

目錄

導論——(1)我們為什麼要研究中國——(2)研究中國之下手處——(3)一種研究的範疇——

(4)綜合的研究

第一章——一部鬥爭的中國史

第一節——由橫的鬥爭到縱的鬥爭……………二〇

(1)亞洲民族混戰——(2)中國的七族四裔——(3)無時或息的種族鬥爭——(4)培植鬥爭能力之天然環境——(5)漢族獨占勝利之理由——(6)勝者對付敗者的一般方法——(7)漢族對付戰敗民族之方法——(8)由橫的鬥爭到縱的鬥爭——(9)階級對立的物質條件——(10)強者的階級哲學

第二節——階級對立之長期的歷史……………三〇

- (11) 歷史上的一個關鍵——(12) 統治階級之主要成份——(13) 官僚與地主——(14) 階級對立之理面——(15) 所謂政治——(16) 農民與統治階級的關係——(17) 農民的暴動——(18) 民衆暴動的原因——(19) 民衆暴動的導火線——(20) 民衆暴動的對象

第三節——由階級對立到新的種族鬥爭……………五〇

- (21) 階級對立時之種族鬥爭——(22) 歷史上又一個關鍵——(23) 新的種族鬥爭史——(24) 鴉片戰前中外鬥爭大勢——(25) 鴉片戰前中外鬥爭大勢(續前)——(26) 增長增高的經濟壓迫——(27) 武力的壓迫——(28) 武力的壓迫(續前)——(29) 經濟侵略的永久保障——(30) 武力的壓迫與經濟侵略的消長——(31) 反抗運動舉例

第二章——經濟之辯證的動態……………五五

第一節——原有經濟之動的研究……………七五

- (1) 決定經濟的天然環境——(2) 農林國——(3) 土地私有制之成立——(4) 真的兼併與假的均分——(5) 地租略略——(6) 建於地租之上的工業——(7) 工業的兩系——(8) 商業與商業資本——(9) 農村中的三種毒物

第二節——中國經濟之變動……………九七

- (10) 商業資本的新活動——(11) 由農村都市到國際市場——(12) 手工業的破產——(13) 權利的挽回與游資的聚

集——(14)由地下之富到地上之富——(15)由帆船運馬到輪船火車——(16)由舊工業到新工業——(17)由錢莊
運到新式銀行——(18)民族資本主義的成立

第三節——國際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一七

(19)國際資本主義方盛民族資本主義萌芽——(20)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相反對——(21)國際資本主義與
民族資本主義相融合——(22)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相競爭——(23)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24)中國經濟
發展的結果——(25)國際資本主義者在華的投資——(26)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系統中之作用——(27)中國經濟之
發展的動機

第三章——社會階級之重組 Regrouping……………四二

第一節——舊社會裏的階級……………四二

(1)階級對立與剩餘農品——(2)統治階級概論——(3)統治階級中之官僚——(4)統治階級中之地主——
(5)被壓迫者——(6)被壓迫的農民——(7)被壓迫的手工業者及小商人——(8)富商大賈之社會地位——
(9)剝削關係概論——(10)剝削制度下之兩種產物

第二節——社會階級之重組 Regrouping……………一六五

(11)剩餘物與剩餘人口之結合——(12)現代資本家之抬頭——(13)由官僚地主等到現代資本家——(14)無產者

- 之出現——(15)資本主義生產制下之青年與婦女——(16)由農民手藝工人等到無產階級——(17)新時代的智識份子——(18)智識份子之種類及社會地位——(19)高等游民與流氓無產者——(20)兵與匪——

第三節——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社會階級

- (21)華工在世界社會關係中之地位——(22)豬仔販運制下之華工——(23)各國資本家之侵佔中國——(24)買辦制度及買辦——(25)買辦之社會地位——(26)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商人——(27)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農民——(28)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工人——(29)中國智識份子之新作用——(30)本章之總結

第四章——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政治)

第一節——概論及史的觀察

- (1)資產階級的政治論——(2)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論——(3)中國政治的性質——(4)地主政治——(5)政治思想——(6)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政治的退化——(7)維新——(8)各種政治的權柄——(9)社會階級的衝突與政權的動搖——(10)清政權之動搖與新政權之產生

第二節——軍閥政治成立之經過

- (11)舊政權的動搖及對帝國主義的爭執——(12)對外的軍事準備——(13)軍閥勢力之系統的發展——(14)舊政權的動搖及對民主勢力的爭執——(15)民主勢力之主要成份——(16)準備在民主勢力中之地位——(17)辛亥革命

與滿清政權之瓦解——(18)民主勢力與軍閥勢力之衝突——(19)軍閥政權之確立——(20)軍閥政治概論

第三節——帝國主義下之軍閥……………二六三

(21)近三十年中國政治變動圖解——(22)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範圍——(23)帝國主義者在華的領事裁判權——
(24)帝國主義者在華的軍警——(25)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利用軍閥——(26)利用軍閥之目的——(27)利用軍閥之目的——(28)利用軍閥之目的——(29)世界政治中之中國軍閥

第五章——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二(教育)……………二六五

第一節——舊教育之工具性……………二八三

(1)教育與社會階級——(2)中國舊社會階級與教育等差——(3)維持身分的教育——(4)請求治術的教育——
(5)治術教育與選舉制——(6)治術教育之目的——(7)治術教育之成果——(8)農工如何教育子弟——
(9)舊教育之根本精神與工具性——

第二節——教育的維新……………三〇四

(10)環境之變遷——(11)廢科舉——(12)設新學校——(13)派遣留學生——(14)翻譯西書——(15)資本主義教育之成立——
(16)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一——(17)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二——(18)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三——

第三節——所謂實辦教育……………三二四

- (19) 殖民地的新教育——(20) 國運風氣——(21) 社會勢力與中國人之歐化——(22) 社會的工具與中國人之歐化——(23) 社會教育之勢力——(24) 社會學校學生之發達——(25) 買辦教育概論——(26) 買辦教育與出版界——(27) 出版事業之買辦性

第六章——思想的變動

第一節——最便於統治階級的舊思想

- (1) 周末思想發達之原因——(2) 孔老墨三大派——(3) 不十分得勢的道家——(4) 為何墨家也不得勢——(5) 孔家學說得勢之理由——(6) 董仲舒及其天人合一說——(7) 韓愈與孔家學說——(8) 宋明理學與朱子——(9) 暗地成功的法家

第二節——資本主義社會之思想的傳佈

- (10) 思想之轉變——(11) 歐前——(12) 新時代的張之洞——(13) 歐前——(14) 新民主義與真的環響——(15) 歐前——(16) 「德」「賽」「賽」兩先生暢遊中國——(17) 工具主義——(18) 所謂綜合的道德論——(19) 略評綜合的道德論

第三節——無產階級哲學之勃興

- (20) 現代中國與哲學運動——(21) 伊利亞德之「神」——(22) 黑格爾的邏輯與「變」——(23) 由唯心到唯物

——(24) 歷史的唯物主義——(25) 辯證唯物主義之宇宙觀——(26) 辯證法——(27) 社會階級之互相衝突——
(28) 社會主義

結論——世界之統一與再分裂……………四二五

(1) 中國之辯證的變動——(2) 世界之橫的統一與縱的分裂。

中國社會之現狀

導論——本書之目的及範圍——

一、我們爲什麼要研究中國

最近研究中國問題，最具熱心，且最有成績的，並不是國人自己，而是國際資本主義者。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時，與之偕來的，有三種值得注意，而我們向未十分注意的人物。第一爲教士，第二爲稍解文事，隨大商人來幫忙的書記或與此相似的職員之類，第三爲領事及其所帶來的一切人物。這三種人隨着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到了中國；眼看着中國事事落後，而事事都有希望；於是心爲之動，每乘自己職務閑空之時，研究中國問題。他們利用媚外以謀衣食的華人的幫助，把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地理，中國的制度，中國的人情，中國的風俗，中國的富源等等，一概描寫出來，刊爲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籍。這些似通非通的書籍之中，名目較爲冠冕堂皇的，我們祇要到上海大馬路西書店裏一看，便可看出無數百種。這些書籍，對於國際

資本主義者有什麼影響？概括的說來，第一把中國的內情明白暴露於國際資本主義者之前，使他們知道世間尚有偌大一塊未經開拓的肥土；第二，把野心較大的富商大賈以及各大資本家，一一引誘到中國來，擾亂中國；第三溝通中外的隔閡，作了建設中外友誼關係的預備工作。分別詳述，當不止這三項；但更概括一點說，却又祇是一個影響，便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作統治中國的先導！

我們自己於今也要開始研究中國了；我們再不要妄想，以為翻譯幾本外國書，便可以解決中國問題了。我們究竟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呢？這似乎是任何人都知道，實無須解答之問題。研究中國，當然不外要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用意，當然又在要改造中國。事實上自然也有許多人是為瞭解中國而瞭解中國的，他們以為做了一個中國人，就應當知道中國的種種。其實為瞭解中國而瞭解中國，實不如為改造中國而瞭解中國之有意義。站在國際資本主義方面研究中國問題的，祇是替國際資本主義者作統治中國的先導。站在我們自己的地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目的應該在改造中國。所謂改造中國，差不多就是把中國從國際資本主義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站在國際資本主義方面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拼命把中國拖到國際資本主義統治之下去。站在我們自己方面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應該把中國從國際資本主義統治之下解放出來。所以研究中國問題這件事，顯然有兩個立場：一則國際

資本主義的立場，一則我們自己的立場。前者的立場，必擁護國際資本主義；後者的立場，必反對國際資本主義。今日研究中國問題，在這兩者之間，若不能決擇，若不能站住一邊，其研究必無結果。我們研究中國問題，必具有反對國際資本主義以圖改造中國的最大願望。

二、研究中國之下手處

本着改造中國的最大願望去研究中國，其下手之處有兩個不同的方面：第一從歷史的傳統勢力中去尋找中國；第二從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去尋找中國。前者係從縱的方面研究，後者係從橫的方面研究。今日的中國，即一般西洋人之所謂摩登支那 *Modern China*，決不是由一方面的勢力造成的。單祇有歷史上傳下來的舊勢力，決不足以產生今日的中國，單祇有從外國侵進來的新勢力，也不足以產生今日的中國。今日的中國，實是歷史的勢力與世界的勢力合造成的。歷史的勢力從上向下移；世界的勢力，從外向內侵。兩者相交，互相衝撞，互相激盪，乃型成一個今日的中國。

我們要研究中國，於這兩種勢力中，如果祇注意一種，便不能得到明白的瞭解。近來研究中國的書籍，未嘗沒有。但都是就事論事，拿着一個問題便從該問題之本身，直截下手；不從這縱橫的兩種勢力互相衝撞，互相激盪之處去觀察。結果總不能把今日的中國看得透澈。高明一點的，把問

題放在歷史的勢力中去觀察，或把問題放在世界勢力中去觀察。但如此觀察的，又常常膠執一偏，而不注意兩種勢力之相撞。看重歷史勢力的人，便爲歷史勢力所壓倒，所遮掩，看不見世界的勢力。於是研究中國問題時，埋頭在歷史上深鑽，一若中國與世界不相干者。看重世界勢力的人，便爲世界勢力所壓倒所遮掩，看不見歷史的勢力。於是研究中國問題時，其所發表的著作，好像專作論文，與中國好像不相干。後者之例，我們隨處可以看見。現在書肆中有許多新書，題目是討論中國問題的；然打開細讀，幾乎祇有嶄新的理論，看不見扼要的實際材料。這類的書見解好極了的也有，但總嫌空疏；不是富有閱歷的人，總不易把書中的理論聯想到事實上去。前者之例，也隨處可以看見。現在書肆中也有好多關於研究近幾十年中國學情的書。其中條理系統之分明，事實之確鑿，斷不容否認。但讀了之後，往往等於不讀；始終看不出其用意之所在。我們研究中國問題，於歷史的勢力及世界的勢力，都不可忽視。我們要於這兩種勢力互相衝撞之處尋找中國。忘却了歷史上傳統勢力的下移，將尋不着今日中國的基礎。忘却了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尋不着今日中國的來因。

三、一種研究的範疇

把下手之處決定了，便應當開始研究。我自己於不久以前，曾定了一個研究中國問題的範疇，并預備著三本小書，以發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一日中國社會之結構，

二曰中國社會之變化，三曰中國社會之前途。第一書專從歷史上下手，預備找出歷史上中國的真相；第二書專從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下手，想找出中國在這發展過程中所以轉變的動因，及變化的痕跡。這兩種研究偏重於解釋現在的中國。第三書，則打算把我們理想的中國作一種簡略的描寫。蓋既把歷史上的中國研究了一個大概，又把國際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中國變遷的大勢研究了一個大概；照順序講，應該於中國社會之前途有所描寫。於中國社會之結構一書中，舉出兩個主要階級：其一為藉政權以奪取經濟利益的統治階級，另一為專事生產，因沒有政權而被人剝削的階級。歷史上的變亂，便是這兩階級衝突暴發的時候。歷史上的太平，便是這兩階級相安於無事的時候。在中國社會之變化一書中，我認為歷史上傳下來的中國，近幾十年之所以遭遇大變，以及變化的結果，都與國際資本主義直接相關。近幾十年來中國一切變動，乃國際資本主義造成的。變動的結果，又恰恰幫助國際資本主義之繼續發展。倘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未侵入，中國或者仍循歷史上的慣例，治亂相間的綿延下去。然國際資本主義畢竟進來了，所以中國也畢竟成了今日的中國，或摩登支那。循此發展，當然有一個我們理想的前途。我想寫中國社會之前途一書，便是要把這理想的前途加一種描寫，以作為我們今日努力的標準。但於今我這計劃放棄了。我覺得理想的描寫，不如

事實之分析有益。於是我決計不寫中國社會之前途，而寫這本中國社會之現狀。

四、綜合的研究

在本書裏，我想把中國問題作一種較為周遍的研究。所謂周遍，並不是說我所研究的，如何完全無誤；祇是說所關涉的較多，把大家時常注意的幾個問題，理出一個頭緒。在第一章裏，我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動的方面，或鬥爭的方面，總檢閱一番。中國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是一部鬥爭史。幾個鬥爭的時代，幾種鬥爭的方式，在本章中都概括的說出了。鴉片戰爭的前後，中國開始與世界各強大的民族鬥爭。到今日將近百年了。在這時期之內，中國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尤其是近三十年之內，變化的速度更大。所謂今日的中國，或摩登支那，便在這短時期內完全出現。第二章到第六章，都是講摩登支那所以出現的過程的。換言之即是講近幾十年內，中國的各種變化的。第二章講經濟的變化，第三章講社會階級的變化，第四章講政治的變化，第五章講教育的變化，第六章講思想的變化。近幾十年中國的變化，當然不止這幾種。我提出這幾種來研究，不過舉實例而已。這些變化，都是在國際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其變化的原因，變化的方式，變化的結果，都有一定的特質。據我個人最近的觀察，我覺得種種變化的原因，都不外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高壓；變化的方式，不外把中國的種種，變成與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趨

勢相融合相調和，換言之，即是歐化；變化的結果，恰恰幫助國際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事事都是這樣變化了，中國也就成了一個歐化的中國，西洋人譽之爲摩登支那。但正在這盛名之下，所謂中國，實際上便完全沒有了，祇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國內的一切，都成了世界經濟網裏面的東西。都要從世界經濟網裏面去察看，才能看出意義。變化的現階段，實在值得注意，實在值得研究。

1

1

1

第一章 一部門爭的中國史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幾乎完全是門爭的事跡所造成。自有史的時候起，一直到今日止，充滿全歷史的祇是門爭。且自今以後，當然仍祇有更劇烈的門爭。現在爲敘述方便起見，且分作下面的幾個時期，各期門爭的主要形式，一併舉出。第一期是由種族門爭到階級對立，或由橫的門爭到縱的門爭的時期，秦以前屬於這一期。第二期完全爲階級對立的局面或縱的門爭所占據；自秦至清末鴉片戰爭時屬於這一期。第三期則是由階級對立到新的種族門爭，或由縱的門爭，到另一種橫的門爭的時期。自鴉片戰爭到現在屬於這一期。第四期由新的種族門爭到新的階級對立，或由橫的門爭到另一種縱的門爭；自今以後，屬於這一期。照我這樣看來，全部歷史中，幾乎祇有門爭，而沒有和平，未免與事實不合。不過我也曉得，歷史上常有和平的時候；但和平的時候，都祇是準備戰爭的，實

在就是戰爭的另一面；因此謂全部歷史都是鬥爭史并無不可。不過要折服這種講法，也很容易，且可以舉出同樣充分的理由。謂和平是準備鬥爭的，既然可以說得過去；難道謂鬥爭是醞釀和平的，就說不過去嗎？歷史上大亂之後，不是緊接着太平嗎？照這樣看，拿全部歷史當作一部太平史亦無不可。本來中國歷史是治亂相尋的，是一治一亂連續起來的：太平的時候，準備變亂，變亂的時候，醞釀太平。從亂的方面看去，謂全部歷史是『亂』的歷史；從治的方面看去，謂全部歷史是『治』的歷史，那當然是各人的完全自由。我於今看重的是亂的方面，所以說中國史爲一部鬥爭史。

第一節 由橫的鬥爭到縱的鬥爭

一、亞洲民族述略

在敘述中國的主要民族互相鬥爭之先，爲圖線索清楚起見，最宜把亞洲的民族略爲一述。活動於亞洲境內，彼此互相衝突的民族，就顏色分別，有黃種與白種兩者，黃種大都在蔥嶺以東活動，白種大都在蔥嶺以西活動。白種與我們所要敘述的對象關係較少，且不管他。至若黃種，則依地勢的差異，可分爲南方系及北方系兩部。北方系的黃人，主要的有通古斯族，滋生於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蔓延於滿洲全境，朝鮮北部，及黑龍江濱。蒙古族，原來滋生

於貝加爾湖東邊，後來南下，蔓延於內外蒙古，黃河套，及天山北路等地。突厥族，原來滋生於阿爾泰山附近，後來蔓延於西伯利亞以南，天山南北路，及中亞一帶。南方系的黃人，主要的有漢族，滋生於中國本部，蔓延於滿洲，朝鮮，及安南等地。交趾支那族，原居中國本部，後被漢族驅到西南深山中，并蔓延於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安南，暹羅及馬來半島等地。西藏族，蔓延於青海，西藏，克什米爾，尼帕爾，不丹，緬甸等地。此外有大和民族，蕃殖於日本，三韓民族，蕃殖於朝鮮。其語言文字頗類北方人，可稱之爲準北方系的黃人。又有一支東方民族，蔓延於山東東邊，及山東以南之沿海，當然屬之南方系。南方系的黃人，其語言皆單音，文字多衍形；北方系的黃人，其語言皆複音，文字多衍聲；這是兩者一個最重要的區別。

二、中國的七族四裔

中國的民族，固然都是亞洲的民族；但亞洲的民族，并不都是中國民族；不過亞洲民族之中，有一大部分是中國民族就是。中國民族究竟是什麼？有人說，即漢，滿，蒙，回，藏等五族是也。漢族當然是亞洲民族中的漢族全部，滿族大概是亞洲民族中通古斯族之最大部分；蒙族大概是亞洲民族中蒙古族之最大部分；回族大概是亞洲民族中突厥族之最大部分；藏族大概是亞洲民族中西藏族之最大部分。更有人說，中國民族乃六族所合成。除上述五族

之外，苗族實爲舊日中國境內活動之主要角色。苗族當然是亞洲民族中交趾支那族之一部分。六族說比五族說，當然較爲近真。但最近更有人謂中國民族乃七族所合成。除漢，滿，蒙，回，藏，苗六族以外，東方沿海居民，往日實爲獨立的一族。這一說極有道理。歷史上所謂東夷，大概就是這一族人。

上述七族人，除漢族外，其餘六族，常被稱爲四裔。何謂四裔？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也。東夷大概是指東方沿海民族的一部或全部而言；西戎大概是指西方藏族的一部或全部而言；南蠻大概是指南方交趾支那族的一部或全部而言；北狄大概是指北方通古斯族，蒙古族及突厥族（即滿，蒙，回族之所自出）的一部或全部而言。漢族則恰恰位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中。拿夷，戎，蠻，狄等名詞來作爲輕侮各族之用，固然是糊塗之極；但漢族地位，恰恰在東，西，南，北，各方的民族之中間，却是真的。各民族互相鬥爭，漢族獨得勝利（當然不是絕對的全勝）這個「中間」的地位所予的助益不少。

三、無時或息的種族鬥爭

這些民族，同處在中國境內，究竟是和平相處，抑互相鬥爭？關於這個問題，西洋有些學說可供參考。有的說：人類在自然狀態之下，是和平相處的；有的說：

人類在自然狀態之下，是互相鬥爭的。這種紛爭，我們無須於決擇；因為我們祇能就事實說話。就事實說，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所看見的民族，實是互相鬥爭的；歷史上實找不出和平相處的證據。反之互相鬥爭的證據，却是不少。例如（1）漢族與苗族的鬥爭。苗族自始即居於長江中下游的兩岸，與漢族對抗。古時候其族曾有強國曰九黎；其君主叫做蚩尤，曾乘漢族炎帝榆罔之衰聯合許多小苗族，向北方對漢族作總攻擊。曾略取了中原的大半，且有驅漢族出塞外之勢。漢族諸侯有熊國之君公孫軒轅聯合漢族中的許多小族，與蚩尤戰於涿鹿，并斬了蚩尤，恢復了黃河流域的地盤。於是苗族退處江南。少皞氏衰，九黎復亂；幸顓頊即位，隨即把苗族征服下來了。舜攝政時，三苗又作亂，舜乃驅其頑梗者於三危之地。禹攝政時，苗族還是作亂。最後漢族勝利了，苗族乃竄到今之湖南廣西等地。這是互相鬥爭的一種。（2）漢族與蒙古族的鬥爭。黃帝之時，曾有北逐葷鬻的事。葷鬻當屬於蒙古族。所以漢蒙互鬥，在黃帝時就開始了。唐虞三代的時候，葷鬻的勢力極其猖獗。商朝末年，葷鬻（即獯鬻）且進寇今之陝西，攻豳，豳之君主抵抗不住，竟逃到岐山之下。帝乙在位時，又有命南仲城朔方，備獯鬻的事。獯鬻大概也屬於蒙古族。這是互相鬥爭的又一種。（3）漢族與藏族的鬥爭。帝堯十六年，曾有司空代曹魏之戎的事。夏帝癸三年，有畎夷入岐反叛的事。

陽甲三年，有西征丹山戎的事。所謂曹魏之戎，猷夷丹山戎等，都屬於藏族。藏族之中，祇有氏羌僻處青海，雖漢族較遠，與漢族鬥爭的事少一點。若猷夷，西戎等等，雜居於今的陝，甘等地，與漢族互相鬥爭的事，特別的多。周室勃興，武乙三十年的時候，周師伐義渠，獲其君以歸。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文丁元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四年，伐余無之戎；七年，伐始吁之戎；十一年，伐翳徒之戎。帝乙三年，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周。三十六年，西伯伐昆夷。周穆王十二年，伐犬戎；十三年，王西征，這是鬥爭的又一種。此外漢族與同族的鬥爭，漢族與滿族的鬥爭，也都沒有好多休息的時候。我們標題曰無時或息的種族鬥爭，實不爲過。

這些民族，爲什麼要互相鬥爭呢？唯心論者一定會說：人有好鬥的天性。專門研究本能的心理學者，一定會把鬥爭當作先天的本能，而與求食的本能，求愛的本能，並列起來。但我們這裏所舉出的這許多鬥爭，却用不着拿本能來解釋。在我們看來，這些民族之互相鬥爭，祇是爲着要佔領優越之地，以圖生存。最初生產工具極幼稚的時候，人類生存，全靠天生現成之物。但天生現成之物，究竟或多或少，或優或劣，或適於生存的需要，或不適於生存的需要，都的憑氣候，地勢，地

質等等而決定的。各族所處的地位，既不相同；則所遇的氣候，地勢，地質當然也因之不同。於是各族所能有的天生現成之物也決不能一致。這樣一來，凡地位較壞的民族，因天生現成之物不十分適於生存需要之故，常向地位較好的民族進攻。地位較好的民族，因天生現成之物，最適於生存需要之故，便常爲各族環攻的對象。歷史上無時或息的種族鬥爭，即原於此，用不着說民族有好鬥的天性，用不着說人類有鬥爭的本能。并且上面所舉出的各種鬥爭，也很足以證明我們這種解釋。上面所舉的許多鬥爭之中，漢族顯然是各族環攻的對象。苗族與牠門，蒙古族與牠門，藏族與牠門，他如滿回各族，也無不與牠門。但牠既被各族環攻，常處四圍壓迫之中；爲何反而常常佔着優勝？這不是一件不可解的事嗎？其實這并不稀奇。漢族之被各族環攻，正是牠能戰勝各族的證據。牠若不是地位較好，所得天生現成之物較優，決不致被各族環攻。牠既有較好的地位，又有較優的可以資生的天生現成之物；因此雖被環攻，却仍能得到相當的勝利。

四、培植鬥爭能力之天然環境

鬥爭的原因，是天然環境決定的，已如上述。鬥爭的能力，也是天然環境培植出來的。各民族所處的地位不同，牠的鬥爭能力也不同；在長期鬥爭之中，所得結果當然也有差異。中國歷史上各族互相鬥爭，漢族得了最大的勝利，苗族完全失敗，滿，

蒙，回，藏各族所得的勝利不如漢族；所遭挫敗，不如苗族；都是天然環境決定的。各族所處的地位，若依氣候，地勢，地質，出產各方面講起來，顯然可以分爲三等。滿，蒙，回，藏各族的地位最壞。然而最壞的地位，從另一方面看，却有相當的好處，即養成各族長久存在的能力是也。苗族的地位太好，其實太好便是壞處。壞處在那裏？喪失苗族的鬥爭能力是也。漢族處於這兩極端之間，其地位之壞不如滿，蒙，回，藏各族；好處也不如苗族。因之牠在南方可以消滅苗族；在北方可以驅逐滿，蒙，回，藏；而得到最大的勝利。現在且舉一點事實來證明這一段說話。先就滿族說罷，滿族處於滿洲，地位恰在北緯四十五度的南北；其氣候較內地冷多了；但熱的時候，也很嚴酷難受。其生產品，我們今日所知道的較爲重要的幾種，直接可以資生之物，不過皮，毛，豆，麥，木材，魚，鹽等等，現在的物產，都祇是如此，則幾千年以前當更壞。人民的生活很苦，都帶有游牧民族的性質，都很粗暴剛猛兇悍。幾千年以前，當然完全是游牧民族。蒙古族所處之境多是內外蒙古，大都在北緯四十五度到五十度之間。因地多沙漠，氣候的寒或暑都極酷烈。出產直接可以供生活之需要的，祇是馬，牛，羊，駱駝，騾，驢一類的牲畜。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的生活，當然完全是屬於游牧性質的。回族處於今之新疆，地位在北緯三十五度至四十七度之間。天山橫貫其中，又有一片

大沙漠，氣候極極了。出產祇有葡萄，瓜，蘋果，鹽，馬，羚羊之類。這迥然與內地不同了，所以人民的生活，完全是游牧生活。至於藏族，其活動的地方，主要的是青海西藏。這些地方，雖然位於北緯三十五度的上下，氣候却依然不佳，寒暑都很酷烈。主要出品頂好的祇是豆，麥，青稞之類，其餘的都早犂牛，羚羊，山羊等等。所以人民的生活，也是屬於游牧性質的。綜合看來，滿，蒙，回，藏四族，因所處的地位，與漢族及苗族處境不同，氣候，土質，出產等等把他們的生活樣式決定了；因之他們鬥爭的能力也有其不同的地方。苗族的境遇，與他們全然相反；位於今日的長江中下游的兩岸。土地既平曠，氣候又溫純，物產更豐富。這可以說完全是一片最適於生活的土地。苗族處在這種地方，受了天然環境的訓練，生活也型成了特殊的樣式。滿，蒙，回，藏各族的生活是游牧的，苗族的生活，便可以說是農業的，農業的生活與游牧的生活截然不同，所以農業生活訓練出來的鬥爭能力也與游牧生活訓練出來的鬥爭能力完全兩樣。漢族位於滿，蒙，回，藏與苗族之間，天然環境，生活樣式，由生活樣式裏培植出來的鬥爭能力，與他們各族都不相同。這一個不同，有分別敘述的必要且在下面詳述。

五、漢族獨占勝利之理由

滿，蒙，回，藏各族的生活既是游牧的，苗族的生活既是農業

的；照進化的道理講，應該由滿，蒙，回，藏來征服苗族，不應該讓漢族獨占勝利。游牧民族之征服農業民族，在歷史上是很有證據可尋的。根布洛域 Cumplovicz，紐曾霍夫 Ratzenhofer 及奧本海麥 Oppenheimer 諸氏在這一方面研究很有成績，幷也尋出了不少的證據。奧本海麥在其所著國家論 (The State)，便把游牧民族征服農業民族的事，從理論與事實兩方面討論，說得非常透澈，我們幾於不能反對。爲什麼在中國獨有一個例外？爲什麼在中國征服農業民族的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另外的民族？爲什麼苗族不消滅於滿，蒙，回，藏各族之手，而獨消滅於漢族？這一個事實，我們有法子說明。這一個事實，不獨不與奧本海麥的學說相抵觸，而且與他的學說相發明。

原來漢族的地位，在各族環繞之中。前面述中國之七族四裔時，便已講到。四裔中之北狄，就是滿，蒙，回各族；南蠻就是苗族；東夷就是東方沿海的民族；西戎就是藏族。漢族沿位於其中。「中」字的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有兩個解釋。第一向內縮小，中的範圍，可以等於零，即「其小無內」之意。就這個意思講，漢族，幾乎沒有，所有的祇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第二向外擴大，中的範圍，可以等於無限，即「其大無外」之意。就這個意思講，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幾乎沒有，所有的祇是漢族。我們於今且折衷於這兩個意思之間，不說沒有漢族，也不說

祇有漢族；而認漢族爲一個雜種。四裔的外層，作爲真正的四裔；四裔的內層，即認爲是雜種漢族。爲何稱漢族爲雜種？因其可以爲四裔，可以爲漢族；同時也可說不是四裔，不是漢族。稱爲雜種，恰得其當。凡雜種較單純種優越些，這是生物進化論所證明的。漢族既然爲雜種，應該較各族爲優越。牠能獨得勝利，這是第一個理由。

其次，牠的地位既然在各族環繞之中，就地理上講，又恰恰在黃河下游的兩岸。例如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於今的山西境內。文王作豐，武王都鎬，都在於今的陝西境內。東周都洛陽，在於今的河南境內。地位適中，恰恰介於純粹的游牧民族與純粹的農業民族之間。氣候既沒有純粹游牧民族所受的那樣壞，却也沒有純粹農業民族所受的那樣好。土地既沒有純粹游牧民族所處的那樣瘠，却也沒有純粹農業民族所處的那樣肥。這種天然優越的環境，把漢族的生活型成一種特殊的，高出純游牧生活與純農業生活之上。因之由生活所訓練出來的鬥爭能力，也超於各族之上。這是漢族獨得勝利的第二個理由。再其次牠沒有游牧與農業兩民族之短處，而有游牧與農業兩民族之長處。純粹的游牧民族，多是兇悍粗暴的，更爲生活所壓迫，祇知奮鬥，無暇顧及文化的發展。純粹的農業民族，多是嬌弱馴服的；更因生活十分容易，幾乎完全喪失抗禦外侮的能力。漢

族因處境不如此兩者，生活不如此兩者，竟沒有這兩者的短處。反過來看，游牧民族的長處及農業民族的長處，牠却都能吸收。如趙武靈王之效法蒙古民族，習胡服騎射，便是吸收游牧民族之長處的一證。又如苗族所發明的刑法戰術之類，漢族都能利用；這便是吸收農業民族之長處的一證。能夠吸收游牧農業兩民族之長處，而沒有游牧農業兩民族之短處；這便是漢族獨占勝利的第三個理由。因這三個理由，所以牠在長期的鬥爭之中，得了勝利。

六、勝者對付敗者的一般方法

漢族得了勝之後，如何對付敗者？在解答這問題之先，應該把勝者對付敗者的一般方法講一講。關於這一層，前面曾提及過的根布洛域，賴曾霍夫及奧本海麥等有些說明。可供參考。根布洛域論種族鬥爭，謂戰勝者對付戰敗者的方法，凡有三個最顯明的：一則把戰敗者殺死，并拿其血肉來當食料。二則把戰敗者當奴隸，要他們替自己作苦工。三則要他們進貢納稅，不一定要他們作苦工了。這三個方法之中，第一個最為殘酷，現在看來，也很稀奇，大概是最早或最原始的種族鬥爭中的現象。但把戰敗者殺死，却不是稀奇的事；歷史上乃至現在，隨處都可以發現實例。至於要戰敗者作苦工，及納貢稅那却尋常極了。奧本海麥的說法，與此略異其方式。他以為勝者之對付敗者，凡有四個不同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裏，勝者毫不客氣，以

殺戮及掠奪的手段對付敗者。在第二個階段裏，勝者爲謀自己利益的擴大起見，停止殺戮及掠奪，把敗者一律拿來替自己作工。在第三個階段裏，勝者所施的壓迫稍稍減輕了；祇要敗者按期送一部分生產品給他們；雖有小過失，也可以容忍了。在第四個階段裏，敗者差不多已經同化了，馴服了，漸漸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了。（英人許印度及埃及的部分的自治，以及各帝國主義者漸漸傾向於取消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也很像這個意義。）奧氏雖分了四個階段，然所說的，根本上與根布洛域所說沒有好多不同。我們可以認他們所說爲勝者對付敗者的一般方法。歷史上得了勝利的民族，對付被征服的民族，所採的方法，未必與此全同；然而其根本作用，却初無二致，不過要把被征服的民族訓練到馴服的程度而已。

七、漢族對付戰敗民族之方法

漢族對付戰敗民族的方法，凡有種種的不同。舉其大略言之，可分爲政治的，社會的，教育的三方面。先說（A）政治的方法。所謂政治的方法，意即謂漢族不許他族有政權。例如自軒轅至商周，凡爲天子的，都是黃帝的子孫；而受封爲諸侯的，也都是黃族的子弟。吳越本爲蠻夷地方，受封爲君的，不是土著，而是所謂先聖之後。萬一不能以本族之君統治的地方，則設監察。史稱黃帝畫州分野，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太監，監於萬

國。春秋以前，世卿的制度很盛行；列國執政的大夫，都是貴族；異族絕不能加入。這完全是防止異族取得政權的辦法。至於對付異族原有的君主，則採殺戮政策。例如禹會諸侯於塗山的時候，防風氏檮，禹便把他殺了。這便是把異族已有的政權奪歸自己的辦法。又如武王率諸侯以伐殷的時候，同他効勞的本有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但天下大定之後，這些人並沒有得着什麼。立國七十一，受封而治其所謂兄弟之國的凡十五人；治所謂姬姓之國的，凡四十人。周家的子孫，祇要不是糊塗虫，都受封爲諸侯。其餘受封的，不是同種的功臣，便是先朝的後裔。異族已有的政權，加以剝奪；應得的政權，不許享有；這是鎮壓異族最扼要的先着。

其次(B)社會的方法。在三代以前，己族人民與異族人民在社會上的地位顯然兩樣。與己同族的，叫做百姓；不與己同族的，叫做黎民。史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的，祇有十四人。書禹貢「錫土姓」。大概姓是極尊貴的東西，必須有待於帝王的錫與。異族於此，是不能妄有所希冀的。又說文云：「民，瞑也，盲也，蓋皆愚昧無知之義」。并且「民」字，古文作民，與古文「奴」字(𠂔)其義相近。所謂民皆含有奴隸之意。而苗氏却是九黎之君。可見「黎民」兩字，實漢族鄙視異族的字眼。這顯見得異族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如漢族之優。又黃帝問於岐伯曰：「吾子百姓，養萬

民」；百姓則親之如子，萬民則祇言養；社會上親疎之分已可概見。書稱：「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這樣差等分別，更可見黎民地位之卑賤。然而卑賤之地位，却正是漢族所以待異族的。美國人喊黑人爲黑奴，其用意頗與此相彷彿。

再其次（C）教育的方法。三代以前，庠序學校，遍於國中；然都是教育本族人的，不是教育異族人的。我們祇要看春秋以前著作淹博之材都出於君相貴族，而不出於異族，便可以明白這個道理。這也可見本族與異族之間教育的不平等。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大概爲士的極少異族人，所以應該尊重，使恆爲士。爲農的極多異族人，應該輕視，使恆爲農。書彛典云：「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國語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民多異族，官是己族。異族的人應當爲本族人種田。這與根布洛域及奧本海麥等所說使異族作苦工，意相彷彿。又夏書禹貢云：「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荒服。」綏服之中，「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文教所及，僅及於綏服之內三百里的地方。至於要服，則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則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這都是文教不及的地方。大概漢族征服他族

之時，自己的人，聚居於一個中心地帶；他族的人，則散居於較遠的地方。受教育最多的人都是本族的人；受教育最少乃至完全不受教育的人，都是他族的人。漢族既然把他族征服了，支配處置之法，當不止政治，社會及教育的三種。然而這三種，却是最有力的，最足以使他族馴服，而爲己族中長久的被剝削被壓迫者。

八、由橫的鬥爭到縱的鬥爭

漢族把異族鎮壓下來之後，鬥爭的方式，全然變了性質。前此的鬥爭爲橫的，爲種族與種族間的鬥爭。後此的鬥爭則爲縱的，爲階級與階級間的鬥爭。這一個轉變，未必是起於一朝一夕；并且所謂種族與種族鬥爭的時候，各種族自己內部，未必全然沒有可以構成階級對立的因子。所謂階級與階級對立的時候，各種族間互相傾軋的事情，未必全消滅了。但我們就大體的情勢看，很可以把漢族征服異族的這個過程，視爲一個由橫的鬥爭到縱的鬥爭的過程，視爲一個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過程。漢族的勢力一天一天膨脹，領土一天一天擴大，受其支配的人民，一天一天加多。於是向來與各族並立的漢人，無形之中，成了支配階級。向來與漢族較勝負的異族人，因戰敗之故，或則遭殺戮，或則拋棄自己原有的地位而逃跑。未遭殺戮，且未逃跑的，在漢族的新勢之下，成了必然的被支配階級。大概北方的游牧族，戰敗之後遭殺戮的較少，向

北逃跑的較多，後來轉土重來的機會也獨多。南方的農業民族，遭殺戮的較多，逃跑的較少，後來轉土重來的機會也獨少。

漢族把異族征服了之後，於異族已有的政權，加以剝奪；應有的政權，不予享有；把政權集於自己一族之手。於是一方面有有權的治人階級，另一方面有無權的被治階級。異族人被征服了，無享受教育之權；受教育乃漢人獨有之機會。但勞苦工作，却是異族人所不能不担任的。於是一方面有受過教育的虛閑階級，另一方面，有從未受過教育的勞動階級。虛閑階級所食的，必出自勞動階級之手。漢族人拿了政權去向異族人擄取食料；異族人因沒有這個權力祇好唯命是聽。於是一方面有吸取他人的膏血的剝削階級，另一方面，有供給他人以生活資料的被剝削階級。有政權的，虛閑的，剝削他人的，成爲一個總體，我且稱之爲統治階級。無政權的，勞動的，被人剝削的，也成爲一個總體，我且稱之爲被壓迫階級。不過於此有應申明之一點。統治階級，未必是漢族的全體；漢族之中，未必個個都是統治者，未必無一人落入被壓迫階級之中的。反之，被壓迫階級未必是戰敗之族的全體，或異族人的全體。戰敗者或異族人未必個個都是被壓迫者，未必無一人跑入統治階級之中的。但這與階級對立的事實并不抵觸，與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事實并不抵觸。我們這裏所注重的，

祇是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事實，我們並沒有打算要担保各階級中成分的血統是如何的清純。

九、階級對立的物質條件

階級既已對立了；要維持這個對立的局面，須有一定的條件。

原來階級對立的局面，是建築在剝削關係之上的：一方面爲剝削者，另一方面爲被剝削者。假如沒有這個剝削關係，階級對立的局面，決不能持久。縱令能持久，其性質一定與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不同，我們大可以不討論。祇有建築在剝削關係上的階級對立的局面，在歷史上才很嚴重，才值得我們注意。中國的種族鬥爭既已轉入了階級對立的階段以後，統治階級便向被壓迫階級施行剝削。但這種剝削不是偶然可以施行的，必有其可以施行的條件，條件爲何？一言以蔽之曰：要生產產品有剩餘。這一個條件，即階級對立的局面所以維持長久的物質條件。這個條件的完成，凡有四事可述：一曰勞動人口之增加，二曰生產工具之進步，三曰生產事業之發達，四曰生產物品之剩餘。

(A)漢族征服異族以後，自己族內一部分人甚至全體的人成了統治階級，要依賴他人的生產品以爲生。倘能生產的勞動人口沒有增加，則將無所施其剝削，生活必陷入絕境。幸而戰勝他族之後，疆土擴大了。隨着疆土之大，勞動人口乃日日增加。每克服一塊新土地，該地人民沒有逃走，或沒有遭殺戮的，便一律成了漢族之剝削的對象，替漢族生產。(B)不過生產者雖然增加了；但生

產者自己也是要消耗的，倘他們的生產品，祇足以維持自身物理的生存，那末剝削者仍無所施其剝削。又幸這時，生產工具一天一天的進步，可以增加生產的速度。通考田賦考引石林葉氏之言曰：『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牛。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則孔子時固已用犁。此二氏所以爲字也』。又莊子天地篇載子貢告抱甕灌園之丈人的話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木爲基，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効如沃湯，其名爲槲。」這都足以證明生產工具的進步。(C)生產工具進步了，生產事業乃隨着發達。漢族佔領了許多肥沃的新土地；如以前苗族的地方，都歸漢族佔領了。又增加了許多勞動的新人口；再加上生產工具的進步；那末生產事業當然發達。發達最快的便是農業。(D)生產事業既然發達，生產品乃有剩餘。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這個偉大的計畫，非生產品大有剩餘是辦不到的。憑這個計畫，也可見漢族征服他族以後，生產品剩餘的一般。生產品有了剩餘，剝削關係乃能存在，因之階級對立的局面，乃得長久維持。(參看拙著中國社會之結構二一頁到二六頁)

一〇、強者的階級哲學

由橫的鬥爭到縱的鬥爭，或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種種，講到這裏，似乎可以收場了。但我在這裏，還要拿出一個這樣的小標題，來講幾句。原來階級對立的局面，是物質原因湊成的；既經成立之後，復又反映爲一種思想；這種思想的自身，轉又成了維持階級對立的一個有力的動因。中國階級對立的局面成立以後，隨着發生的，便是階級思想，即我所謂強者的階級哲學。先秦時，孔墨兩家，都富有這種思想。孔子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早就告示統治階級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孟子謂「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更是承認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必須對立。墨子甚倡兼愛之說，語多擁護被壓迫者的利益。但同時却又大講其所謂上同。在「上同」的意義之下，把階級的組織，定得穩妥之極。然把階級思想表示得最透徹的，還是孔家。孔家的正統派孟子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後來同派的健將韓愈於勞心者及勞力者之外，更找出了一個中間階級。他在原道篇裏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於規定上中下三級之意義外，更規定了他們應有的職

務。孟，韓都是孔家的正統派，他們的階級思想太清楚了；所以我引他們這兩段話，也不止一次。階級的事實先有了，階級的思想必然發生：這是極平常的事。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九號，美國有一個律師名奧孔納 O'Connell 在「對南方人的公道」一個標題之下，於紐約發表其演說詞道：「諸君！黑奴的奴隸境遇，是自然所賦予的。他有力氣，他適於作工。但自然給了黑奴以力氣，同時却又不許他有管理自己的聰敏，及好好作工的心願。（衆鼓掌）幸喜這個自然雖不讓他有作工的心願，却能賜他一個主人；主人能將作工的心願強交給他，使他在適宜的天然環境之下，爲自己及爲管理他的主人作一個有用的奴隸。我以爲：讓黑奴仍處於自然所賦予的地位，派一個主人去管理他，這決不是不公平道。並且他的主人要管理他，要使他於已於人，都成有用的，也非用氣力用材智不可。所以他若迫不得已而作工以報主人之勞，決不是喪失了什麼權利。」。（這是從 *South Carolina* 二卷四五四到四五四頁上轉譯下來的大意）這一段話，真可以說是強者對弱者所講的階級哲學。這個律師，真是強者的最好代表，他竟認強者之支配弱者爲天然的。與此相類的思想，在統治階級立穩了腳跟的時候，一定很發達。發達了便可以鞏固統治階級。中國的階級思想，也是鞏固統治階級的一個要因。但這個要因的自身，實出於物質的反映，而不可與物質條件並立於一處。我們

祇能說階級對立，造成階級思想；此思想發達了，轉足以鞏固已有的階級對立。

第二節 階級對立之長期的歷史

一一、歷史上的——個關鍵

我們這裏所謂歷史上的關鍵，係指秦始皇統一中國的短時期而言。大概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以秦朝爲一個重要關鍵。都以爲秦以前，中國未曾統一過；到了始皇，才組織了一個真正的統一大帝國。秦之重要，大概在這一點。我們研究歷史上鬥爭的事跡，也可以拿秦朝來做一個重要關鍵。秦以前的許多事變祇是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過程；秦以後的許多事變，却是階級對立所表現出來的動態。吳貫因在庸言一卷七號五族同化論一文中有幾句很近真的話說：「蓋中國前此之專制政體，自秦漢而後，爲君主專制平民；自三代而上，爲本族專制異族。自秦漢而後，君主對平民爲政治之專制；自三代而上，爲本族（指漢族）對異族之專制。」這段話頗有幾分近真。他所謂三代而上的本族對異族的專制，實在就是我們所謂種族鬥爭，并談不到什麼本族專制異族。不過當時漢族是各族環攻的對象，後來又得了最大的勝利，史家祇知有漢族，而不知有他族；因此推論三代以上的漢族是專制異族的，亦無不可。他所謂秦漢以後的君主對平民

的政治專制，就是我們所要講的階級對立的長期歷史。然則自三代到秦朝的這一段歷史是什麼呢？我們可以補說一句；即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一個過渡期。階級對立的局面，在這個時期，隨着許多物質條件而成長發展；到秦朝乃確立。秦以後的歷史，乃階級對立的歷史。我們在秦以後階級對立的長期歷史中，要把統治階級的成分，及其對付被壓迫階級的手段，與夫被壓迫階級的反叛，及所以反叛的原因等等略為述及。

一二、統治階級的主要成分

統治階級裏最惹人注意的，便是元首，我常稱之為統治階級的總頭子。即皇，帝，天子，君主一類名詞所代表的人。社會上一部份人憑着種種物質條件，得了勝利，要統治其他部份的人時，為什麼要弄出一個總頭子來呢？政治哲學家的解答，多是站在擁護階級對立的立場說話，製造出許多麻醉人的解釋來。例如荀子，便以為統治階級的頭子是「管分之樞」的人。富國篇曰：「人君者管分之樞也。」什麼叫做「分」呢？他在王霸篇裏說：「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人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辨治；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天子能管「分之樞」，而所謂「分」，又有這樣複雜。那末統治階級的這個頭子，好像是人人所必尊重的。其實

不是如此。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這個頭子，祇於他本階級是重要的。他的主要作用爲（1）團結并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力量，使不崩潰；（2）統一命令，使被壓迫階級的行動有次序，不致危及統治階級。如是而已。總頭子而外，其次重要的便是特權者。特權者有兩個最大的特徵：一曰坐吃現成，二曰膺有封號。所吃的現成，或以所封之國的收入爲標準，或以所封若干縣的收入爲標準，或以所封的若干人家的供給爲標準；或長住京城，坐食租稅，不管所封之地的事。情形雖有種種不同，其坐吃現成，則是一樣。至於所膺的封號，也有種種不同：或爲諸侯王，或爲諸侯，或爲列侯，或爲恩澤侯。稱呼雖不一樣，其爲封號則一。除了這兩個特徵之外，還有幾個消極的條件以限制之。一，特權者祇是統治階級中之一種成分，不可單稱爲特權階級，而與統治階級並列。二，特權者包括功臣以及外戚之膺有封號坐吃現成者言，非單指王族或貴族。三，特權者與官僚不同。官僚無論大小，都有被雇的性質。其所得的報酬是官俸，而不是坐吃的現成。根據這幾個限制及上面兩個特徵，到歷史上去找特權者，則最引我們注意的有三大類：一曰同姓，二曰異姓，三曰功臣。這些都是統治階級裏面的主要成分。社會上一部分人既成了統治階級，或一個種族中大部分人成了統治階級；這些成分，因事實上的需要及方便是必然要產生的。

一三、官僚與地主

(A) 統治階級之所以爲統治階級，單祇有一個總頭子作代表，再加上一批膺有封號，坐吃現成的特權者是不行的。支配多數被壓迫者，如要支配得適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況且統治階級的總頭子乃至各種特權者，并不一定是精明強幹的。至是官僚乃重要起來了。所謂官僚這種人，在種族鬭爭到階級對立的過程中，未必全然沒有，未必全然是階級對立以後才發生的。不過在前一個時期中，統治階級尚未完全成立；所謂官也者，多是事實上所需要的主要的作用，在幫助人民生產。到了階級對立以後，官之爲物，固然仍是事實上所需要的；但主要的作用，完全變了；不在幫助人民生產，而在幫助統治階級行劫。階級對立以後的官，并不是人民的助手，而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或家奴。官成了家奴之後，其行動完全不是對人民負責的，而是對統治階級負責的了。他們的職責，祇是幫助統治階級鎮壓民衆，剝削民衆。在中央任事的官是如此，在地方任事的所謂親民之官，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大可以把官僚列在統治階級一邊。

此外應列於統治階級一邊，而且很重要的分子，便是地主。地主是什麼？就其最廣義講起來，統治階級的全體，都可以說是地主。例如漢族征服苗族之後，自己成了統治階級；苗族大部分都成了漢族的農奴；所耕之地，都是漢族所有；這時我們可以說統治階級全體都是地主。不過這樣的解

釋太廣汎，太不中用。若就狹義講，所謂地主，卽是「田連阡陌」的富人。他們有田，自己不耕。耕田的人，自己却又無田，非租他們的田不可，或非做他們的奴隸不可。這種自己有田不耕的富人或地主，是從那裏來的呢？歸納的講起來，大概有四個頂大的來源。一是由特權者變來的。歷史上受封而爲特權者的人，都有土地。後來因某種關係，特權被取消了，但其子孫，爲維持生存起見，把土地占據起來。久而久之，乃成了普通的地主。二是由官僚變成的。官僚多有職田，卽用以代替俸祿的。這種職田，官僚退職之時，未必全然退還。歷史上因占了職田而成地主的當然也不少。三是由富商大賈變來的。歷代政府頗禁止富商大賈買地。但這正是他們成爲地主的反證。四是由普通平民變來的。平民之能夠變成地主，在土地私有制下，自由競爭最烈的時候，未必不可能。地主資格一經成立，因土地私有制之確定，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又因自由競爭的毒饑高漲；於是土地日積日多；乃成「田連阡陌」的富人。富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葉水心說得最明白，他說：「……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術，傳食於富人；而又上官官驗，難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其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卽是地主。爲州縣之本，爲

上下之所賴，其在社會上地位之重要，可想見矣。

一四、階級對立之裏面

由上所述看來，特權者是膺有封號，坐吃現成的；是有土地者。官僚吃俸祿，有職田，是有土地者。地主或從特權者變來，或從官僚變來，或從富商大賈變來，或從平民中成長出來，更是模範的有土地者。他們所吃的，都出自土地。但形式却有種種：或是國稅，或是地租，或是國稅兼地租。大概地主之所食，屬於地租形式的多，屬於國稅形式的少。特權者之所食，屬於國稅形式的多，屬於地租形式的少。官僚之所食，屬於地租和國稅兩種形式的，大概都不少。他們所吃的，既都出自土地；然他們自己都不是直接耕種土地的；耕種土地的，祇是農民。所謂農民也有種種之不同：或為農奴，或為佃戶，或為自由農民。大概自由農民，係自食其力之稍有土地者；佃戶則是與地主成立契約關係的；農奴則自己既無土地，又無資格與地主成立契約關係，唯一的謀生之路，便是為他人在土地上執奴役。

所謂階級對立，其裏面幾乎完全是（1）食土地之出產的，與（2）在土地上從事生產的兩種人之對立。換言之，就是孟子所謂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對立；或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對立；或食於人者與食人者之對立；或君子與野人之對立；或治野人者與養君子者兩方的對立。在階級對立的局面之

下，地主與佃戶的關係，特別值得注意。這個關係之發生，與階級對立的局面之成立，幾乎在同時。我們在前面說過：自三代到秦朝，是階級對立之局的成長時代。然土地私有制也恰恰在秦統一以前不久成立。歷史上都稱土地私有制是秦孝公十二年（紀元前三五〇年）用商鞅的計劃促成的。土地私有制當然不是成於一朝一夕。但秦統一以前不久發生顯著的轉變，除封地一類的土地不計外。人民大概可以正式享受私有土地之權了。土地既經可以私有了，因平民之自由競爭，因官僚子弟之占據職田，因封國的後裔之佔據封地等等關係，模範的大地主乃一天一天加多。於是一方面有「田連阡陌」的富者，另一方面有「地無立錐」的貧者。貧富的對立，與階級的對立成了似有區別而絕不可分離的東西。富者成了「巨室」，成了「州縣之本」，成了「上下之所賴」。於是所謂政治，也成了富者專有的工具。關於這一層，下面就要討論了，我這裏却有另外一層須申明的。即貧富的對立，與階級的對立，初看起來，好像是分途成立的：階級對立好像成於種族鬥爭；貧富對立好像成於財產私有。兩個對立的局面通成立了，乃又互相結合。這當然也是一種看法。不過我始終不這樣看。我以為種族互相鬥爭的時候，便是私產制度萌芽滋長的時候。種族的鬥爭，私有制的滋長，實互為因果，互相影響，自始就是祇有區別而不可分離的。并不是種族鬥爭進到階級對立時，與私

產制度進到貧富對立時，忽然互相結合。

一五、所謂政治

種族鬥爭時，失敗了的種族時時有反叛的行爲，時時有動亂的行爲。得了勝利的種族，被這等行爲所威脅，被事實的要求所驅使，便首先學會利用政治的工具。中國種族鬥爭到周初時，漢族得最大的勝利；所以那時的政治，便漸漸完備起來。大家都知道，周朝行封建政治，著政治史的人，都把這種政治詳爲說明。這種政治就是漢族鎮壓異族的工具。漢族之得勝，早在黃帝之時，所以黃帝時封建制便已有了一個起頭。黃帝征服異族時，迫於事實的要求，因利乘便，常對異族中稍稍出色的人物，或比較桀傲不馴的東西，加以某種名義，使其分別去統治若干人民或若干地方。這大概是封建制之開始。（馬端臨謂不知所自始，則當在黃帝以前）其辦法正如近代較大之軍閥想謀名義上之統一，不惜以威嚇利誘的手段，使許多小軍閥，在某種虛榮之下，表示服從。一經表示服從，便算統一。在種族鬥爭時，失敗的民族中之領袖，如在某種虛榮之下，表示服從得勝的民族；那末勝者有時因自己力量不足，便一時予以容忍。黃帝時之情形，大可以作如此看。到周初時，漢族已得到最大的勝利了，封建制度也隨着完備起來；與黃帝時相較，顯然不同；被封者的爵位，極有一定；所封的土地，也極有一定；至於被封的人物，恐已完全不是異族人自己

了。這完全是（1）因漢族的力量已大，不必對異族再事敷衍；（2）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制度可以詳明。直到種族鬥爭進入完全的階級對立局面時，情勢又不同了；所謂封建政治，又不得不變。於是秦乃廢封建制爲郡縣制；完全用雇傭式的家僕或官僚，來代替封國之君主。這一個轉變，及其辦法，舊日研究歷史的人，看得極重要；討論，研究，批評，儼然當作一回事。在我們看來，這祇是階級完全對立時，統治階級出來整頓對立陣容的辦法。自秦以後，歷代政治上的變動，都祇是整頓階級對立的陣容之法。

政治制度，是階級鎮壓階級的最有效的武器。自從秦朝以後，階級對立之局長期存在。政治制度，完全是統治階級所獨有的東西。掌握這個東西的主腦，是統治階級的總頭子或特權者；作這個東西的齒輪，或在其裏面活動的工具是 僚；受這個東西的保護而得到利益的是地主。地主要收地租，非有政治的武器不可；官僚卽是地主家裏出來的智識分子變成的，要吃俸祿，非有政治的武器不可；統治階級的總頭子或特權者，要統治農民，以直接或間接擄取經濟利益，更非有政治的武器不可。更詳言之，掌握政治權力的是君主及特權者；構成政治機括的是官僚；依靠政治保護的是地主。幾千年以來的中國政治，便是這種三位一體的政治。至於農民與政治，却祇有反面的關係，

被其壓迫是也。

一六、農民與統治階級的關係

統治階級或掌握着政權，或運用着政權，或憑藉着政權，站在農民的上面。農民沒有政權，但有勞動能力、長期站在統治階級的下面，從事生產。兩方的地位是如此的；兩方的關係，則是統治階級以政治手段，向農民擄取經濟利益；農民以勞動力作憑藉，養活自己，并養活統治階級全體。換言之統治階級與農民的關係，祇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壓迫農民，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手段；剝削農民，才是統治階級的目的；以政治支配農民是手段，向農民擄取經濟利益是目的。要擄取的多，便須壓迫的重；唯有壓迫的重，乃能擄取的多。中國歷史的全部，除近數十年有巨變外，幾乎都是以統治階級向農民的壓迫和剝削為基因而造成的。

要壓迫加重，壓迫的方法不得不多，範圍不得不廣。於是輔助政治的，有所謂道德倫理。中國歷史上的道德倫理，祇是鞏固統治階級的工具。忠，孝，節，義是道德的大端；然凡此諸端，無一端不是直接或間接利於統治階級的。五倫為倫理之大端，然其中却無一倫不是直接或間接鞏固統治階級之地位的。道德倫理之外，又有所謂學術思想。中國的學術思想，以關於政治道德倫理的為最

發達。就是這一點，也很可以暗示中國的學術思想是輔助統治階級的。原來中國的智識分子，概是地主或官僚，或貴族的子孫；他們生來就是統治階級一邊的；第一惹他們注意的問題，便是如何治安天下。所謂治安天下，其裏面恰恰是支配農民。因此之故，一切出自智識分子口中的學術思想，無論其爲屬於政治的，或屬於道德的，或屬於倫理的；其實都是幫助統治階級的。上面所述，不過是舉例而已。仔細研究起來，全部文化，都帶有階級對立的色彩，都帶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痕跡。凡著文化史的人們，若依階級對立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文化，一定可以得到新奇而有趣的結論。

以學術思想道德倫理等輔助政治，來作壓迫農民之工具時，大概是統治階級最順利的時候；每朝開創的若干年，多是很順利的。但順利的時候，便已埋伏着不順利的因子。統治階級之開創新業，因經歷過艱險，受過物質環境的訓練，很能振作有爲。所以開創的若干年，能得到相當的順利。但正因有相當的順利，其子孫的統治能力，便漸漸喪失；而窮奢極慾的壞習氣，却在祖先的盛業之下完全養成。一方面統治能力沒有了，另一方面壞的習氣養成了；多經過一些年載，祖先的盛業，乃一變而爲衰微。時代已經進了衰微的階段，窮奢極慾而又毫無統治能力的統治階級，祇好任貪官污吏，用繁刑嚴誅的手段，向農民施極殘忍的剝削。這樣的時期進到了相當的階段，農民往往

因特別的機會起而暴動，以造成極恐怖的時代。

一七、農民的暴動

歷史上每朝末年，統治階級自身腐化不堪，不能統治農民時，農民便起而作大規模的暴動。例如秦朝末年，有陳勝，吳廣，劉邦等領導的農民暴動；西漢末年，有所謂赤眉賊及王郎等所領導的農民暴動；東漢末年，有所謂黃巾賊的暴動，其實就是農民暴動；隋末，有李密竇建德等統率的農民暴動；唐朝末年，有黃巢統率的農民暴動；元朝末年，有張士誠，陳友諒等領導的農民暴動；明末，有張獻忠，李自成領導的所謂流寇之亂，其實也就是農民暴動；清末，有洪秀全等統率的農民暴動。清末的農民暴動，延至現在，可以說還在方興未艾的發展之中。自秦至於清末，這個長期的歷史，可以說完全被階級對立的種種形式佔據了，所以我們稱這期的歷史為階級對立之長期的歷史。階級對立，有兩種形式：一曰動的形式，二曰靜的形式。動的形式，叫做變亂；靜的形式，叫做太平。上面舉幾種農民的暴動，不過是聲聲大者都型成了歷史上極大的變亂。其實大小的暴動，幾乎是數不清的。祇是大暴動，歷史上尚有痕跡可尋；若較小的暴動，則因統治階級要粉飾太平之故，完全湮沒了，在歷史上找不出絲毫的痕跡。因之歷史上太平的時期好像多過變亂的時期。誰知太平與變亂乃是等量，可以齊觀的。

歷史上每經過一次極大的農民暴動，便有三件大事得到改造；一則喪失統治能力的舊統治階級崩潰下去，新統治階級，漸漸從暴動過程中訓練出來，重行統治農民；這算是統治階級的改造。二則不甘壓迫起而暴動的農民，在暴動的過程中，死亡流竄漸就消滅；剩下的祇是些柔弱如綿羊一般的順民，最便於受人統治；這算是被壓迫階級的改造。三則兩方對立的局面漸漸由動態進入靜態，即由變亂進到太平；這算是階級對立的局面的改造。雖然三者都改造了，但社會上的制度却絲毫沒有變更：統治階級仍是統治人民，被壓迫階級仍是被人剝削，階級的對立仍是階級的對立。社會上儘管有極大的動亂，儘管有長期的紛擾；然社會制度從不變更。階級對立的局面從不動搖。這種情形，是階級對立之長期歷史的特色，我常稱階級對立的歷史為有亂而無變的歷史。

一八、農民暴動的原因

農民暴動的原因，前面雖沒有特別提出來討論過，然直接間接講到的地方，却已不少了。現在為使讀者得到明確之印象起見，特再提出來討論一番。歷來的農民暴動之所由起，幾乎祇有兩個原因：一曰統治階級自身的潰爛，二曰農民生活的不安。每朝的統治階級，在創業之始，頗能勵精圖治。但其子孫，因享慣了現成幸福，窮奢極慾過慣了；所有的統治能力，便在前人的所謂盛業之下全然消失。結果剝削民衆過度的繁苛起來，鎮壓民衆過度的殘酷起

來。要維持窮奢極慾的生活，剝削不得不繁苛；剝削既繁苛，鎮壓的方法不得不殘酷。鎮壓的方法之殘酷，便是統治階級喪失統治能力的象徵。歷代農民的暴動，都是在統治階級殘酷的鎮壓之下發生的。

例如秦末民衆暴動的原因，洪容齋筆記所記張耳之言有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頭會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這段話中的意思，祇是說秦朝統治階級鎮壓民衆太殘酷，剝削民衆太繁苛。又山西漢末年，臨淮瓜田儀，鄆鄆呂母，荊州王匡王鳳，鄆鄆樊崇，東海刁子都，南郡秦豐，平原女子遲昭平等相繼起爲盜賊時；王莽遣使赦之，使者縱盜解復合。莽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這段話也祇是表示統治階級鎮壓民衆的殘酷，剝削民衆的繁苛。又如東漢末年所謂黃巾賊暴動時，皇甫嵩便首先提議解開黨禁，出中藏錢，這一個提議可以說是統治階級鎮壓民衆過於殘酷，剝削民衆過於繁苛的自白。鎮壓不是殘酷，爲什麼關那麼多人在京裏？剝削不是繁苛，爲什麼有中藏錢可出？又隋末民衆暴動的原因，洪容齋筆記記馬周之言曰：「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營而強斂之

以資寇耶」？又記柳宗元之言曰：「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鍾，轟以毒燄，煽以虐焰，沸湯灼爛。號呼騰蹈」。這也都是表示統治階級之剝削繁苛鎮壓殘酷的。又唐末黃巢率領民衆暴動，也幾乎是統治階級繁苛的剝削，殘酷的鎮壓所激成的。僖宗時用財無度，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虛。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說上籍兩市商稅，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關東水旱，州縣不以實言；這便可以想見一斑了。他如元，明，清各朝末年民衆的暴動，其原因也都很顯然，無不是由於統治階級剝削民衆之繁苛，鎮壓民衆之殘酷。鎮壓民衆之殘酷，與剝削民衆之繁苛，可以說是古今中外一切民衆暴動的基因。此外雖可找出許多大的小的，直接的間接的原因，然究竟皆可以歸於這兩者。

一九、民衆暴動的導火線

殘酷的壓迫與繁苛的剝削，加在民衆身上，使他們不能不暴動。但每次暴動之開始，尙有許多導火線。這些導火線性質，原無一定；或則爲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或則爲天災，或則爲流民的煽惑。大多數民衆，在殘酷的壓迫和繁苛的剝削之下，受盡了苦痛，暴動是必然的；加以偶然的導火線。暴動乃開始。（A）例如東漢末年，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幾種極顯著的衝突：一則外戚與宦官的衝突，二則宦官與名士的衝突。外戚利用皇帝的幼弱無能，

憑皇后的拿扯，在中央政府裏包辦一切。宦官因向來得了大寵，勢力坐大，也可以在中央左右一切；於是與外戚對抗。到末了竟把外戚勢力完全打倒，握有中央行政實權的全部。這時名士看不過意了，起而與宦官對抗；名士之居官者，對宦官的兄弟姻戚，裁治非常利害。原來名士是由地主家裏來的，在統治階級一邊佔重要位置；不忍坐視宦官把統治階級自身弄糟，想加以糾正。誰知糾而不正，統治階級的統治能力反因此削弱了，民衆的暴動得乘虛發生，造成歷史上所謂黃巾賊之亂。又如隋末民衆暴動之發生，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也予了不少的助力。當時的民衆，因受不住壓迫及剝削，快要暴動了，或已經在開始暴動。治好其時，統治階級方面有許多野心家紛紛起來，折統治階級自己之台，當時有羅藝，以虎賁將軍的資格起而獨立；有劉武周，以馬邑校尉的資格起而獨立，有梁師都以朔方郎將的資格起而獨立，有薛舉，以金城校尉的資格起而獨立；有李軌，以武威司馬的資格起而獨立；有沈法興，以吳興太守的資格起而獨立；有王世充以東都留守的資格起而獨立；有李淵，以太原留守的資格起而獨立。統治階級內部，彼此是這樣拆台，民衆的暴動，乃能如風發火起，蔓延得異常迅速。上面兩例，頗可暗示一般。（B）天災之流行，也是引起民衆暴動的導火線。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尚未發達，生產方法還很拙笨的時候，隄防天災之法極不完備；天災差不多

年年都有。但歷史上大書特書令人十分注意的天災，總在每朝的末年，總在大亂的前後，一若天也有意湊巧，也想乘人之危。這究竟是什麼原故呢？我們可以解釋如下。大概統治階級對民衆的壓迫不甚殘酷，剝削不甚繁苛的時候；民衆的生活還勉強過得下去。每年大小的天災雖也有；但不足以引出民衆的暴動，所以人家不甚留意。一到統治階級對民衆的壓迫加緊剝削加緊；民衆暴動的根本原因完全具備時，天災乃特別引人注意。爲什麼？因爲牠可以引出民衆的暴動，作民衆暴動的導火線也。因不注意，覺得牠沒有；因特別注意，覺得牠特別的多。天災在民衆大暴動的前後，特別的多，全然是這樣的。并非天意湊巧乘人之危；實在是人事已危，大家製造出天意。因人事之危而製造天意，這是古今中外所共有的事。不過中國史上實例特多。例如東漢末年，民衆正要暴動時，天災也大得可怕。自桓帝建和二年（132）起，到獻帝建安二年（197）止，無年不有淹沒民居，溺死人命，傷害禾稼的大水災。又唐末民衆正要暴動時，天災也大得可怕。自僖宗乾符元年（872）王仙芝黃巢等起事的時候算起；前後三十餘年之內，水災飢荒，差不多年年都有。元朝末至正元年（1328）到七年（1336）的一個短時期內，民衆的小暴動，凡數百處之多。正在這短時期之內，天災也多極了，正史上幾不絕於書。這些例都可以證明天災爲引出民衆暴動的導火線。（C）此外流民的活動，也是一個導火線。流民即歷來所謂

盜匪。當然盜匪也是農民變來的。不過他們的生活。長期落伍，長期在生產關係之外，與長期在生產關係之內忽然脫離出來之農民到底有多少不同之處。他們的活動是統治階級時時引以為慮的。不過在太平的時候，即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保持靜態關係的時候，所謂流民雖很可慮，却不至成大問題。一旦到了變亂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他們很能幫助民衆暴動的擴大。甚至民衆將要暴動而未開始時，他們可以出來為之首倡。如明末民衆將要暴動時，有所謂賊衆為之首倡，造成所謂流寇的暴動，便是很顯著的實例。綜括說來，（1）統治階級內部的衝突，（2）天災的流行，（3）流民（即生活落伍的農民）的煽動，乃民衆暴動之導火線。

二〇、民衆暴動的對象

民衆暴動的原因，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及剝削。那末暴動的對象，當然是統治階級。所以歷來暴動的民衆每到一處，必陷城邑，殺官僚，焚燒豪富之家的房舍。以示與統治階級不能兩立。例如赤眉賊，乃西漢末年起來暴動的民衆。他們對於一般未從他們起來暴動的民衆，看待極好，不許殺傷；他們約束自己，凡殺了人的要抵命，傷了人的要償創。然西向攻長安時，遇了更始諸將，則不惜與之開戰。這可見他們暴動的對象完全是統治階級，而不是一般的人民。又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賊，也是起來暴動的民衆。他們每到一處，便燔燒官府，劫掠聚邑。所過

的地方，州郡失守，官吏逃跑。然一般的人民，則不怕他們。當時安平甘陵等處的人民，且將統治階級裏面的特權者一個一個捉來響應他們。這也可見民衆暴動的對象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統治階級。更如黃巢賊，誰都知道是唐朝末年的大賊衆：其實也就是起來暴動的民衆。他們初起來時，傳檄於諸道說：官吏貪吝賦重，賞罰不平。他們陷落了廣州時，發表露布，數統治階級之罪狀曰。官豎柄朝，垢蠹網紀。他們西向由潼關進攻西京時，大殺統治階級，把唐朝的宗室子孫，殺一個落花流水。據說所殺的人，凡有八萬；血流於路，可以涉行，名曰「洗城」。這可見他們對統治階級的殘酷，及其仇恨之深了。至於明末的所謂流寇，也祇是對統治階級進攻。不過他們進攻統治階級時，爲增加自己的勢力起見，對於一般人民，不免施以威脅，使服從自己。他們蹂躪的地方極大：凡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四川等地，無不大遭慘劫。他們每過一處也必殺官僚，屠豪富，屠城邑，燒房舍。每圍攻一城的時候，對於被圍者，有種種待遇之不同。凡歡迎他們的，他們可以不加殺戮；若死守來抵抗的，他們要按抵抗的時日之久暫，而定殺人之多少。據說守一日的，全城的人，必殺去十分之三；守兩天的，要殺十分之七；守三天的，全城的人都要殺一個乾淨。這種殺法，無論如何，對於普通人民，總是有很大的威脅作用的。大概民衆暴動中之威脅作

用，是不能免的。歷史上民衆暴動之令人駭怕，原因也就在此。倘起來暴動的民衆，能分皂白，祇殺統治階級，全不波及一般人民，那末一般人民是不會十分駭怕的。

民衆受不住統治階級之壓迫及剝削，起來以暴力推倒統治階級；照理統治階級被推倒之後，民衆應能樹立自己的政權，建設自己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國歷史上沒有這樣的先例。民衆用暴力打出來的江山，通通被野心家奪了去。例如秦末民衆打出來的江山，被漢朝的新統治階級奪去了；西漢末民衆打出來的江山，被東漢的新統治階級奪去了；隋末民衆打出來的江山，被唐朝的新統治階級奪去了；唐末民衆打出來的江山，被梁朝的新統治階級奪去了；元末民衆打出來的江山，被明朝新統治階級奪去了；明末民衆打出來的江山，被清朝的新統治階級奪去了。中國的歷史，真如我們所說，是「有亂而無變」的歷史。其亂之大，可以震驚天地；然大亂之後，社會的次序，依然是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對立。這其中的原因，很不容易找出。大概土地私有制之未能打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歷來暴動的民衆，都沒有打算廢除土地私有制。祇有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之亂，主張財產公有，田畝均分。然太平天國却又未能成功。因此之故，暴亂過後，社會上依然是階級對立。然則歷來暴動的民衆爲什麼沒有想到要廢除土地私有制呢？爲甚麼現代的勞働階級曉得主

張生產工具公有呢？這大概是由於土地私有之害，不如現代生產工具私有之害之顯而易見。所以歷來起而暴動的民衆，祇急急於向統治階級直接進攻，而不搖動他們所憑依的土地私有制度。土地私有制度既未搖動，那末大亂之後，社會的分子，依然屬於兩羣：一方面是地主，是富人，是統治階級；他方面是農民，是貧人，是被壓迫階級。

第三節 由階級對立到新的種族鬥爭

二、階級對立時之種族鬥爭

階級對立的時候，種族鬥爭的事實，未必就完全停止了；反之種族鬥爭的時候，階級對立的事實，未必就完全消滅了。不過我們從大體上觀察，可以看出某種鬥爭在某個時代，佔着主要的地位；因之就把佔主要地位的鬥爭來名那個時代。這樣一來，一部中國史，分成三個時代：曰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曰階級對立的長時期；曰由階級對立到新的種族鬥爭；在事實上最爲方便。我們是這樣分期，也祇是爲着方便。

階級對立時之種族鬥爭，我們打開歷史看，隨在可以看出。例如秦朝與漢朝，我們已經劃入階級對立的時代了；然當時蒙古族之匈奴，仍常與漢族爲難。漢初，匈奴的單于曰冒頓者，竟圍漢族

統治階級的頭子高祖於平城。高祖迫不得已，且用襄敬的下策，以宗室之女作爲長公主，嫁與匈奴單于爲妻，以結和親。漢文帝與景帝時，匈奴與漢族的友好關係，時斷時續。到武帝時，漢族才暢快快的把匈奴趕到漠北。直到宣帝時匈奴始因內亂，屈服於漢族威力之下。又如唐朝，我們也劃入階級對立的時代了；然當時回族中之回紇，常與漢族爲難。代宗時，回紇的可汗且親自帶兵入寇。後因郭子儀的力量，才稍稍對付下來。然其族人之留居京師的，非常驕恣，漢族竟莫可奈何。直到文宗時，回紇因受了黠戛斯的打擊，才歸於失敗，不能爲患於漢族。至若南北朝時，北方異族之紛紛內侵，以及北宋與遼族（蒙古族）的鬥爭，南宋與金族（蒙古族）的鬥爭，都是階級對立時代之種族鬥爭。若在元朝與清朝，則漢族且全然被異族鎮壓下去了。元以蒙古族的資格。壓倒漢人，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清以滿族的資格，壓倒漢人，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他們把漢族鎮壓下來之後，漢族中被壓迫階級，依然是被壓迫階級；統治階級，或則與他們的新統治階級結合，或則墮入原來的被壓迫階級。這種情形，與前述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時代，顯然兩樣了。那時代的種族鬥爭，顯然在促成階級對立的局面；階級對立時代的種族鬥爭，則不同了；祇使已有之階級的成分複雜，而不是促成階級對立的新局面。這種與階級對立之

局平行的種族鬥爭，固然每朝都有，但在歷史上未佔主要的地位。在歷史上佔主要地位的是階級對立。所以自秦至於清朝與英人開鴉片戰爭時，我們雖看見了不少的種族鬥爭，然始終要稱這一個時代爲階級對立的時代。自鴉片戰爭以後，歷史又走入了新的階段，我們稱之爲由階級對立到新的種族鬥爭的時代。

二二、歷史上又一個關鍵

秦朝統一中國時，是歷史上一個重要關鍵，把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的一段歷史與階級對立的長期歷史劃分了。清朝與英人開鴉片戰時，是歷史上另一個重要關鍵，把階級對立的長期歷史與新種族鬥爭的歷史劃分了。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境內的種族鬥爭，祇是亞洲東南一部分黃種人彼此的鬥爭；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境內的種族鬥爭，有全世界聞名的白種人參加了。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歷史，是亞洲東南部一部分黃種人的歷史。其中雖也不免有與全世界相涉之處；然主要的祇是關於一部分黃種人的。關於種族鬥爭的材料雖不少；然關於階級對立的事實却特別的多。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歷史，成了世界史之重要部門。不復單是一部分黃種人的歷史了。其中事跡雖有些是與全世界無關的；然與全世界有關的，却特別令人注意。關於階級對立的材料雖不少；然關於中國與列強鬥爭的事實却特別的重要。中國與列強鬥爭，支配了近代中

國歷史的全部。階級對立的事實，被中外鬥爭的事實所遮掩了，幾乎不令人注意：這是鴉片戰後，中國歷史的特色。若在鴉片戰前，支配中國歷史的，是階級對立的事實。漢，滿，蒙，藏，苗各族鬥爭的事實，反被階級對立的事實遮掩了，幾乎不令人注意。研究歷史的人，於鴉片戰前，祇注意於歷代的治亂興衰，及典章制度；其實即祇注意於階級對立的靜態或動態。國內各種族互相傾軋的情形，似少人留意。於鴉片戰後則注意之中心點忽然移到中國與列強相與鬥爭的事實上來了；國內的治亂興衰，典章制度雖不會被人忘却；然有眼光的歷史家，却都特別注意於中外的鬥爭。平心說來，歷史上的事實，本是前後相續的。但在相續之中却有轉變的階段。倘我們於這急劇轉變的階段，不能看出；各種重要關鍵，不能抓住；則於瞭解歷史，必不能得到迎刃而解，豁然貫通之妙處。我把鴉片戰爭作一個重要關鍵，反覆說明，也祇在希望讀者把歷史上的大勢弄清。

二三、新的種族鬥爭史

鴉片戰爭，固然是一個重要關鍵；但新的種族鬥爭，或中外鬥爭，并不是直到鴉片戰爭時才開始的。我們要研究新的種族戰爭史，最好依鬥爭的激烈或緩和的情形之不同，而分為若干小段。在鴉片戰前不久，中外開始接觸：列強的勢力，漸漸向中國轉移：中國人的眼光，也漸漸注射於國外。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埋伏戰機的時候，或撒布中外鬥爭的種子的時

候。在這時候，彼此相接觸的機會頗少，接觸的情形也極溫和。但正在這溫和的接觸之中，埋了鴉片戰爭的種子。鴉片戰後，情形截然不同：彼此相遇，動輒以槍砲子彈作禮物。自鴉片戰爭到庚子聯軍之役，六十年間，曾經過許多流血慘劇。這六十年，實在是門爭最緊張的時期。庚子聯軍之役以後，形勢又忽然一轉，由急劇轉到溫和。轉變的原因，祇是因為庚子聯軍之役以前，六十年內，列強與中國鬥爭，得了全勝。前一期的全勝植下了後一期的溫和之基。因此自庚子聯軍之役，直到華盛頓會議，中外鬥爭的表面，似較溫和。華盛頓會議以後，又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可以說是由溫和的極端轉到緊張的極端的時候。

我們把新的種族鬥爭史，分成這幾小段：鴉片戰前的一段，叫做戰機埋伏時期；自鴉片戰爭到庚子聯軍之役的一段叫做鬥爭緊張時期，自庚子聯軍之役到華盛頓會議的一段，叫做鬥爭溫和的時期；華盛頓會議以後的一段，可以叫做由溫和轉入緊張的時期。這種分法，讀者一看，即知我所採的分期標準，完全在戰爭一點。中外鬥爭的表面，固然是武力的戰爭；但中外鬥爭的裏面，却是經濟的侵略。中外相遇，若祇有武力的戰爭，而沒有經濟的侵略，那於事於理，都說不通。階級對立時，統治階級對付被壓迫階級，以政治的支配為手段，以經濟的剝削為目的，幾乎成了定律。新

的種族鬥爭時，列強對付中國，以武力的戰爭爲手段，以經濟的侵略爲目的，也幾乎成了定律。我們研究階級對立時，若祇注意政治的支配，而不注意經濟的剝削；使不能理解階級對立的真意義。至研究新的種族鬥爭時，若祇注意武力的戰爭，而不注意經濟的侵略也決不能理解新的種族鬥爭的真意義。新的種族鬥爭之中，列強對中國所施之經濟的侵略，無時或息。然所用之手段，則隨事實上的需要之緩急，而有所變更。事實上不需要武力時，則不用武力；事實上需要武力時，則用武力。武力的壓迫要加緊時則加緊；武力的壓迫可以放鬆時，則放鬆。武力爲必不可少時，則設法維持；武力可以他物替代時，則以他物替代。武力的壓迫是手段，故可以隨時變更；經濟的侵略是目的，祇有逐漸加緊。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才知道列強對中國的武力壓迫，何以有輕重緩急之不同。鴉片戰前，中外初相接觸，列強以試探的態度來華，尙未感到用武力的必要。然以鴉片烟來吸取中國的經濟利益，畢竟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因之武力的壓迫隨着發生。自鴉片戰爭到庚子聯軍之役，六十年中，列強爲要達到經濟侵略的目的，不惜盡量以武力加於中國。結果中國被壓下去了，列強的經濟侵略，可以暢行；於是武力的壓迫，也隨着可以稍稍放鬆。庚子聯軍之役以後，便是列強對中國稍稍放鬆武力壓迫的時候。直到華盛頓會議的前後，武力的壓迫，幾乎可以用教育的

勢力來代替。國人文明的程度，一天一天加高；教育的効力，可以代替武力；於是列強爭着到中國來發展文化事業，以保障其經濟侵略。但國人文明的程度一天一天加高，同時了解列強侵略的野心，也愈透澈。因之反抗的運動加緊，引起來的新壓迫也愈兇。中外的鬥爭，至是復由極溫和轉入極猛烈。

二四、鴉片戰前中外鬥爭大勢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外鬥爭的序幕早開始了。與中國接觸的勢力，凡可以分爲兩大組：一則從西來海上進來的西方勢力；二則自東北陸路進來的俄國勢力。前者之中，復包有葡，西，荷，英四國。加入中外鬥爭的序幕的，當然不止這幾國；但這幾國與中國接觸的事實較爲顯著，特別值得敘述。葡萄牙人之到中國，早在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年）就開始了。正德十六年，因葡人行爲不檢，政府曾下令驅逐他們出境。後來令弛，他們復來，且愈來愈多。到嘉靖時，廣東附近有葡人居留之地凡三處：曰上島，在今台山縣南；曰電白，在今電白縣南；曰澳門，在今香山縣南。當時葡人來華的都是商人；目的祇在到中國吸取經濟利益。中葡貿易最盛的地方，便是電白；葡商寄居該處的，常達五六百人之多。後來澳門興盛，且有駕電白而上之勢。自是以後，福建之泉州，浙江之甯波，也多有葡商出入。居甯波的葡商，有許多怪舉，曾結

黨四出誘掠婦孺。這一件事，引起了華人的反感。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地方居民起來復仇，曾焚燒葡船三十七艘；并同來之教徒，亦屠殺無數。泉州的葡商，也於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被吏民所逐。這樣一來祇剩下澳門爲葡人在極東經商的根據地。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葡國政府且在澳門設官，管理關於僑民的事務。不過當時葡人來華吸取經濟利益，完全用的試探態度。反客爲主的事尙少。所以在澳門經商，每年還須納地租二萬金。神宗萬歷十年（一五八三年）葡人要求減租，中政府允了，遂減爲每年五百金。這個租額，延至清道光間，還沒有改變。這也足證當時中外關係尙是平等的；反客爲主的事，尙不易發見。

當葡商壟斷東洋貿易之時，西班牙的勢力，也正在開始向東方發展。明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就有麥哲倫 Magellan率領艦隊航大西洋達到太平洋；歷時凡三十三月之久。後來西班牙的勢力，在斐律賓羣島一帶殖了基礎。當時中國商人往來南洋各處經商，獲利很厚，其勢也頗不可侮。兩相接觸，中，西門爭遂從此開始。當時福建泉州人李馬奔，很勇猛，又習於海上生活，常率武裝帆船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攻斐律賓。萬歷二年（一五七四年）大破西班牙兵於馬尼刺灣，殺其副將，并把西班牙人趕跑。後來西班牙兵，增兵補充，轉敗爲勝。然中國人之於

力，尙能繼續應戰。李馬奔敗後，福建總督復發中國艦隊至斐律賓。西班牙人得了這個消息，駭怕極了，很想乘機，與中國訂通商條約。萬歷八年（一五八〇年）西王遣使來申前請。但都爲葡萄牙人所阻，未得成功。自彼時以後，中西兩國的商船，站在平等地位，互相競爭；馬尼刺竟成了兩國互爭的唯一一象。

葡萄牙人在東方的勢力就衰的時候，荷蘭人與英國人乃起而代之。萬歷二十三年（一五八五年）荷亞摩斯特登商船創私立東印度會社，從事探險。自是以後，荷蘭商船東渡的漸漸多起來了。萬歷三十年（一六〇二年）東印度會社，得了政府的允許，可於殖民地置兵設官，并與所在國宣戰；勢力蒸蒸日上。萬歷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在爪哇建立政府，且以該地爲東洋貿易的唯一根據地。當時中國南部的商業利益，已爲葡萄牙人佔據了好久。荷蘭勢力一來，乃漸漸由葡人之手轉入荷人之手。清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爪哇政府派人到北京，請求通商。清廷允荷蘭商船每八年來華一次，每次船數，且限定祇准四艘。這是中荷互相鬥爭的序幕。至於英國人到東方來探險，大概與荷蘭同時。萬歷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倫敦商人組織東印度公司與荷蘭互相競爭。在印度所培植的勢力，極爲雄厚。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英女王伊利莎伯遣使與中國修好，但因舟遇颶風而止。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年）英人 Weddell 率艦隊到澳門；然爲葡人所拒，乃轉至虎門，遣使向中國請求通商。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東印度公司派商船一艘到廈門。不久即返。後因鄭經在台灣與英人訂了約。以廈門爲通商地。因厚利所在，廈門畢竟成了盛大的商場。總觀上述葡，西，荷，英四國之來華，其唯一目的都在商業上的利益。初來的時候，都帶了幾分冒險性質。武力的後盾，尙不足以與中國爲難。與中國通商，縱不是處於從屬的地位，但無論如何，是處於平等的地位。這種站在平等地位相互通商的關係，直到鴉片戰爭時，便完全改變了。

二五、續前

葡，西，荷，英等國是從海上進來的西方勢力。此外從陸上進來的，尙有俄國的勢力。俄本爲中國北方大國。明崇禎十一年（一六四三年）俄國勝部可薩克人自雅庫次克省至黑龍江下游；歷時三載，熟察當地情形。回去時盡將所察實情報告雅庫次克政府，并請派兵經略。清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富商 Khabarov 募義勇兵數百人至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擊敗索倫兵。後復引兵東略黑龍江下游，至烏蘇里江口。當地的部落派人到中國甯古塔請救兵；甯古塔都統派兩千人去援助，竟不得結果而還。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俄政府以 Khabarov 兵紀不好，改派 Stepanoff 代領其衆；復沿黑龍江東下，剽掠各部落。十五年（一六五八年）Stepanoff 率可薩克兵五百

人出松花江，抄掠村落；甯古塔郡統率艦隊四十七艘，與戰於松花江，大獲全勝，把可薩克兵打破，并把 Stedanoft 打死。俄人以武力來攻，目的究在那里：一言以蔽之，無非欲在東方找通商根據地，以圖吸取經濟利益。順治十一年及十二年，俄曾兩次遣使臣送禮物給滿清，上書請求通商，并在北京窺探虛實。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俄復派人到北京請求訂約通商。當時中國方面堅持不許。一方面定欲通商，一方面堅拒不納；兩相爭執，彼此都以大軍相見。二十五年（一六八八年）時，俄軍且大敗特敗。正當那一年，和議告成，於是雙方罷兵。二十八年（一六九一年）訂尼布楚條約，約中畢竟規定：「兩國商旅持有護照者，得自由在他一國經商」。是約成立以後，俄人對中國頗溫和，不復常以武力為手段了。其派來中國沿邊經營貿易的隊商，也都能服從條約；直到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還沒有變態。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中俄又訂恰克圖條約；約中關於商務之規定有云：「俄國商人，得三年一至北京通商。員數以二百人為限。留京不得過八十日，往來當由官定之路徑，不得迂道他往；違者沒收貨物。」後來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增訂恰克圖條約，約中規定嚴禁俄商負債，發生糾葛，及入邊行劫諸不法事。由此種種看來，鴉片戰前，中國與俄國鬥爭，也是站在平等地位。俄雖屢以武力為手段，希圖達到吸取經濟利益之目的；但中國頗能對付，也可以拿武力

與之周旋。綜而言之，鴉片戰爭以前，中外互相鬥爭，都是站在同等地位無論自海上來的西方勢力，或自陸上來的北方勢力，中國都能對付。經過鴉片戰爭，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二六、繼長增高的經濟侵略

鴉片戰爭以後，中外站在同等地位相互鬥爭之局，全然打破。此後列強之對付中國，完全反客為主：一以武力的壓迫為手段，施行其經濟的侵略。經濟的侵略：自鴉片戰爭之日起至於今日，不獨無時或息，而且繼長增高。關於這點，我們可拿海關報告冊上所載歷年進出口貨價之數字表示之。自一八六五年（鴉片戰爭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一年）後每五年一計；自民國成立後，逐年一計。其進出口的貨價，以百萬海關兩為單位；歷年數目，有如左表。

年度	國貨出口淨數	洋貨進口淨數
一八六五	六〇	六一
一八七〇	六一	六九
一八七五	六八	六七
一八八〇	七七	七九
一八八五	六五	八八

中國社會之現狀

一八九〇	八七	一二一
一八九五	一四三	一七一
一九〇〇	一五八	二二一
一九〇五	二二七	四四七
一九一〇	三八〇	四六二(右均爲第五年款額)
一九一五	三七七	四七一
一九二〇	三七〇	四七三
一九二五	四〇三	六七〇
一九三〇	三五六	五六九
一九三五	四一八	四五四
一九四〇	四八一	五一六
一九四五	四六二	五四九
一九五〇	四八五	五五四

一九一九	六三〇	六四六
一九二〇	五四一	七六二
一九二一	六〇一	九〇六
一九二二	六五四	九四五
一九二三	七五二	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七七一	一、〇一八
一九二五	七七六	九四七
一九二六	八六四	一、一二四

這張表是劉大鈞整理出來的（參看中華國貨展覽會紀念特刊）。雖不是起於一八四〇年，止於一九三一
 年；然而我們祇看這六十年的中外貿易情形，就很可能可以看出：（1）出口數目，繼續不斷的増加；六
 十年中，幾增到十三倍。（2）進口數目，也繼續不斷的増加；六十年中，幾增到十五倍。（3）進出
 口數目，雖都繼續增加，但進口數目，除一八七五年外，無一年不大過出口數。（4）進口數目增加
 的速度，大過出口數目增加的速度；到一九〇五年時，進口數目幾高於出口數目的一倍！這可見列

強或國際資本主義者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之繼長增高了。

二七、武力的壓迫

國際資本主義者對華的經濟侵略，固然繼長增高，逐年加緊；但用作手段的武力的壓迫，却是由猛而寬；自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有逐年放鬆之勢。猛的時期，以白鴉片之戰到庚子聯軍之役的六十年爲最。這六十年，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用武力屈服中國的時期。中國屈服了，然後加緊經濟的侵略，從中國的工農身上，盡量剝削。這種情形，頗令我聯想到牛肉公司屠牛者的手段。屠牛對於將就屠殺之牛，必先以木棒擊其頭，使昏眩，然後徐徐殺之。國際資本主義者之對付中國，則先以鎗炮子彈攻中國，使中國變成綿羊一般，然後加緊其經濟侵略。計自鴉片戰爭起至庚子聯軍之役，國際資本主義者對華的武力壓迫，最惹人注意，最令人難忘的，便有最大的四次：（1）鴉片戰爭。鴉片之輸入中國，爲時最早。清道光時候，英人自印度輸入的尤多。當時朝野上下，多有曉得鴉片煙之危害的。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御史朱臣烈都上疏痛論之；湖廣總督林則徐有極剴切之奏語曰：「煙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練之兵！」林氏對鴉片的見解既是如此，所以一八三九年，他到廣東時便強令英商將價值五六百萬元之鴉片煙共二百萬零二百八十三箱在虎門陸續燒燬。這事觸動了英國之怒，英政

府乃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派伯麥 Bremed 統海軍，意律喬治 George Elliot 統陸軍，共兵士一萬五千人，軍艦二十六艘，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五月抵澳門。見廣東有準備，乃北攻福建；見福建又有準備，乃進攻浙江，陷定海，封甯波，進逼天津。英人既佔了大沽口，乃向中國投書請和，後因條件未能商妥，繼續從印度調兵艦入廣東；由璞鼎查 Pottinger 統率，於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再度北上，攻閩浙沿海，連陷廈門，定海，甯波。二十二年，更陷乍浦，寶山，上海；并沿長江進逼南京。結果強迫中國與之訂立南京條約。（2）英法聯軍之役。南京條約訂立之後，英人欲實現條約上的權力，中國人民不能忍受，廣東紳民更爲憤慨，卒因廣東紳民拒絕英商入廣州城的事而發生英法聯軍攻打中國的大戰。這次戰事的導火線，爲亞羅船事件。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九月，有亞羅船從海外入粵河。船上懸掛英國旗，載有兩個英國人，十三個中國人；被巡河水師捕獲了，該巡河水師以捕獲匪船的名義報告當局。當時英領事巴夏禮以爲船上懸有英旗（中國奸商藉外國旗以圖掩護的事，實在太多了。）出來抗議。謂「擅執華傭爲不當，侮辱國權尤非禮。」要求中國當局送還十三個被捕的，并於四十八小時內，向英國謝罪。是時中國當局兩廣總督葉名琛，一味傲慢，又毫無作戰的準備。英艦乃入粵江，攻黃埔砲台，咸豐六年十月竟攻陷廣東省城。但因人數過少，不

敢久留，隨即退出。當時法國正藉口廣東教士被殺之事，要向中國開釁；於是英法乃相與組織聯軍，攻打中國；竟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再陷廣州，并把總督葉名琛虜去。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四月，聯軍竟由上海北上，闖入八沽口。結果，強迫中國與訂天津條約。後又訂北京條約。

二八、武力的壓迫續前

（3）中日戰爭。這一次的戰爭，又叫甲午之戰（因為發生於光緒二十年，恰洽歲次甲午），其導火線為朝鮮內亂。當清同治光緒時代，朝鮮成了中日俄三國角逐的地方；而中日的衝突，更為利害。恰在那個時候，朝鮮內亂，新舊兩黨相爭；親中親日，各走極端，遂激成中日暗鬥。後來東學黨起事，中日兩國都派兵入朝鮮。及大亂平定以後，日本竟延不撤兵。這樣一來，中日乃不得不出於一戰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日正式宣戰。中國方面，因事前毫無準備，海陸各軍，都遭慘敗。不得已乃與日本議和，并派李鴻章東渡，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4）八國聯軍之役。這一役因發生於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又號庚子之變。清朝末葉，國際資本主義的先鋒隊天主教，在中國橫行，肆無忌憚；因之激成中國農民仇教的心理。當時有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起於山東，開始作排外的運動，其實就是作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初步工作。山東巡撫毓賢，頗加保護。後又擴大到直隸，直督裕祿，更為之張目。清當局如載漪，

剛毅等都力加獎勵。爲時不久，義和團的勢力，竟遍滿了京津一帶。他們因勢力大起來了，到處戕殺教徒，攻擊使館，爲所欲爲。政府當局，且正式派人幫助指揮。這樣一來，乃惹起了各國的太怒。於是英，法，德，俄，美，日，奧，意等八國，乃組織聯軍問罪於中國。陷大沽口，攻破天津，直入北京。當時居在北京的統治階級嚇死了，一時北京陷入無政府狀態。這時正是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七月。這次事變的結果，經李鴻章的折衝，畢竟與各國訂立條約。其條約因訂於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名叫辛丑條約。綜上所述看來，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之役，實列強以武力壓迫中國最猛烈的四次大戰。爲欲達到經濟侵略目的，不惜施行這樣最猛烈的軍事手段，這是近代歷史中最惹人注意的特色。

二九、經濟侵略的永久保障

上述四次大戰，製造了四種有名的不平等條約，或亡國條約。各條約中所載，治治是保障列強之經濟侵略的。現在且將其大略錄列於次。（A）鴉片戰爭製造的不平等條約，曰南京條約，其要項有八款：一，中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和平；二，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納軍費一千二百萬兩，商欠三百萬元，鴉片賠償六百萬元，共二千一百萬元，限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歲末付清。三，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

住居，并准英商攜帶家屬自由來往。四，以香港之主權讓與英國政府。五，放還英人之爲俘虜者。六，戰役中爲英人服役之華人一律免究。七，將來兩國往復之文書用平行款式。八，條約得皇帝批准，償金交付六百萬元之後，英國可自當時所占領之長江沿岸等地撤兵。唯舟山及鼓浪嶼在條約實行之前，仍由英軍占領。(B)英法聯軍之役製造的不平等條約有天津條約，其要項爲：一，英法與中國互派公使。二，准英法教士自由傳教，英法人民攜帶護照自由旅行。三，續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鎮江，九江，漢口，淡水，江甯等港爲商埠。四，予英，法以領事裁判權。五，償英費四百萬兩，法二百萬兩。六，再行協定稅率。七，許法國以特惠贖典。其次北京條約，其要項爲：一，天津條約有效。二，開天津爲商埠。三，割九龍司地方一區，爲英國領地。四，增賠款，英法各八百萬兩。(C)中日之戰所製造出來的不平等條約曰馬關條約。其要項爲：一，朝鮮完全自主。二，割遼東半島(奉天南界從鴨綠江至鳳凰城，海城營口)台灣及澎湖列島於日本。三，償軍費二萬萬兩。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口通商。(D)八國聯軍之役所製造出來的不平等條約爲辛丑和約；其要項爲：一，懲辦罪魁。二，派專使赴德日謝罪。三，凡虐殺虐遇外人之城市府縣，均停止文武考試五年。四，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五，開拓使館界，不准中國人住居，且

駐兵保護使館區域。六，數大沽砲台，及北京至海濱間交通之各砲台；折天津城。七，各國得駐兵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等處，以保北京至海濱無斷絕交通之虞。八，中國政府須頒布嚴禁排外之上諭；官吏須切實保護外人。九，中國政府承認襄辦白河黃浦江二水路之改善。十，改總理衙門爲外務部，位在六部上。

我們祇舉四次較嚴重的武力壓迫所製造出來的不平等條約爲例，便可以看出國際資本主義者所得經濟侵略的永久保障，爲何等鞏固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有人調查中國內情；不平等條約上規定外人可以自由旅行中國，這於調查內情方便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有根據地；不平等條約上規定割地與外國，這於根據地的問題算解決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中國自己對外無抵抗的表示；不平等條約上規定中國拆城牆，毀砲台，這中國當無抵抗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有商埠；不平等條約規定開若干商埠，這於商埠問題解決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有保護外商及壓迫國人的特權；不平等條約上規定外人有領事裁判權，這外商可以放心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能支配中國政府；不平等條約規定任外人駐兵保護使館，并改中國總理衙門爲外務部，位於六部之上，以供外人支配；這樣外人可以支配中國的政治了。施行經濟侵略，必須有武力作後盾；不平等條約規定，外國可以駐兵

於中國，這算有後盾了。凡此等等，不過略舉其要。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中種種規定，無不是國際資本主義者對華施行經濟侵略的永久保障。

三〇、武力壓迫與經濟侵略的消長

幾次大戰，把中國打昏了；武力製造出來的不平等條約，又把中國束縛得緊緊的。這結果所發生的影響。便是國際資本主義者對中國武力的壓迫漸漸減輕，經濟的侵略漸漸加緊。武力的壓迫所以減輕，因為經濟的侵略得了永久的保障，能夠加緊。經濟的侵略既能夠加緊，那末武力的壓迫因把中國打昏了，無妨減輕。武力的壓迫與經濟的侵略這樣一消一長，是新的種族鬥爭的一個特徵，我們最宜認取；并且事實具在，也不容我們忽視。先就武力的壓迫講罷。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各國以武力壓迫中國的事，并非沒有，但決不如八國聯軍之役以前的猛烈；因之引起大戰的事完全沒有。例如英人之侵略西藏，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曾乘俄國與日本有事之時，派兵一千，由印度侵入西藏。但也止於如此。這與前此大戰的情形比較起來，算是極溫和的了。又如日人之侵略南滿，也祇在行政方面努力佈置。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於光緒三十三年設關東州都督府。很少用大軍壓境，造成大戰的事。再如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英兵之占據片馬，也祇以占據為止；其駐在片馬之兵，來去

也無一定；并不如八國聯軍之役以前那樣兇猛的向中國重鎮長驅直入。更如葡人之擴大澳門租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曾與中國大起爭議，然亦止於爭議，并未釀出大的軍事行動。凡此都足以證明國際資本主義對中國之武力壓迫，顯係由猛烈而溫和。不獨由猛烈而溫和，并且用文力代替武力。華府會議前後，各國爭以教育為保護市場之工具，紛紛在中國提倡文化事業，發展學術機關，促進教會教育。當時國人盛倡反對文化侵略之說。倘非反對而收有相當之效果者，則今日之大學生，恐都在教會大學；國立大學，恐無人上門。這并非我故意瞎吹，乃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見的事實。

武力的壓迫，日漸溫和，甚至以教育代替武力，這并不是國際資本主義者要對中國施恩，實因經濟侵略，可以暢行無忌，無須用武力猛烈的壓迫了。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國際資本主義者對中國所施的經濟侵略，其速度一天一天加大，也是凡有眼睛的人所能看見的。我們在前而論總長增高的經濟侵略時所舉的一表，便足以證明這個事實。該表所列出入口淨數，自一九〇〇年以後，其增加之速度較一九〇〇年以前，顯然大多了。且入口淨數之增加較出口淨數之增加，其速度更大，也一日可以瞭然。這還祇是貿易一方面的情形。至於以雄厚的資本，投於中國的礦山，投於中國的鐵路，投於中國的工廠等等，以直接或間接剝削中國工農之血汗，更是顯而易見的事，更足以證明經

濟侵略之加緊。但經濟侵略之加緊，與文化的侵略是平行的。兩者結合，又引出了極大的反抗運動。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等之相繼發生，其直接原因，幾乎就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的經濟侵略及保障經濟侵略的文化侵略之日益緊迫。

三一、反抗運動舉例

反抗運動，實隨國際資本主義之侵略以俱生。并不是到五四運動時才開始的。現在且舉幾個例以見一般（A）廣東紳民之反英運動。鴉片戰爭以後，英人欲實現南京條約上所規定的權利；到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處紛紛建設領事館。獨廣州紳民，誓死反對，不許英人入城。當時耆英爲兩廣總督，無法制止紳民的憤慨，乃與香港總督結約，保障舟山不割讓他國，將廣州開放之期延至光緒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藉以平紳民之憤。後因亞羅船事件，中英開釁，英軍攻陷廣州。但因人數太少，不久即退。退出之時，紳民情慨極了，羣起暴動，大燒洋樓。凡法國人美國人的住室，以及英國人的商館，與夫從前的十三行，都一律燒成焦土。這不能不說是一次反抗運動。（B）義和團之「滅洋」運動。光緒中葉，山東有農民，利用宗教迷信爲手段，糾聚黨徒，以拒暴吏，叫做義和團。義和團眼看中國被國際資本主義者（他們自己當然不知道稱此爲國際資本主義者）壓迫得轉氣不來，乃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倡始反抗運動。常常有仇殺外人，

焚燒教堂等直接行動。初起於山東時，勢力頗厚。後因袁世凱主張剿伐，乃竄入直隸南部。直隸總督裕祿，不唯不加剿伐，且表示信仰。這樣一來，他們的勢力更兇了。他們以爲一切模倣西洋的辦法，都是洋人弄出來以禍中國的。於是毀鐵路，燬電線，燒教堂；甚至藏洋書洋報者，亦必捕殺之。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四月間，在天津及近畿一帶，異常活動。紳民信從的日多。五月十五日，遂在北京大肆暴動，焚燬教堂，劫掠街市。并把日本書記官杉山彬殺於永定門外。結果遂引起八國聯軍入北京之事。（C）五卅慘案及其他。自五四運動以後，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運動，一天一天展開；常以外交問題爲導火線而爆發。民國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學生憤國際資本主義者之壓迫太甚，痛工人顧正洪被外國資本家打死；乃在租界內分隊講演願被殺之真相，以期喚起各界注意。公共租界英捕房謂學生援助工人，有意排外，竟捕去學生若干人。學生因此集合大隊出發，一面講演，一面請求釋放被捕同學。英捕以武力干涉，捕頭愛伏生竟召集巡捕，下令向大衆轟擊。當場死者四人，後在醫院死者七人。至於受重傷的，則不計其數。五卅慘案，於以釀成。五卅慘案發生之後，漢口慘案，及廣州沙基慘案亦相繼發生。一時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熱潮，幾已瀰漫全國。

國際資本主義者向我國壓迫，我國民衆起而反抗；這種情形便是我所謂新的種族鬥爭、新的種

族鬥爭正在進行之時，新的階級對立之局也正在醞釀。但這樣醞釀出來的階級對立之局，與前此的將截然不同。前此的階級對立，祇對立於黃種人中；後此的階級對立，將擴大至全世界的民族。又新的種族鬥爭正在進行之時，中國也漸漸變成了外國：漸漸喪失了向來獨立國家的資格，成了世界的社會關係中之一員。我在下面各章中，要從經濟，社會，政治，教育，及思想各方面，討論中國之所以變成外國的種種。

第二章 經濟之辯證的動態

在新的種族鬥爭中，中國漸漸變成了外國，其中變化的實在情形，究竟如何？我們如要研究，最宜從經濟方面研究起。關於經濟的研究，我們可以依着很自然的次序，分爲三節：一，中國原有的經濟；二，原有的經濟之變動；三，經濟變動後的新機能。現在先講第一節。

第一節 原有經濟之動的研究

一、決定經濟的天然環境

中國經濟之所以爲中國經濟，是天然環境決定的。中國天然環境中，影響經濟生活最大的，厥爲地勢與氣候及河流。中國位於亞洲之東南部，地勢西北高，東南低。西北依據高原，東南接連大海。自高原至大海，其間成一斜面。此一斜面中，因有大山與大

水；橫行交錯於其中，又型成高原，邱陵及平原等等區別。就高出海面的尺數而言，大概高出海面六百尺以下的，可視為平原，高出海面五千尺以上的，可視為高原，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可視為邱陵。高原位於西藏，西康，青海，甘肅，蒙古，新疆等處；平原與邱陵，則分佈於各省。高原面積，約一八五三、四〇〇〇里，占全國總面積約百分之五六。平原面積，約三七四、七三〇〇里，占全國總面積，約百分之一二。邱陵面積，約一〇五九、〇〇〇〇里，占全國總面積約百分之三二。高原都在西北，邱陵及平原分佈於各省；我們一見即知較為適於經濟生活的乃邱陵與平原。高原對於經濟生活，則遠不如邱陵與平原之有益。中國原有的經濟生活，固然受地勢支配着；即原有的經濟之變動，亦與地勢有關。中國近代經濟的變動，始於東南，漸次及於西北，便是明證。

地勢之外，決定中國經濟生活最有力量的便是氣候。以言溫度，內地最優。南嶺以南雖是熱帶氣候；然得海洋調劑，仍非常溫和。長江黃河兩流域，可以說是中國境內氣候最溫和之地。東三省比內地稍差一點：每年有酷熱酷冷的時候。但比起蒙古新疆及西藏來，則又好多了。蒙古，新疆及西藏的溫度，在中國境內，算是最不適宜的。所以這三處的經濟生活，遠不如東三省及內地之優越。再就雨量言，每年雨量多寡之適度，也以內地為最，東三省次之。若蒙古新疆西藏等處，雨量

多寡，便不很適度了。蒙古，新疆，西藏各處的經濟生活之較劣，實地勢氣候使然。至於河流，則支配中國經濟生活之處，更爲顯著。中國境內的大山，如南嶺北嶺陰山；大水如黃河長江珠江；都是東西橫行。山則自西向東，漸漸低下；水則行於大山之間，匯合衆流，自西向東，漸漸廣闊。山之漸漸低下，水之漸漸廣闊，乃把高原之地，漸漸轉而爲邱陵與平原。邱陵與平原的地勢及氣候，均較高原爲優，前面已經講過了。因此中國人要經營適當之經濟生活，如要貪邱陵及平原的地勢優越，氣候溫和，則必與廣闊的江河奮鬥。歷史上統治階級指揮民衆所從事的，關於經濟的設施，幾乎祇有對付水患的一種。對付水患，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經濟工作。蓋不對付，則祇有逃避；若逃避，則又舍不得氣候溫和，地勢優越的邱陵與平原。因此之故，中國人於對付水患，畢竟下了不少的苦工。

二、農業國

對付水災的成功，便是農業的發達。中國農業的發達，遠在周初，便已到了極隆盛的地步。幾千年以來，經過統治階級的提倡，以及爲統治階級作工具的智識分子之鼓吹，中國竟成了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直到最近，據官書的報告，中國從來農業的農家戶數，民三到民七的統計有如左表。

年別 農家戶數

民國三年	五九、四〇二、三一五
民國四年	四六、七七六、二五六
民國五年	×五九、三二二、五〇四
民國六年	×四八、九〇七、八五三
民國七年	×四三、九〇五、四七八

上表係從第一回中國年鑑——一四頁上轉錄來的，係民國十一年農商部發表的統計報告。附有×記的，係因五，六，七各年度，湘，川，粵，桂，雲，貴的報告未到，未得完全的數目。這種統計報告，大家都知道錯的很多，不甚可靠。但至今我們尙無更可靠更不錯的統計，因此之故，仍祇好拿這不甚可靠的數目來表示一般。我們若以民國三年的戶數爲準，并認定每戶農家的人口爲五人，則以五乘五九、四〇二、三一五，得總數二九七、〇一一、五七五人。近來大家都謂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全國人口之數，也是至今無可靠之數目的。說多者謂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說少者則謂祇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參看社會調查所社會科學雜誌二卷二期二二〇頁到二三三頁）。不過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數，大家多信以爲眞。我們於今無法反證，也姑且信以爲眞。以二九七、〇一一、五七五的農民總數，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全國人口總數比較，雖不能謂農民治治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但離百分之八十的比例，尚不甚遠。全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從事於農業。他們工作的地方，主要的便是農田與園圃。農田是種五穀的，園圃是種桑麻茶蔬之類的。農田與園圃的面積，據農商部報告，民三至民七的統計有如左表。（畝爲單位）

年次	農田	園圃	之面積	合計	百分比	比例
民三	一、三五四、一四四八	一、八二〇、一五七	一、五八六、四七五	八六・三三	一一・六七	
民四	一、三九五、五二一	一、三三八、八九七	一、四四三、三三六	九二・四八	八・五三	
民五	一、三八四、九七七	一、三三〇、三七〇	一、五〇九、九七五	九二・七三	八・二六	
民六	一、三五八、二六六	一、〇六二、一六六	一、三六五、一八六	九二・二八	七・七二	
民七	一、二二七、二九六	九七、一九三	一、三四四、四七二	九二・六一	七・三三	

上表也是從第一回中國年鑑一二三四頁上錄來。★記係表五，六，七各年度湘，川，粵，桂，

雲，貴的報告未經列入。這種統計，當然也不甚可靠。但未得可靠的數目之先，祇好拿此來表示一個大概。民國三年，全國農民總數為二九七、〇一一、五七五人（是年共五九、四〇二、三一五戶，每戶以五人計）農家為五九、四〇二、三一五戶；農田總圖之總面積為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畝。以人數除畝數，每人可得五畝以上；以戶數除畝數，每戶可得二十六畝以上。農民在農田園圃從事勞動，結果便造成大量的出品 每畝每年出品的分量，我們可拿民三到民七五年之中的米麥豆為例（石為單位）

年 別	每畝所出 之米	每畝所出 之麥	每畝所出 之豆
民 三	三・六九二	〇・九四二	〇・七二七
民 四	五・一五八（恐有誤）	〇・九五四	〇・七二〇
民 五	*二・一八〇	〇・八八八	〇・五六八
民 六	*二・一九八	〇・六四二	〇・七一九
民 七	*一・六六四	〇・六四八	〇・七五八

上表係根據農商部的報告所作成，附有★記者，報告不完全，米麥豆為中國的主要食品，每年

每畝的出品數量有如是之多，中國人宜乎家家可以稱小康矣。乃事實上治治與此相反：餓死人的事情，幾千年以來，無一年沒有，無一省沒有，原因究在何處？一言以蔽之曰：土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是也。上述每家農戶有二十六畝以上之土地，乃將農民之數與土地之數平均計算的結果，并非事實上真正如此。就事實看，中國的土地，完全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多數農民沒有土地。這一個事實，乃中國原有的經濟裏的一個特徵。中國社會的結構，文化的表現，幾乎全是以這個特徵為基礎。然則土地又是如何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去的呢？這要先把土地私有制的歷史略為說一說。

三、土地私有制之成立

土地私有制，并不是成於一朝；乃經過長期的歷史，漸漸演成的。就其演變的階段言，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曰絕對公有的階段，二曰半公有半私有的階段，三曰私有的階段，四曰土地兼併的階段。（A）土地之絕對公有，無人佔領，或據為己有的一個階段，在歷史上是必然的。任何民族中，必有這樣一個階段。世間到底是先有土地然後才有人類；斷不是先有人類然後才有土地。更不是土地私有制，先人類而產生。我們於此，不必多舉證據，便可以毅然決然承認這是任何民族在歷史上所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B）半公有半私有的制度，乃繼絕對公有制之後，因應環境而產生的。我所謂半公有半私有，乃土地所有權歸公，使用及收益權歸私的意

思。這樣的制度，頗與中國歷史上所謂井田制相當。中國究竟有無井田制，言人人殊。但就社會進化的事實推論，可以斷定爲有此種制度。不過始於何時，終於何時，很難考定就是。至若繼絕對公有制之後，產生這樣一種制度，確是事理之當然。按這種制度的辦法，田歸公有，耕田者向公家領田耕種。耕種所獲之產品，分一部分於公家。一個人在未領田之先的幼小時期，及還田於公之後的年老時期，都歸公養。在人口生殖日繁，絕對公有制不能維持原狀的時候；政府機關或類似政府的權力機關，出而把絕對公有的土地，稍稍劃分，使耕者遵守相當的條件，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并非不可能之事。半公有半私有之制，大概就是這樣產生的。（C）中國之井田制，或半公有半私有之制，在歷史上縱占據一個時期，但行過相當的紅運之後，便消滅了；起而代之的，乃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井田制之所以必轉而爲完全的土地私有制，也是因應環境，適合時代之需要的。朱子阡陌辯述秦商鞅廢井田之理由曰：「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則病其地利之有移。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歸授之際，不免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併買賣，以盡人力。開墾異地，悉爲田疇，而不

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就這段話看，井田之變而爲私有。乃根據四大理由：一曰盡人力，二曰盡地力，三曰免歸授的麻煩，四曰防人民的佔據。大概當時人口繁殖到了相當的程度，半公有半私有之制，不足以應付事實上之需要了；并且歸授的麻煩，以及人民的佔據，在在表示井田之不得不廢。(D)井田制剛廢去，私有制剛完成，兼併的風氣乃隨着開始。好像私有制乃爲着兼併而設的。兼併與私有制有什麼不同？簡單言之，私有制祇是政府允許私人享有土地權，允許私人視土地爲自己的財產，乃是一種制度。兼併則是將私人的土地所有權移於少數人之手。爲少數人壟斷土地之過程。這一個過程，可以從兩方面看。從少數壟斷土地者的方面看，很像資本之原始累積的過程；從多數喪失土地者的方面看，很像農業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分離的過程。兼併之風愈甚，土地被少數人壟斷的愈多，農業生產者與土地分離的事實也愈發達。農業生產者愈與土地分離，社會上的貧富之分乃愈顯著。這是土地私有制下兼併盛行的結果。

四、真的兼併與假的均分

土地私有制所以成立的經過，略如上述。土地私有制一經成立了，幾千年來便完全支配着中國的農村，沒有發生過根本的變動。不唯沒有絲毫變動。且兼併之

風，日甚一日。正因兼併之風日甚一日，糾正此種風氣的種種辦法也隨着產生。於是兼併或獨占的風氣，與公有或均分的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平行。不過兼併是事實，均分却祇是虛名；兼併是真的，均分却是假的。看中國歷史的人，若祇看官書上鋪張揚厲之文，謂中國幾千年以來，朝朝都有很好的土地制度，固無不可。法學叢刊社出版之法學叢刊一卷三期上便有這樣的看法。該誌四五頁上有言曰：『綜計我國自開化迄今，凡歷四千六百餘年。其中土地完全國有，施行井田，計口授受者，凡二千餘年。開阡陌，准自實，及行代田王田制者約五百年。給永業，分露田，由政府通盤籌算，平均支配者，約八百年。土地歸人民私有，一任兼併買賣者，則最近千百年之事也。但從反面看去，祇看那些反對兼併及替農民訴苦的議論，謂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土地制，都是很壞的，也很應當。崔東壁說：『春秋之時，王制已廢，井疆已紊，……豪強兼併，多寡不均』。（見王政三大典考）馬端臨說：『自秦開阡陌之後，田即為庶人所擅。然亦唯富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勢力，非勞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於富者也。（見通考田賦考）這些議論，都是體察事實的結果。馬尚祇謂秦以後富貴者擅田。崔則謂春秋之時，豪強便開始兼併矣。這些議論，若拿來與事實對照看，可以說是洞中肯綮。事實上兼併土地之風氣，自有土地私有制之日起，直

到今日爲止，並沒有停止過。如謂此風始於春秋之時爲太早，則推遲一點說，謂始於秦漢之交，却是萬億千真。漢初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時便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豈獨漢興循而未改？老實說來，自土地私有制成立之日以至於今，歷代富貴之家，都在變本加厲的兼併。宋朝的官吏，憑勢力以奪人民田廬產業者不知凡幾。元朝此風更甚。元成宗曾有一次對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臺臣答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詈」。官吏與富民，倚勢以欺貧民，壟斷土地，把土地轉移到少數人之手；使多數人與土地分離（分離兩字與 *Marx Capital* 中 *expropriation* 一字之義相近。讀者如有工夫可取該書一卷二十六章參閱）乃歷史上萬萬不能否認的事實。歷代正史上改革田畝制度的種種辦法，如「名田」，如「代田」，如「王田」，如「均田」等，都祇是這種事實的反映。歷史上以均田或公田的種種辦法示人，無異於說兼併獨占的風氣已經發達到了極點。兼併獨占的流毒愈大，歷史上改革的法令或制度便愈多。法令制度，乃紙上的空文；兼併獨占，乃農村中的實況。實況是兼併或獨占，空文則是公有或均分。我們研究歷史時，倘不把空文與實況分別注意，則定有許多問題糾纏不清。若曉得這一個分別，則糾纏

不清的問題常可以迎刃而解。

五、地租論略

土地既被少數人兼併去了，大多數農業生產者與土地分離。然與土地分離之後，爲生活所迫，又非重行與土地結合不可。這一個重行結合，乃構成東佃關係。所謂地租，便是已經喪失土地的農民向獨占土地的地主租種土地後所發生的。即農民與地主成立東佃關係之後發生的。獨占土地者，有地面無人耕，則不能獲利。喪失土地者，能耕而無可耕之地，則不能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喪失土地者爲生計所迫，祇好依據某些條件，租種地主的土地。地主拿土地所有權作武器，向租種土地的人索取地租。無土地的人拿出勞力到有土地的人的土地上從事工作，乃中國歷史上很早就發生了的事情。馬端臨謂「耕田之夫，率屬役於富貴者」，便是指此等事情，葉水心謂「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也是指此等事情。蘇洵謂「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田之所入，已（田主）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而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靠」。也還是指此等事情。（上均見通考田賦考引語）蘇氏所說，不獨無田者耕有田者之田，且將耕者與田主平分收穫的事一併說出了。我所謂地租，正是指耕者分於田主的一部分收穫而言。田主所得這一部分收穫，並沒有什麼理論的根據。

祇因他獨占了土地，有土地所有權，可以任意向耕者索取。

不過擁護地租的人，也有種種說話。或則曰土地有生產的功用，耕田者雖能操勞，倘無土地，則勞力亦無處使用。勞力既無處使用，結果便沒有收穫。今耕田者能有收穫，當是土地所賜。因此耕者應納地主以地租。此一說也。不過我們却不能認此爲索取地租的理由。土地雖有生產的功用，但不加勞力於其上，斷不能有收穫。可見耕田者之有收穫，并非完全由土地所賜，而祇是自己勞動的結果。或則曰：地主獲得土地權時，費了不少的氣力。今將土地租於耕田者，則耕田者應納地租以報酬之。此又一說也。我們於此姑不問地主獲得土地權時。費了多少氣力。假令地主不是官僚或特權者之後裔，而是由勤儉以起家的。（由勤儉起家以成地主的，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裏，當然不能說沒有。）但也不能向耕田者索地租以作報酬。蓋獲得土地所有權時所費的氣力，土地所有權即是牠的報酬。耕田者所有的收穫，乃他自己勞動的結果，乃報酬他自己之勞動的，不能分於地主。或則曰：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時候，地主拿出錢來購置土地，并加種種改善，使土地變成土地資本 Landcapital。（在 Marx Capital 中土地資本一詞相對的，叫做 Material Land 我們這裏所謂土地，意即 Material Land。所謂土地資本，意即 Landcapital。關於這兩個名詞不同的意義，可參看該書三卷七二五到七二六頁。）資本是應該有利息

的，所以耕田者既租種地主之土地，定要分一部分收穫於地主，以符資本應有利息之義。此又一說也。但資本應有利息的意思，并非謂資本自己能創造什麼東西。祇因得了政府法律的保障成了一個榨取勞動者之剩餘勞動的武器。地主以土地所有權向耕田者索取地租，其辦法正與拿資本榨取勞動者之剩餘勞動相若。這個辦法，現在我們實在不能承認了。不過我們承認與否爲一事，事實是否如此爲又一事。我們儘管不承認這個辦法；實事上則幾千年以來，都直接或間接，正式或非正式實行這個辦法。自私有土地制成立，土地可以任人買賣兼併之日起，直到今日，事實上的東佃關係，在歷史上從沒有消滅過。在今日則此種關係異常發達，平均計算中國農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佃農，佃農最多的地方，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廣東便有這樣的例。（參看拙著中國社會之變化一九四〇—一九九〇）

六、建於地租之上的工業

土地集於少數人之手，地租的分量，日漸擴大，工業的製作，也隨着發達起來。中國原有的工業，可以分爲兩系：一，則因統治階級的需要而發達的，乃最進步的一系。另一，則因民衆的需要而發達的，乃最幼稚的一系。統治階級的主要成分，是元首特權者，官僚，地主等，我們在第一章曾說過。這等人都是憑政權奪取農民的生產品而生存的。他們有政權，他們可以儘量榨取農民的生產品，因之他們的生活，可以優越豐富，但優越豐富的生活，是

要用物質的設備或供給才能充實的。如果物質的設備或供給，僅足以維持生存，那末生活也就無從優越起，無從豐富起。統治階級用政權奪取農民的生產品以維持生存外，尚有無限的剩餘。此無限的剩餘，乃成了發展工業的基礎。統治階級聚積無限剩餘生產在手中（或聚積實物，或聚積貨幣。大概貨幣經濟不甚發達時。多聚積實物。中國有許多交通機關，都是因統治階級聚積剩餘生產而發達的。如運河之開鑿，卽是一例。）不能直接消耗，不得不轉變形式，不得不易爲間接使生活優越豐富的用品服飾，等等。中國許多精製工業品，都是因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而發達的。中國歷史上有所謂「進貢」的辦法，各地製作某種工業品的製出最精之品，送於統治階級。各地某種工業品，一經有進貢的資格，在社會上的地位，乃陡然高起來。至是附近的地主也爭相購用。因此這工業品乃一天一天的發達，一天一天的進步。蓋統治階級中之特權者，官僚，地主都需要；且都有剩餘農產品在手，或都有由地租實現出來的貨幣在手，配需要這種精進的工業品也。

誰都知道：中國的生產方法極不進步。不過方法雖不進步，生產品却有極進步者。誰都知道：中國是窮得不像樣的國家。不過國家雖貧，生產品却有極奢侈者。宮殿之偉大，如秦始皇之阿房宮，歷代帝皇之宮殿，南北朝後歷代供奉佛像之廟宇等等，從歷史上的記載想像起來，實令人驚

訝。特別建築，如秦始皇時代之萬里長城，曾費去無數農民之勞力；特別製造，如隋煬帝之樓船，其大可以容數千人。他如最精緻的織繡，瓷器，金石器物，於今北平故宮博物院所留下的，也就夠令人羨慕了。一個貧而不進步的國家，竟有如此偉大奢侈精緻之物，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但這個矛盾容易解釋。這完全是階級對立的結果。階級對立的裏面，便是貧富對立；我們在第一章曾經講過。貧富既已對立了，富的有多量不能消耗之農產品，不得不轉變為他物，以滿足需要。貧的有勞力無處使用，適逢富者有轉變農產品的需要，於是相率到統治階級指揮監督之下，去從事於建築製造等。因有統治階級或富人的需要：偉大的建築及精緻的工業品，乃一代一代的多起來。照理講，貧國家不能有偉大的建築物精緻的工業品。然貧國家中有富人；富者累積地租，貧者在地租上提供勞力；手工業時代的許多奢侈精緻的東西都是這樣發達的。我所謂建在地租之上的工業，也就是指此。

七、工業的兩系

上所述的，為建在地租之上的工業，是統治階級所獨有的。但一般的民衆，除了純粹農產品外，未必全然不需要他種的工業品。滿足水平生活的需要，也非有幾種極簡單的工業品不可。因此之故，中國的工業，很早以前，就分兩系發達。一系是滿足統治階級的，建在地租之上，官營或官有的性質多。另一系是滿足一般民衆之需要的，在民衆與民衆間互相交換；私

營或私有的性質多。時代愈早，兩系的分別愈顯。在社會階級初對立之時，民衆方面因彼此的需要漸漸發展出來的工業尙極幼稚，其工業品尙不易爲統治階級所重視。然統治階級的需要，在階級初對立之時，便已迫切；常設專官爲自己製造用品。統治階級自己設官所製造的東西，因貴重奢侈之故，很不易流於民間。民間因滿足水平線的需要，漸漸發展出來的東西，則簡陋粗糙，很不容易引起統治階級的注意。所以時代愈早，兩系工業的分別愈見顯明。

中國早在周初，兩系工業的分別便非常顯明。周禮考工記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植之工二』。鄭注云：『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官，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這顯然是說統治階級自辦工業。至若滿足一般民衆之需要的，則完全是在民衆間自由發展出來的。民衆與天然奮鬥實際的需要，逼出了發明或製造。考工記上有一段話很可以證明民間自由發展工業的事實。其言曰：『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人人都能作鑄函廬弓車等，則顯然

是民間也有工業的證據。民間的工業，與統治階級的工業，最初的分別，很是明顯。但積時既久，有一大部分漸漸匯合起來。民間製造的東西可以上達於統治階級。統治階級設官專製的東西，可以下移於民間。這個匯合的過程，大概如下：（1）統治階級設官專製的東西，初雖專爲本階級應用，但亦未必絕不許流於民間。更因設官之多，官爲營利起見，或將製品賣一部分於民間以獲利。再者製作的方法，因積時久，漸漸普遍了，民間富而有資者或漸漸起而仿造。這樣一來，統治階級的工業品可以下移於民間了。（2）民間因某地特產豐富，常能就特產中製出特殊東西。此種特殊製造，一經傳聞於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常令製造者選精「進貢」。某地某種特殊製造品，一經有進貢的資格，價值便陡然高起來。價值愈高製作愈精，久而久之，也可以成統治階級常用的東西。至是兩系工業，乃漸漸匯合，無所謂統治階級的與民間的之分別了。

八、商業與商業資本

工業品的兩系，固然匯合爲一了；統治階級的與民間的之區別，固然消除了；但工業品的種類，是因地方的特產決定的。某地方有某種特產，始可以發展出某種特殊工業品。無金銀的地方，決不會有金銀器；無竹木的地方，決不會有竹木器；無絲麻的地方，決不會有絲麻物。工業品之種類不同，由於地方出產之各異。但地方出產之各異，又是天然環境所決定

的，天然環境決定特殊物產，特殊物產決定特殊工業品。要使特殊的工業品能適應大多數人的要求，則必有賴於懸邇有無的商業。工業品固然要靠商業，其功用才能廣播；農業品亦復如此。農業品之種類不同，也是天然環境決定的。盛產谷米之區，未必盛產絲麻；盛產絲麻之區，未必盛產羊毛茶葉。要使特殊區域所產的農品能普及於一般人，能滿足一般人的要求，也必有賴於懸邇有無的商業。不同區域，不同種類的工業品，以及不同區域不同種類的農業品，固然都需要商業來把各自的功用擴充於一般人。但同時農業品與工業品彼此的交換，尤其有賴於商業。因此之故，商業乃在中國境內發達起來。商業之發達，爲時極早。大概自有工品種類之不同及農品種類之不同，與夫農品農品地理分佈之不同的時候起，便有商業的雛形。不過初時祇是以有易無，直接交換。後因分工之制一天一天發達，以及貨幣的產生，商業乃得獨立發達。

商業獨立發達起來了。不同種類的工品在地理上分布的距離儘管很遠。不同種類的農品在地理上分布的距離，儘管很遠；工品與農品彼此在地理上分布的距離儘管很遠，然藉商人之力，可以進行交換。於是以有易無的直接交換，一變而爲由商人代理的間接交換。商人代理的間接交換初發展之時，大概就是商業資本開始成長之時。直接交換，純係以物易物，如甲以布易乙之米，雙方都是

爲着滿足自己需要，并非爲着獲利。但間接交換，就不同了。居間的商人，憑貨幣爲媒介，代雙方進行交換，則他自己的生活費用，必須用賤買貴賣的方法。向雙方取得。倘他向雙方取得的費用等於生活所需，則他所憑藉以進行交換的貨幣，仍是貨幣。倘他向雙方取得的費用超過生活所需之外，并用餘數加入原來所憑藉的貨幣之內，擴大交換，那末他原來所憑藉的貨幣，便已變成商業資本了。中國歷史上用賤買貴賣的方法，獲得贏餘的利息，從而擴大交換之範圍的，自秦漢以來代代都有。前漢書食貨志述晁錯之言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這可見商業資本發生很早，所以早在漢朝便已有極大的商業資本家。其勢力之大，可以傾倒王侯。傾倒王侯之事，當然不是常見的例。但自秦漢以來至於今日，商業資本在中國的發展，却成了絕對不可否認的事實。

九、農村中的三種毒物

自從商業資本發展以後，在農村中作祟的，有很大的三種毒物：一，即商業資本，二，爲地租，三，爲高利貸資本。（A）商業資本在農村中作祟，貽害農民，自古至今，沒有間斷過。中國歷代所施的抑商政策，便是商業資本貽害農民的反映。上面所引晁錯之

言：「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更是商業資本貽害農民的明證。然則商業資本究竟是
如何貽害農民的呢？這可以一言蔽之曰：以賤買貴賣的方法，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是也。史記貨殖
傳述白圭樂觀時變，其言有曰：「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
繭；歲兇取帛絮，與之食」。所謂樂觀時變，便是善於投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最好從中以貴
易賤。商人憑商業資本，以貴易賤，在農業經濟占主要地位的時代，最足以貽害於農民。如以一百
圓錢買穀，賣於需穀者，得錢一百二十圓，得二十圓贏餘。此二十圓贏餘應付於出穀者。但商人却
祇與出穀者一百圓。此一度買賣中便榨去穀農二十圓了。又如以一百圓錢買絲；賣於要絲者，得錢
又一百二十圓，得二十圓贏餘，此二十圓贏餘應付於出絲者。但商人却祇與出絲者一百圓。此一度
買賣中，又榨去絲農二十圓了。商人以商業資本，換取農產物品，依賤買貴賣的方法，無論賣於王
侯，或賣於官吏，或賣於地主，結果都要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商業資本在農村中有這樣的作用，
應稱之爲毒物。(B)地租之貽害農民更是顯而易見。假如農民與獨占土地者之關係爲佃戶與東家的
關係。佃戶租種東家若干畝田，每年將總收穫分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或十分之七與東家。(此種分法
現在中國，差不多任何省都可以找出實例。參看拙著中國社會之變化一九九頁到二〇三頁)東家所得十之五，或十之

六，或十之七，乃佃戶的勞力生產出來的。然東家却可以憑土地所有權爲武器，任意向農民索取。這是地租貽害農民之處；蘇洵謂「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見前）便是地租貽害農民的明證。地租這樣貽害農民，所以我們應稱之爲農村中的毒物。（C）至於高利貸資本，可以說是地租及商業資本的變形。地主累積高額的地租，不能任其閑空，不能不放出去活動，以擴大其自身。出去活動，有兩個主要的動法：一則走入流通過程中，充商業資本，憑賤買貴賣的方法，以間接搾取農民的剩餘勞動。另一則貸於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充高利貸資本，憑高額的利息，以直接搾取農民的剩餘勞動。至於商業資本，也常因商業不旺，從流通過程中退出。不過退出之後，商業資本家，也是決不會任其閑空的，也是決不能不任其出去活動的。出去活動的方法也有兩個：一則到農村中購買土地，化爲土地資本 Landcapital（見前）憑地租的方式，以搾取農民的剩餘勞動。另一則貸於無土地的農民，憑高額的利息以搾取農民的剩餘勞動。商業資本與地租都可以轉變爲高利貸資本；所以高利貸資本之發生很早，大概與土地私有制或地租制之盛行，與商業資本之發達同時發生。漢時有限制「取息過律」的法令，清律亦規定：「每月行息，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據此也可想見高利資本發生之早，及貽害之大。因其貽害大，我

們乃稱之爲農村中的毒物。總結說來，在農村中作祟，貽害於農民的，有地租，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此三者，在中外沒有交接之先，始終祇能在農村中活動。在中外開始交接之後，乃由農村漸漸轉入都市；轉入工廠，轉入鑛山，轉入交通運輸各種工業。一言以蔽之曰轉入新的生產過程之中，新的流通過程之中。在新的生產過程中及新的流通過程中，與國際資本主義者的資本互相交接，或互相融合，或互相競爭，或互相衝突。地租，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漸漸由農村轉入新的生產過程，及新的流通過程，中國經濟乃漸漸變革：一方面拋棄其舊有的特性，另一方面顯出其新生的機能。但正在新的生產過程及新的流通過程中，又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及資本發生了密切關係：或與之互相融合，或與之互相競爭；至是中國的經濟，於變革之中復生變革：一方面由舊式的變成新式的，另一方面，由中國的變成世界的一部分。前者在第二節內研究，後者則留到第三節內研究。

第二節 中國經濟之變動

○、商業資本的新活動

中國經濟之由舊式的變爲新式的，其變動的痕跡，章章在人眼

中，最惹人注意的一點，便是原有的商業資本得到新的活動機會。原有的商業資本，雖很有偉大的勢力，雖有時上可以傾倒王侯，下可以使農民破產；然其活動的範圍，始終限於農村，始終限於中國境內。其滋長擴大，始終祇在農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過程之中，或手工業品與手工業品的交換過程之中，或農業品與手工業品的交換過程之中。但自海禁既開以來，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商品。紛紛流入，中國原有的商業資本，乃得到新的活動機會。原來的活動，祇限於農村，或農村都市（與現代的新式商埠截然不同。）海禁開後，則到新的都市或新式商埠去活動。原來的活動，祇在國內，海禁開後，則活動到國外去了，原來牠的滋長擴大，始終祇在農業品與農業品，或手工業品與手工業品，或農業品與手工業品彼此互相交換的過程之中，海禁開後，則擴充到國內的農業品或手工業品與國外的機製工業品互相交換的過程之中去了。這些轉變，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便已開始。鴉片戰爭前，與中國通商較早的爲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這些國家早就用機製工業品來換取我國的農業品。例如鐘表，鈕扣，縫衣針，眼鏡架，等等都是很精緻的機製工業品。鴉片戰爭前，各國的富商大賈，常拿這些東西來換取我國農業品如絲茶之類。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規定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爲通商口岸。西方機製工業品乃源源而來。農業品的輸出，也隨着增加。

工業品的輸入增加，農產品的輸出增加，原有的商業突現進步之狀，商業資本，乃得較多的活動機會。原有的商業資本在國內能活動，乃因國內生產品之地理的分布有不均。例如產米之區，不一定產絲；產絲之區，不一定產茶。因生產品之分布，有地理的差異 *Geographical Difference*，需要商業爲之調均，於是商業資本乃能活動。但牠活動之弛緩與緊張，全依調均的程度之高下以爲斷，倘地理上的差異調均到了相當程度，則商業資本的活動乃弛緩起來。中國原有的商業資本之不能無限擴大，商業之不能發達到現在的歐美一般，原因祇在於此。或謂中國商業所以不及歐美，乃由於重農賤商的學說，俗尙的儉樸，以及外力的壓迫等。（參看陳燦編中國商業史一八一到一八五頁）其實學說與俗尙並沒有好大的力量；外力的壓迫，自始就是促進商業的。海禁開了，國內生產品在地理上分布的差異，一變而爲中國與外國間分布的差異。朝國內看，地方與地方間生產品分布之不同，幾乎調均到了飽和的程度。若朝國外看，中國與外國間生產品分布之差異，尙極待調均。中國有的是農業品，而工業品感缺乏；外國有的是工業品，而農業品感缺乏。中外的情形如此，中國的商業之突飛猛進，乃成了事理上之必然。因此之故，原有的商業資本，乃得到新的活動。原有的商業資本之得到新活動，乃中國經濟由舊的變成新的之序幕。

一一、由農村都市到國際市場

商業資本既得了新的活動之機會，商場也隨着變動起來。

原有的商場，最大的爲國都所在之京師，其次爲省會，再其次爲縣城，又其次爲鄉鎮。這些市場無論大小，都是農產品與農產品，或農產品與手工業品，或手工業品與手工業品交換之所，但自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商品流入中國以來，這些商場，乃漸漸開始變化其性質。由國內生產品相互交換之所，漸漸變爲國內生產品與國外生產品相互交換之所。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最多之處，市場性質的變動最大，農村都市幾乎完全成了國際商場。這是第一度變革。因市場性質的變動，市場的形式也隨着變動起來。在農業生產品或手工業生產品獨占了國內市場之時，市場的形式極簡略，極樸素；物質的設備，幼稚極了。但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流入中國以後，各農村都市乃漸漸變化其形式；由簡略樸素，變成華麗美觀。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商品，出於機器製造，其自身本較農產品或手工業品爲美觀。又因首先販賣外來商品的商人其資本較雄厚，常能在一個市中占領較爲繁盛之所。以機製精品，置於繁盛地帶，市場的面目便已改變了大半。又繁盛之區的繁盛，最易引起地方當局의 注意而首先加以改造。國外商品愈來愈多，繁盛之區也隨着愈擴愈大。從反面看，不繁盛的區域，亦復隨着愈縮愈小。久而又久，整個都市，變成嶄新。天津，上海，寧波，廈門，廣州這些較

大的都市，固已面目全新；即其他較小的都市，也無不正在拋棄其原來的舊面目，而改裝新面目；這是第二度變革。市場的性質及外形正在變革時，市場的地位也隨着變化。這種變化，完全隨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時之方便與否而定。如有舊式商場或農村都市於此，其地位恰合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之流入，則該商場或都市，必很快的變成國際市場。南京條約規定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爲通商口岸，便是根據這個原則。南京條約訂立以後直到現在，中國因受不平等條約的強制而開闢的商埠，共一百餘所，幾乎都是根據這個原則而開闢的，都是爲着要便利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之侵入而開闢的。新市場是這樣開闢了，隨着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之流入，一天一天繁榮起來。同時國內大宗可以出口的農業品，也漸漸與原有農村都市脫離關係，而轉入新開闢的都市與外來商品相交接。農產品與農村都市漸漸絕緣，農村都市，乃漸呈沒落之象。稍稍爲之撐持門面者爲手工業品，但手工業品，自從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以後，消耗者相率購用外貨，也陷入了絕境。因此之故，原有的農村都市，若不是有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爲之挽回厄運，一定沒落下去。農村都市的沒落，新式商場的勃興，這是第三度的變革，因國外商品的流入，往日國內農業品與手工業品交換之所，變成了國內農業品與國外工業品交換之所。因國外商品充斥於農村都市，農

村都市乃漸漸拋棄其舊面目，而裝上新面目。因國外商品流入之方便，許多農村都市沒落下去，許多新式商場，繁榮起來。交換性質的變動，市場面目的變動，市場位置的變動，結合起來，乃把農村都市，化成了國際市場。

一二、手工業的破產

農村都市變成了國際市場；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乃如潮水一般向中國流入。中國原有的手工業，受了外來商品的壓迫，乃紛紛開始崩潰下去。這種情形，正如英國機器棉織物初輸入印度時，印度手工棉織物之開始崩潰一樣。一八三三年以後，英國在亞洲的市場，日漸擴大，其擴大的第一步，便是把印度的手機棉織工人整個的消滅；這種情形大家稱之爲「人類的破滅」(Destruction of Human Race) (參看 Marx: Capital 1 卷五〇一頁) 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自鴉片戰爭以來，因中國門戶洞開，商場林立；繼續不斷的流入。其流入的速度，一年一年的加大。自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以後，更突飛猛進；每年入口的價額大過出口的價額遠甚。一九〇五年時，入口價額幾乎大過出口價額二分之一！(參看拙著中國社會之變化 一一頁到一一五頁) 外來商品這樣流入，一方面把中國農業品吸收過去，以擴大或延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另一方面乃把中國固有的手工業衝撞至七零八落。外來商品如何可以衝毀手工業的？其過程可述於下。第一外來商品，均係機器

製造，最美觀而又最中用。一入中國，最易引起生活較為豐裕之人的注意，最易使他們購用。第二生活較為豐裕的人既然購用外來商品去了；於是手工業品減少了顧客，因之銷路遲滯。第三生活較為貧困的人，雖因財力不足，不能效法生活豐裕的人之購用外貨；但他們購買手工業品的能力，向來有限，不能恢復手工業的厄運。第四手工業品的厄運，既然不是生活貧困的人所能恢復，在事實紙好任其崩潰下去。第五手工業崩潰下去了，生活豐裕的人，便完全購用外貨；生活貧困的人，以無手工業品的存在，也迫不得已祇好用外貨。至是外來的商品，便全然代替了手工業品。且以絲綿布物為例。英，美，日三國輸入中國的絲綿布物最多。語其種類，有本色市布，本色粗布細布，漂市布，漂白織花布，漂竹布，粗斜紋布，細斜紋布，洋標布，漂白洋標布等等數不清的名稱。這還祇是布類。且再看綢緞，則有玄色羽綢，玄素泰西緞，色素羽綢，色素泰西緞，色素羅緞，色素羽綾，織花羽綢，織花泰西緞，織花羅緞等數不清的名目。綢綾緞類，或祇有生活豐裕的人購用；粗細布類，則幾乎是全國富貴貧賤各等人所共用的。大家既都用外來的布疋，那末中國原有的土布業，便祇有沒落。土布沒有人用，土布業沒落；於是土紗也隨着沒落。往日的農村婦女，都能紡紗；紡紗是中國主要的家庭手工業。於今少見有婦女伴着手紡紗機紡紗的了。我們舉布物這一例，

可以概見其餘。綜而言之，凡手工業品，可用外來商品代替的，通通被外來商品代替，其自身或已經沒落，或正在沒落，或決不免於沒落。

一三、利權的挽回與游資的聚積

手工業破產，洋貨充斥於市場；而農業品之輸出，又不足以抵償工業品之輸入；中國的財富，必然的外溢。而且代表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而入中國的，不單止剩餘商品；剩餘資本，也是很重要的。剩餘資本之入中國，或為借款，或為投資，在在都要榨取中國的財富。借款如做了軍政各費，化為烏有，人民必負擔本利。投資如到了生產過程，與勞動結合。更好直接榨取人民的剩餘勞動。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商品與剩餘資本，乃把整個中國拖入世界經濟系統中的兩大動力。國人眼望着外來的商品與外來的資本深入了中國，充滿了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隱隱約約，以為外人的經濟勢力，足以亡人之國；於是發生一種挽回利權的運動。挽回利權的運動，始於何時，止於何時，并無一定。但我們可以放胆說：是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及剩餘資本，相終始的。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及剩餘資本，何時流入，挽回利權的運動便何時開始。挽回利權的運動何時告終，要看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及剩餘資本之流入何時告終。國際資本主義的商品及資本愈增加，挽回利權的運動便愈緊迫。前者促成後者；前者為因，後者為果；

前者爲主動，後者爲被動。

但從另一方面看，結果却又成了原因，被動者却又成了主動者。挽回利權的運動雖是國際資本主義所逼出；但既被逼出之後，牠自身却又成就了一件大事：即聚積游資是也。在此種運動未發生以前，中國原也有不少的資本。除前曾說過的農村中的三種毒物（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之外，實在還有許多可以充資本之用的東西。如官僚的俸金；軍閥的財產；地主之剩餘地租尚未變而爲土地資本的；商業資本家的剩餘資本尚未投入流通過程之中的；以及軍閥官僚地主商業資本家拿出來充高利貸資本，尚未有人接受的；與夫小商人，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的少許蓄積；無不可以聚積起來，形成巨額資本，作開發實業之用。祇是在社會上游移，不能中用。挽回利權的運動，恰恰把這許多游資聚積起來了，完成了聚積游資的工作。游資聚積的過程，同時却又是發生作用的過程。從一方面看，是由零星集而爲整體；從另一方面看，却又是由聚積轉而入於生產過程。當其轉入生產過程時，其自身或進礦山，或進工廠，或上鐵路，或上輪船。代表牠而歸游資主所保存的成了股票，或成了債券等等。下面我們且舉幾個實例，以說明這種過程。

一四、由地下之富到地上之富

先以開發鐵業爲例。游資聚積到了鐵山，於是鐵業得到開

發，地下之富，一變而爲地上之富。中國之天然富源埋於地下的，本來不少。語其種類，人人都曉得的有金銀銅鐵煤等等。不過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未侵入以前，中國經濟未生變化之時，國人所注意的，祇是金銀等貴重金屬。近代重工業所不可少的煤鐵等物，并不珍視。且開採之法，都是土法；費力多，成效少，極不經濟。開採所獲，多用以作裝飾品，很少用於工業的。於今就不同了。開採所獲，雖未必不用以作裝飾品；但用以發展工業的特別加多了。開採方法雖未全然拋棄土法；然科學的新式開採法盛行了。貴重金屬，雖未必被人輕視；但有助於工業的煤鐵；成爲最重要之產物了。中國的煤，儲量極大。據萬國地質調查會調查的結果，各省總計，約共得二三、四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單祇山西一省，便有五、八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這樣富足的煤鐵，往日并無人看重；偶經開採，也祇是一般人拿去作燒飯的燃料，或農家拿去作冬季取暖的燃料，今何如者？輪船上，火車上，以及一切工廠裏，都要用煤。煤之爲物，幾乎成了推動工業的原動力。工業國家，若少了此物，重工業幾乎不能進行；日本便是一個好例。日本羨慕我國山西儲煤之富，以及南滿鐵路曾在遼省撫順開掘煤鐵；均足以證明日本缺煤，有賴於我國的接濟。煤既有這樣大的用途，所以中國的煤鐵，自用新法開採以來，產額便逐年增加。且以較大之公司所開發者爲例。開滦鐵務總

局，民國元年，出煤一、六三六、〇八五噸；二年，二、〇三六、九六七噸；三年，二、七九八、三二噸；四年，二、九七八、九三二噸；五年，二、八四四、六一〇噸；六年，三、一七六、四六九噸；漢冶萍公司，民國元年，出四〇〇、〇〇〇噸；二年，七〇〇、〇〇〇噸；三年，八〇〇、〇〇〇噸；四年，九二七、四六三噸；五年，九五〇、〇〇〇噸；六年，九四六、〇八〇噸。就全國論，煤產的總額，無不是逐年增加。五年，全國總產額爲一五、九〇二、六一六噸；九年則增爲一九、五〇〇、〇〇噸；十三年，增爲二五、七八〇、八七五噸；十七年，爲二五、〇九一、七六〇噸。（參看中國年鑑一三七〇頁到一三七二頁及 *China Year Book 1931* 的三二五頁）每隔五年計算，總見增加。祇十三年到十七年，因戰事影響，各主要鐵路旁之煤鑛，不能進行開採，出產乃稍見停頓。煤之出產情形如此，鐵之出產情形，亦復相同，也是逐年增加，且以幾個較大的公司爲例。民國十二年，漢冶萍，本溪湖，鞍山，及楊子機器公司四處，共出生鐵一七三、四四二噸；十三年，出一六〇、五二一噸；十四年，出一九九、六一七噸。（參看國民政府農礦公報十三期一三八頁）自十四年以後，全國總產額逐年增加，戰事的影響，都未能使之停頓。十五年，總產額爲一、五六一、九一一噸；十六年，爲一、七二〇、一三五噸；十七年，爲二、〇〇三、八〇〇噸。（參看 *China Year Book 1931* 的三二六頁）煤與

鐵，是現代重工業所不能少的東西；產額增加，可視為工業進步之一個旁證。至若在鑛業方面，佔的是主要地位，產額增加，更是鑛業進步之明證。

一五、由帆船驛馬到輪船火車

游資聚積，轉入鑛山，遂使鑛業發達，成為中國新式生產事業之重要部門。游資聚積轉上輪船鐵路，乃使新式交通機關發達；發達的結果，更是中國新式生產事業中重要部門之重要部門。中國原有交通工具，主要的為帆船驛馬。陸行用驛馬，水行用帆船。在國際資本主義未侵入之前，國內生產事業尚未發達的時候，交通運輸的需要，不如生產事業發達以後的需要之迫切；帆船驛馬，本已夠用。當時的交通運輸很少逾越省界的。即偶有逾越省界之必要，然運輸祇限於農產品及手工業品之轉移；交通祇限於官場文書之傳達，帆船驛馬，仍可應用而有餘。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以後，國內生產事業漸漸發達，情形乃為之一變。國際資本主義者要輸送機製工業品於內地，吸引內地農產品於海口，固非往日的帆船驛馬所能濟事；國人自己也因受了外力的刺激，開發了許多天然財富，如煤鐵之類，其輸送轉移，也非帆船驛馬所能濟事。同時國內政治軍事各方面的需要，更使舊式交通運輸機關不得不改良，因此種種，輪船火車，乃漸漸起而代替帆船驛馬。帆船驛馬，日就沒落，輪船火車，日見勃興。計自興築鐵路以來，至於今日，已經正

式營業的國有鐵路，有七、七〇七·九六公里；尙在建築期中的國有鐵路，有一六·二二公里；租讓鐵路，有三、九九四·〇七公里；商業及實業鐵路，有一、五〇六·六六公里。合計起來，中國境內，居然有一三、二二四·九一公里的鐵路了。（參看統計月報第一卷第二期）這些鐵路之興築，或由於國人自己的需要，或由於國際資本主義者的要求。國人自己的需要，最初不過爲着要鞏固國家的統一，及運輸煤鐵礦產，前者之例，如以北平爲中心的平漢路，平綏路，及津浦路皆是。後者之例，如湖南的萍株路，安徽的益華路，黑龍江之鶴立崗鐵路等皆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的要求，自始即爲着要輸送外來工業品於內地，吸引內地農業品於海口。凡以海口或濱海之地爲終極點的鐵路，如江蘇之滬甯路，廣東的廣九路，山東的膠濟路等皆屬於這一類。（參看交通大學上海鐵道管理學院所出全國鐵路概要）鐵路興築的多了，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資本固有了新的活動機會；國內的許多游資也一變其游移狀態，完全顯出資本的功用來。

火車之外，代替舊式交通運輸的另一種工具，便是輪船。我國輪船之創辦，始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招商局之設立。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繼有大達公司之興辦。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至三年，甯紹，肇興，直東等公司相繼設立。至是輪船事業，乃日漸興盛。雖始終爲國際資

本主義的勢力所壓倒，爲外國商輪所排擠；然總合前後計算，却祇見進步，而不見退步。民國十七年，各航業公司或商號到國民政府交通部註冊的，其所置船舶，總噸數在千噸以上的，也有六十家；船隻總數，也有二百五十艘，噸位總數，也有二十五萬二千七百六十噸。若就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的航業與中國自己的航業合計起來，航業的狀況，就很可觀了。單祇民國十七年一年，總計往來國外船舶的總噸數，有一萬六千三百七十萬噸之多；其中往來國外之船舶，計四千六百八十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九噸！（參看民國十七年度交通部統計年報航政編）經濟落後的中國，航業一項，有如是之興旺；姑無論其資本爲屬於國際資本主義者，抑屬於中國人自己，總算是經濟上的大變動了。

一六、由舊工業到新工業

再就工業看，舊工業變成新工業，更是游資聚積後活動之新結果。在國際資本主義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原有的工業，概是手工業，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國人因受了外力之壓迫，起而挽回利權；聚積許多游資，建設新式工廠。於是手工業遂一變而爲機器工業。手工業之進行，多在家庭，例如紗紡，乃往日最重要之手工業；執此業者，多是農家婦女。他們於農事之暇，從事紡紗。紡成若干，又復請專門織布者到家庭爲之織成布疋。紡紗在家庭，織布也在家庭。機器工業之進行，則在工廠。今日通都大邑，工廠林立；都是代替家庭的生產

之所。手工業之進行，雖也有賴機器，如紡紗有機，織布也有機。然這些機器之轉動，都是用人力，而不是用蒸汽，或電汽，或瓦斯，或煤油所發出之動力。機器工業就不是這樣的了。其主要特徵，就在利用蒸汽機，或發電機，或瓦斯機，或煤油機作原動力，以代替人工。在手工業中，生產的工具與生產者尚未分離：如有鐵店於此，其經營之主人，常以一身而兼三職，工具的所有者是他，生產者也是他，甚至出賣產品者還是他。在機器工業中，就不是這樣的了。工具所有者為資本家，依工具而工作者，除勞力而外，幾乎一無所有。生產工具與生產者完全分離。在手工業時代，一個生產單位，所包含的祇有幾個人：少至一人，也可以進行生產工作；多至十人，便成最大之規模。在機器工業時代，便完全不同了。一個工廠，常容納幾百人，乃至幾千人。手工業與機器工業，大概的區別，約略如是，中國之創辦新式工業，或機器工業，為時很遲。最初創辦的人，為大官僚李鴻章，張之洞等。所設立之工廠，多是官辦，或官商合辦。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載振自歐，美，日本考察歸來，奏陳東西各國振興實業之利，及保護獎勵之法，於是中央政府乃設立一個商部，（後改為農工商部）創制立規，實行保護政策。這可以說是在朝者挽回利權的表示。正當在朝者竭力提倡的時候，民間的挽回利權運動，也正如日中天。於是上下互相呼應，新式工業，乃

得勃然興起。新工業或取舊工業而代之，或於舊工業之外，另行增設，或由舊工業所擴大而成。來歷雖略有不同，其由舊到新則是一樣。新工業既然多了，新式機器製造品也隨着多起來。自商業資本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發生關係以後，農村都市一變而為國際市場。充斥於市場的，為自國外湧進的機器製造品。自游資聚積到新式工廠以後，國人自己做製的機器工業品。亦復充斥於市場。至是往日農業品與手工業品的交換，漸漸變而為農業品與純粹機製工業品的交換了。

一七、由錢莊票號到新式銀行

外來的工業品充斥於市場，仿製的工業品，也充斥於市場；工業品之為物，無論是來自外國或出自做造，總是要流通的。恰好輪船火車，代帆船驛馬而興，增加了流通之便；使工業品與農業品互相流通的速度，或工業品與工業品互相流通的速度加大了。不過輪船火車之外，增加流通之便的，還有最重要的金融機關。金融機關的作用，曾在調劑贏虧，增加生產的速度。直接影響工商各業，間接影響社會全體。社會上有餘資，任其閑空，不投入生產或流通過程之中，在盛行私有財產制的時代，實為一大損失。工商各業，缺少資本；生產過程及流通過程，都不免有停頓之隱憂。一方面有贏餘，一方面感不足。金融機關乃恰恰位於贏餘與不足之間，而調劑之。一方面吸收社會上的餘資，使其不閑空；另一方面則扶助工商各業，使流通過

程及生產過程不至停頓，且能縮短所需之時間。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未侵入，產業尚未十分發達時，主要的金融機關，爲錢莊票號等。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以後，生產事業變了舊觀，錢莊票號，或因資本不厚，或因經營不良，不能滿足事實上的需要了，於是起而濟其窮的，有新式銀行。新式銀行在中國演進的歷史，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周傑鑾中華銀行史自序有曰：「歐化東漸，而商策一變；滬江片石，始露銀行之曙光。而大江南北，聞風踵起；始則外資獨擅其權，繼則中土亦分其潤；始則官爲之借，繼則民自爲募。然大都沿襲國外之典章，未脫中土之舊習；南轅北轍，多所牴牾；此爲吾國銀行萌芽之時代也。光宣以降，世變益甚；中外銀行，多所興設；於是始有則例之頒布。改革伊始，因時制宜；紙幣集中之政策，金庫統一之特權，勒爲成文，宣之大衆，俾普通特別之界限，不越雷池；殖產興業之範圍，不徧累黍；而銀行之規制始定；此我國銀行完成之時代也。壬癸以還，社會經濟之觀念日益精，企業信用之基礎日益鞏；中央金融之脈絡，已分布於全邦，農工貸借之機關，幾普及於各邑。其握轉輸飛挽之權，綰山海漁鹽之利；開邊拓土，操奇計贏者，咸賴有特別機關，以資調節，使出納；而富商大賈亦同時奮起；使金融界存放匯通之規模，一洗從前票號錢局之舊觀，而一新其面目；此吾國銀行發達之時代也。」新式銀行逐漸發達；直到今

日，除外人設立者不計外，國人自己所設本支各行共有七百餘所之多（參看China Year Book 1931的四一九頁到四二六頁）。其營業之發達，與年俱進；雖有連年不息的國內戰事，也絲毫不受影響。關於這一點，我們祇要看民國十九年中國銀行報告，便可以深信不疑。中國銀行在十九年度內外多事的時侯，其營業狀況，仍較十八年度為進步。就存款一項論，十九年度活期存款餘額為四一六、三八八、八一五·（元）五六，較十八年度增加三三、六〇三、二三〇·（元）〇九。定期存款餘額為六九、六八八、九〇二·（元）〇三；較十八年度增加一四、三七七、八九六·（元）一一。兩共增加四七、九八一、二二六·（元）二〇。且存款之中，以工商業存款為最發達，較十八年度增加三一、四六六、四五八·（元）一七；佔增加部分百分之六六。再就放款一項論，十九年度定期放款餘額為一〇九、三八四、八四五·（元）八二；較十八年度增加一二、九三一、四二〇·（元）九一。各種放款之中，商業放款較十八年度增加一一、〇九〇、三四〇·（元）四五；實業放款增加一一、六四九、三四三·（元）七三，團體及公用事業放款增加四、一九九、一一〇·（元）四五。由中國銀行一例，便可推知銀行業之發達及其與工商業關係之密切的大概情形了。

民族資本主義的成立

由上所述種種看來，我們可以確認民族資本主義的成立了。

民族資本主義，乃與國際資本主義相對之稱。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倘未侵入中國，中國縱有資本主義，也不會被稱為民族資本主義。自從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以後，中國原有的商業資本得到新的活動機會，與國際資本發生了關係；同時國內許多游資，亦漸漸聚積，成為巨額資本，轉入生產行程，也與國際資本發生了關係。國際資本主義者的資本，在中國活動的形式，或為商品，或為投資，或為債款；處處與中國原有的資本及新聚積的資本發生關係。其關係的式樣，或為互相調和，或為互相衝突，或為互相融合，或為互相競爭。在此種種關係之中，民族資本主義的特質顯現出來了，隨着特質的顯現，乃有所謂民族資本主義的名稱。名稱既然弄明白了，我們現在要進一步來把民族資本主義成立的經過略說一說。(A)民族資本主義的資本，有兩個來源。第一是由原有的資本變來的，國際資本主義未侵入以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還未流行於中國的時候，中國原也有資本，在農村中活動。如商業資本，土地資本，以及由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兩者中分出來的高利貸資本，都是很顯著的。我們在第一節講農村中之三種毒物時，便已提及。這種種資本，都是民族資本主義所以發展的根苗。第二是由游資聚積而成的。如官僚的俸金，軍閥的財富，地主的地租等，倘未成為商業資本，或土地資本，或高利貸資本；在國際資本主義未侵入，新式生產事業未發達的時候，無處安插，

都是游資。再者小商人，手工業者以及自由職業者的少許蓄積，因為數太少，不能舉辦大事；除依高利，貸於貧農及入不敷出的手工業者外；也必然成為游資。這種種游資，可以聚成巨額，也是民族資本主義所以發展的根苗。(B)新聚積的游資與原有的資本，轉一個方向由農村中轉入國際貿易場中，轉入新式工廠中，轉入銀行中；乃一變原來的機能，發生新的作用；成為新式的資本。為什麼要稱之為新式資本？因為他能使舊的生產制度漸漸變成新的生產制度，能弄出輪船火車來代替帆船驢馬，能弄出工廠機器來代替家庭手工，能弄出新式銀行來代替錢莊票號，能弄出新的社會階級來代替舊的社會階級。(C)新式資本，已經是一個不見經傳的怪稱呼。但還有更怪於此者，即大家稱新式資本為民族資本是也。新式資本何以又被稱為民族資本？這可以一言蔽之曰：因為牠的活動，在在與國際資本相關。因為與國際資本相關，於是大家賜牠一個新名稱，曰民族資本，以別於國際資本。民族資本與國際資本一經發生關係，所謂中國經濟，乃完全加入世界經濟系統之中，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部門。活動於農村中的舊資本以及游移於社會上的游資成了新式資本，中國經濟也隨着由過去的變成了現代的。新式資本在在與國際資本互相衝撞，互相激蕩，於是中國經濟又隨着由中國的變成了世界的，這兩種轉變的過程，乃民族資本主義成立的過程。在下一節內我們要把中國

經濟之所以由中國的變而爲世界的，及其在國際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機能新作用略爲討論。

第三節 國際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中國經濟

一九、國際資本主義方盛民族資本主義萌芽

要明白中國經濟之所以由中國的變而爲世界

的，最宜先把近百年來（自鴉片戰爭以來）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略爲一述。近百年來，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可以一言蔽之曰：前者方極盛，後者才萌芽。換言之，國際資本主義已如日中天，盛到極端，民族資本主義則如嫩芽初發，方才開始（A）國際資本主義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又叫做帝國主義 Imperialism，本是由資本主義 Capitalism 發展成的。資本主義之發展爲帝國主義，凡經過三個重要的階段。第一，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時自由競爭最烈的階段；在這階段內，獨占的事實，漸漸多起來了。第二，一八七三年大危機以後卡德爾 Cartels 最發達的階段；在這階段內，獨占幾乎完全代替了競爭。第三，爲十九世紀末的大興盛，與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的大危機相繼發生的階段；在這階段內，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漸漸變成帝國主義的時候，各資本主義國便都要向外擴充土地，以圖消納剩餘資本。自一八七六年到一九〇〇年，歐

洲各強國以及美國擴充土地的情形有如左表。

擴充土地 的地方	一八七六年時各 國領地的百分數	一九〇〇年時各 國領地的百分數	增加之數
在非洲方面	一〇・八	九〇・四	七九・六
在波里尼西亞	五六・八	九八・九	四二・一
在亞洲方面	五一・五	五六・六	五・一
在澳洲方面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
在美洲方面	二七・五	二七・二	減少〇・三

土地擴充了，各國便盡量把剩餘商品及剩餘資本送到新擴充的地方去消納，同時并在新擴充的地方吸收農業品。這樣一來，國際資本主義乃得充分的繼續發展。現在且以英，法，德三大國資本輸出的情形列成左表。

各國在國外的投資（十億佛郎為單位）

年 別	英國	法國	德國
一八六二	三・六	—	—

一八七二	一五	一〇	—
一八八二	二二	一五	↑
一八九三	四二	二〇	↑
一九〇二	六二	二七—三七	一二·五
一九一四	七五—一〇〇	六〇	四四

從領土或市場的逐漸擴大，以及資本輸出的逐漸增加的兩個實例看，便很可以明白國際資本主義蒸蒸日上情形了。（參看 *N. Lenin Imperialism* 的十頁，四十八頁及六十頁）

（B）國際資本主義，正在蒸蒸日上的發展，而我國的新式生產事業，方才起頭；我國生產事業，向來祇有農業及手工業。直到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才有李鴻章，以資本二十七萬兩在天津設立開平礦務局，以期用新法發展礦業。向來的交通運輸，全靠帆船驢馬。今日通行的鐵路，也直到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才開始建築；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才築成自開平經塘沽至天津的一條短短的鐵路。至於新式工業，發達更晚。直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載振自歐美考察歸國以後，才漸漸興辦。若便利工商之銀行業，則直至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才有正式的大清銀行出現。

且各業雖漸漸創興了；然因資本之不足，人材之稀少，以及經營管理之無術，進步極慢。以之與國際資本主義所經營的種種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別。國際資本主義已盛到極端，民族資本主義才開始；國際資本主義已到了壯年時代，民族資本主義還在小孩時代。這個先進與落後的畸形，便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命運，便使中國經濟不得不由中國的變而為世界的，

二〇、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相反對

民族資本主義還在小孩時代，國際資本主義已經入了壯年時代。兩兩比較，無處不是相反。民族資本主義者與辦任何事業，至少要感到下列幾種弱點：一，缺少巨額資本；二，缺少專門人材；三，自己沒有機器；四，管理方法不精。這幾種弱點，國際資本主義者斷然不會感到。不唯不會感到，且他們與辦任何事業，有許多制勝之點，為民族資本主義者所夢想不到的。且以紗業為例。民族資本主義者經營紗廠之時，國際資本主義者也在中國經營紗廠。兩者互相爭競，前者常感力不能支，後者則能俯視一切。關於這層，民族資本主義者自己有極警策之言曰：『……日人之在華設廠競爭者，月薪而歲異，大有喧賓奪主之概。日商投閒抵隙，乘我之空虛，制我之死命；競爭劇烈，銳不可當。查日廠所以制勝之點凡七。（一）日人在華各廠，大都由日本老廠所分設者，資本雄厚。（二）有經濟界為彼作後援，息率甚輕。（三）

各部分執事，技術精良。(四)航權在握，運輸便利。(五)享有三聯單之權利，原料便宜。(六)各處都設有機關，推銷便利。(七)各紗廠團結力甚堅固。以上七者，我國紗廠，完全無之；故中國紗廠難以立足」。(參看藕初五十自述八十五頁)國際資本主義者所以制勝之點，民族資本主義者固然全無。反之，民族資本主義者所以致敗之點，却在在皆是。關於這層，民族資本主義者自己也有扼要之言曰：「……我國紡織專門人材，甫在培植；此時祇得將就支持；留心弱點，廠務遂無起色；此缺乏專門人材之可危者一也。……我國人短於自治。自治尙且未能，又安能管理工人。以自治工夫見缺故，遂致次序紊亂；影響出數。虧損斯來；此管理不得其道之可危者二也。……全廠工作，無專門人才督察之管理之；則出數少，出品少。一任工人任意妄爲，漫無限制；工資雖廉，其如工作之不精良何。……此工作不精良者三也。國民富力未充，自私自利之心，却反濃厚。萬錠紗廠動需資本金五十萬兩。投資一二萬，儼然以大股東自命；攘奪權利，位置私人。馴至股東間自相傾軋，不輟業，不甘休；授外人以隙，坐收漁利。此股東無公德心之可危者四也。全廠廠務，用人行政，責任綦重。爲經理者，宜如何盡心籌畫，期無負股東之付托。乃購辦機件，墮人術中，吞聲飲恨者有之；假公濟私，滿載而歸者有之；徜徉花天酒地，躊躇妾而去者亦有之。廠未開，基金百萬，

已消蝕殆盡矣。或則位置私人，狼狽爲奸；股東之血本雖虧耗，總協理之私囊已充滿。此當事人無天良之可危者五也。股東狃於目前小利，偶有盈餘，分散靡遺。公積一項，素未注意；一旦市況變動，以致周轉不靈。不虞之虧損，遂至無從彌補而擱淺；或因信用掃地。竟至閉歇。此各廠缺少公積金之可危者六也。政爭日起，政象日非；商業凋敝，紙幣充斥，現金缺乏；遂致息率日增，担負愈重，立業愈難。倘回復無期，殊難持久。此息率過重之可危者七也。……蹂躪地方之軍隊，布滿全國。……軍隊愈多國事愈紛亂；貨物愈壅滯，而不易流通。政府不但不加保護，且於不知不覺間，掩之。……此政府不知保護之可危者八也。」（參看稿初五十自述文錄上卷三十四頁到三十六頁。）上列八項，都是民族資本主義趕不上國際資本主義的地方。國際資本主義已入了壯年時代，處處勝過民族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尙在小孩時代，處處趕不上國際資本主義。這真可以說是歷史上的必然現象，無法否認，更無法避免的。

二一、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相融合

但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兩者之相

反，又恰恰是兩者所以相融的原因。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之互相融合，正由於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之互相反對。民族資本主義者常患資本太少，人材不專，機器不精良，管理法不

完備。國際資本主義者，則有利餘資本，專門人材；更有精良的機器，完備的管理法。兩相結合，以長補短，乃如膠投漆，融成一團。民族資本主義者缺少資本時，國際資本主義者可立刻拿資本出來幫助。其拿出之資本，或以借款的形式，或以投資的形式，與民族資本主義者的資本互相結合。中國近代任何種的新式生產事業，都有國際資本主義者的資本。如礦山，有由外資單獨開採的，有由中外合資開採的，有由中國借來外資開採的。如鐵路，有由外資單獨建築的，有由中外合資建築的，有由中國借來外資建築的。又如工廠，有由外資單獨設立的，有由中外合資設立的，有由中國借來外資設立的。其他各業，莫不如是。自己資本不足，借外資以補充之，是民族資本與國際資本融合之一例；中外合資舉辦新式生產事業，是民族資本與國際資本融合之又一例。再就人材講，民族資本主義者要舉辦新事業，而缺乏專門人材時，國際資本主義者隨時又可拿出專門人材來幫助。中國近代的新事業，無論爲生產的或非生產的，幾乎無處不有外來的專門人材。專門人材之來，或由於不平等條約規定，中國必須聘用；或由於民族資本主義者與專門人材互定契約，自由聘用；或由於中國政府要賣好於國際資本主義者，以重金聘用。政府聘用的，如財政顧問，軍事顧問之類是；民族資本主義者自由聘用的，如工廠技師之類是；不平等條約規定必須聘用的，如借外

資築鐵路時，借款條約上附帶規定必須用債權國的專門人材之類是。外人以專門人材供給中國，幫助中國經營新式生產事業；中國於此果然得益不少；有許多事幾乎完全是外國專門人材代為造成的。這顯然是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互相融合之又一例。至於機器，中國原來沒有，倘國際資本主義者不供給機器，民族資本主義者完全無法可設。在這緊急關頭。國際資本主義者為投合民族資本主義者的需要起見，乃把嶄新的機器售於中國。民國元年，機器進口總價值為六百七十九萬三千海關兩。十年竟增至五千六百二十九萬九千海關兩。這年紗業發達，紡紗機進口的特別多，固不足奇。但十八年時，進口總價值仍有二千九百八十八萬七千海關兩。（參看社會調查所社會科學雜誌二卷三期三二六頁）中國各項新式生產事業，因得新式機器之助，而益發展；這也是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互相融合之一例。若管理方法，完全是從外國學來的，或由外人親自帶來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生產，有賴於國際資本主義的管理法。當然也是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互相融合之好例。

二二、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相競爭

同時卻又是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互相競爭的原因。蓋兩者之互相融合，固可以改造中國經濟，固可以使中國新式生產事業加速度的發展；但卻不能使民族資本主義抬頭。反之兩者融合的

程度愈高，中國經濟變動愈大，中國新式生產事業發達愈快；在在是增加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機會。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愈大，流入中國的資本愈多，便愈引起民族資本主義者的反動。結果挽回利權的運動，有如風起雲湧。在第二節裏，我們曾說過：挽回利權運動之興起，一方面是由於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商品無限的流入；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資本無限的流入。商品無限的流入，把中國的手工業破壞，把中國的農村都市，化成國際市場；這些事實當然要引起挽回利權的運動。資本無限的流入，新式生產事業固然可以加速度的發展；但民族資本，卻被擠在一邊，成了附庸；我們所看見的幾乎祇是國際資本的勢力，而不是民族資本的勢力；這些事實，也當然要引起挽回利權的運動。挽回利權的運動勃興，民族資本主義乃展開一個獨立發展的局面。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局面愈近於獨立，必然要與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的勢力互相競爭。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互相融合，固然可以發展中國的經濟；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互相競爭，更可以發展中國的經濟。可是中國經濟發展之日，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在華勢力雄厚之時。中國經濟愈發展，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的勢力愈雄厚。現在且以紡紗業為例，來說明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互相競爭的這個事實。在最近中國工業之中，紡紗業實為最重要之一種，這是無論誰都相信的。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以後的數年之內，且特別興旺。乘着歐戰方酣之時，突飛猛進，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但自民國八年以後，遇着了在華方興未艾的國際資本主義者——日本爲我們的勁敵。自十一年以後，且漸漸被在華的日本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所壓倒。民國七年的時候，中國境內紗業一項，中國自己頗佔優勢。以錠子之數而論，當時共一百四十二萬九千錠。英商佔百分之十七，日商佔百分之二十一，華商佔百分之六十二。但自八年以後，日本紗商直接到中國來開設紗廠；紗廠錠子之數，日見增加。民國七年時，日紗商在華紗廠錠子之數祇二十九萬四千。十年時，却增加到八十六萬七千了！十一年以後，繼續增加，竟把中國紗業完全壓倒。例如上海，大家都知道是紗廠最多的地方。民國十二年時，中國資本家或民族資本主義者在該處所投資資本祇一三、二〇〇、〇〇〇元；日資本主義者或國際資本主義者在該處所投資資本却有五五、二八〇、〇〇〇元！十三年時，前者的資本增至一三、七〇〇、〇〇〇元；後者的資本，却增至五六、〇八〇、〇〇〇元！（參看中國社會之變化七四頁及七五頁）十七年到十八年時，因排日運動的結果，中國的紗業始漸漸得到優勢。計十七年到十八年，華商紗廠數七四；錠子數二、〇八七、五〇六；織機數一三、九〇七。日商在華紗廠數四三，錠子數一、三九七、二七二，織機數一三、九八一。（參看 *China Year Book-93* 的一四三頁）民族資

本主義愈發展，則不利於國際資本主義，國際資本主義愈發展，則不利於民族資本主義。這是兩者互相競爭的必然現象。

二三、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

講到這裏，我們可以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作一個概括的敘述。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最根本的祇有一個，即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是也。國際資本主義到中國，凡有兩個形式：一則剩餘商品，二則剩餘資本。剩餘商品與中國原有的商業資本接觸，把中國的手工業漸漸摧毀，把農村都市變為國際市場。這一個事實引起了國人挽回利權的運動。挽回利權的運動，在消極方面是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在積極方面，却是聚積游資以發展產業。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逼出挽回利權的運動；挽回利權的運動，促使經濟發展。這是從剩餘商品上看出來的國際資本主義之足以推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國人正在聚積游資以發展產業時，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資本也早已到了中國。游資要聚成巨額，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於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的現成剩餘資本乃乘虛而入；其形式或為借款，或為投資；與民族資本主義互相融合。融合的結果，便是資本的數量在國內增加。資本的數量增加，乃助長經濟的發展。這是從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之互相融合上看出來的國際資本主義之足以推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不過國際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

主義互相融合到了相當的程度，民族資本主義者感覺到在他人的資本勢力支配之下，終不是辦法，於是又自謀獨立，與國際資本主義者分道揚鑣，互相競爭。競爭的結果，也是經濟發達。所以從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之互相競爭上看，國際資本主義也是推進中國經濟之發展的。

二四、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果

由上所述看來，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剩餘商品的輸入，剩餘資本的輸入，都可以直接或間接推進中國經濟之發展；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看去，中國經濟之發展，又恰恰幫助國際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幫助國際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幾乎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結果。中國新式商場開闢的愈多，交通運輸機關愈改進，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商品愈易流入。中國的鑛山愈用新法開採，新式工廠設立的愈多，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資本愈易流入，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商品，剩餘資本，自從非洲被分割以後，幾於無處消納；國際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幾有停頓之虞。但恰恰在此時，中國成了一個大窟，可以容納剩餘商品，可以容納剩餘資本；可以替國際資本主義解除困厄，而幫助牠繼續發展。剩餘商品之輸出，剩餘資本之輸出，乃國際資本主義的特徵。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三年，英，美，法三大國剩餘商品輸出增加的情形，於左表可以看出。（以百萬磅為單位）

	一九二三年 總額	一九二三年 百分數	一九二三年 百分數
全世界(一五七國合計)	四〇三四・八	五二九・九・〇	一〇〇・〇
英帝國A本部	五二五・三	七四三・五	一三・〇二
B他處	四九四・七	八五三・五	一二・二六
C合計	一〇二〇・〇	一五九七・〇	二五・二八
美國	五〇三・一	八九四・三	一二・四八
法國	二七二・八	四〇一・八	六・七六
其他各國	二二三八・九	二四〇五・九	五五・四九

上表是從 John A 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四五九頁上轉錄來的。英，美，法各國的輸出，都有增加。輸出的增加，是要有地方消納的。主要的消納處，當然是中國。且以美國輸入中國的剩餘商品為例吧。一九一四年六月底。總額為二四、六二八、〇〇〇金圓；一九二四年六月底，則達一二四、四三六、〇〇〇金圓！(參看 *Dunn America's Foreign Investment* 二五九頁到二六〇頁)單這一例，也就很足以證明中國是國際資本主義者消納剩餘商品的好地方。現在中國，百業待

興。例如汽車路一項，各省都在興築。美國現正感着橡皮車輪無處消納；中國興築汽車路，當然可予牠以極大的援救，推而言之，中國經濟的發展，與任何國際資本主義者都有好處。再者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資本輸出之增加，我們在本節的起頭，就提及過。單就英國說，一八七二年的輸出，爲一百五十億佛郎；一九一四年，竟增加到七百五十億乃至一千億！據此也大可以推知國際資本主義者剩餘資本輸出增加之速度了。現爲明確起見，且將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三年英國資本家投於國內及國外的資本互相消長的情形列成左表。（以一千磅爲單位）

年 別	投於國內的資本總額	投於國外的資本總額
一九〇〇	一〇〇、一二一	二六、〇六九
一九〇一	一〇六、五八五	二六、九七八
一九〇二	七五、一二四	六二、二一四
一九〇三	四四、八六七	六〇、〇一三
一九〇四	五〇、〇八三	六四、六一四
一九〇五	四八、四二六	一一〇、六一七

一九〇六	三九、三一四	七二、九九五
一九〇七	三二、九八八	七九、三三四
一九〇八	五〇、〇五二	一一七、八七一
一九〇九	一八、六八一	一五〇、四六八
一九一〇	六〇、二九六	一七九、八三二
一九一一	二六、一四六	一四二、七四〇
一九一二	四五、三三五	一四四、五六〇
一九一三	三五、九五二	一四九、七三五

上表係根據 Hobson 的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的四六九頁。從這表看，英國資本家投於國內的資本，顯然逐漸減少；投於國外的資本，顯然逐漸增加。這種情形，實在不獨英國爲然；一切國際資本主義者，或帝國主義的國家，無不如此。國際資本主義者剩餘資本的輸出，既然逐漸增加；那末尋找投資的地方，成了很重要的工作了。中國於此，恰恰中了各國際資本主義者之選。恰恰成了一個很好的投資地，很可以消納剩餘資本，替國際資本主義解除矛盾，而幫助其

發展。

二五、國際資本主義者在華的投資

現將各國在華所投之資本略舉於左，以見一般。

國別	投資種類	投資額
英國	商業投資	五二九、八一二、一四二
	地產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其他不動產	二〇、七〇五、〇〇〇
	動產	二九、二九〇、〇〇〇
	鐵路投資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商業借款及增股	六、二八二、〇〇〇
	政府借款	四二、一一八、〇〇〇
	社會財力	一、五〇〇、〇〇〇
	估計未經調查之投資	七一、〇〇五、〇〇〇
	合計（商業投資除外）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華幣圓

美國……………對外政府借款

美金元

A 有抵押者……………二四、二七一、九三〇

B 無抵押者……………二、九六〇、七二一、五二

商行借款……………八、〇八五、一五、六五

所購證券價……………九、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四六、四五二、八〇五、六四

華幣元

百分比

日本……………借款(鐵路國產森林電器事業及其他)……………一七一、六九一、一九六

(大藏省的估計爲七一六、一五三、〇〇〇元)

公司資本(依日本商法組織者)

A 大部份事業在滿洲者……………九一一、七五七、七八八……………六五%

B 大部份事業在滿洲外各地者……………一八七、三七三、六六五……………一三%

公司資本(非依日本商法組織者)……………三六、二二〇、四七六……………三%

公司資本(私人企業)……………九四、九九一、五六〇……………七%

中國社會之現狀

一三四

合計.....一、四〇二、〇三四、六八五.....一〇〇%

法國.....商業投資.....二九、六〇〇、〇〇〇 美金元

借款.....六二、六一二、六六二、七〇

德國.....商業投資.....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金元

政府借款.....八八、三一、一六九、五〇

其他各國(包括意，葡，比，丹麥，瑞典，荷蘭，西班牙，奧大利等國)

進出口業資金.....一、七四六、八六〇 華幣元

其他各業資金.....一七、五二七、五二〇

合計.....一九、二七四、三八〇

上列數字，係從統計月報二卷十二期八〇頁到一一一頁上摘出。其不盡不實之處當然難免。茲再將大阪每日新聞社所出對支經濟資料一覽表上所列各國對華投資總額附錄於次。

本業別

金額

鐵道運輸等業

六億五千十五萬二千圓

銀行等業	二億五千六百三十三萬二千圓
紡織業	二億五千六十四萬五千圓
農林牧業	二億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圓
一般貿易業	一億六千二百八十六萬圓
製造業	一億四千四百九十四萬千圓
電氣及瓦斯業	四千七百二十一萬千圓
土木建築	三千百七十萬八千圓
其他	五千八百六十一萬圓
合計	十八億九百十五萬四千圓
地方別	金額
廣東	七百三十三萬七千圓
大連	七億三百九萬三千圓
上海	二億七千四百萬五千二百圓

青島	一億三千九百六十四萬五千圓
奉天	五千十二萬四百圓
漢口	四千四萬七百六十圓
天津	三千五百九十六萬三千圓
北平	七百十七萬八千圓
其他各處	五億千百七十七萬六千六百四十圓

上列數目，係一九二九年太平洋會議席上日本委員所發表。當然也有不盡不實之處。但憑此可以窺見國際資本主義者在華投資的大略情形。至於要得詳盡確實之數，不獨私人辦不到，即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也不能辦到。所以我們祇好拿這些不盡不實之數來作一個暗示，并藉此以窺見一個大概。

二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系統中之作用

國際資本主義者紛紛把資本投到中國，中國經濟，得到外來資本之助，大見發展。但發展的結果，恰恰又在延長國際資本主義自身的壽命。關於這一點。上面講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一段時，已提及過。現在且在這裏再作一次概括的討論。自從國際資本主義成立以後，助其繼續發展的地方，有三處最重要：一，非洲；二，拉丁美洲；三，亞

洲。亞洲的中國，尤其重要。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日漸擴大，中國的領土，乃日漸縮小。各國國際資本主義者把中國的領土占去，便在所占的地方安植資本，以榨取當地農民的剩餘勞動。至若，在中國本部，則憑不平等條約，進行侵略。國際資本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從反面看去，便是中國幫助國際資本主義之繼續發展。國際資本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凡有三方面：一，吸收廉價的原料；二，消納剩餘商品；三，移植剩餘資本。中國於此三方面，都能滿足國際資本主義者之要求。中國因新式生產事業，才開始發達，需要鉅額資本。鉅額資本，一時籌措不易，便不得不拿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資本。又因新式生產事業才開始發達，一切敝造的工業品，都不若國際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品之精良中用。因之國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乃能在中國暢銷。中國既要消納國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同時便不能不拿自己的農業品以爲貨價。這樣一來，中國算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的最好國家了。國際資本主義需要原料，中國能以原料接濟牠；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工業品無處消納，中國能替牠消納；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資本，無處安植，中國能替牠安植。中國新式生產事業創辦的愈多，經濟愈發展；愈能替國際資本主義者供給原料，消納商品，安植資本。國際資本主義吸收國外原料愈多，剩餘商品愈有地方消納，剩餘資本愈有地方安植；前途便愈有希望，便愈可以苟延殘

喘。今日的中國，成了世界問題的重心；世界的安危，幾乎完全繫於中國；其唯一無二的原因，厥爲中國能幫助國際資本主義繼續發展。假如中國不能供給國際資本主義者以必需的原料，不能替牠消餘商品及資本；則國際資本主義的前途，必感極大的恐慌。中國的大冶若不供給日本以鋼鐵，撫順若不供給日本以煤產；日本的重工業，便將完全停頓。英國蘭開夏地方的布匹，若不能暢銷中國，則蘭開夏的布廠，隨時有關門的危險；美國汽車大王的汽車，若不能暢銷中國，則美國汽車工廠，隨時有歇業的可能。中國的政府若不需要外債了，中國的新式生產事業若不需要外資了；則各國的銀行便失去了最好的顧客，剩餘資本，不免要變成無處生息的死東西。由此看來，中國在世界各國中，有什麼地位；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系統中有什麼作用；可以明白了。

二七、中國經濟之辯證的動態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作一個結束了。本章第一節第二節及第三節所述合起來，恰恰構成了一種辯證的動態。從原有的經濟上發生出經濟的變動；經濟變動的結果，又復幫助國際資本主義之發展。前者乃過去經濟變而爲現代經濟的過程；後者乃中國經濟變而爲世界經濟的過程。由過去到現代，由中國到世界；其中一往一復的情形，無不與辯證的運動 Dialectic Movement 相吻合。原有的經濟，經濟的變動，變動的結果，三者相續，恰恰成一個「三

合」Triad (Metagart 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最喜用 Triad 一字來表示由「正」Thesis 經「反」Antithesis 以達「合」Synthesis 的整個過程。參看 Metagart Studies in Hegelian Dialectic 第六章)經濟的變動，把過去的經濟一變而為現代的。變動的結果又把中國的經濟一變而為世界的。(A)原有的經濟由農業的發達，乃有剩餘農品，集中於特權者，官僚及地主之手。剩餘農品集中在這些人手中的時候，農村中正有無數人口，窮至不能聊生：這算是一種極大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現象。在精緻及奢靡的手工業之發展中，得到了解決。精緻及奢靡的手工業開始一展，剩餘農品與無數的窮人相結合，乃造出多量的手工業品來。但手工業品與農產品因地理上分布的差異，不得均調。這又是一種矛盾的現象。這種矛盾現象，在商業之發展中又解決了。正當商業發展的時候，商業資本乃漸漸由成長而擴大。商業資本擴大了的時候，剩餘地租在特權者官僚地主手中的，未必已經消耗無餘。商業資本與剩餘地租在農村中及農村都市上擴大到了相當程度不能再擴大時，常變相而為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以及剩餘地租，乃中國原有經濟的產物。近幾十年經濟的變動，又完全憑這些產物作根基。(B)經濟的變動首先有商業資本與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剩餘商品互相接觸，把農村都市化為國際市場，把手工業漸漸破壞。這一個事實引出了挽回利權的運動；與

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對抗。挽回利權的運動把農村中不能安植的剩餘農品或地租，高利貸資本，以及各種游資聚成鉅額，做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基礎，在各種新式生產事業中活動，活動的結果，原有的經濟，變成嶄新；過去的經濟完全變成現成的。但過去經濟變而為現代經濟的時候，正值國際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因此之故，中國經濟變動的結果，竟把整個中國經濟，拖到世界經濟系統中，幫助國際資本主義之繼續發展。（C）當國際資本主義已經如日中天，發達到了極點；民族資本主義，還極幼稚，還才萌芽。兩兩比較，其進步與落後的狀態幾乎完全相反。但相反乃相成之原因。民族資本主義處處趕不上國際資本主義，却處處用得着國際資本主義的幫助。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乘此機會，乃深入於民族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甚至與之互相融合。融合的結果，又復引起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的互相競爭。互相融合與互相競爭，都足以使中國經濟加速度的發展。中國經濟愈發展，愈能消納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及剩餘資本；同時愈不能不以農業品供給國際資本主義。中國經濟變動的結果，恰恰幫助了國際資本主義；於是整個的中國經濟，成了世界經濟系統中之一部分。最後的演變將是世界經濟系統之分裂的醞釀，將使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對立的醞釀。

第三章 社會階級之重組 (Regrouping)

經濟的變動，繼續不斷的拖着社會階級與之俱變。上章既把經濟的變動述了一個大概，本章正好接着來討論社會階級之變動。社會階級之變動，也可以分爲三節討論之：一，舊社會裏的階級及其相互之關係；二，舊社會裏的階級之變動；三，國際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之中國社會階級。

第一節 舊社會裏的階級

一、階級對立與剩餘農品

舊社會裏的階級之分別，主要的爲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或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分，或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分。前者握着政權或利用政權，壓迫後者，從而剝削之榨取其經濟的利益。後者因沒有政權，或不能利用政權，祇好任前者壓迫，從

而受其剝削，以經濟的利益供給之。統治階級與被壓迫者的分別或對立，原來是沒有的。人類并不是先把階級樹起，然後才組織社會；實是先有社會生活，然後社會生活中漸漸發生階級。中國社會裏的階級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在第一章第一節裏曾討論過：大概先有種族鬥爭，然後由種族鬥爭漸漸轉而為階級對立。種族鬥爭又是因着什麼發生的呢？唯心論者說：人類有好鬥的「天性」；專門研究本能的心理學者說：人類有鬥爭的「本能」。但我們却不用「天性」或「本能」等名詞，依然可以解釋種族鬥爭之所由起。人類最初的生活，都是依靠天生現成的東西。天生現成的東西，在某些地方或多或少，或優或劣，或適於生活的需要，或不適於生活的需要；都是由氣候及地勢等所決定的。那末處在天生現成的東西太少或太劣或太不適於生活之地的人，為生活的需要所驅使，一定會向那天生現成的東西較優較多且較為適於生活的地方跑。但跑到之處，早有人在。於是新到的人與原有的人兩兩相遇，鬥爭乃因之而生。中國北部的人向南部侵逼，與南部的人發生鬥爭；黃河流域的人向長江流域的人侵逼，與長江流域的人發生鬥爭；還可以作這種道理的例證。在種族鬥爭的長期歷史中，私有財產之制漸漸發達。最初可以私有的，祇是隨身之物，後來則土地也可以私有了。土地可以私有之初，當然祇有一族一族的人能夠私有，斷不是一個一個人能夠私有。某一族

人私有一塊土地時，此一族人在種族鬥爭過程中若征服了另一塊土地上的另一族人，則被征服者可立刻變爲征服者的奴隸。漢族之征服苗族，還可以作這種道理的例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分別之發生，便是統治階級與被壓迫者的對立之開始，階級對立的局面固然是在種族鬥爭中成立的；然牠能夠長久存在，則實由於一個物質的條件。這個物質的條件是什麼呢？剩餘農品是也。征服者拿被征服者作奴隸，在農業發達的時候，把他們的勞動翻成剩餘農品，便成了階級對立的物質條件。積時既久，土地之爲物，不獨一族人可以私有，一家人乃至一個人也可以私有；於是奴隸之外，又有自由的農民。自由農民的剩餘農品，依然要分一部分給統治階級，依然是階級對立的物質條件。再者自由農民出現之日，便是大小地主發生之時。蓋農民已有自由的了，兼併侵佔之事便已盛行。兼併侵佔盛行的結果，便產生大大小小的地主。地主有地不耕，必租於無地的農民。至是又有地主與佃農之分了。佃農的剩餘農品，直接分一大部分於地主；地主是統治階級裏面的柱石，因之佃農的剩餘農品也必然的爲階級對立的物質條件。倘中國社會裏，自始就沒有剩餘農品這回事，階級對立之局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反之階級對立之局能夠長久存在，幾乎完全由於剩餘農品。

二、統治階級概論

生產剩餘農品的，在歷史上，幾乎全是被壓迫者；享受剩餘農品的，則

爲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所包含的成分很多。如元首及其族屬親戚等固然是主要的成分，即官僚和地主，也是很重要的成分。元首及其族屬親戚等略與西洋史上之所謂貴族 *Nobility* 相當，但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我們始終不稱之爲貴族。爲簡便起見，稱之爲特權者：因爲他們的地位賦予他們一種特權，可以坐食剩餘農品也。特權者這一部分人，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爲至高無上；在社會諸層累中，爲最高一層。中國歷史的全部，幾乎就是他們的家譜。歷史上所敘述的事跡，雖未必全然是他們的；但通通以他們爲經，通通是附麗於他們的。中國的文化，好像就是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生活所需，完全出自被壓迫的民衆。被壓迫的民衆，爲何肯供給他們以生活所需呢？因爲他們有政權。政權之爲物，到底是一個手段，一個鎮壓他人的工具。誰能拿到這一個工具，誰便可以向人行劫，可以向人擄取經濟的利益。中國的特權者所以爲特權者，就因爲他們有政權。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是特權者的專有物。他們有政權，故能坐食剩餘農品，故能爲中國社會諸層累中之最上一層。不過政權在手，倘不會運用，也便等於廢物。中國歷代の特權者，并不是都是能夠利用政權的。例如現在日本人所要利用的溥儀，是前清末末的皇帝。他上台的時候，還祇是一個嬰兒，他怎知運用政權？在這種場合，皇室的親戚族屬，便出充實際上的寶座。嬰兒尚不解事，爲什麼定要他做皇帝呢？這是宗法

所規定的宗法的最大作用，在免去皇室的爭端。照宗法誰應做皇帝，誰便是皇帝。因有宗法，所以嬰兒也便可以皇帝起來。嬰兒做皇帝，親戚族屬負責任；後者可以使統治階級的最高權威不倒，前者可以使統治階級內部無爭。如欲長久的鎮壓民衆，剝削民衆，這種辦法，當然好極了。中國的宗法，在統治階級裏的効用較大，且能歷久不變，實由於此。不過皇室及其親戚族屬，人數究竟有限；整個的政權，完全由他們自己運用，事實爲不可能。至是官僚重要了。特權者享有政權自己不能運用，可算是有權而無能者。但他們雖無能，却有權，可以雇用官僚替他們作工具，替他們施行政事，替他們作鎮壓民衆及剝削民衆的實際工作。官僚可算是有能而無權者。特權者雇請官僚，有權者與有能者結合，乃構成一架完整的機器。受這架機器保護的，就中國歷史看，主要的幾乎祇有地主。受這架機器壓迫的，就中國歷史看，主要的便是農民。地主受政治的保護，且出而作官的，多是地主的子弟；因此常有人稱中國政治爲地主政治。官僚替特權者做工具，負政治的實際責任；特權者沒有官僚，政治的機器，幾乎轉運不動；因此又常有人稱中國政治爲官僚政治。不過官僚雖能負政治的實際責任，地主雖能受到政治的實際保護；但享有政權的，祇是特權者；因此更有人稱中國政治爲貴族政治。特權者享有政權，官僚執行政事，地主受政治保護；這是實情。我在第一

章第二節裏也曾講過，并稱此爲三位一體。

三、統治階級中之官僚

官僚是從那裏來的？這可用一言包括說：是從地主家裏出來的。

蓋官僚必須讀書，就中國往日的經濟情形看，一個人讀書，能讀到做官的資格者，除地主的子弟以外，幾乎沒有了。地主的子弟坐食地租，可以拋開實際的生產工作，故能有長時間讀書。讀書讀到了相當的程度，經過政府機關的選拔，便可以預備作官了。中國做官的與讀書的，實在是一種人。書讀好了，未作官的叫做士；書讀好了，做了官的叫做仕。論語上所謂「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正是這等人，未做官的，以地主的子弟，而兼讀書人的資格，既富且貴，在農村中頗有權威，主要的責任是維持地方的風化。所謂維持風化，實際上也祇是變相的統治或麻醉民衆，使服從統治階級的壓迫及剝削而已，至於作了官的，則以地主的子弟而兼官僚的資格，不獨在農村中有權威，且已成了特權者直接使用的工具；其唯一的責任，在直接鎮壓民衆及剝削民衆。韓昌黎所謂「臣者奉君之令，而致諸民者也。」（原道篇）便是指的官僚。官僚的數目，很不易知道，茲且隨便舉幾種數字，以見一般。

朝代	人口總數	官僚總數	數字來源	官僚及供糧官僚而生存之人(一家以八口計)
周初	一三、七〇四、九二三	六三、六七五	通考戶口考及通志職官一	五〇九、四〇〇
西漢末	五九、五九四、九七八	一三〇、二五八	全 右	一、〇四二、〇六四
隋全盛時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	一二、五七六	全 右	一〇〇、六〇八
唐天寶時	五二、九〇九、三〇六	一八、八〇五	全 右	一五〇、四四二
宋神宗時	一三、九一〇、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博物彙編及容齋隨筆	三六四、〇〇〇
明初	五九、八七〇、〇〇〇	二四、六八二	續通考戶口考及職官考	一九七、四六四

上列數字，多出自官書，當然不盡不實。這正與北京政府時代關於全國戶口及地畝等數字之不盡不實一樣。其中最惹人注意的，便是宋朝的人口特別少，官僚特別多的兩點。人口少，大概是因當時北方失地太多，有許多地方的人口沒有計算。官僚多，大概是把所有冗員都計算了。宋理宗時，監察御史朱熹請裁汰冗員，據說當時的冗員有二萬四千餘員之多！（見續通考官職考）其實冗員之多，歷代都是一樣，我們於官僚總數上大胆加上一倍，都不算冤枉。再者一個官僚所養活的人至少有八個：父，母，兒，女，妻，自己，及男僕，女僕是。八的數目，實在少到不能再少了。合大官小官折衷

計算，認一官所養活的祇有八人，總算公道。民國以來的官，恐怕比歷史上任何一代都要多，可惜我們無法知道實在的數目。

地主的子弟既經變成了官，除家裏尚在繼續收地租，直接剝削佃農以外，自己復有正式的官俸、養廉銀，辦公費及非正式的中飽陋規等。官俸是固定的薪水，養廉銀據說是特權者恐官僚貪污，特加以補助銀，以養其廉潔的。辦公費則是官僚雇請職員，預備用品，料理瑣事等的開支。這三項都是報酬官僚的正項，非官僚任意向民衆榨取的。至於中飽陋規，則完全是官僚在某種名義之下任意向民衆榨取的。中飽陋規的收入，在任何地方，都要超過正式報酬以上數倍乃至數十倍。特權者爲欲使官僚對自己効忠起見，多予默認，而不追究。若現在的軍閥，祇要官僚肯對自己効忠，則官僚對人民無論怎樣敲詐剝削都可以。例如一個縣長，每月正式薪水及辦公費，普通總祇是千圓上下。倘若他是某師長或旅長推荐出來的。他稍稍報効推荐者外，恃着推荐者爲師長或旅長，放胆向人民剝削，一月竟可剝到兩三萬元乃至十餘萬元！其他大官僚的剝削之大，也就可以推知了。

四、統治階級中之地主

地主從那裏來的。我們在第一章第二節裏曾舉出了四個來源：

(一)由特權者降下來的。如某一特權者受元首的封賜，憑特殊的稱號，享有特殊土地一塊。這樣受

封賜的特權者的稱號與土地，多是父死子繼。但亦有因特別原故，稱號被取消，土地被沒收的。在這種時候被封者的子孫占據許多土地，以爲私有，是可能的事情：這樣一來，特權者的子孫，便降而爲普通地主了。(一)由官僚轉變而來的。上面我們曾說過：官僚都是地主的子弟。現在說官僚轉變而爲地主，那便無異於說由地主轉變而爲地主。但由地主轉變而爲地主一句話，也并非全無意義。往往有極小的地主，或僅自耕農之較爲富裕者，亦常竭力送子弟讀書以圖升官。一旦官到了手，便加速度的富裕起來：一方面服官，一方面置買或侵占他人的土地。退官之時，乃成了大地主。(二)由平民上升而來的。在土地私有制之下，自由競爭最烈。中小農民或自耕農民，地位極不一定，可以因某些原故上升而爲地主，也可以因某些原故，下降而爲赤貧。現在農村中慇勤儉刻苦由貧農漸漸變而爲富農，由富農漸漸變而爲地主的實例，也并非沒有。不過由貧農變而爲富農的時代，是漸漸脫去他人之剝削的時代，由富農變而爲地主的時代，則是開始剝削他人的時代。我們却不能說由平民變成地主不算地主。除此三個來歷之外，還有一個另外的來歷。即(四)由富商大賈變來的。在產業不甚發達的時代，富商大賈的商業資本擴大了某種程度，不能再活動於流通過程中的時候，必然要轉入農村，變成了土地資本。商業資本有一部分變成了土地資本，於是商人於原

有的資格之外，又取得了一個地主的資格。

地主在中國，是舊社會次序的柱石。舊社會的次序，幾乎完全建築在地主的力量上。地主爲什麼這樣重要呢？這完全因爲他們的地位重要。他們在統治階級中，處於最基本的一層。統治階級中特權者的生活來源，繫於他們；官僚的生活來源，繫於他們。他們直接搾取農民的剩餘勞動，於肥食自己之外，分一部分，以賦稅的形式納於政府，以象養特權者及官僚。在產業未發達的時代，政府主要的收入爲田賦或地租。倘沒有地主直接向農民搾取剩餘勞動，以轉納於政府，則政府將無法撐持，特權者與官僚將失去生活的保障。歷代政府必盡力保護地主，原因便在於此。地主因有政府的保護，在整個社會中，便有權威了。他們的子弟，叫做闊少爺，乘肥馬，衣輕裘，橫行鄉里時，可以令人羨煞。結交貴冑，出入官府，以勢力逼人時，可以令人嚇煞。講道德，說仁義，作鄉里的模範時，可以令人敬服。行慈善，樂施予，以救濟赤貧時，可以令人愛戴。總而言之，地是整個社會的重心。他們可以剝削農民，他們也可以救濟農民；他們有政府保障，他們也可以撐持政府。特權者雇用官僚，官僚指揮地主；地主則直接剝削農民。所以特權者與官僚及地主是緊緊相連的，且都與農民或被壓迫者立於正相反對之地位。

五、被壓迫者

地主，官僚特權者造成堅固的壁壘，向民衆進攻，民衆成了他們進攻的對象，構成所謂被壓迫者。被壓迫者的成分，最要的爲農民，其次爲手藝工人，再其次爲小商人。至於大商人，雖有政府向他們徵稅，但他們所納之稅係從農民及手藝工人和手工業者方面剝削來的；他們自己並沒有創造什麼新東西供政府剝削。大商人的地位，略如地主。地主向政府繳納賦稅，但所繳納的，都是從農民方面剝削來的，而不是自己創造的。不過就中國的歷史看來，地主是無例外的受政府保護，大商人則有時受政府的壓抑：這是兩者不同的一點。但我們不能因大商有時受政府的壓抑，就把他們列於被壓迫者一邊。他們雖受政府壓抑，然他們自身的存在，却完全靠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和手藝工人。所以我們舉被壓迫者的成分時，總不舉大商人，而祇舉農人手工業者手藝工人及小商人等。農人，手工業者，手藝工人及小商人等在社會之諸層累中，都居於最下的一層。整個社會的生活，都繫於他們。他們創造整個社會生存的物質條件。農人不生產食料，手工業者及手藝工人不製造用品，商人不通有無，整個社會生活，便祇好停頓；建築在物質生存的條件之上的文化，制度，學術，思想等，也祇好歸於烏有。韓昌黎謂『……民者，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原道篇）出粟米麻

絲的，當然是農民；製器皿的，當然是手工業者及手藝工人；通有無的，當然是商人。這幾種人對於生產若不負責任，整個的社會便將瓦解；統治階級，當然更不能免於崩潰。『所謂民不出粟米麻絲，製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蓋亦深知農工商人地位之重要，深知統治階級之存在，有賴於這幾種人之生產也。這幾種人負責創造整個社會生存的物質條件，然而政權一事，却與他們無干。政權完全握在統治階級手裏；他們則完全祇受政治的支配，受政治的威脅。他們之所以叫做被壓迫者，正因為沒有政權。他們沒有政權，統治階級却憑政權向他們榨取經濟的利益，以圖生存，以圖發展；他們則憑勞力改造天然事物，轉移天然事物，以謀自己之生存及供給整個社會之需要。有政權者剝削他人；無政權者被人剝削：這是古今中外之所同。中國的統治階級之剝削他人，被壓迫者之供養統治階級，也是因為前者有政權，後者沒有政權。

六、被壓迫的農民

被壓迫者的成分，以農民為最大多數。農民在全國人口總數中佔百分之八十，幾乎成了定論。全國人口總數假定為四萬萬，則農民人數當有三萬萬二千萬。不過百分之八十的數目，係包括大小地主而言。據武漢政府時代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調查（實在也祇是估計，而不是調查）小地主佔農民總數目百分之九，大地主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合為百分之十四，

三萬萬二千萬人口中減去百分之十四，即減去四千四百八十萬，餘數爲二萬萬七千五百二十萬。這個餘數，便可以說是真正農民了。二萬萬七千五百二十萬人，享有全國耕地若干？據武漢農民部的估計，僅享有全國耕地百分之四十五！農民地主的人數合計，農民占百分之八十六，地主占百分之一十四。農民地主的土地合計，農民占百分之四十五，地主占百分之六十五。單就這一點看，也就大可以看出農民與地主之間的不平等了。再者二萬萬七千五百二十萬真正農民中，凡可以分爲下之各種：第一爲自耕農；這是有土地，自己耕種的，算是最幸的一種。但是這一種的地位極不穩固：有收入能稍稍超過生活所需的富農，有收入恰恰可以自給的中農，有入不敷出的貧農。這種地位的變動，乃自由競爭的私產制下必然的現象。第二爲佃農；這是自己無土地，租種地主之土地的，算是較爲不幸的一種。佃農的人數，全國平均計算，占地主與農民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約一萬萬六千萬人以上。有些省分，且占百分之八十，乃至九十，這樣的省分，佃農的數目就更大了。第三爲雇農；這是連租種他人土地的資格都沒有的人；最爲不幸。凡地主，自耕農，乃至佃農都可使用雇農，雇農依其被雇時間之長短言，有年工，月工，零工等分別。第四爲農奴，這種農民，自己既沒有土地，又無力租種他人之土地，更不是按期被雇於別人；乃固着於特權者土地之上的奴隸；我

們無妨稱之爲農奴。特權者的土地，在前清約有四大類。據大清會典所載，四類之名爲：（一）皇室莊田；（二）宗室莊田；（三）八旗莊田；（四）駐防莊田。在這些莊田上工作，受莊頭管領的概是農奴。第五爲農業勞動者。這是資本家雇用的。在東三省方面，據說有大資本家租得大地主之土地，雇請大批無土地者爲之耕種。但這種農業勞動者，現在的人數大概很少。又農奴當然也是很少的。所以真正農民之中，仍以自耕農、佃農、雇農三者爲最重要。

各種農民，雖都受人壓迫，受人剝削；然直接壓迫他們及剝削他們的人，却有種種之不同。自耕農所受的壓迫，出自政府，受政府直接的剝削。他們因自己有土地，所以每年的收入，必分一部分，以賦稅的形式繳於政府，以養官僚，以養特權者。佃農則受地主直接的壓迫，受官府間接的壓迫。每年的收入，常要分出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乃至十分之七，繳於地主；地主再從中拿出一部分繳於官府。所以一個佃農，常要受三重以上的剝削：直接受地主剝削，間接受官僚剝削，再間接受特權者剝削，但此外還須受商人的直接剝削；他有少許剩餘農品，要拿出去兌換別種生活必須之品時，非經商人之手不可，非讓商人剝削一部分不可。雇農不受官府的直接剝削。但誰雇了他們，誰便剝削他們。中國現在，使用雇農的多爲地主及稍富裕的自耕農，佃農亦間有使用雇農者。所以地

主，富裕的自耕農，以及佃農，都有直接壓迫并剝削雇農的機會。至於農奴，則直接受莊頭壓迫。莊頭並設役農奴的。農奴的剩餘勞動，除莊頭偷去一部分以自圖中飽外，其餘一概歸於特權者。若農業勞動者，則直接受農業資本家的剝削；其受剝削的情形止與各工廠工人受各該廠主的剝削相同。各種農民所受剝削的高度，彼此不同。大概自耕農所受的剝削較輕。佃農受地主剝削最重。每年收入，自己實得十分之五，地主得十分之五；被地主剝削去的，便有百分之百以上；因自己須負擔生產的費用也。雇農所受的剝削，普通也必在百分之百以上。一個雇農每年生產假定為稻谷五十石，他從雇主方面所得的報酬，至多也不過二十石左右，以自己所得與雇主所得比較，受剝削的高度總在百分之百以上。若農奴及農業勞動者，目前在中國為數不多，且不具論。農人是這樣受人壓迫受人剝削；整個社會，乃得生活的來源。若統治階級的生活，則完全建在他們的血汗上。

七、被壓迫的手工業者及小商人

單祇有農人生產食料，尚不能構成完整之社會生活，製器圖通貨財，在社會生活中，的確為不可少。因此之故，乃有手工業者手藝工人及小商人逐漸發生出來。手工業之發達，最初本有兩系。一為專供統治階級的需要，由統治階級提倡而發達的；另一為應民間日常需要，漸趨自由發達的。（參看第二章第一節）後來因時代的需要，兩者乃逐漸混

合。混合之後，逐漸發達，爲滿足生活需要之部門，在農村都市上永久存在着。直到最近。農村都市化爲國際市場之後，才漸漸沒落下去。手工業之種類，極不容易完全舉出。概括說起來，凡不用新式機器，不直接從事於農業生產；用舊式工具，憑舊式技術，以從事於製造，從事於建設，圖整個社會衣、食、住、行、用、各方面之滿足的，通可以說是手工業。如彈棉花，紡紗，績線，織布，縫衣，染布，製帽，作鞋襪，織絲繩衣帶等，乃關於衣一方面的手工業。製糖食，作糕餅，磨麵粉，開麵館，榨茶油，製麻油，晒醬油等，乃關於食一方面的手工業。開鋸木店，磚瓦行，石頭鋪，作木工，作泥水匠，彫花版，打鐵釘，開油漆鋪等，乃關於住一方面的手工業。製小車，製藤轎，修築石橋，造木船，專預備繩索帆布等，乃關於行一方面的手工業。製紙墨，造紙，打刀，作圓木器，作金銀首飾等，乃關於用一方面的手工業。手工業之發達，凡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種類之繁多，實非我們所能完全舉出。上面列舉若干項，意在暗示讀者自己到社會中去尋找，手工業之種類，既多至不可勝數；從事於手工業的工人之種類及數目也多至不可勝數。三十年以前，新式機器尚未十分通行於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工人幾乎完全祇是手工業者及手藝工人。（手工業者乃自己稍有資本，及一小工場，而能雇用幾個手藝工人的人。手藝工人，則一無所有，被人雇用。）手工業

者之中，十有八九爲小商人。中國的小商人與手工業者，有最大部分是無分別的。小商人即手工業者，手工業者即小商人。例如有一鐵店於此，其主人自己爲鐵匠，當然爲手工業者。但他所打出的鐵器，復在自己的店中出售，因此他又成了一個小商人。舉此一例，可以類推其他。所以中國的手工業者及小商人，最大多數，是彼此無分別的。

手工業者及小商人所受的壓迫及剝削，可從三方面觀察：一，官府的壓迫及剝削；這是顯而易見的。凡在農村都市上經營手工業的小商人，照例要供給官府一切苛捐雜稅，同時還要供給當地類似官府的公事機關的特別捐款；如鄉鎮的團防捐，警經捐之類。二，地主的壓迫及剝削。經營手工業的小商人，也與地主發生直接關係。他們所必不可少的店鋪面，便是直接向地主租來的。凡省會，或縣城，或鄉鎮的店鋪面，十有八九，爲地主的房產。經營手工業的小商人，必須向地主按月繳納行佃。三，與農民同受的壓迫及剝削。這是不易看出來的，然而其嚴重並不亞於前兩者。手工業品的顧主，多數爲農民。農民因受了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層層壓迫及剝削，生活極壞，購買能力極低。因此之故，本所以供給農民需要的手工業品，反不能在農民中暢銷。這樣一來，手工業便祇能維持原狀，不能繼續向上發達。手工業不能向上發達，手工業者的生活便不能改善。這可以說是與

農民共同受壓迫及剝削的結果。

八、富商大賈之社會地位

農民與手工業者，手藝工人及小商人，都在社會之最下層；其命運彼此相差不遠，都要直接或間接受地主，官僚及特權者之壓迫和剝削。至於富商大賈，其地位則特別。在舊社會裏，政府雖也倚重他們依賴他們；然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國，人民從事於農業的爲大多數；對於商人，不免賤視；對於富商大賈，幾乎歷代都施行嚴重的壓迫。壓迫的方法，可大別爲兩種：一則賤商的法令，降低商人的社會地位；二則病商的政策，妨害商人的營業。漢之高祖，便是首先屈辱商人的，他曾明令禁止商人衣錦繡乘馬。并以漢初管理商人的法律，較管理尋常人的爲嚴酷。賤商的法令，幾千年以來朝朝都有。直到清朝，還有不許商人子弟參與考試的明令。至於病商的政策，幾千年以來，幾乎是一貫的，最普通的爲向商人征重稅。最特別的，或則不許商人有田；如漢武帝時便有這個辦法。或則沒收商人的家財；如唐肅宗遣鄭叔清等討江、淮、蜀、漢富商之財，十收其二，便是實例。政府對待富商大賈既然是這樣，我們似乎不好把他們列於統治階級一邊。不過他們雖不是統治階級一邊的，却也決不是同農民及手工業者一樣，完全受壓迫及剝削。反之，他們實是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的；他們的地位，在農民及手工業者之上。他們上則受政府爲

削，下則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

剝削的方法凡有種種，但都基於賤買貴賣一點。國內的農業品及手工業品，因地理上分布的差異，不能不憑大商人爲之轉運，爲之流通。在轉運流通之過程中，商業資本乃發生作用，商人於此乃開始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剝削的方面有三：一剝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例如有商人於此，以資本一千元，向製茶油的手工業者收買茶油；以貨幣資本，轉爲商品資本。出售之後，得一千二百元，商品資本，復還爲貨幣資本。多出之二百元，是賤買貴賣的結果，是他以商業資本向手工業者剝削出來的剩餘勞動。二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例如自耕農或佃農每年收穫的谷物，除向政府納賦稅或向地主納地租之外，其餘留給自己維持生活的，其中必有一部分須變爲貨幣，以圖購買谷物以外的生活必需之品。商人於此又復進行剝削，如以一千元購買農民的谷物，售得一千二百元。多出之二百元，便是他以商業資本向農民剝削出來的剩餘勞動。三，經過地主之手，間接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地主直接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除分一部分以賦稅的形式納於政府外，其餘的或用以維持生活，或用以擴大土地資本。無論如何，總有一部分須轉變爲貨幣。商人乘其需要，以貨幣換之，換取地主之所有，以進行剝削。如以一千元向地主購取谷物，出售於需要者得一千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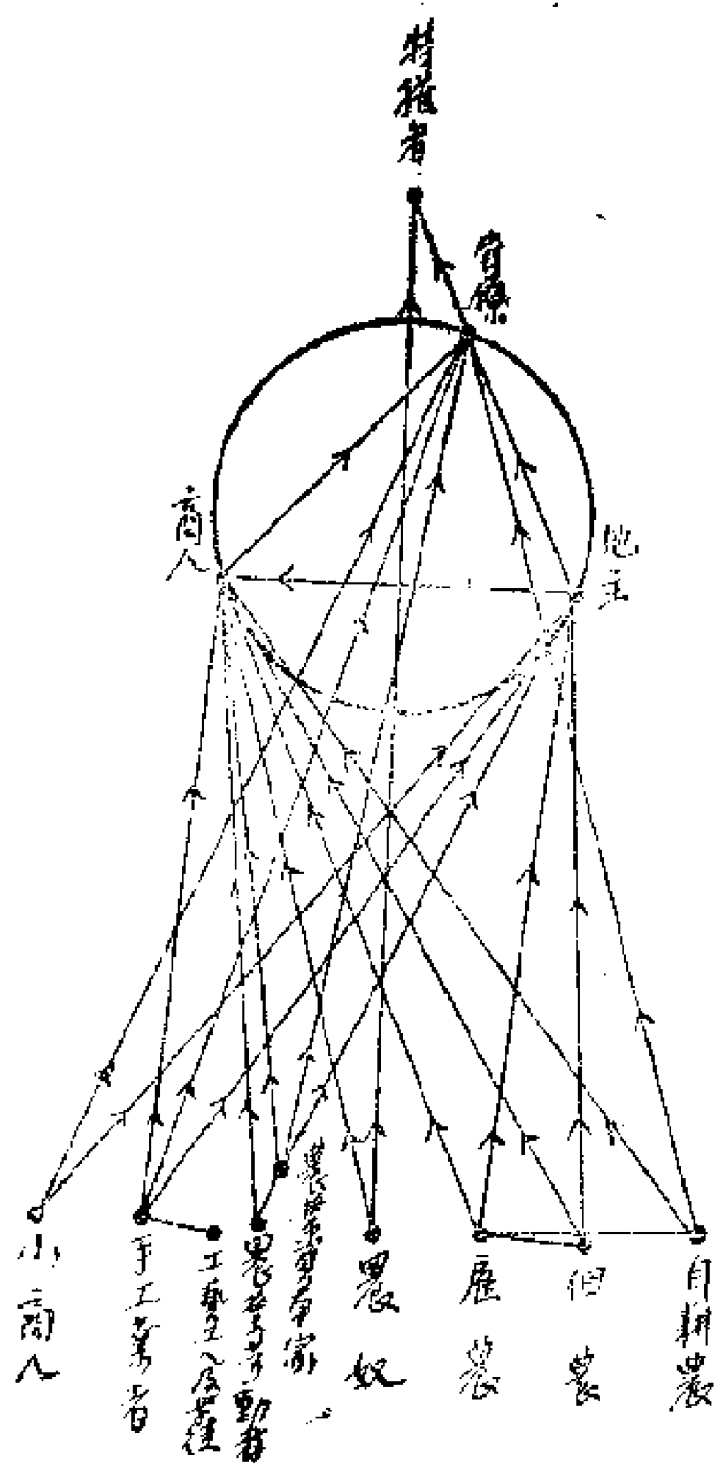
元。多出之二百元，好像是從地主方面剝削來的。但地主是沒有什麼給人剝削的；地主的所有都是直接出自農民。所以此二百元，實經過地主，間接剝削農民之結果。商人是這樣直接或間接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且剝削的形跡，又顯而易見，所以在農業經濟占主要地位的社會裏，統治階級，便不免要予以賤視。不過賤視之中，又不得不借重。統治階級見商人能獲厚利，於是常想與之分肥。所謂病商的政策，所謂向商人征重稅，便是統治階級與商人分肥的簡捷辦法。統治階級一方面賤視商人，另一方面又欲與之分肥，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在這矛盾之中，商人的地位，形式上固若卑賤，實際上則與時俱進的抬高起來了。直到最近，首先使中國各方面發生變動，各方面趨於歐化的，幾乎完全是富商大賈。至是統治階級不獨不賤商了，有時要向商人借款，幾乎可以認商人作父親。

九、剝削關係概論

由上所述種種看來，中國舊社會裏的剝削關係，我們可以明白一個大概了。社會的最下一層，爲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或小商人。農民可分爲自耕農，佃農，雇農，農奴及農業勞動者。直接剝削農業勞動者的爲農業資本家；現在東三省有這樣的剝削關係。直接剝削農奴的爲特權者；前清皇室莊田，宗室莊田等所在之處，如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天津，正

定，宣化各府；以及奉天，山海關，古北口，喜峯口等處，有這樣的剝削關係。直接剝削佃農的，爲地主；這樣的剝削關係，通行於全國；剝削的程度，南方各省較北方各省爲高。直接剝削雇農的爲雇主；雇主有時爲地主，有時爲自耕農，佃農亦間有使用雇農者；這樣的剝削關係，也通行於全國。直接剝削自耕農的爲政府，即官僚與特權者；這樣的剝削關係，也通行於全國。除上述各種剝削關係之外，凡自耕農，佃農，雇農，農奴，及農業勞動者，都要受商人的直接剝削。直接剝削手工業者或小商人的，爲商人，爲地主，爲政府，或官僚與特權者。這樣的剝削關係，也通行於全國。地主與商人的地位似乎相當，都是直接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或小商人的，同時都要受政府，或官僚與特權者的剝削。不過他們自己並沒有什麼東西給人剝削；他們右邊被官僚及特權者剝削去的，立刻從左邊向農民及手工業者方面剝削進來以補償了；且被他人剝削的分量，遠不及剝削他人的分量之多；倘不如此，則地主與商人便不叫做地主與商人了。此外官僚，地主，商人三者，在舊社會裏，常是彼此相通的。官僚原是地主的子弟；既成了官僚之後，又復以其官俸贖充土地，或投入流通行程之中充商業資本，從而增大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的機會。地主也常以其剩餘地租直接變爲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商人亦復常以其剩餘的商業資本購置土地。官僚可變爲大地主，大地主

可變爲大商人，大商人又可變爲大地主。（在中國歷史上大商人直接變爲大官僚的較少。）大地主復變爲大官僚。因都能直接或間接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剝削的太多了，自己固都很富，然大多數的平民或農民及手工業者却窮得要死。在這種情形之下，官僚，地主，商人三者拿着剝削來的財富無處安置，祇好彼此兜圈子。至於特權者，則在社會的最上一層，直接間接剝削全國的生產者。現在爲醒目起見，且將剝削關係列成下表，以箭頭示剩餘勞動的去向，以圓圈示彼此的相通。



一〇、剝削制度下之兩種產物

在剝削制度之下，有兩種特殊的產物：一爲多餘的「物」，二爲多餘的「人」。前者係指特權者官僚地主商人從民衆方面剝削的剩餘勞動而言；後者係指因被剝削而脫離生產關係的人口而言。(A)剩餘勞動，實現爲貨幣之後，累成鉅額；在新式生產事業尚未發達的時候，無處投放。但正因其無處投放，乃成了發展新式生產事業的一個條件；新式生產事業所需的資本，是由舊社會裏的剩餘勞動轉變而來的，是假官僚地主商人之手，從民衆方面剝削而來的。舊社會裏的純粹剝削關係，至少當有三千年的歷史，官僚地主商人累代的剝削下去，被壓迫的民衆累代的把剩餘勞動提供給官僚地主及商人。被壓迫的民衆，一代一代的蕃衍，剝削的進行從無已時；於是被剝削出來的剩餘勞動，乃繼續不斷的在官僚地主商人之手中累積起來。累積的太厚，又無處安置，於是成了多餘的東西，(B)被壓迫的民衆(剩餘勞動，繼續不斷的提供出來，結果便是自己生活落伍，自己從生產關係裏墮落下去，自己被事實逼迫到生產關係之外。凡因此而離開了生產關係的人，都成了多餘的人口。多餘的人口，自有剝削關係之日起至於今日，繼續不斷的擴大。歷史上許多暴動，幾乎都是他們首倡出來的；歷史上許多法律，幾乎都是爲着他們而定出來的；歷史上許多道德，幾乎是爲着他們而提倡的。他們的勢力雄厚的時候，往往可以摧毀統治階級的

的政權。勢力不雄厚的時候，則散在社會上成爲游離分子。其謀生的方法，或爲偷竊，或爲強劫；偷竊的叫做盜，強劫的叫做匪，或爲人作家僕，或爲人執苦役，其通稱曰苦力。或爲統治階級打仗，這叫做兵；或在社會打流，這叫做流氓。就歷史上看，在某特殊地方，構成很大之集團的，亦復不少。例如山西，陝西，有所謂教坊樂籍之民，世執賤業，不能與平民爲伍。浙江紹興府有惰民，元朝稱爲怯憐戶，明朝稱爲丐戶。其生活與樂籍之民無異。江南，徽州府有伴僮，富國府有世僕；本地通稱爲細民；其生活與樂籍及賤民無異。廣東有鑿戶，以船爲家，生齒極繁，一般人稱之爲卑賤之流。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舊有丐戶，其生活與惰民無異。此外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之中，尚有所謂棚民者，亦屬賤民之類。（參看王桐齡中國史第四編一三三頁）在剝削制度之下，農民及手工業者，被剝削去的剩餘勞動太多，整個社會的生活資料，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去了；於是整個社會的生活，乃日益緊迫。緊迫的結果，厥爲剩餘人口，厥爲自生產關係之中被擠出來的人口。剩餘人口也成了發展新式生產事業的一個條件。綜而言之，剩餘勞動，實現爲貨幣之後，累成了鉅額，無處投放；剩餘人口，在社會上閑散，求生不得，無處安插；這乃是幾千年的剝削制度替現代所謂民族資本主義預備的兩個重要條件。

第二節 社會階級之重組

一一、剩餘物與剩餘人口之結合

剩餘勞動實現爲貨幣之後，累成鉅額，無處投放，便成了死東西，便祇有埋在地下。在舊社會裏，凡官僚，地主，商人乃至稍有財產者，各將其豐厚之蓄積，化成貨幣，埋在地下，乃極普通之事。官僚的官俸，地主的地租，商人的資本；在產業未十分發達的社會裏，祇有化成貨幣，埋在地下，較爲穩固。不過祇圖穩固，不圖生息，那是官僚地主等人等所不甘心的；於是又祇好勉強驅使在社會上流動。官僚拿着用不完的官俸，祕密裏囑託親戚朋友，代爲經商。希望於賤買貴賣之中，逐十一之利；或貸於貧民，以取厚利；或廣置土田，以收地租。地主拿着用不完的地租，化成貨幣，或自己直接經商，或貸於商人間接經商；也希望於賤買貴賣之中，逐十一之利；或更增置土田，以圖增加地租的收入；或貸於貧民，以取厚利。商人拿着剩餘的商業資本，或直接擴大自己商業的經營，或貸於貧民以取厚利；有時也拿去置買土田，以圖收租。不過商人拿剩餘商業資本去置買土田的，還不如官僚地主拿官俸及地租出而經商的那樣多。這當然是由於買地收租，不如經商獲利之迅速的原故。但無論買出，或經商，或放債，在農業生產方

法與手工業生產方法去生剝變之時，總祇是有限的，剝削而不生產的事業，終不能無限擴大；換言之，即不能吸收剩餘人口增加剝削的對象。至是官僚地主商人直接間接從農民及手工業者方面剝削來的剩餘勞動，終有一次要成累贅的死物。不過在舊社會裏爲死物，在新社會裏或產業開始發達的社會裏，却成了發達產業的重要條件。

這一個重要條件，倘不與剩餘人口相結合；倘不能吸收剩餘人口，以增加剝削的對象，必定依然是死物，依然不能有什麼新作用發生。反之在舊社會裏因被壓迫及剝削而脫離了生產關係的剩餘人口，倘不與這一個條件相結合，倘不找到一個被剝削的新機會，在私有財產制的社會裏，始終是廢物，始終是剩餘人口。剩餘人口雖然是廢物，雖然是剩餘的；但究竟是生物，究竟要圖生存，爲圖生存起見，終非另找被剝削的機會不可。同時官僚地主商人，直接間接從農民及手工業者方面剝削來的剩餘勞動，化成了貨幣之後，無處投放時，雖然必定成爲死物；但官僚地主商人自己却都是活的，非把自己所有的死物一同活起來不可。他們把死物弄成了活的，即是把無處投放的財富，或蓄積，或剩餘勞動化成資本，再去剝削別人，再去剝削剩餘人口。剩餘人口一旦找到了被剝削的新機會，便可立時解決生存問題；於是農村社會裏的剩餘人口，可一變而爲新時代的無產階

級。中國官僚地主商人手中的剩餘財富之要找出路或活動的機會，并不自今日始；農村剩餘人口之要找出路，要找被剝削的機會，也不自今日始。爲什麼在往日兩者不結合，今則漸漸結合呢？這乃由於一個新的機緣之推動。機緣爲何？國際資本主義所給予的刺激是也。

一二、現代資本家之抬頭

農村中原有的剩餘財富與剩餘人口，因受國際資本主義刺激的影響而互相結合；隨此結合而出現的，乃有許多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新人物。這些新人物中最主要的厥爲現代的資本家與無產者。現代的資本家，隨其資本活動的範圍之不同，而有種種稱號。以資本投於礦山，從而直接榨取礦工的剩餘勞動的，可以稱之爲礦業資本家。自從新式採礦法輸入中國之後，中國的礦業資本家，便逐年多起來。這可以拿各省區礦商領取採礦執照件數的多寡爲證。民國元年，礦商向政府領去的執照，祇二十一件；二年，則增爲三十一件；三年，增到五十八件；四年，增到一百五十三件；五年略減，也有一百二十八件；六年增到一百八十二件；七年更多，有二百三十三件。（參看中國年鑑一四一七頁）領取採礦執照者逐年加多，便是礦業資本家逐年加多。自民國七年直到今日，礦業資本家的人數，當大到很可觀了。至於以資本投於工廠，從而直接榨取工廠工人之剩餘勞動的，可以稱之爲工業資本家。工業資本家逐年增加的速度，比礦業資本家逐年增加的速

度更大。例如資本在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的大公司之數，差不多是繼續不斷的增加。民國元年，祇有六十八個；民國六年，則已增到一百一十二個。其他資本在十萬元以上的，二十萬元以上的，五十萬元以上的，乃至百萬元以上的大公司，也無不逐年增加。資本在一百萬元以上的大公司，民國元年，便已有二十五個；五年，則增到了三十八個；到現在，更不知增到了多少。單就紗廠一項而論，民國三年，祇有三十二家；民國十年，竟增到一百一十三家。現存者雖祇有七十四家，然資本總數，差不多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參看China Year Book 1931的三四四頁）這些事實，顯示着工業資本家之逐年增加，并可從而窺見其增加的速度。若以資本投入銀行或經營銀行業，間接榨取農工之剩餘勞動的，可以稱之爲銀行資本家。銀行資本家，在中國的勢力，也是逐年擴大；已漸漸由支配工商業，進而操縱政府了。據民國十一年銀行年鑑所載，上海銀行公會會員凡二十一，北京銀行公會會員凡二十二，天津銀行公會會員凡一十九，漢口銀行公會會員凡一十一，杭州銀行公會會員凡七，濟南銀行公會會員凡九。這是有資格入銀行公會，且已入了公會的。至於有資格入會，而未入會的，以及無資格入會的尙不知凡幾。據China Year Book 1931所載，中國所有銀行，總支各行合計，共有七百餘家！（參看該書二一九頁到四二六頁）這顯然表示銀行資本家，在中國已漸漸抬

起頭來了。至於與銀行同一作用，規模與銀行較小的所謂錢莊，在通都大邑，也逐年發展。例如漢口，民國十年，有錢莊九十三家；到十四年，則增至一百三十六家。資本總數，也由二百零三萬兩增到了四百五十八萬七千兩。（參看銀行雜誌一卷八號九號十號）其他因資本活動的範圍之不同而興起的各種資本家，無一不是逐年增加。我們祇舉上述三種作例，便可推知其餘了。

一三、

由官僚地主等到現代資本家

現代資本家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概括言之，至少有四個來源：一由官僚變成的。在新式生產事業未盛行的時候，中國人之最富者，厥爲官僚。服官致富，幾乎是必然的。從前有賣官之例，某捐某省之道臺，以幾萬兩；某授某縣之知縣，以幾千兩。才不必適其官，而官不必得其人。祇以出資的多寡爲標準。凡出資以得官的，爲着要取償所出之資，并致富起見，便直接向農工大肆剝削；賄賂中飽，公行無忌；中飽陋規之所入，往往超過正薪數十倍。所以凡服官的，無不大富。一經富了，剩餘的財富，因產業未發達之故，無處生利，常成爲死東西。直到新式產業發達，需要巨額資本時，官僚乃首先將自己的財富化成貨幣，紛紛投到新式生產事業裏面去，中國最初修築鐵路時，買鐵路股票的是官僚，最初用新法採礦時，拿出股本的，也多是官僚。官僚把資本投到新式生產事業裏，乃自然的成了現代資本家。二由地主變成的。官僚原來就是

地主：當其未服官之先，必須是地主乃有服官的資格；既服官之後，因發了大財，更可以作地主。不過官僚雖都是地主，而地主却未必個個都是官。凡未作官的地主，眼看着作了官的地主投資到各種新式生產事業裏，可以獲厚利；於是也大起胆子，把剩餘地租化成貨幣向新式生產事業裏面投。這樣一來，地主也必然的成了現代資本家，官僚地主，隨着新式生產事業之漸漸興起，變而為現代資本家，乃極自然之事。三由富商大賈變來的。中國從前的富商大賈，以茶商，鹽商。典當商為最著名。鹽商之最富者，其勢往往可以傾倒官僚。即在今日，還是如此。例如湖南，每當軍政費奇絀之時，淮商（即淮鹽商）往往可以於三兩日之內，拿出數十萬元現款來應急。富商大賈，原來都是商業資本家。一旦把剩餘的商業資本，直接或間接投入新式生產事業，便成了現代資本家。若鹽商以剩餘資本間接投入新式生產事業，更為顯著之事。民國四年，中國實業銀行招集商股時，直，魯鹽商，以及淮，浙鹽商担任股本，最為踴躍。在短時間內，長蘆各鹽商，担任四百萬元。東綱各鹽商担任二百萬元，兩淮各鹽商担任五百萬元，兩浙各鹽商担任一百六十萬零四千元。鹽商的剩餘資本到了銀行，由銀行轉入新式生產事業；於是舊日之鹽商，一變而為現代資本家了。四由軍閥變來的。滿清的特權者沒落之後，便是中國軍閥發橫財的時候。向來在名義上所要服從的最高統治者被趕跑

了，少了一層顧慮；連年彼此相互的混戰，訓練出一套刮錢的本事。國家財政全權，盡操在他們手裏。中央的收入及地方的收入，幾乎就是他們的私人收入。某個軍官，一經成了軍閥，同時也就成了財閥。他們從人民身上括來的錢，一概存入通都大邑之外國銀行或中國銀行。由銀行又轉入工商各業。這樣一來，軍閥也就成為現代資本家了。近年以來，國內大小戰爭，從未停息，農村經濟，幾乎完全破產。而各地向銀行或大錢莊存款的，却逐年增加。例如中國銀行，十九年度存款餘額較十八年度，增加四七、九八一、一二六·（元）二〇，在此增加部分中，有百分之三十四，是私人的存款。（參看中國銀行報告第三頁）又如東三省官銀號，十七年度活期存款金額為二二七、二八二、一五七元，十八年度，則增至六八五、六九五、六五八元。十九年度乃增至一、七一三、六〇四、四五八元！這可見存款逐年增加之速度。又該號十七年度所收官署及私人存款為五五一、〇九六、五一一元；十八年度，竟增至一、四五五、〇八八、四四四元！（參看民國二十年東北年鑑九二四到九二五頁）銀行存款的增加，尤其是私人存款的增加，可以作為官僚地主富商軍閥等漸漸變為現代資本家之一證。蓋到銀行存款的是這班人；銀行放款出去，必直接或間接轉入新式生產事業之中也。

一四、無產者之出現

官僚地主，富商大賈，大小軍閥既然逐漸變為現代資本家；於是被

他們剝削的對象，也隨着變了：由舊日的農民手工業者，及手藝工人，一變而為現代的無產者，現代的無產者，一般人都稱之為產業工人，以與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相對比。他們的特點，也正從這對比中可以看出。手藝工人（1）與工場主人（即手工業者）不甚隔閡。這由於舊式工場規模狹小，工人不多；主人也常在一塊工作，故工人與主人之間，得免去許多隔閡。（2）與主人的階級之別不嚴。主人因資本不厚，不能多雇用工人；且自己也常在工場中工作，不是純粹靠剝削工人為生的；所以主人與工人之間，階級之別不嚴。（3）因有上述兩種情形，工人與主人之間，常能保持相當和順親熱的關係。（4）工人的慾望容易滿足。這是從前的情形。從前生活程度不高，工人有些少經常收入，便滿足了。（5）生命很安全。舊式工場裏，沒有機器，沒有一切危險物；所以在裏面工作，生命可保安全。（6）至於勤儉的工人，如工作年數較久，稍有蓄積，且可獨立自營一業；井不必終身作他人的雇工。所以稍勤儉的工人前途希望頗大。至於產業工人，則與此完全不同了。（1）與工廠主或資本家完全隔膜起來。週旋於工人與廠主之間的，有所謂工頭；工人與廠主從無接近的機會。不僅祇無接近的機會，而且（2）彼此對立起來；廠主與工人的階級對立關係，極為嚴峻。工人的利益與廠主的利益是相衝突的：工人要加工資，廠主要減工資；工人要減少工作時間，廠主要增

加工作時間；工人要改良待遇，廠主不願改良待遇。兩者的利益，處處相反；於是（3）衝突乃常常發生。從前手工業時代，工人與主人間和順親熱的狀態，完全沒有了。（4）手工業盛行時代，生活程度不高，工人生活不十分困難，因之慾望也容易滿足。現在生活程度較從前高了許多倍；產業工人的工資，雖較手工業時代為多；然生活仍不易維持，慾望也更不容易滿足。（5）產業工人，日與機器相伴，生命沒有從前那樣安全了。（6）至於前途的希望，幾乎完全斷絕。財產制度不改變，自己永久不能獨營一業，祇有永久作資本家的奴隸，任資本家剝削。

這樣的產業工人，其數目隨新式生產事業之逐漸發達而增加。直到今日，確實的數目，還不容易知道。據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所載，有三、一六五、〇〇〇人（參看該誌三卷五號一二六頁）這個數目，當然不甚正確；且裏面有許多不能算是產業工人。又據國民政府工商部十七年各地工會調查報告所載，各地工會共一、一一七個；會員共一、七七三、九九八人。（參看該報告第一頁）這個數目，當然不足以代表中國產業工人的全體：一則各地工人未必都組織了工會；二則有工會的地方，未必個個工人都入了會；三則各地工會及會員數并不一定報告了工商部。但祇就這個數目看，也就可以知道中國的產業工人為數不少了。產業工人的分佈，當然以產業發達的地方為最多。茲且以上

海，香港，天津，漢口等四大埠的產業工人數目列出，以見一般。

地名 人數(參看 China Year Book 1931 的 502 頁)

上海 三六二、八九四

香港 一五〇、〇〇〇

漢口 一六九、九九二

天津 四七、五一九(統計已入工會的)

產業工人，是現代資本家剝削的對象。產業工人的數目增加，便是資本家榨取剩餘勞動的機會擴大；因人數雖增加，工人的工作時間，并未縮短也。

一五、**資本主義生產制下的青年與婦女**

工人；青年與婦女，也是他們剝削的對象，資本家爲着要擴大榨取剩餘勞動的機會，乃將青年與婦女盡量拖到新式機器之下；凡青年與婦女力所能任的工作，他們都用青年與婦女，這樣一來，社會上除成年的產業工人以外，或無產者以外，又添上了童工與女工，或無產青年與無產婦女。童工與女工之被人家剝削，正如現代資本家之剝削別人一樣，同是以物質的變動爲原因，同是因爲舊式經營

變成了新式經濟，同是因爲手工的生產變成了機器的生產。自從新式機器輸入中國以來，資本家固然可以大大的擴大剝削他人的機會，貧苦人民却也變成特別容易被人剝削的了。蓋機器對於工人，顯出了兩個重要的作用：一則使工作簡單，二則使工作輕易。工作簡單，凡青年與婦女，雖沒有專門技能，雖沒有受過長期的訓練，也可以從事工作。工作輕易，凡青年與婦女，沒有好大的氣力，不能任重的，也可以從事工作。雖然，機器被人使用以後，我們固仍看見許多工作，非有專長的人不能幹，非有氣力的人不能幹。但不用專長，不須氣力的工作，確實增加了不少。例如繅絲廠裏的婦女，以手指到熱水鍋裏撥繭球；壓棉廠裏的婦女，拿着棉花往機器口裏送；工作雖極不衛生，然都不費氣力。又如印刷廠裏的小孩，站在印機旁邊，將印好了的字紙，一張一張拖下；紡紗廠裏的小孩，在搖紗間裏，將一束一束的紗稍稍移動；工作雖也都不衛生，甚至很苦，但也都不需要什麼特別技能或專長。工作既不需要專長，既不費氣力，那末氣力小，無專長的青年與婦女，便都可以進工廠作工了。不要專長，不費氣力，可以進工廠作工，這似乎是青年與婦女的幸運。但幸運之所在，便也是厄運之所在：因爲工作不要專長，不費氣力，資本家便少給工資。用少量工資，而能吸收多數青年與婦女到機器之下工作，倒是資本家的真正幸運。資本家的幸運，實建立在青年與婦女

的厄運上。現在中國境內自己過厄運，替資本家造幸運的青年與婦女，正在逐漸加多。女工之數，據前北京農商部統計的結果，民國元年有二三九、七九〇人；在全國職工總數中，佔百分之三二。二。民國八年，在全國職工總數中的比例就增大了；增到了百分之四四・七。童工之數，單祇以上海一隅為例，也使多到可以。「上海童工人數，各方估計不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四年發表宣言，謂爲代表上海一五〇、〇〇〇童工之意見。汎太平洋勞動大會，則謂上海有工人一、二五三、〇〇〇人，內中童工佔百分之七，即九四、〇〇〇人。十四年上海童工委員會逐廠調查童工人數，則謂上海中外各工廠所雇用之童工，計男子一七、五九五；女子四、三〇五人；共計二一、九〇〇人。」（中國勞動年鑑五六二頁到五六三頁）上舉之數，雖不盡不實，然上海一隅有如此之多的童工，全國合計，其數之多，當更可觀了。童工與女工的數量的增加，這是中國經濟開始變動以後，逐漸發展的事實。

一六、由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到無產階級

成年的產業工人以及童工與女工，這樣成千成萬的增加起來，做新式資本家剝削的對象；固如上述。但他們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可以一言蔽之曰，是從農村中來的。他們原來都是地租商業資本以及高利貸資本下之犧牲者；原來都是對

地主，富商大賈，以及高利貸資本家提供剩餘勞動的。直到新式機器輸入中國，新式生產方法傳來中國以後，中國農村中的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乃漸漸向都市上轉移，向新式生產事業上轉移。跟着這個轉移，首先來到都市上，或工廠裏，或礦山裏或交通運輸機關上的，便是農村中生活落伍的農民及手藝工人。東洋車子（上海叫做黃包車）輸入中國以後，農村中許多生活落伍的，便以拉車爲謀生的捷徑。開車行的資本家，每日可以向他們榨取八角乃至一圓四角的車租。於是他們由生活落伍的農民一變而爲無產階級。自從科學的採礦方法輸入中國以後，中國的官僚地主，乃至富商大賈，得到了投資的新機會，爭先恐後的集資開礦。資本到了鐵山，生活落伍的農民，也隨着到了鐵山，一變而爲鐵工，或被鑛業資本家剝削的無產者。自從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剩餘商品在中國通都大邑落卸以後，成千成萬的失業農民或手藝工人爭到輪船碼頭搬運貨物，成爲碼頭工人。他們在輪船碼頭旁邊，若無貨可搬，便不能得食；也是純粹的無產者。所以每遇抵制外貨，無搬運工作時，他們便恐慌起來。再者新式生產組織，如大工廠大公司之類，在中國境內，一天一天的加多；吸收生活落伍的農民和手藝工人的，爲數更是不少。總而言之，近代一切新式生產組織，生產機關，都可以把農民手藝工人和經濟破產的手工業者，以及農村中一切生活落伍的人，拖到都市上做

無產階級，供近代資本家的剝削。

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之變爲無產階級，本是產業界發生了變動，舊式生產方法變成了新式生產方法以後之必然現象。英，美，德，法各資本主義國家當產業革命發生之時，都有這種現象。英國且曾有一個時期，忽然感着農村人口減少，同時都市上也感着工人不敷應用。但這一個現象，在今日的中國，比英國產業革命時稍有不同。英國當時感着農村中人口忽然減少，都市上尚嫌工人不敷應用。今日中國，則恰恰相反：都市上正患工人太多無處安插；農村中亦正患落伍的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太多，無法爲生。此中原因，殆由於中國農村生活，早已被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近代國際資本主義的剩餘商品所破壞；農村人口，生活落伍的太多。而吸收剩餘農村人口的新式生產事業，却在農村生活已經破壞之後。於是農村中許多等着要做產業工人的，常感無工可作之苦。隨着這一個事實，都市上的勞動價格。乃變成曠世罕見的低廉；一兩毫小洋，往往可以買到十四小時乃至十六小時的勞動。勞動價格低落，復又引誘國際資本主義者拿着剩餘資本，向中國新都市上狂奔。中國新都市上的資本愈多，農村中生活落伍的亦隨着加速度的向都市上跑，加入真正無產階級的隊伍；而爲國際資本主義者或民族資本剝削的對象。此種往復變動，互爲因果的情

形，真值得我們注意，真值得我們研究。

一七、新時代之智識分子

在現代的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對立的局面之下，新式的智識分子，亦勃然興起。智識分子，略與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之 *Int. Regentia* 相當。近來國內有許多人，喜稱之爲「士大夫」，或「士大夫階級」。士大夫這個名詞，我不想採用。因爲（1）「士大夫」三字，原是由「士」與「大夫」兩個名詞所合成的。士與大夫兩名詞，在中國歷史上各有特殊意義。就拿士來說罷。禮王制上所謂天子之元士，諸侯之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固都叫做士；而孔安國所謂辨曲直的理官，也叫做士。這樣的士，與現在所謂博士，學士，碩士，以及在學校讀書的所謂士子，便全然不同了。再就大夫來說罷，在歷史上，所謂大夫，曾有一個時候，明明是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這個系統中的一級；其意義更是特別。雖然從前有人把士大夫三字連綴成一個名詞：如顧炎武日知錄上所謂「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學仙」之類。但（2）現代社會上有許多式樣的人，全然是西洋機器文明輸進以後，新生出來的：稱之爲智識分子可，稱之爲士大夫則決不可。例如大學的教授，我們如果稱之爲士大夫，未免太不自然。又如律師，以及替書店裏老板當編輯的，替報館裏老板採訪新聞的，也一律稱之爲士大夫，更是離開了事實。但稱

之爲智識分子，却極自然。所以我們爲圖意義明顯起見，最好把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以前的智識分子稱爲「士大夫」；把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以後的智識分子稱爲「智識分子」。

時代變了，人的社會地位跟着變；人對人的作用，也跟着變：在機器文明未輸入中國之前，中國的智識分子或爲官僚的助手，或爲地主的助手。在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之後，乃漸漸轉變而爲資本家及買辦等的助手了。在機器文明未輸入中國之前，他們主要的工作在幫助地主官僚及特權者搾取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之後，他們乃漸漸開始幫助資本家或買辦以搾取無產者的剩餘勞動。他們的社會地位變了，他們的工作變了；於是他們所需要的智識技能也隨着變。從前的智識分子，祇須講道德，說仁義，誦詩讀書；把自己弄成神祕的寶貝一樣，在農村中，便可以担任移風易俗的工作，或號召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以服從官僚地主等。現代的智識分子，則須有專門智識或技能，始能作資本家的良好工具，始能盡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責任。例如到大學當教授，替新興的資本家，買辦，軍閥，與夫原有的官僚和地主等培植專門人材；斷非吟幾首舊詩所能了事的。又如替報館老板，及書局股東當編輯，以鼓吹資本主義的文化，從而鞏固資本主義的社會次序；也非背誦幾句孔孟遺言所能了事的。至於常醫生，當律師，則更非有專門智識不可。即作

小小的政客，亦須熟悉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勢，并能略談國際政治經濟。由此種種看來，機器文明輸入中國之後，智識分子的地位，工作，乃至智識，技能，既都變了，我們稱之爲新時代的智識分子，自是恰當。

一八、智識分子之種類及社會地位

舊時代的智識分子，隨經濟的變動，一躍而爲新時代的，其大概情形，略如上述。現在且舉幾種智識分子作例，以見一般：第一，服務教育界的人員，這顯然是新時代的人。從前中國雖也有所謂教育，但情形與現在迥然兩樣；且主持的人，決不如現在之多。自從中國經濟發生了變動以後，專門智識的需要日見迫切；於是朝野上下增設新學校以應付之。新學校多了，服務教育界的人員，乃跟着多起來。至若事實上并不需要，徒因受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之暗示，而創設之新學校，更不知凡幾：這更是使教育界一方面增加智識分子之主因，第二，編輯人員。產業界既生大變，社會一天一天朝向新的方面走。所謂新的或資本主義國家傳過來的，新智識，新思想，新學術，新習慣，新道德等等都極需專門人材來發揮傳播。一言以蔽之，促進新文化的人材，日漸重要起來了。學校裏要讀新書，書局多起來；工，商，軍，政各界要通消息，報館多起來。書局報館多起來，編輯人員乃隨着增加；且以報館爲例。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

年）我國祇有報紙七十八種。民國十年時，（一九二一年）全國共有報紙一千一百三十四種。三十六年之間，差不多增加十五倍。據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調查，最近之數，已逾兩千。（參看黃天鵬著中國新聞事業第七章）一個報館所容智識分子之人數，由數人至數十人不等。幾千個報館所容的智識分子，必然構成很大的數目。第三，律師。經濟發生了變化，都市一天一天的發展，社會生活，一天一天的複雜；於是權利義務的法律關係，一天一天多起來。隨着這種情形，乃產生出大批的律師。現在都市生活正在方興未艾的發展；律師之數目，也正在無限的增加。律師，編輯人員，教育界的服務者，幾乎是模範的智識分子。智識分子之種類很多：凡不用體力勞動，專恃智力以爲生的，都可以叫做智識分子。不過我們舉出這三種人爲例，便可以推想其他。

這些智識分子目前在社會上的地位，究竟是怎樣的呢？這可用一言蔽之曰：他們都站在統治階級或資產階級，或剝削階級一邊，替他們當工具。智識分子自己，未必一定要替人家當工具。但在階級社會裏，他們必然是人家的工具。社會上那一個階級佔勝利，他們便伴着勝利的階級吃飯。目前中國社會上佔勝利的是統治階級，或資產階級，或剝削階級，所以智識分子，也恰恰是他們的工具。就事實說罷。如大學教授，便是最好之例。目前的大學校，無論是私立或公立，幾乎完全被軍

閥，官僚，政客，買辦，地主，富商，大賈等之子弟所獨占。居大學一年，費用至少五百圓；貧苦農民或手工業者或新興的無產者之子弟，決不能進去。因此現在的大學教授事實上完全是幫佔勝利的階級的，又如編輯人員，也是一樣。無論是報館裏的編輯，或書局裏的編輯，都是佔勝利的階級之工具。目前報館裏所出的報，書局裏所出的書，都是維持現社會之次序的。如不維持現社會的次序，或與現社會的次序相衝突，甚或有打倒現社會次序之嫌疑，其書其報，便不能存在。所謂現社會的次序者，乃佔了勝利的階級編造出來的。編輯人員維持現社會的次序，事實上恰恰幫助了現社會裏佔了勝利的階級。再如律師，更是佔了勝利的階級之好工具。目前的法律，完全建在私有財產制度上。執行法律，以維持資產階級之社會次序的是律師；援引法律，替資產階級到法庭上解決糾紛的是律師。至若無產者或被人毒打一頓，想請律師幫忙，而數十元一次之出席費又拿不出，結果祇好不要律師。所以今日的律師，祇是幫助統治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工具；與無產者並沒有正面的關係。總而言之，目前的智識分子，除少數叛逆者外，都穩穩的站在統治階級或資產階級一邊。

一九、高等游民與流氓無產者

智識分子，在統治階級與被壓迫者兩極端之間，其地位本不一定，實是可左可右的。完全站在被壓迫者一方面，替貧苦農民，手藝工人手工業者，和產業無

產階級等當工具，可以。完全站在統治階級一方面，替資本家，地主，官僚，軍閥等當工具，也可以。就目前的事實看，智識分子中除已站在統治階級方面的不計外，有一部份成了高等游民；更有一小部份，因過不慣高等游民生活，已冒險跑入被壓迫者一方面去了。現在我們要把無勇氣跑入被壓迫者方面，無機會跑入統治階級方面的這一部份高等游民略爲一述。高等游民的實數，究有多少，固不能確知；但數目一天一天的擴大，漸漸成了社會上的隱憂，却是事實。他們目前因無機會跑入統治階級方面去，其鑽營奔競乞憐，等等怪狀，頗足以反映他們生活的苦悶。他們爲什麼不能跑入統治階級一方面去？他們爲什麼成了社會上多餘的人？這可以一蔽之曰：由於製造智識分子的速度太大，吸收智識分子的機會太少。製造智識分子，是學校教育的事；吸收智識分子，則要靠生產事業發達，社會繁榮。學校供給或製造智識分子，社會需要或吸收智識分子。學校的供給與社會的需要如能相謀，則智識分子決不至剩下，而成爲高等游民。例如美國大學校裏的科目，雖日異日新，各種各樣的智識分子雖有加無已；然因資本主義的生產制發達，社會生活，在資產階級眼中算最繁榮；事實上需要智識分子之處，的確不少。因此智識分子尙能勉強在社會上謀生，博得資產階級的垂顧。然現在亦已漸成人滿之患矣。

中國的情形，與美國大異。教育事業的發展，與生產事

業的發展，并不相謀。當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之時，朝野上下，以為擴充軍備，改革政治，革新教育，發達產業，都是致富強的切要之圖；於是分途并進，各不相屬。結果軍備擴充了，政治改革了，國內却無人能主持，無人能支配，反成了國際資本主義危害中國之資。教育發達了，人材多如過江之鯽（謂中國無專門人材者，乃不察實情之論。實際上中國有人材，祇因無處安插，轉成廢物！）然因產業尚未完全發達之故，致無處安插！情形如此，智識分子乃不得不成高等游民。

高等游民，是智識分子中之多餘的；至若流氓無產者，則是被壓迫階級中之多餘的。智識分子，因沒有人要，成了高等游民；被壓迫的人，因求一被壓迫之機會且不可得，乃成了流氓無產者。智識分子之所以成爲高等游民，乃因教育發達與產業發達兩不相謀，或教育發達之速度大過產業發達之速度。被壓迫階級之所以成爲流氓無產者，其主要原因之一，在商業發達與工業發達兩不相謀，或商業發達的速度，大過工業發達之速度。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發展產業，增設工廠，是吸收剩餘人口的極好辦法，是容納生活落伍的農民及手藝工人的極好辦法。但中國不幸，發展產業的大事，完全出於被動，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壓迫出來的。這一個事實，是現代流氓無產者激增的重要原因。因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原有的商業資本，得到新的活動機會，增加了破壞農村生活

的作用；於是許多貧農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的生活乃日漸落伍。因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內部發生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改革運動。改革運動流產，內亂相繼發生，更是直接破壞農村生活，使貧苦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生活落伍的。他們的生活已經落伍，而吸收他們容納他們，的新式工廠方才萌芽。情形如此，他們祇好做流氓無產者。流氓無產者與高等游民之數目日增，在中國爲一嚴重之社會問題，爲中國社會生活破產之病徵。然在國際資本主義者眼中，則成了對華投資的一個極好的條件。高等游民多，可以直接間接幫助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發展。流氓無產者多，則是國際資本主義剝削的極好對象。現在國際資本主義者與民族資本主義者在中國境內互相爭奪的便是這種對象。誰能多開設工廠，多運用資本，誰便能多吸收這種對象，多擷取中國的剩餘勞動。

二〇、兵與匪

在民族資本主義者與國際資本主義者正開始在中國爭奪剩餘勞動之時，中國的流氓無產者爲生活所迫，早在自尋出路。出路之最便捷最不花本錢而又可以做倖圖存的，莫如當兵與當匪。所以近數十年來的中國，幾乎成了兵匪世界。中國兵匪之多，在今日幾乎是空前未有。要明白兩者確實的數目是不可能的。大概說來，兵之數目，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份時軍祇所聞國軍，便有如下的數目：

(一)中央政府直轄軍

步兵……………四一師

一六旅

一〇團

騎兵 一旅

(二)第一集團軍

步兵 一二師

二旅

騎兵 一師

砲兵 三獨立旅

(三)第二集團軍

步兵 一二師

五混成旅

第三章 社會階級之重組

中國社會之現狀

騎兵 一師

二旅

(四)第三集團軍

步兵 一三師

六旅

三團

騎兵 六師

一旅

二團

砲兵 一〇團

一營

工兵 七營

特務兵 八營

(五)東北邊防軍共計一五團

(六)四川，雲南，貴州合計二〇師。

國軍全部合計步兵凡一一四師，二九旅，一三團；騎兵凡八師，四旅，二團；砲兵一三團；工兵及特務兵一五營。人數每一師官佐和士兵有一四、〇〇〇人。全部合計，將近一、八〇〇、〇〇〇人。（參看才敏達著兩年之新政一三四至一三五頁。該書英文原名爲 *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這個數目，僅指政府所知道的現存之數而言。至若已經指定要受編遣的，有特別任務的，私招私募的，充各地團防的，以及政府所不知道的一切雜牌兵士，尙不知凡幾。雜兵官兵合計，至少當不下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這些人名爲兵士，實際上都是農村中生活落伍的農民及手藝工人。其在軍隊中生活之苦況，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

當兵固然是流氓無產者的一條出路；當匪也是他們的一條出路。中國近代匪風之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地域論，無一省無一縣沒有匪患。就時間論，無一年無一月沒有匪患。舉幾個實例來說罷。河南有紅槍會匪。紅槍會匪，據說是由義和團傳下來的。義和團在庚子以後，雖已消滅；然他們的徒子徒孫，還潛伏在山東河南一帶。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從山東曹昌，東昌一帶，傳到河南

內地。初祇蔓延於歸德、虞城，考城，滑縣，安縣等；後則遍布全省；到民國十二年時，且有大規模之組織。四川有神兵，四川的神兵，初起於奉節，巫山，及大竹各縣，現在幾乎蔓延於全省。神兵之多，差不多完全是貪污土劣壓迫的結果。民國十七年八月六日的成都民國日報有一段記載說：『巫山一帶，純係神兵維持治安。……內部亦有多數讀書識字之人；作告示，貼標語，亦係事實。其中有「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口號；暨其他行動。頗帶有政治運動氣概。……湖北有大刀會。湖北荊門，天門一帶的人民，幾乎全部都是大刀會匪。大刀會匪的團體意識很強。凡屬同會的，彼此必互相幫助。就是遇軍隊來干涉他們，他們也不怕。此外較爲著名的，宿遷有小刀會，溧陽有大刀會，膠東有無極會等等。著名的會匪，其人數常是成千成萬的；容易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卒者數十人成羣，隨地行劫的，不知有多少；無論何省的報紙，天天都有關於匪患的記載。』

（關於會匪的內幕，張振之所著革命與宗教裏，有些有趣的描寫。）現在旅行中國的外國人，常以中國兵匪之多而起驚訝。其實最近中國兵匪之加速度的發展，實以國際資本主義之侵略及國內軍閥之橫行爲主要的直接的原因。兵匪多了，裁兵與剿匪，又成了中國的要務。但兵與匪都是脫離了生產關係的；如沒有使其重行加入生產關係之可能性，裁與剿都無效。怎樣才能使其重行加入生產關

係？先決條件在有足以容人的大規模的新式生產事業。至是國際資本主義者投資於中國，以擷取中國人剩餘勞動的機會又多了。綜括言之，中國近代流氓無產者之日集日衆，國際資本主義之侵略，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反之，流氓無產者人數之衆多，又成了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繼續發展的一個主要條件。

第三節 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社會階級

二、華工在世界社會關係中之地位

近代中國流氓無產者之加速度的發展，固然以國際資本主義之侵略爲一個主要的原因；但流氓無產者之發生，却不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之日始。中國自有地租，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等在農村中作祟以來，流氓無產者便繼續不斷的發生。歷代民衆的暴動，便是這個事實的反證。其次當兵與當匪，固然是流氓無產者自投的兩條出路；但除此兩條出路之外，未必絕無他道可以圖苟存。講到這裏，凡冒大險，拋妻別子，離開祖國，到國際資本主義者勢力之下，去充當華工，以圖苟且生存的，便值得我們注意了。中國貧苦農民及手藝工人，因在國內生活已經落伍，冒險出國謀生的，早在兩百多年以前就很多。自清初以至今日，往南洋一

帶的，更有加無已。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便有斐律賓人驅逐華人出境之事。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斐人曾再度驅逐華人。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年）荷屬巴城有屠殺華人萬餘人的慘事。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華人因幫助英人攻斐律賓之故，曾遭斐當局處以慘刑。就這些事看，可知華人出國謀生之日甚早。直到最近的幾十年之內，到南洋一帶謀生的特別衆多。這個事實，惹起了當地政府的不安。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乃有荷屬徵收華僑人口稅之舉。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海峽殖民地政府，又復通過限制移民的條例（參看溫維翰著南洋華僑通史裏的中國南洋交通年表）中國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離開祖國到異地去謀生，原來不限於南洋一帶；不過因南洋離祖國較近之故，往南洋去謀生的獨多。

華工之發生，是中國人套在世界社會關係（World Social Relation。Buckhari）在其所著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一書裏，常把這幾個字運用。）裏的最明顯之例。現代華工之加多，凡表示兩個重要的意義：一則中國農村生活日漸破產，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生存的路道日漸狹窄。二則國際資本的勢力，日漸發達；國際資本主義者擷取剩餘勞動的機會日漸擴大。中國人的生活愈緊迫，國際資本愈覺有隙可乘。國際資本的勢力愈擴大，生活落伍的中國人反覺有生路可走。

中國人民生活之落伍，與國際資本勢力之擴大，兩者實相反而相成。這一個事實，在今日外資充斥中國，農村人口羣集都市時，固是如此。在往日各資本主義國向經濟落後之地進逼，及中國窮人向國外狂奔時，更是如此。例如十九世紀之末，英，荷兩國正互爭東方海上霸權，各該國政府，極力獎勵國內的資本家向南洋羣島經營拓殖事業。一時西方的資本，向東方經濟落後之地湧入。這些西來的資本，在南洋羣島一帶，除榨取當地土人的剩餘勞動之外，隨即吸引了成千成萬的中國農工做榨取的對象。西方有資本向南洋移動，中國有生活落伍的農工向南洋移動。資本與勞力結合，野蠻的南洋，竟一變而為文明的。正在這個變化之中，一部份中國人或全部華工的剩餘勞動，都化成了剩餘價值，且實現為貨幣，源源不竭的流入西方資本家的口袋裏去了。幫助西方資本家榨取華工之剩餘勞動的，有一種奇異的制度，曰豬仔販運制。這個制度與華工之關係值得敘述。

二二、豬仔販運制下之華工

豬仔之名，係指往海外謀生的華工而言。大約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久，英，荷，法等國的資本家，在新開拓的地方，經營大規模的生產事業，需要多數的工人。於是當時各國資本家有招募華工之議。此議一出，凡由香港出海的船舶，乃滿載華工，前往古巴，澳洲，南美等處。大概說來，由英屬澳洲及美國等處的，多自由移民，其去不須他人預付船費，也

無須定合同，先收工資若干之辦法。至若往西印度羣島，古巴，巴拿馬及南美等處，和南洋英，荷兩國之屬地的，則都是契約勞工。這種勞工，可以說具「債奴」。他們未出去之先，在廣州，汕頭，廈門，或香港等處，向招募華工者訂立合同一摺。合同上詳載應募到某處，作某種工，每月工資若干，每日工作時間好久，以三年爲期；期滿，雙方同意，再續。來回船費，由招工者代付。臨時生活費，可預支工資若干充之，由後來應得之工資內扣償。合同既訂之後，即預備出發。招工者乃集合其所招工人於一定地點，以船載之，向目的地輸送。既達目的地之後，即帶到工作場所，開始工作。這時候被招來的工人，其進退動作一概聽招工者之指揮，自己絕無自由選擇職業之餘地。這種弊害，還算不了什麼。最大的弊害，乃在招工者之意圖急速招募，鬼域多端，甜言密語，隱匿其合同之條件。訂合同時，條件很寬；既達目的地，開始工作時，一切待遇，與合同上所訂條件全不符合。至是被招之華工，始知受騙。強悍的聚衆反抗；機智的，伺機逃遁；柔弱的，自尋短見，久而久之，豬仔之地獄生涯，乃漸漸暴露於外。南洋接近廣東與福建；被招到該處的華工獨多。因此豬仔販運制與往南洋的華工關係更密。至於招募華工的詳細手續，更值得我們的注意。招募之初，大概係由大資本家委託一總招工之人，負責招募。這個總招工之人，叫做猪仔頭。他自己直接與大資本

家訂立契約。契約訂好了，隨即派許多較小的招募者分赴中國內地，進行招募。大約每招募工人一名，此小招募者，可得一元至二元之介紹費。因有這種利益，此小招募者，不管哪裏的工人提出何種條件，均一一信口答應。并極力陳述海外謀生之易，以引誘鄉愚，以引誘農村中生活落伍的農民及手藝工人。凡各鄉鎮，各村莊之茶樓，驛館，均是小招募者活動的地方。迨人數募足了，乃一齊帶到出口場所。出口場所最著名的，廣東有汕頭，廣州，澳門，海口，江門等處；福建有廈門。在出口場所，屯聚於總招工或豬仔頭所預開之洋行或棧行裏。俟輪船一到，各人乃忍痛飲泣，離開祖國，向外國資本家鐵路之下走。走到了外國資本家的鐵路之下，其苦况殆不可以言語形容。下面一個稟稿，頗可以幫助我們推知一二。『具稟人潮陽縣，松修都，玉石鄉黃武，龍吳山等；爲慘遭誘騙，拐帶出洋；弱品難歸，乞賜旋里事。竊於上年九月間，有葛州鄉人黃順孝，託言檳榔嶼有洋商招工前往該埠種蕉。每名每月工銀七元。按月准該工家屬在汕支銀四元；其餘則原人在埠支給。當時同赴役者百有餘人。計共數月，能否平安，均未知悉。乃近日忽有同伴鄉人辭工歸里。詢及情形；據述各工入到埠後，慘遭凌虐，飢餓不堪。伊幸逃回，免亡異地，且云各工入現墮黃順孝計中，已轉露列洋；以後斷難旋鄉等語。』此稟係呈潮陽縣轉請兩廣總督向星加坡政府交涉云。稟中

所述，乃一八五〇年之事。（參看南洋華僑通史一六九頁。）我們讀此，便可推知豬仔販運制下的華工苦到了什麼程度，并能更加明白：國際資本主義向上發展，中國農村生活向下崩潰之相反狀態中，華工在世界社會關係裏的「正地位」。

二三、各國資本家之雲集中國

華工所至之處，即各國資本家所至之處；各國資本家與中國的華工連結起來，把許多野蠻地方化成文明地方；把野地方的落蠻後的生產事業，化成文明地方的進步的生產事業。但經過這樣的變化之後，或這樣的變化達到某一種程度之時，各國資本家活動的機會必然的漸漸減少，甚至不能活動；資本投放的場所也必然漸漸縮小，甚至無處投放。至是各國資本家，乃挾其雄厚之資本，直接向中國內地進逼。同時中國自己，也正在發展新式生產事業，缺乏資本。國外資本家有鉅資投到，當然歡迎。因此近幾十年來，中國境內，到處都有外來的資本，到處都有外來的資本家。中國任何種新式生產事業，祇要是規模稍大一點的，都有外來的資本參與，如建築鐵路，便有外資獨建的，或中外合資建築的；開採礦山，便有外資獨開的，或中外合資開採的；設立工廠，便有外資獨設的，或中外合資設立的；經營業務，便有外資獨營的，或中外合資經營的。開辦銀行，便有外資獨辦的，或中外合資開辦的。資本所至之處，便是資本家的勢力

所至之處。外來的資本既然在中國境內各種新式生產事業裏活動；外來的資本家，也於有形或無形之中，直接或間接握着中國新式生產事業之一部份或全體。中國近數十年來，新事業一天一天發達，似爲國人之福。但同時外國資本家在華的勢力也一天一天雄厚；實又爲國人之禍。新事業不發達，失業人口無法生存，生活落伍的農工或流氓無產者甚至高等游民或失業的智識分子都無處安插。新事業發達，國外的資本，却如潮水一般的湧入；把中國失業工農，盡數拖到國際資本主義者鐵蹄之下。因有此一個矛盾圓頭，國內乃發生許多不同的思想。但這不宜在此處多講；現在仍回轉頭來講雲集中國的外來資本家。外來的資本家之雲集中國，一方面表示中國新式生產事業之落後，及農村經濟之破產；另一方面，則表示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之擴大，及國際資本主義者之向外發展。近數十年中，外來的資本家，在中國正日集日多。例如美國在中國所設之大公司，一九一四年，祇一三六個；一九二〇年，則增至四〇〇個。（參看 *Duvv's American Foreign Investment* 一五九頁至一六〇頁）又如紗廠，據一九二八年海關報告冊所載，單祇日本在華的紗廠，便有四十三家；織機之數，共一三、九八一；比中國七十二家紗廠所有的一三、九〇七架織機還要多！再如銀行，各國資本家在中國都有極大之銀行。單就日本在華的銀行講，據 *China Year Book 1931* (三一頁) 所載，截至一九

三一年一月，日本在華銀行本支行合計，共有一〇八家！與此互相發明的，本年一月九日的香港超然銀上還有一段話曰：日本侵略我國手段，首在利用經濟包圍。……觀其在華設立銀行之多，投資之鉅，可想見矣；其在我國北部者以橫濱，正金銀行爲主。在我國南部者，以台灣銀行爲主。其餘在我國內大小銀行，約有百家以上；而資本較大，勢力較厚的，則有四十四家，分設於南北各地，茲調查於後。

行名	所在地	實收資本金額
正金銀行	分設南北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台灣銀行	分設南北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銀行	分設南北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井銀行	上海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菱銀行	上海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住友銀行	上海漢口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吉林銀行	吉林	三〇〇、〇〇〇

商工銀行	遼陽	二七五、〇〇〇
哈爾濱銀行	哈爾濱	五〇〇、〇〇〇
大連興信銀行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商業銀行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〇
聚興銀行	大連	一、〇〇〇、〇〇〇
綏遠銀行	大連哈爾濱	九、五〇〇、〇〇〇
庶民銀行	大連	三七五、〇〇〇
長春實業銀行	長春	五〇〇、〇〇〇
安東實業銀行	安東	一二五、〇〇〇
滿洲貸款銀行	瀋陽	五〇〇、〇〇〇
營口銀行	營口	三、〇〇〇、〇〇〇
聚興銀行	牛莊	三二五、〇〇〇
中日銀行	綏遠	一、〇〇〇、〇〇〇

第三章 社會階級之重組

開源銀行	開源	五〇〇、〇〇〇
四平銀行	四平街	一五〇、〇〇〇
大昌銀行	遼陽	二五〇、〇〇〇
天津銀行	天津北街	二五〇、〇〇〇
濟南銀行	濟南青島	二五〇、〇〇〇
華南銀行	台灣廣東	七、五〇〇、〇〇〇
新商銀行	福州廈門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連興業銀行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
大市銀行	大連	六一〇、〇〇〇
日華銀行	鐵嶺開源	一、〇〇〇、〇〇〇
正隆銀行	滿州各地	九、五〇〇、〇〇〇
龍口銀行	滿州各地	五、七五〇、〇〇〇
遼中銀行	大連瀋陽	一、五七〇、〇〇〇

滿洲商業銀行	安東	二、二七五、〇〇〇
協成銀行	安東	二五〇、〇〇〇
平興銀行	大連	二〇〇、〇〇〇
安南銀行	安山	三七五、〇〇〇
旅順銀行	旅順	四八七、〇〇〇
安山銀行	安山	二五〇、〇〇〇
奉天銀行	瀋陽	一、二五〇、〇〇〇
東聯銀行	瓦屋店	八二五、〇〇〇
滿洲銀行	滿洲各地	八、六一九、〇〇〇
上海銀行	上海	一五〇、〇〇〇
總計	四十四家	四九一、六二〇、〇〇〇

上面所列，還祇是日本在華的四十四家銀行，其資本總計，便有四九一、六二〇、〇〇〇元！其他各國的尚未提及。現在祇舉這四十四家作例，以暗示各國資本家在華勢力之雄厚。各國在華資

本家，都是直接或間接榨取中國農工之剩餘勞動的。他們的資本在華活動的場所，或在工業方面，或在商業方面，或在農林方面，或在墾殖方面，或在鑛業方面，或在交通方面，或在運輸方面。但無一處不與中國農工發生關係，無一處不把中國農工拖在榨取制度之下，供其剝削。

二四、買辦制度及買辦

外來的資本家，要與中國的工農發生關係，直接榨取中國農民的剩餘勞動，頗不容易。一則中外語言不通，外來的資本家與中國人不易接觸；二則中外的習慣不同，外來的資本家雖與中國人接觸了，然因習慣不同之故，又不易發生密切關係。三則外來的資本家，不熟悉中國的情形，不容易進行榨取工作。因此種種，中國工農羣衆，與外來資本家之間，無形之中，有一種障礙，使雙方不能接近。但這種障礙顯出作用之日，隨着便有許多打破此種障礙之人或制度發生。例如語言不通，隨着便有夠通語言的翻譯；又如習慣不同，隨着便有溝通中外習慣的青年會；再如外來的資本家不熟悉中國情形，隨着便有中外人士合組的調查團之類。調查團之爲物；社會主義者常目之爲偵探團，專門偵察中國的實情，供外國資本家的參考，以間接幫助他們決定侵略中國的方策。我們若稱之爲殘酷的買辦制亦無不可。買辦制度之發生，完全基於上述的三種事實：語言的不通，習慣的不同，外來資本家對中國情形的不熟悉。此制一經成立，外來資本家與

中國工農羣衆之間的障礙，可以一掃而空。外國資本家到中國來開大商店，開大工廠，經營交通運輸事業，開設銀行，經營投機事業，創辦跑馬賽狗一類的賭博事業，乃至正式開設大賭場；均一律有買辦負責進行。外來資本家，直接或間接榨取中國工農的方法，雖儘有卑鄙下流得不堪的，然他們自己，却高高在上，儼然高等商人以先進國的人民自居。充當買辦的中國人，做了他們的工具，幫助他們做了壓迫中國工農的工作，而不自覺！

中國人之充當外來資本家之買辦，皆須訂契約以爲據。所謂買辦，乃中國人與外來資本家根據互訂之契約，在一定報酬之下，替外來資本家奔走效勞的使用人，一方立於外來資本家之使用人地位，另一方則根據互訂之契約，於所定職權範圍之內，以完成外來資本家之營業爲目的。凡一切交易，一切經營，對於外來資本家，皆立於保證之地位。例如普通商店之買辦，係由店中供給一定之月薪，使之周旋於各種交易，保證華人顧客之信用，並負對顧客納款之責任；或則處理貨物之購入賣出等手續，而得相當之佣金。又如輪船公司買辦，則在一定薪俸之下，使之招徠貨物及乘客，並作繳納水腳之保證。銀行買辦，則受銀行一定之薪俸，以一己之責任及利害，掌管一切出納事項。凡經由買辦之手，所有對於華人匯兌買賣，貨款承受等，均負完全保證之責，同時由銀行給以相當

佣金。由這些實例，我們知道買辦究竟是什麼人了。

二五、買辦之社會地位

買辦之社會地位，可從三方面觀察之：第一站在國際資本主義者或外來資本家之地位觀察，第二站在民族資本主義者或中國商業資本家的地位觀察。第三站在中國工農羣衆的地位觀察。站在第一個地位觀察，則買辦對於國際資本主義者，或外來的資本家，也有不利的地方。馬寅初博士替外來資本家述買辦之流弊最爲清楚。據他云，買辦喜扣息。如外國銀行，貸與中國錢莊規銀一千兩，即上海所謂折票，二日爲期。假定日息三錢，二日則爲六錢，計一月之息，不過九兩。經買辦之手，往往日息不止三錢，除將三錢明數歸於大班外，餘數悉爲中飽；二方（國際資本主義者與民族資本主義者）均吃其虧。又用買辦，頗不經濟。因用了買辦，外來的資本家，必須預備兩本帳簿；既勞校對，復費時間；辦事處，亦須設兩所；已佔地位，又多開支；煩瑣呆滯，不言可喻。再者買辦最喜從交易之中取巧。中外兩方不能直接交涉，全憑人言，難免失真。如婚嫁然，全憑媒妁之言，未必能合乎雙方之意也。且買辦或因利之所在，從中舞弊。（參看馬寅初演講集第二集中國之買辦制）馬氏爲國際資本主義立言，可謂沈痛之極，若站在民族資本主義者的地位觀察，買辦對於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者，也有很大的害處。第一買辦足以障礙中國外

交之進行。如抵制外貨，是弱國之外交上的良好武器。但買辦因對國際資本主義者或在華的外國資本家負了責任，并繳了押櫃金之故，無一不反對抵制外貨。第二，買辦有促成內亂之嫌。如各地武人所用軍械及其他附屬品，無一不是經由買辦之手，向外國洋行買來的。就這一點看，買辦也可以說是內亂的罪人。第三，買辦足以斷送國權，使外國資本家在華的勢力日漸擴大；如介紹外國銀行，借款於中國政府，即一最好之例。總括言之，（1）使外國資本家在華的勢力擴大（2）間接造成內亂，（3）直接反對抵制外貨等等舉動，都足以障礙民族資本主義之發展。所以買辦對民族資本主義者，實是有害而無利的。（參看沙公著中國之買辦制第四章）若站在中國工農羣衆的地位觀察，則買辦乃中國工農的敵人。他們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直接或間接搾取中國工農的剩餘勞動；他們是國際資本主義者侵略中國的代理人。把中國農人拖到世界之搾取制度下的是他們，把中國工人拖到世界之搾取制度下的是他們。同時把中國官僚軍閥，資本家地主，以及富商大賈拖到國際資本主義者一邊，使他們漸漸拋棄民族利益，漸漸消滅自己的民族意識，而與國際資本主義者結成聯盟，攜手同行的，更是他們。他們自己是買辦，同時中國的官僚政客乃至軍閥，因受了他們的暗示，深覺國際資本主義者力量之雄厚，亦相率而爲高等的買辦。這些高等買辦，自身不必與國際資本主義者訂契

約；祇須憑自己的資望，手段，以及與國際資本主義者的交誼，便可站在所謂中國政府（實係買辦政府）裏替國際資本主義者說話，替他們推銷剩餘資本，替他們商訂擄取中國農工利益的條約；以盡買辦所應盡的一切責任！

二六、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商人

中國商人，顧名思義，應該是中國的，但於今不同了，他們已由中國社會關係中之商人，一變而為世界社會關係中之商人了。中國社會關係中之商人，其主要作用，在協助中國境內農業品的生產及手工業品的生產，在使中國境內生產品之地理的差異漸趨於平。但自國際資本主義者之剩餘商品輸到中國以後，他們的作用，乃開始轉變。原來他們的作用，表現在國內，於今則表現在國際上去了，這是一度的變動。原來他們的作用在協助農業品與手工業品的生產，於今則在協助國外工業品與國內農業品的生產，這是二度的變動。原來他們的作用，在使國內生產品之地理的差異漸趨於平，於今則在使世界生產品之地理的差異，漸趨於平，這是三度的變動。經過這幾度的變動，中國商人，乃完全成了世界商人，他們漸漸衝出了中國一隅的社會關係，加入了整個世界的社會關係。他們既然加入了世界社會關係，對於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影響如何？這可以一言蔽之曰：協助國際資本主義者繼續擴充勢力是也。國際資本主義者自從

自己國內市場已經達到了不能再擴大的時候，乃不得不挾其剩餘商品向殖民地狂奔，因此之故，自從非洲被分割以後，在東亞方面，中國竟成了唯一無二的好市場，農品極富，而機器工業品幾乎沒有。這樣的市場，最合國際資本主義者之用。國際資本主義者需要的是農品，是原料；要人家消費的是機器工業品，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商人的作用大起來了：經營農品或原料之輸出的是他們，經營機器工業品之輸入的是他們。他們或因語言風俗習慣之不同，不能與國際資本主義者發生直接關係；但有買辦，為作媒介。自從中外開始貿易之日，即買辦開始發生之時。買辦把中國商人與國際資本主義者拉攏，國內的原料與外國商品乃得相互交流。這一個相互的交流，竟把垂死的資本主義救轉過來；把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日漸擴大。但正在這國際資本主義勢力擴大之日，恰恰又是中國工農羣衆套上新枷鎖之時。中國無數的手工業者，早已因中外貿易發達，國際資本主義勢力擴大，陷入了沒落之境；同時中國無數農民，也因這個原故，早已加入了世界社會關係，一方面在替國際資本主義者消納工業品（中國農民，購買力薄，似不能消納外來的工業品；但中國的官僚，地主，軍閥，政客等榨取了他們的剩餘勞動，可以消納外來的工業品。）另一方面在替他們生產原料。至於從農民及手工業

伍出來的所謂流氓無產者，則更引領瞎目的盼望國際資本主義者

拿剩餘資本來救他們，實係來擄取他們的剩餘勞動。由此看來，中國商人自從加入世界社會關係之後，固然直接幫助了國際資本主義之繼續發展，但同時却間接的把中國工農拖到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之下去了。這一個作用，是與買辦共同表現出來的。

二七、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農民

中國農民之加入世界社會關係，固然由於商人及買辦之直接或間接的拖引。但資本主義先進國之需要原料，却是基本的動因。資本主義先進國因國內市場達到了不能繼續擴大之時，必然向國外經濟落後的地方推銷商品及吸收原料。例如英國，當國內資本主義的生產發達到了最高度，其原料全仗殖民地供給。單就棉花一項而論，由印度輸入英國的，一八四六年，有三四、五四〇、一四三磅；一八六〇年，增至二〇四、一四一、一六八磅；一八六五年，則增至四四五、九四七、六〇〇磅。再就羊毛一項而論，自澳洲輸入英國的，一八四六年，有二一、七八九、三四六磅；一八六〇年增至五九、一六六、六一六磅；一八六五年，則增至一〇九、七三四、二六一磅。農業國成了供給原料的中心，工業國成了吸收原料的中心；合起來構成一種國際的分工制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參看 Marx: Capital 第一卷四九三頁）中國農民之加入世界社會關係，也是在國際分工制下加入的。一八六五年時，中國農民供給資本主義先進國的

農產品或原料；價值六千萬海關兩；一八九五年時，增到一萬四千三百萬兩；一九二五年時，更增到七萬七千六百萬兩！（參看第一章第三節）中國農民，在國際分工制下，有這樣大的報効；資本主義先進國得了這種報効，資本主義的生產，得加速度的擴大，進而成就國際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那末中國農民在世界社會關係中之地位，便可想而知了。中國農民既然加入了世界社會關係，其職能其作用也隨着變動起來。第一由中國農業品的生產者，一變而為國際資本主義之工業品的消耗者。中國農民本無資格消耗世界機製工業品。但他們須以剩餘勞動提供於官僚軍閥地主買辦以及富商大賈等。這班人榨取了他們的剩餘勞動，可以直接消耗世界機製工業品。這一個事實，無異於他們自己以剩餘勞動間接維持國際資本主義。他們自己雖生長在中國，實則已成了國際資本主義機器下之犧牲品。第二，由中國手工業品的消耗者一變而為國際資本主義之原料品的生產者。中國農民的生產品，向來雖有一小部分是手工業的原料，如竹木，麻棉，毛皮之類是。但分量極少；其餘大部分却都是直接維持生活的資料，於今不同了：大部分的農業品，都成了國際資本主義機器下之原料。中國農業品一旦禁止出口，各國工廠，且有停頓之虞。就這一點看，中國農民竟成了直接維持國際資本主義的人。同時，中國農民除受國內軍閥官僚地主富商等之剝削外，還須受國際資本主義者之剝

削。例如價值十元之農業品，國際資本主義者以八元收去，便剝削了農民二元。原來資本家之剝削，並不限於工人，農民也是被剝削的對象。資本家吸收原料時，便間接經過地主之手，而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將原料製成工業品時，便直接榨取工人的剩餘勞動。工業品在市場上銷售了，則前後兩度向農民及工人所榨取的剩餘勞動，均一一實現為貨幣，入了荷包。

二八、

世界社會關係中之中國工人

中國工人之套入世界社會關係，自第二節裏所述的華工開端。但華工之外，現在中國境內完全套在世界社會關係中之工人，為數實在不少。倘民族資本主義抵不住國際資本主義；所謂中國，有完全被國際資本主義獨占之可能，則中國工人全部，也有完全套在世界社會關係中之可能，國際資本主義在華的勢力愈發達，則中國工人的地位，愈加國際化；換言之即將愈加喪失國家性，而取得世界性。中國工人套入世界社會關係之條件，主要的約有兩個：一則國際資本主義的資本之充塞中國；二則國際資本主義的工廠之遍布中國。資本到了中國，是要取利息的，但利息決不會從天上掉下，必須從勞動者身上榨去。中國境內，外來的資本有多少，則中國工人便有多少剩餘勞動要被國際資本主義者榨去；同時中國工人與世界社會關係，便會達到某種密切程度。現在中國境內外來的資本究竟有多少？第二章第三節裏，曾有一個約略的估

計。各國對華投資，單祇鐵道銀行紡織等幾項，便有一十八億九百一十五萬四千圓之多。這種大量的資本，便是擷取中國工人剩餘勞動的利器。至於各國在華直接開設工廠，招收中國工人供其剝削的，更不知凡幾，單祇日本一國，便有左列之數。

業別	工場數	資本額
紡織工業	四三	二四七、八九〇、〇〇〇圓
製油工業	二四	一七、八八〇、〇〇〇
製粉工業	一一	一〇、二〇〇、〇〇〇
硝子工業	九	四、九五〇、〇〇〇
糖精工業	三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燐寸工業	一〇	二、〇七五、〇〇〇
鹽造工業	一四	四、四七五、〇〇〇
煙草工業	五	三、五〇〇、〇〇〇
造船工業	四	二、七一二、〇〇〇
製麻工業	一	二、五〇〇、〇〇〇

皮革工業	二	二、五〇〇、〇〇〇
機械器具鐵工業及印刷業並製竹業	四〇	二〇、九六一、〇〇〇
石鹼蠟燭製造業	四	一、五六〇、〇〇〇
雜糧器具製造業	七	二、八八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七七	三四六、〇八三、〇〇〇

上列數字，係從大阪每日新聞社所出對支經濟資料一覽表上錄出。近年以來，各國資本家都爭先恐後的到中國來開設工廠，中國生活落伍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乃相率跑入外人所設工廠內，任外來的資本家剝削。此次滬變發生，滬上一隅中國工人自日人所設工廠中跑出者，便達六三、三九二人之多。（參看三月廿日申報）外人在華開設工廠至少有下列各種好處；一，原料容易吸收；二，製造品容易出賣；三，勞動價格低廉，因有這幾種好處，國際資本主義者乃爭先恐後的進來，他們進來的人愈多，中國套在世界社會關係中的工人也愈多。不過他們係以資本家的資格向中國內移，中國工人係以無產者的資格向世界社會中深入，一轉移間，世界的社會關係，固然日漸密切；但世界的階級對立，却也日漸顯明，橫的交接方成熟，縱的分裂已開端。此又最值得注意之事也。

二九、中國智識分子之新作用

中國智識分子之作用，因一般的社會關係之變動，而有種種之不同。在舊社會裏，他們的主要作用，在維持統治階級與被壓迫者之對立關係。使統治者，官僚，地主與農民，手工業者之間，不發生衝突。所以在農村中講道德，說仁義；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等德目宣示於衆，乃他們的主要工作。這個工作叫做維持風化；這個工作，一方面鞏固了統治階級的力量，另一方面，緩和了民衆的反抗。自從中國經濟發生變動以後，中國社會階級，乃漸漸開始重組：舊日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對立的關係，乃漸漸變而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關係。智識分子的作用，也隨着不同了；他們自身，都漸漸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直接或間接維持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關係。訓練資本主義生產制下的一切人材，闡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文化，維護資產階級的社會次序，都成了他們的主要工作。但他們這等工作，若放在世界社會關係裏去看，其意義却又變了。訓練資本主義生產制下的人材，同時却也培植了發展國際資本主義的人材；闡揚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同時就是宣傳帝國主義的文化；維護資產階級的社會次序，事實上無異維護國際資本主義者的社會次序。中國社會次序若混亂，民族資本主義者固蒙不利；而投了鉅資在華的國際資本主義者更蒙不利。資本主義的文化若不能闡明，則國際資本主義在

華勢力之擴充，將不若今日之神速。依同一理由，資本主義生產制下的人材多如過江之鱗，事實上都成了買辦的前身，都成了發展國際資本主義的後備軍。中國現在的人材或智識分子，無不直接間接成了發展國際資本主義的好工具。國際資本主義者初來中國時，中國農民對之殊無好感，且多仇視者。但自新教育一開，新人才輩出，這個風氣消滅了，這可以說是便利國際資本主義之起碼的一步。國際資本主義者要榨取中國工農的剩餘勞動，要與中國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要與中國當局成立友誼；高等智識分子，或留學外國歸來的學生，從中拉攏，出有大力；這是便利國際資本主義最成功的一步。其他直接間接的工作，舉不勝舉，且留到第五章裏去作一個概括的敘述。

三〇、本章總結

現在且將本章各節所述，作一個結束如下。(a)生產工具的獨佔，構成階級對立的基礎，階級既已對立了，榨取制度盛行。幾千年榨取的結果，社會上遂有一方面生產品過剩，另一方面人口過剩的怪現象。過剩的生產品，表現為地租剩餘產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幾於無處安置。過剩的人口，都成了生活落伍的農工或流氓無產者，無處圖存。直到最近，產業上發生了鉅變，這兩種剩餘的東西，才又漸漸開始結合。(b)最近的過去，中國因受了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壓迫，產業上發生鉅變；向來停滯在農村中的剩餘生產品，漸漸轉移到都市上來了，漸漸成了新式

生產事業的資本。隨着資本跑來都市上的，便有成千成萬的農工羣衆。他們跑到新式的生產制或資本主義的生產制下，都成了無產階級。至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漸漸開始代替官僚地主與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的對立。在這個重組的過程之中，向來擁護地主官僚以支配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的智識分子，亦漸變而爲擁護資產階級以支配無產階級的智識分子。(c)這樣的新階級之對立，恰恰存在於國際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中。從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上看去，中國的社會階級與世界的社會階級，日益密合。於是中國社會階級對立之局，漸漸與世界社會階級對立之局隨着密合起來。中國農工羣衆，固然是民族資本主義者榨取的對象；同時却也是國際資本主義者榨取的對象。民族資本主義者固然是剝削中國農工之剩餘勞動的，同時國際資本主義者更是剝削中國農工之剩餘勞動的。智識分子於此，其作用又生一度的變動，變動爲何？大家都成了買辦是也。目前中國的智識分子，無論所操的職業如何，都有直接或間接幫助國際資本主義以壓迫中國農工羣衆的嫌疑，替各國資本家當買辦的，固不必說；即站在政府裏作官，受各國資本家之代理人的頭指氣使的亦復如此。總括看來，經濟之世界的發展，固然把許多分離孤立的地方統一起來了；但階級關係之世界的發展，却使全世界成了兩個不能妥協的戰陣。換言之，橫的統一方告成，縱的分裂已開始。

此後縫的分裂能否消滅，須看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有無變更。

第四章 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政治

社會階級對立的局面，必須有種種工具來維持。中國因生產工具之被人獨占，搾取制度之盛行，階級對立之局老早就成立了。最近經濟的變動，雖使社會階級不得不重組；但階級對立之局，并不因而消滅，反之且日趨嚴重。與階級對立之局同時發展的政治與教育，恰恰成了維持階級次序的兩種強而有力的工具。本章先論政治；下章再論教育。

第一節 概論及史實的觀察

一、資產階級的政治論

要討論中國的政治，最宜先將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論及最近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論述一個大概，以資比較，資產階級的政治論，最關重要的，為國家之起源及國家之職能的種種學說。論國家之起源的有所謂神權說，(The Theory of Divine Origin) 此說以為一國

之君主的政治權力爲神所授予；神欲統治萬民，不得不建立君主，不得不假手於君主以施行統治工作，這種學說，在十九世紀之初，還盛行於歐洲；有名的神聖同盟條約中，還露有這種學說的痕跡。其次爲社會契約說（The Social Compact Theory），主張道說的，以盧梭霍布斯及洛克等爲最著名；按這說的大意講，政治制度，乃社會分子自動的同意，組成盟約的結果。社會分子藉盟約爲根據，把自己組成政治團體，從而有政治生活。又其次爲強力說（The Force Theory）此說以爲政治制度，乃強力的結果。人羣最初本是無政治組織的；但其中有一二傑出的，其體力超過尋常一般人；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把一般無政治組織的人，拖到自己勢力之下。這樣一來，無政治組織的，可以變成有政治組織的了。此外最使人信從的，有所謂歷史說或進化說（The Historical or Evolution Theory）此說頗反對契約說，以爲政治制度并非人類故意造成的，實歷史演進的結果。按主張這說最力的著名學者 Burdett 的意見，政治乃漸漸實現的法律組織；人類的私心，漸漸隸屬於公心；公心漸漸實現爲法律組織；於是政治制度告成。（參看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的第四章）這些學說幾乎都是出於資產階級學者的杜撰；都沒有找到國家之起源的真正來歷。神權說固然荒謬絕倫，即進化說，仍祇能於人類心理上找國家之根據，而不注意於經濟及社會的事實；仍

祇是似是而非的空論。

至於國家之職能或作用，資產階級的學者，也舉出了最重要的三種：（一）國家爲抵禦外侮的；（二）國家爲維持內部次序的。這兩種作用，資產階級的學者認爲是國家存在之基本理由。不過這兩種作用，都偏於消極方面，於是又加上一種新作用曰，（三）國家爲發展文化的。其實三者都極空洞，都祇是資產階級的學者騙人的理由；國家存在之真正理由，却另有所在。

二、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論

社會主義者之論政治，就不是這樣的了。他們以爲國家之出現，乃社會階級衝突，不能調和的結果，恩格斯有言曰：『國家并不是加於社會之上的一種另外的勢力；也不是什麼道德的實體或理性的實體，如黑格爾所主張者。國家乃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一種產物。國家之出現，實因社會自身已經進入了一個不能解決的矛盾；社會內部，發生了不能調和的衝突；同時社會自身又無力避免這些衝突和矛盾。爲着要和緩這些衝突和矛盾，使各階級不致因相反的利益，在激烈的鬥爭之中，互相摧殘，甚至犧牲社會全體；於是有類似超於社會之上的勢力出現。這勢力對於和緩社會內部的衝突和矛盾，并使之復歸於次序，是很必要的。這勢力原來出於社會之內；但出現以後，却翻到社會之上去了；後來更慢慢的與社會分立。這分立的勢力，

便是國家。」又曰：「國家必有獨立的公共武力。因社會已分裂爲許多階級了；原來人民自己的武力組織不中用了；不得不有公共的武力。這種武力，不獨包含許多武裝的分子，而且有許多物質的設備，型成監禁反叛分子的牢獄等等。」（大意，非直譯原文。）社會主義者之論國家及國家之起源是這樣的。現在我們再看他們論國家之職能或作用又怎樣。關於這一層，Nikolai Lenin 說：「國家乃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因爲既有超於社會之上的特殊公共勢力，則維持此種勢力之稅收及國債爲不可少。」官吏指揮公共勢力，有權徵收稅款，（恩格斯語）高居社會之上組成獨立的機關。氏族社會時代類此機關所享有的優待，在他們已不中用了。」現在特別法律，成了維持官吏權威的要件。現在的警察，比氏族社會時代人民的代表還有力些。……什麼東西把官吏安插在社會之上去的呢？這個問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會切實解決過。……「既然國家是爲着緩和階級衝突而發生的，既然國家之發生，是階級衝突的結果，那末最有勢力，及在經濟方面佔優越地位的階級，便是國家的主人；他們憑着政治的力量，可以變成在政治方面佔優越地位的階級；因此可得到新的方法以壓迫并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古代的國家及中世紀的封建國家，固然是剝削奴隸及農奴的機關；即現世的代議國家，亦復是憑資本以剝削勞動者的機關。……」「在民主共和國裏，（恩格斯語）

財富可以間接運用勢力；但正因間接運用，便有最大的效果。其運用之法，一則有錢者直接對官吏納賄；（如美國）二則政府與金融兌換機關結成聯盟。」（如法國與美國）以上所述，是社會主義者對國家之作用及國家之起源所持的理論。（參看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的第一章）歸納而言有三要點：一，國家之出現，由於社會階級之對立及衝突；二，國家之作用，祇在壓迫并剝削被壓迫的階級；三，國家出現了，便有高居社會之上的官吏，武力，以及其他一切協助國家權力之實施的物質設備。

三、中國政治的性質

中國政治、當然不是例外。上所述的三個要點，也都具備齊全。國家之出現也祇是由於社會階級之對立及衝突。中國由種族鬥爭到階級對立以後；國家制度，亦隨階級對立關係之尖銳化而漸進於鞏固。周初的時候，階級對立之局早成，所以當時便有極完整的國家制度。周禮一書，無論其為真或為假，都可以做這個事實的寫照：真則為事實的描寫，假則為思想的反映。自周至於今日，中國的國家制度無一個時代不是與階級對立之局相伴隨。其次，中國國家制度的作用，也祇在壓迫并剝削被壓迫的階級。被壓迫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依地租及稅款的形式，對統治階級提供剩餘勞動；統治階級全部的生活，都建在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上，

特權者官僚地主若離開了被壓迫階級，或被壓迫階級起而暴動時，他們的生活便立刻動搖起來。中國幾千年治亂興衰的歷史，祇是統治階級對被壓迫階級施行剝削的反映。再其次，國家制度既已出現了，高出社會之上的權力機關，以及一切協助國家權力之實施的物質設備，亦應有盡有；如政府的機關，官僚的組織，軍備的設置，監獄的建立，刑法的執行，無不具備。這些東西，本是統治階級剝削被壓迫階級所不可缺的。沒有這些東西，國家的權力，便不能表現；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作用，便不能發生。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典章制度，幾乎全部都是協助國家權力之實施的，全部都成了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國家之起原，作用及組織，固如上述。再從國家權力的分佈講，我們可得下列幾個要點；第一，因國家權力為統治階級裏的特權者所享有；特權者的成份為元首及其族屬與戚屬之膺有封號者；這些人與西方的貴族略相當；於是便有人稱中國的政治為貴族政治。第二，國家權力之實施，非特權者所能獨自為力，特權者想運用國家權力而有效，非雇請大批官僚不為功；於是官僚成了執行國家權力的專家，人們亦常因此稱中國的政治為官僚政治。第三，特權者與官僚以及與之相依的一切寄生分子都不是直接生產的，他們的生活，都建在農民的剩餘勞動上。農民之剩餘勞動，地主直接剝削的

最多。他們將所剝削的分一部份與政府，留一部份與自己。留一部份與自己，則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重要了；分一部份與政府，則自己在政府裏的地位重要了。在政府裏及在社會上都很重要，那末政府自然要借重他們；特權者與官僚，自然要依賴他們，至是國家權力，無形之中，被他們享有了一大半。因此遂又有人稱中國政治爲地主政治。總而言之，中國的政治，無論爲貴族的，或官僚的，或地主的，其爲剝削被壓迫階級之工具則一也。茲且將地主與政治的關係，作爲較詳之敘述如次。

四、地主政治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從好幾方面講，都可以說是地主政治。從特權者說罷。特權者原來都是有土地的；即或無土地，其生活也都間接建在地租上及國稅上，從官僚說罷。官僚原是地主出身；且既做了官，所食的仍是地租與國稅。再從地主本身說。他們真如葉水心所說，爲「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參看第一章第二節）整個政府所賴以生存的，一大半要靠他們剝削農民的剩餘勞動來維持。歷來政府之所以看重地主，就是爲此。除此以外，他們憑考試可以直接插入政府，或憑捐款，也可以直接插入政府。考試是特權者藉選拔人材之名義，與地主均分政權之一法。捐款是特權者藉廣闢財源之名義，與地主均分政權之一法。前者姑不具論；後者則有著名之「入粟補官」「捐監制度」可作寫照。捐監制度之前身爲入粟補官。入粟補官之事實，遠在明初就已有

了。且在明以前，宋元各代，也曾行過。這種制度，係隨各時代財政情形之好壞而或廢或興。大概在財政困難時，政府便採用捐監制度，以闢財源。宋甯宗嘉定十年（一二二七年）因對金作戰之故，曾募民納粟補官。金僖宗皇帝三年（一二四三年）因陝西旱饑，曾詔許富民入粟補官。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因水災，命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補官。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年）饒，信州飢，令民入粟補官。金大定元年（一一六一年）令民納粟補官；貞祐二年（一二二四年）又詔許諸人納粟買官；三年（一二一五年）更規定一種所謂勸率遷授格，以濟軍餉；并規定官民能勸諸人納粟五百十石者遷官一階。元大德十一年（一二〇七年）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飢；詔民能以私粟賑貸者量授以官。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各縣飢，令民入粟補官。明景泰四年（一四五三年）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上面所述種種，尙不能算爲純粹的「捐監制度」；一因人民（即地主）所捐者祇限於米粟；二因政府所授者祇限於官職。然最足以表明特權者與地主平分政權之意。至清代情形稍爲不同，人民所捐的改成銀兩了，政府所授的，除官職以外，多爲所謂「監生」的身分。有清二百年中，「捐監制度」頗有許多改變。嘉慶時，平民捐監，在京中的，每名納銀一百零八兩；在京外的，每名納銀一百兩。至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一概改爲一百二十兩；十一年（一八三一年）又一概改爲一百零

八兩。總計道光元年至三十年，各省捐望的人數以及捐出的銀兩，有如左表。

省別	人員數	銀兩數
山東	一〇、九五九	一、一六九、八三七
山西	六、〇三〇	六三八、六四〇
陝西	一一、七七七	一、二五七、〇三八
甘肅	三、一七七	四一〇、七二四
河南	二二、六六三	二、四一六、九六八
安徽	一五、六八四	一、六七六、九五〇
江甯道	一四、二八八	一、五一六、六一八
蘇州道	二〇、五八一	二、二〇六、五八二
浙江	三三、八六九	三、六三四、一一四
湖北	一九、九六〇	二、一二九、二八四
湖南	二七、七二三	三、〇二三、九九八
江西	三八、六四二	四、一四一、〇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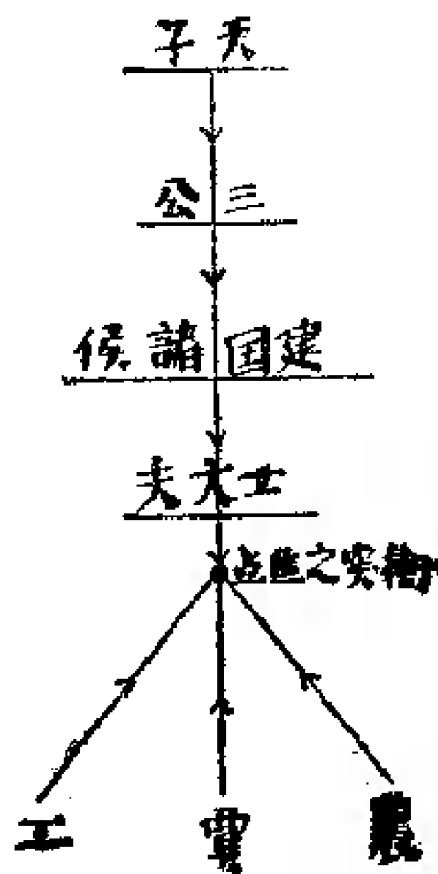
四川	一四、九六七	一、五九六、三九〇
雲南	四、〇八二	四三八、一三〇
貴州	三、二三五	三四八、七〇六
廣東	三八、二六四	四、一〇三、一四三
廣西	九、四七九	一、〇一七、九一四
福建	二〇、一三五	二、一六〇、五一四
總計	三一五、八二五	三三、八八六、六三〇

三十年中，捐監的人數，達三、一五、八二五！所捐的銀兩，達三三、八八六、六三〇！（參看北平社會調查所發行之社會科學雜誌第二卷第四期）人數與銀兩最多的地方爲浙江，江西與廣東。這或者是由於這幾省東佃關係發達，地主衆多之故，這幾省地主之衆多，可從佃農的比例數上反證出來。據前北平農商部的統計，（民六到民十）這三省佃農比例數最大。民六時，江西佃農，有百分之五七·七；浙江有百分之六七·〇；廣東有百分之六六·四，據嶺南大學調查，廣東東江十二縣平均佃農有百分之八五·〇！（參看拙著中國社會之變化一九七頁）在全國中爲最高的比例。佃農比例數既大，地主人數自然衆多。因之「捐監」的風氣特盛，以銀兩換取身分，希圖插入政府的地主少爺也特別的

多。這一個事實，正與英國資產階級以金錢報酬政府取得議員資格相當。資產階級於無形之中支配了政府，則政府便是資產階級的；地主於無形之中支配了政府，則政府便是地主的。

五、政治思想

政治的性質既然明白了，我們現在且進一步，來考察從實際政治上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思想。中國的政治，無論其為貴族的，或官僚的，或地主的，但總不外為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因之從這上面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也無非是一種階級次序的寫照。這種階級次序的寫照，我近來反覆考慮，頗與「禮」字相當。中國的「禮」字，其真正的內容，祇是階級的次序。禮樂記裏說：「樂統同，禮辨異。」禮所辨之異，正是指階級次序之不容混亂而言。莊子天下篇謂「禮以道行，樂以道和。」禮以道行，正是教人遵守階級次序而言。我們把「禮」字的內容解作階級次序，似頗武斷；但我們若拿荀子的話來對看，便不見得武斷了。荀子富國篇曰：「人君者，管分之樞也。」什麼叫做分呢？王霸篇裏說：「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辨治，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之大分，便是這樣的一套，這不是階級次序是什麼？這種階級次序，更可用圖表於下：



天子，三公，建國諸侯，略相當於貴族，或特權者；士大夫包括官僚與地主。特權者，官僚，地主構成一大營壘，為階級對立的一邊。農，工，賈（勢傾王侯的大商人除外）構成另一大營壘，為階級對立的另一邊。兩大營壘，互相對峙，互相衝突。黑圈處為兩邊衝突之焦點。中國的政治思想，自荀子以下，概在調和兩方的衝突上兜圈子；很少有倡為革命之說，以根本消滅階級對立及階級衝突的。尤以儒家的學說，為達到了調和論的頂點。董仲舒春秋繁露調均篇有言曰：「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

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

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制度，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這可以說是極明白曉暢的階級調和論；可與現代「勞資協調」說先後比美。雖然歷代也有些反對統治階級的；但其人多是不得志於統治階級的智識分子。發揮議論之時，早已成了高士或隱者，毫無鬥志。且其議論，都祇直接對統治階級本身進攻；絕沒有進一步攻擊統治階級所依靠之經濟基礎的。阮籍的大人先生傳是如此，鮑敬言的詰鮑篇是如此；黃宗羲的原法篇還是如此。

（參看拙著中國社會之結構二七一到二八〇頁）

六、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政制的進化

上面所述，係偏於理論方面的。現在且進一步，來略略敘述政治制度的進化。中國政治制度的進化，處處與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相因緣。（a）統治階級尚未凝固爲一整個之階級時，政制的形體亦未完全具備。自殷以前，至於周初，頗是如此。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有云：「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政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

也。待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爲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滅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爲諸侯之君。『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是政治形體不完備之證。天子諸侯君臣之分何以不定？則是因爲當時許多諸侯（實卽各種族中之酋長）尙在互爭雄長，政治尙停頓在酋長制之中；種族鬥爭之局尙未全消。統治階級本身之疑結不固，故政治的形體不完。』（b）統治階級內部鞏固，封建制度乃盛極一時。周自克殷踐奄，滅了許多舊國，把舊國之長一律肅清；同時建立許多新國，把周家的功臣昆弟甥舅一律作新國之長。這個滅舊建新的工作告成，統治階級內部乃忽臻鞏固。至是封建的政治制度，乃得一度完整。被封者之爵位，凡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分。其所受封的土地，也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別；大概公國與侯國都有百里之地，伯國有七十里，子國與男國都有五十里，其餘不滿五十里的叫做附庸之國。爵與土固然有一定，卽官職軍職等也都有一定。至若天子與諸侯之間，則憑巡守與朝覲以相聯絡。（c）統治階級再鞏固，封建制乃進而爲郡縣制。封建制度完整之日，却又是開始動搖之時。周室子孫受封之時，卽是周天子開始倒臺之日。秦始皇看透了這層道理，上台之始，就幹了廢封建爲郡縣的一件大事。在封建制下，被封者是領有土地的。但有了土

地，便是禍根；富強起來了，便各幹各的，不認得天子。始皇看透了這個事實之必然性；所以在他初併天下的時候，王琯請立諸子，以王燕，齊，荆等遠地，他便不信，同時反聽從廷尉李斯之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李斯之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族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勿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勸制。天下無異意，則安甯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甯息，豈不難哉？』始皇曉得戰鬥不休，是因爲有了侯王，那末沒有侯王，當然可以甯息。於是毅然決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設守以理民政，設尉以主兵柄，設監以司糾察。於是前此坐食一方的所謂公，侯，伯，子，男等沒有了；所有的祇是些由中央隨時設置的地方行政長官。

七、續前

(d) 漢鑑於秦之以孤立亡國，乃於郡縣制中雜行封建制。漢的郡縣制，與秦差不多；郡有太守，管治民，進賢，決訟，檢姦之事。春則巡回屬下諸縣；冬則決囚，并考察部吏的功勞之高下。縣，有令長；治萬戶以上之縣的曰令，治萬戶以下之縣的曰長。至武帝時，郡上又置州，共置有十二州之多。州有州牧，（初爲刺史）到後漢末年，州牧起來割據天下。竟與後來唐之藩

鎮差不多，但單祇郡縣制，恐不足以鞏固統治階級的力量。例如秦是單行郡縣制的。但始皇死後，羣雄蜂起割據，諸郡無守禦之力，竟至天下瓦解。漢高祖看清了這一點，乃於郡縣中間雜封建，大封諸王及功臣於各地，使與郡守雜處。凡皇子被封的叫做諸侯王，王子被封的叫做諸侯，其諸臣異姓之因功而受封的，叫做徹侯。總計封地將過天下之半，聲勢很大。景帝時，晁錯便倡行削地之策，卒至激起吳楚七國之亂。殆吳楚七國之亂平後，乃逐漸把封國之勢力削弱下來，終至存封建之名，而無其實。(e)事實逼成的「建而不封」或「名亡實存」之封建制。名亡實存之建封制，有許多實例可作說明，例如晚漢州牧，本是設來巡回屬下諸郡，監察郡守之行爲的。其土地初本受諸帝室，然非封建。到後來州牧竟把所受之土地任意傳諸自己的子孫；那便與封建無分別了。又如唐之節度使，本是設來安內攘外的；唐高宗末年，武曌二氏先後作亂，國勢傾危；諸外夷若回紇，若土蕃，若大食乘之，邊境又復擾亂。於是置十節度使以安內攘外。但安史亂後，節度使之聲勢日張，各統數州，手握兵馬大權，以賦稅自私，以土地傳子孫，隨意任免文武官吏，儼然地方之小皇帝。有時且彼此互相聯合以抗中央。這種情形，凡延至百餘年之久；到五季時才漸漸停息。歷史上稱此爲藩鎮之亂。所謂藩鎮，實即建而不封，或名亡實存之封建制。這種變相的封建，並不祇漢唐爲然。

遼時之東丹國王，元時出鎮遠方的諸王，以及明代出就藩封的諸王，都可以說襲取了變相的封建之意。續通考封建考有言曰：「遼之東丹，制度畢具，屹然各樹一國。元則幅員廣闊；諸王出鎮之地，悉能總其軍賦，辟置官僚。明之諸王，亦皆出就藩封，給以護衛；是皆有古者封建之餘意。」總括言之，漢之州牧，唐之節度使，元明之諸王；其設置本是爲着鞏固統治階級之整個力量的；但結果反足以分散統治階級整個的力量。此乃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之好例。（f）事實逼成的「封而不建」或「名存實亡」之封建制。「建而不封」或「名亡實存」之封建制，固出於事實；反之「封而不建」或「名存實亡」之封建制，亦是出於事實。皇朝文獻通考封建考說：「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建國之制不可行於三代以後，而三代之初，亦既不勝其弊。……顧封建之制不可行，而封建之制不可廢。以達懿親，以酬勳閥，率是道也。……蓋存封建之名，卽所以示封建之戒。後之考者，統觀而析辨之，則知封而不建，實萬禩不易之常法。而迂儒之矜言復古者，固未足以語上下千古之識也。」這段話中，真有上下千古之識，封建之制若行，則足分散統治階級內部之力量；反之，封建之制若廢，又不足以牢籠勳閥懿親。結果乃以封而不建爲常法。這層道理，明太祖亦老早知道。續通考封建考曰：「太祖既正大位，詔封衆子爲王；置傅相，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疆民，分土

而不建國。」讀此亦可知統治階級要消滅內部矛盾之煞費苦心；更可知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政制進化的關係之密切。

八、幾種政治的機括

上面所述，完全是就統治階級內部之鞏固與否，及政權之如何分配而言。但統治階級要鎮壓民衆，要剝削民衆，則除政權之適當分配外，尚須有極完備之政治機關。政治機關，就歷史上的情形看，最主要的，凡可以分爲三級，第一級中央機關，第二級各省機關；第三級各縣機關。且以前清爲例。前清中央機關之最重要者爲內閣。內閣的職責爲輔弼天子，贊襄庶政。有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內閣內包含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有尙書爲長官，侍郎爲次官，以分掌政務。所謂大學士及協辦大學士，例由各部尙書兼任。吏部掌中央與地方文官的銓敘，黜陟，與封爵等事。戶部掌歲入，歲出，及戶籍，鑄錢等事。禮部掌吉，凶，軍，賓，嘉五禮的秩序及學校貢舉的事。兵部掌中央與地方武官的銓選，及儲藏軍實等事。刑部掌法律刑名。工部掌全國的工虞器用。及辨物庶材等事。凡各部提出來的表章，概須經由內閣轉達天子親裁。天子親裁之後，又由內閣指令各部實行。內閣之地位，頗爲重要。後來添設軍機處，軍務機要，概歸軍機處辦理；內閣所管的，祇是例行的公事。至於祕密的軍務，則由軍機處直接指令內外

實行，內閣差不多等於虛設。各省機關的重要官員如下：每省有巡撫一人，統轄一省的軍務，監督民治，節制總兵以下的文武官員。有布政使一人，掌全省錢谷的出納，有按察使一人，掌全省的法律及治獄等事。有道臺一人，管糧儲或鹽法，驛傳或兵備，海關或巡守等專務；并監督省以下各府廳、州，縣的行政。縣政治機關，便是縣知事衙門。縣知事爲親民之官，管行政，民事訴訟賦稅等事，大概說來，全國的政治機關似可分爲中央與各省及各縣等三級。但嚴格說來，實可以分爲六級。縣之下尚有土豪劣紳所組成的鄉鎮機關。縣知事名爲親民之官，實則所親的，祇是土豪劣紳。土豪劣紳，可以說是真正的親民之官；他們受縣知事的頤指氣使，可以橫行鄉里，直接進行統治階級全體剝削民衆及支配民衆的工作。縣之上，省之下有府廳、州。府有知府，廳有同知，州有知州，各管以縣；都位於省與縣之間，而爲另一級。省之上更有總督，每一個總督，兼管兩省或三省。總督的職務，在統轄軍務，監督民治，節制文武官員。總括言之，恰爲六級，中央爲一級，總督爲一級，省爲一級，府廳州爲一級，縣爲一級，鄉鎮爲一級。政治機關，層層設置，自中央以至鄉鎮，恰恰構成一架總機器。專門研究這架機器之組織的，可以稱之爲「治法。」善於運用這架機器的人，可以稱之爲「治人。」這架機器在民衆方面，凡有兩個意義：就政治言，爲鎮壓民衆的機

器；就經濟言，爲剝削民衆的機器。統治階級的生存，全恃有這一架機器。這一架機器之分爲若干等，完全看牠能否顯出作用，完全看牠自身能否鞏固而定。歷代政治機關之分爲五級或四級或三級，都是以其能否發生效用爲理由。

九、社會階級相互的衝突與政權的動搖

政治機關組織的完備，其自身就伏了瓦解之因。

因爲政治機關祇是表現政治權力的；政治機關愈完備，政治權力便愈易行使。政治權力愈易行使，則愈易逼出被壓迫階級的暴動，而使政權動搖。中國歷史上之一治一亂，便是這一個事實的寫照。被壓迫階級的暴動，我們在第一章第二節裏曾講過。這些暴動，從某一方面講，可以說是統治階級壓迫民衆的最後結果。每朝統治階級創業之始，因自身係從艱苦奮鬥中出來的，頗能勵精圖治。選賢舉能，把所謂「治人」「治法」找出來；修明政治，把所謂「治法」找出來。「治人」「治法」都找出來了，政治權力，得暢快的行使，於是造成一代的盛業。但正在盛業之下，其子孫因享慣了現成幸福，未經過艱苦，統治能力，完全喪失，同時因窮奢極慾過慣了，又不得不厚斂於民衆。到這時候，往日的所謂「治人」「治法」，一變而爲「亂人」「亂法」。換言之，所有官僚，所有制度，都成了促成內亂的因子。這時候的民衆，在高度的壓迫及剝削之下；倘再加以旱災，水災，蝗蟲等

的襲擊，以及從來被擠在生產關係之外的所謂「盜匪」（實即生活落伍的農民）的煽動；便大規模的暴動起來。暴動的對象，無疑的是統治階級全體；所以每到一處，必陷城邑，殺官僚，焚燒豪富之家的房舍。這城邑被陷落了，官僚被殺了，豪富之家被焚燒了；於是統治階級在當地的政治權力，乃化成烏有。起來代替的，當然又有新的政治權力。新的政治權力，果屬於參加暴動的民衆，抑屬於當時出來趁火打劫的野心家，我們且不管；但原有的政權，因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一度激烈衝突而動搖，而破碎，而消滅，却是顯明的事實。

一〇、

清政權之動搖與新政權之難產

歷代政權的動搖，都是統治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互相衝突的結果。所以每逢政權動搖之時，社會次序雖極混亂；殺人流血的慘事，雖不知要經過多少；然經過若干時之後，便有新統治階級出而建立新政權。且新政權在樹立之初期內，照例非常鞏固，因之每朝初年，照例有一番盛業，照例有一段光輝燦爛之歷史。這是徵諸史實而無誤的。祇有清末政權動搖之後，情形就大不相同：直到今日，尙無一鞏固之政權出現；所謂盛業，更是沒有。這究竟由於什麼原故？反覆推究，有一個原故：即帝國主義的內侵是也。滿清政權開始動搖之時，正是帝國主義在華發展勢力之時。滿清政權固然在被壓迫階級之眼中呈動搖之象，同時還在帝國主義者眼

中呈動搖之象。在被壓迫者眼中所呈動搖之象，其意義祇是在同社會內一個階級不能鎮壓另一個階級；在帝國主義者眼中所呈動搖之象，其意義却是在異國間，一個國家不能應付另一個國家。帝國主義者要在中國發展勢力，對滿清統治階級盡量威脅；被壓迫階級要中國尋自己的出路，對滿清統治階級也不得不盡量威脅。一個滿清政權，受內外兩方的壓迫，終於倒了。但正因為他是受內外兩方的壓迫而倒，新政權乃始終不能鞏固，不能健全。此中曲折，頗值得多講幾句。（1）被壓迫階級要樹立一個自己的政權，帝國主義者要維持一個自己的政權，兩相爭執，新政權乃不能健全鞏固。（2）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事實上是占了勝利的；要包辦一個政權，本是可能的事；但許多帝國主義者彼此之間有衝突，包辦亦常感不能稱心如意。（3）被壓迫階級，倘內部不分化。同以打倒帝國主義為目的，新的健全鞏固之政權，自然較易實現。不幸其中有一部分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又使新政權之樹立，不得不延期。（4）因此種種，軍閥政權，乃成了過渡時代之必然產物。軍閥政權有一個特別作用：代替帝國主義執行壓迫中國農工的任務是也。這個政權的表現機關，曰軍閥政府，且於下節約略論之。

第二節 軍閥政治成立之經過

一一、舊政權的動搖，及對帝國主義的爭扎

舊政權正在動搖之時，一方面受着民主勢力的威脅，另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威脅，更見岌岌可危，不能終日。其受帝國主義威脅的事實，近數十年的中國史，便是赤裸裸的寫照。茲且摘錄康有爲保國會演說詞的一段，以示舊統治階級不得不對帝國主義爭扎的實在情形。康云：我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溺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爲奴隸，爲牛馬，爲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忍言者也……近復有膠州之事，四十日之間，要挾逼迫者二十一事：一，德之強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則英欲借我款，三釐起息，而俄不許矣；其三，欲開大連灣通商，俄不許矣；其四，欲開南甯通商，俄不許矣；其五，借英款不成，而內河全許駛行輪船矣；其六，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借款十萬矣；其七，盤協贊調補山東道，德入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八，津鎮鐵路通山東，三電德廷，德不許矣；其九，改道過河南，德亦不許，後請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十，新軍請俄教習，而謂明不歸

統領節制矣；其十一，俄教習去留，須候俄皇旨矣；其十二，俄人勸導德教習四人矣；其十三，直隸，山西，東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矣；其十四，長江左右厘金，盡歸稅務司矣；其十五，德人既得膠州百里，復索增廣矣；其十六，既得增廣，又索鐵路矣；其十七，既得鐵路，又索全省矣；其十八，既得鐵路，又得全省商務矣；其十九，俄人要割旅順大連灣金州矣；其二十，法人索廣州灣，又訂兩廣雲貴不得讓與他國矣。此皆今年二月以前（即戊戌年二月以前。戊戌年即一八九八年）之事，其此後，英之索威海，日本之訂福建不得讓與別國等事，尚未計及也。夫路待商之德廷，道員聽其留逐，是皇上之權已失。買館所謂何忍以帝皇尊號，爲戎人諸侯。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轉錄自中華書局出版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下冊）從這段演說詞裏，可以看出舊政權之動搖在帝國主義威脅之下，危險到了什麼程度。

舊政權的動搖，危險到了這步。當時滿清統治階級最後之爭扎的準備果如何？康氏演說詞中也有一段很好的描寫：「甲午之後，仍不變法，間有一二，徒爲具文。即如海軍，電線，鐵路，船局，船廠，間效一二，然變其甲不變其乙，變其一不變其二，牽連相累，必至無成。其他且勿論；即如被創之後，而兵革常備，鐵艦不再購一艘，吾練營兵六十餘萬，八旗兵三十餘萬，實皆老弱，且

皆有業。托名伍籍中。泰西以民爲兵。吾則以兵爲民，何以敵之？」帝國主義的威脅既如彼其緊迫，自己爭扎的準備，又如此其單薄：那末唯一的出路祇有對外作軍事的預備。這種準備，可拿鴻章所上籌備防海的奏摺作一個總描寫。該摺係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所上，中有一段曰：「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見以求實際而已。何以言之？歷代籌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之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廣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惟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幻變如此，而猶欲以成法制之；譬如醫者療病，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庚申以後，夷勢駸駸內向，瀟海冠帶之備，莫不發憤慷慨，爭言驅逐；局外之營議，既不悉局中之艱難。及詢以自強何術，則茫然靡所依據。臣於洋務，涉歷既久，見聞較廣，於彼長短相形之處，知之較悉。而環顧當世，餉力人才，實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牽於衆議，雖欲振奮而未由。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總上所述看來，可得下之結論：一，舊政權開始動搖之時，帝國主義乘機威脅；二，在威脅之中，舊政權更瀕於危險。三，舊統治階級毫無爭扎的準備。

備。四、欲作最後的爭扎，仍祇有自己振奮，才是辦法。自己振奮的要務，厥爲對外作軍事準備。

一二、對外的軍事準備

在對外的軍事準備之先，滿清的統治階級，原也養有許多兵。以作鞏固政權之用。這些兵，可以分爲三種：第一，八旗。八旗原爲皇帝的親兵，創始於清太祖之時。後來滿清攻克蒙古，佔領中國本部，又編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其主要作用，在護衛京師，及駐防地方。每旗有都統及副都統以統轄之。第二，綠營。綠營是滿清統治階級編訓漢人以駐劄各省及邊疆的，是一種折衝外侮，鎮撫內亂的常備兵，有提督總兵以指揮之。第三，鄉勇，旗兵，及番兵。鄉勇乃設於中國本部的一種義勇兵。始於嘉慶年間，係爲討伐所謂教匪而設的。後來太平天國事起，曾國藩募集義勇軍奏了奇功。自是以後漸漸成了常備兵。旗兵乃蒙古部落中的一種民兵。將內蒙古分爲四十九旗，外蒙古分爲八十六旗，青海分爲二十九旗，使各各担任地方的警備。番兵，則用西藏土人組織以警備西藏的一種傭兵。但這些兵，姑無論是護衛京師的私兵，或抵禦外侮之漢兵，或維持地方次序的民兵鄉勇，都是完全的舊式軍隊。若與帝國主義者的軍隊相接觸，真如以卵投石。然事實上帝國主義者的軍隊却正在進逼，非從事於新的軍事準備不可。總括滿清統治階級對外的新軍再準備，約有下之數端。第一增設水師。水師之增設，始於滿清末年，

共有北洋，南洋，長江，福建，廣東五水師。北洋水師，屬於北洋通商大臣。南洋水師，屬於南洋通商大臣。（當時北洋通商大臣，係直隸總督的兼職；南洋通商大臣，係兩江總督的兼職。總督兼通商大臣，更兼管水師。政治外交軍事集於一身，可見清末官僚地位之重要。袁世凱利用民主勢力，威脅滿清統治階級，把自己造成軍閥的總頭子，也是這樣的重要地位使然）長江水師，屬於長江水師提督；福建水師，屬於閩浙總督；廣東水師，屬於兩廣總督；在北京則有海軍衙門，以統轄各水師，并總理海軍事務。第二，發展軍用工業。單祇有兵，而無物質的設備，依然不中用。因此軍用工業重要了。軍用工業的發展以同治元年（一八六一年）到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爲最盛。現在國內規模較大的兵工廠，造船廠，差不多都成於這二十年之內。例如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曾國藩設江南造船廠；五年，左宗棠設福州船政局；六年，李鴻章設江南製造局；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丁寶楨設四川兵工廠。凡此都是最基本的軍事準備。第三，軍事人材的培植。培植人材的方法。除派人直接到外國學習軍事外，最要的便是自己開設學堂，以訓練人材。所以左宗棠督閩時，便在福建船政局裏附設一個船政學堂，以便講習船政；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北洋水師學堂也成立了，內分駕駛管輪兩科。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天津武備學堂也成立了，其規制概仿歐美陸

軍學校。光緒十三年，廣東水師學堂也成立了；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湖北武備學堂也成立了，其辦法與北洋水師學堂及天津武備學堂相同。凡此都是從人材方面對外作軍事準備。

一三、軍閥勢力之系統的發展

帝國主義的壓迫愈加緊，滿清統治階級的準備愈認真。但正在認真準備之中，軍閥勢力便開始發展。（a）軍閥究竟是什麼？這並沒有人下過定義。我們爲方便起見，可勉強定其義曰：無惡不作，絕無所屬之軍事領袖，即爲軍閥。軍事領袖所帶的軍隊，所管的士兵，萬不可與軍閥混爲一談；士兵祇是生活落伍的農工；偶爾被人編成隊伍，遂成了私人的工具。至於軍閥之稱，到底祇限於軍事領袖。軍事領袖，倘有所屬，爲某一部份社會勢力所支配，所指揮；也不過是他人的工具而已，不能叫做軍閥。例如英美的軍事領袖，是資本家的工具，意大利的軍事領袖是法西斯黨的工具，都不必稱之爲軍閥。祇有中國的軍事領袖，除受制於帝國主義者外，絕無所屬。滿清的統治階級早已倒了；所謂民主勢力，并未達到足以支配軍事的程度；至於新興的資產階級，自身尙未健全。因之中國的軍事領袖，在帝國主義者眼中，固然是良好的工具，在中國人自己的眼中，却是絕無所屬的東西。既無所屬，便無惡不作；於是廣布爪牙，提拔走狗，爲之經營一切。可以管民政，可以管財政，可以管教育，可以管建設，可以管其他等等。整個政治，

都成了軍、領袖的私事。軍事領袖運用政治盡量壓迫民衆，剝削民衆；至是乃成軍閥。其所屬的一切勢力，也就成了軍閥勢力。（b）北洋軍閥勢力之系統的發展。中國之有新軍，自北洋編練新軍始。甲午一役以後，湘淮軍潰敗，滿清統治階級覺得練新軍爲必要，於是命胡燏棻開始練新軍，初成定武軍十營於天津；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由袁世凱統率，駐於天津南之小站；（後有小站練兵之稱）以武備學堂畢業生爲軍官，兵制悉仿德人。這可以說是北洋軍閥勢力發展之序幕。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袁世凱被任爲直隸督總，兼北洋大臣（即通商大臣，爲華北最高之外交官）小站兵的勢力乃逐漸擴大。至三十一年，練成的北洋新軍竟達六鎮之多。是年秋季，并在河間舉行秋操。北洋陸軍之聲譽，一時傳遍全國。光緒三十二年，中央成立陸軍部，定全國軍額爲三十六鎮。三十三年，除北洋六鎮外，湖北南京，各成一鎮。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成第九鎮，及第六混成協。二年，成第十二鎮及第十九混成協，三年，成第十六鎮及第十六混成協。單在直，魯，豫，及東三省的，便有八鎮之多。當時除禁衛軍、及吉林之第二十三鎮，與黑龍江之混成協外，其餘通是袁世凱的部下！（c）北洋軍練成了，乃開始分布於各省。光緒三十二年，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調第三鎮之第五協赴奉天；三十三年，又從二四兩鎮中抽撥六營爲第二混成協駐奉天；同時第三鎮

亦分防吉林。這是北洋勢力向東北的發展。至於向其他各處的發展，則更有可觀。二次革命時，袁世凱以何宗蓮率第一師駐察哈爾，以王占元之第二師及褚恩榮之第二混成旅鎮武漢；以曹錕之第三師，及馮國璋之第二十師駐岳州，靳雲鵬之第五師及新成立之四十七旅駐山東；以李純率第六師及第二師之一部攻江西；以馮國璋率禁衛軍雷震春之第七師，劉詢之直隸第一混成旅及第五師之第十旅，與第二十師之七十九團攻南京；以第四師之一部守上海；旋派第四師之十四團赴福建，於是上自湖北，下至浙閩，均爲袁世凱軍隊駐防地，北洋勢力遂侵入東南。(d)北洋軍閥勢力漸漸布滿全國，同時各省所練新軍，因民主政權未能完全建立之故，也無不直接間接向軍閥之路上狂奔。自民國初元以來，中國竟完全爲軍閥所統治。

一四、舊政權的動搖及對民主勢力的爭扎

帝國主義威脅舊政權，其結果僅促成了軍閥勢力。民主勢力威脅舊政權，其結果却推倒了滿清政權。但滿清政權被推倒之日，即軍閥勢力漸漸抬頭之時。民主勢力活動之結果，竟成了軍閥抬頭之好機會。軍閥勢力之發展，好像是預定接收滿清政權的！帝國主義之威脅舊政權，及軍閥勢力之發展，略如上述。若民主勢力之威脅舊政權，及舊政權如何轉移到軍閥之手，也當有一個大略的說明。什麼叫做民主勢力？這我們可以作一個總解答。

曰，凡努力於「恢復中華，創立民國」這是同盟會內的誓詞，當可視作正確的解答。）的種種勢力，都可以稱之爲民主勢力。這種勢力之形成，乃由於三種最大的壓迫；第一滿族對漢族的壓迫。同盟會誓詞上所謂「驅逐殘虜，恢復中華，」便是這種壓迫的反映。第二爲統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同盟會誓詞上所謂「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便是這種壓迫的反映。第三爲帝國主義的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在滿清統治階級眼中，固然是一種極大的威脅，在中國人民眼中，也是一種極大的威脅，統治階級怕帝國主義消滅自己的政權；人民則怕帝國主義滅亡中華民族。所以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是促成民主勢力的。

民主勢力被這些壓力醞釀成了，乃因轉頭來向這些壓力反攻。首當反攻之衝的，便是滿清統治階級的舊政權，民國成立以前的幾年之內，這種反攻的事實，差不多年年都有。但都被滿清統治階級鎮壓下來了。茲且列成左表以爲證。

年代	事實	結果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	孫文起事於廣州	失敗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	鄭士良謀取惠州	被粵督擊散

同年

史堅如謀刺事督

不中，史發覺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

吳樾炸五大臣

不中，樹死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

黃岡會黨起爭

不成

同年五月

徐錫齡殺徐撫

皖撫恩銘死

同年七月

黃興起事於欽州

敗潰

同年十月

孫文起事鎮南關

為陸榮廷所扼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

黃興起事河口

為滇軍所平

同年十月

熊成基起事安慶

為姜桂題擊散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正月

倪映典起事廣州

為水師提督所平

宣統二年三月

汪兆銘炸攝政王

事洩汪下獄

宣統三年九月

黃興起事廣州

黨人死七十二

同年

溫生才刺李琦

李琦死

同年

陳敬撫刺李準

李準

上列種種事實，都是民主勢力威脅滿清統治階級舊政權之事實。同時也是滿清統治階級為要維

持自己垂死之政權，對民主勢力作最後之爭扎的事實。

一五、民主勢力之主要成分

敘述至此，最宜把所謂民主勢力之主要成分，提出略爲一談。民主勢力之主要成分，凡有三種：（一）爲會黨的勢力。會黨完全爲滿清統治階級壓迫出來的一種結果；最初之主要目的，在反清復明，領導之者多爲士大夫。積時既久，被壓迫的農工加入的亦很多，遂成了強有力的反統治階級的團體。這等團體，與同盟會結合，復成了民主勢力的主要成分。同盟會與會黨之結合，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一文中曾曰「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并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會黨之担任實際的革命工作，有許多例證。如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七月，鄭士良謀起事於惠州，所率領之衆，便是會黨中人。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萍醴事起，革命軍與清兵苦戰，幾乎全然是會黨中人幹的。孫中山在有志竟成裏還有一段話曰：「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以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并合於興中會之事也。」這更是同盟會與會黨

結合之明證，也是會黨爲民主勢力之成分的明證。(二)爲智識分子。同盟會中的智識分子，差不多完全是留學國外的學生。以經濟地位論，多是地主家中之子弟。不過他們的經濟地位雖優，然他們因在外留學之故，英美各國的民主思想，先到他們的腦中。同時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兇狠，他們看得較透。再加以仇視滿清統治階級的心理，他們乃不期然而然的成了民主勢力的重心。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上又說：「庚子失敗（指光緒二十六年惠州的失敗而言）之後，……有志之士，多爲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爲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戴元成，沈虬齋，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和於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乙未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多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蔡君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六十餘

人；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監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唯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由這些話看，我們可知智識分子在民主勢力中，佔何等地位了。（三）爲華僑，華僑也爲民主勢力中之主要成分，其在民主勢力中之地位，值得特別敘述。（四）爲紳商，這一部份人，可拿川鄂湘粵四省保路同志會的人作代表。這些人完全是地主及富商大賈。他們因投了資本於鐵路也可以稱爲現代的資本家。

一六、華僑在民主勢力中之地位

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現仍以孫中山的話爲證，孫說：「……予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有志竟成）華僑爲什麼贊成革命，贊成推倒滿清統治階級的政權？其意義與會黨及智識分子之贊成革命稍稍不同。會黨之贊成革命，有兩個較爲重要的意義：一，以漢族的資格反抗滿族；二，以被壓迫者的資格反抗統治階級。智識分子之贊成革命，也有兩個較

爲重要的意義；一，以漢族的資格反抗滿族；二，以中華民族的資格，反抗帝國主義，因要推倒腐敗不能有爲的滿清統治階級，才可以奮發圖強，以抗帝國主義也。至若華僑之贊成革命，主要的意義，爲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因身居國外，反滿族的情緒不高，反統治階級的情緒也不高，唯反帝國主義之情緒較高；蓋帝國主義爲直接壓迫他們者。因要反帝國主義，以爲腐敗的滿清統治階級若被推倒，祖國一旦強盛，便可以達到目的，故贊成革命。華僑對革命的實際工作，厥爲捐款。孫中山謂「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提岸之黃景南也，傾其一生之蓄積數千元，盡獻之軍用，誠難能可貴也。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峯，曾錫周，馬培生等三人，曾各出資數萬，亦當時未易多見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倪映典等失敗於廣州時，孫正在檳榔嶼。當時他爲再圖繼起之故「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舉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驟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途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千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見有志竟成）華僑對於革命究竟捐過好多款，實在無法知道。但爲數很多，則可斷言。例如黃花岡一役，據胡漢民在事先的預算，需費約十二萬元。另預備費約數萬元，而華僑捐款，重要的有左列各款：

英屬南洋	五萬元
爪哇泗水	五萬元
又	一萬元
荷屬總共	三萬元
美洲城多利教公堂	三萬三千元
溫哥華教公堂	一萬九千元
滿得可卑	一萬一千元
金山	一萬元
檀香山	二千元
紐約	二千餘元

祇此一事，籌備捐款便有如此之多。（二十一萬五千餘元）其他所捐之款，倘能查出實數，其數最一定很大。（上列數目，見胡漢民廣州三月廿九之役報告書）

一七、辛亥革命與滿清政權之瓦解

民主勢力經過數十年的醞釀，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八月居然得到一次極大的成功，當八月初旬，武漢間有革命黨約期舉事之風傳；鄂督瑞澂

惶恐極了，先後捕獲黨人三十二人槍決之。革命黨人，因被捕者日衆，事機迫切，乃於十九日夜突然舉事，攻楚望台，佔軍械局，並進攻督署，結果瑞澂及其所屬官吏一概逃走。瑞澂逃走之後，革命軍佔駐了武昌，乃公推譚成協黎元洪爲都督，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以黃帝紀元出示安民。部署略定，分遣軍隊，佔領漢口漢陽及兵工廠。同時照會各國領事轉呈各國政府恪守中立。領事團果宣告中立，認革命軍爲交戰團體。至是，所謂武昌革命，乃完全成功，軍政府組織之後各省聞風響應，紛紛獨立，脫離清廷，與軍政府取一致行動。爲時未及一月，民軍勢力範圍，已達全國三分之二。茲將各地宣布獨立的日期列表於左。

地方	日期	人物
長沙	九月初一日	焦達峯（會黨首領）
九江	九月初二日	馬融寰（新軍統領）
西安	九月初四日	張鳳閣（新軍管帶）
太原	九月初九日	閻錫山（新軍協統）
雲南	九月初九日	蔡謨（新軍協統）
南昌	九月初十日	吳介璋（新軍協統）

上海	九月十三日	陳其美(民黨)
蘇州	九月十四日	程德全(江蘇巡撫)
杭州	九月十四日	湯壽潛
廣西	九月十六日	沈秉堃(廣西巡撫)
安慶	九月十八日	朱家寶(安徽巡撫)
福州	九月十八日	孫道仁(新軍協統)
廣州	九月十九日	胡漢民(民黨)
山東	九月廿三日	孫寶琦(山東巡撫)
四川	十月初七日	蒲殿俊(諮議局議長)
甘肅	十一月十八	

獨立的既然多了，各省乃推派代表於九月底集議於上海，名曰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決設立臨時政府於南京。十一月初十日，開臨時總統選舉會，到會代表十七省，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爲臨時總統；中華民國於以成立。中華民國元年元日(即舊歷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赴南京就臨時總統之職。南京政府已成立了，滿清統治階級仍不肯下台，仍不打算把政權交出。親貴如良弼，鐵

良，載瀾，載洵，載澤，善耆等尙復結成所謂宗社黨，希圖苟延殘喘。但後來良弼被彭家珍炸死，親貴乃驚恐萬狀，相與向青島、大連等處狂逃。段祺瑞等復聯合通電，贊成共和，事機更不許滿清統治階級戀棧。舊歷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一日）滿清統治階級裏的特權者或親貴乃接受中華民國之優待條件，實行退位。同時并命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自是以後，乃進入孫中山所領導之民主勢力與袁世凱所領導之軍閥勢力互相衝突之時代。

一八、民主勢力與軍閥勢力之衝突

滿清統治權瓦解之日，本民主勢力抬頭之時；但民主勢力抬頭之時，又恰恰是軍閥勢力長成之日。於是從滿清統治階級手裏取得的政權，僅在民主運動者之手中來往一次，隨即又轉入軍閥手中去了。自清帝退位後，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即通電南京臨時政府，發表政見贊成共和。這一次通電，無異於袁氏向臨時政府要求獨攬政權。當時民主勢力爲軍閥勢力所威脅，祇好把剛剛取得之政權，讓給袁氏。故袁電發出之次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向參議院辭職，并代薦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元年二月十五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選舉的結果，袁世凱果然當選爲臨時大總統。袁氏既當選爲臨時大總統了，乃以軍閥領袖的資格，開始向民主勢力進攻，與民主勢力相衝突。衝突之事實的表現，凡有種種；茲舉一二如次：（一）國都問題與兵變。

袁氏既當選爲臨時大總統，乃藉口鎮守北京，不肯南下就職。而南京的政府，亦不肯移到北京，以遷就他一個人。於是所謂國都問題發生，一時爭執頗烈。民黨的意思，本想奠都南京，誘袁氏南下，以孤其勢。袁亦深知此意，亦決不自入牢籠。當時民黨派蔡元培汪兆銘赴北京，歡迎袁氏南下就職。他倆於二月二十七日抵北京，二十九日夜，北京軍隊忽然譁變；三月一日，天津保定軍隊繼變。至是袁世凱更可以藉口鎮守北京，不南下了。事實如此，三月初六日，參議院乃議決允袁在北京就職。民主勢力與軍閥勢力剛開始衝突，優勢便讓軍閥佔去了。(二)總統與內閣之爭。袁世凱爲總統之初，以唐紹儀組織內閣。唐本爲袁系人物，後來加入了同盟會，與袁意見便漸漸不相投了。兩人意見既不相投，而臨時約法上所採取的內閣制，係法國的責任內閣制，內閣總理有處理國務的全權。這於袁氏，便不利了。於是總統與內閣之爭開始。唐以自己係責任內閣的總理，既不能行使職權，(例如唐委王芝祥爲直督，袁世凱可以不顧，另委王到南京去遣散軍隊。)乃憤而辭職。唐去後，復由陸徵祥組織所謂超然內閣。那知不久陸又倒了。最後乃由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內閣，趙爲袁之私黨，可以頤指氣使。至是總統與內閣之爭，一般人所稱府院之爭，總統府與國務院之爭，也讓軍閥佔了優勢。(三)二次革命。袁氏當國，處處壓抑民主勢力，與國民黨爲難。國民黨已恨極了。

乃二年三月二十日，忽有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之事。宋爲民黨要人，初主政黨內閣，因其說不能實現。乃辭去農林總長。下野後，沿江而東，經湘、鄂、皖，南諸地，演說其主張，且時暴政府之短，遂爲袁所忌而被刺。宋被刺之後，民主勢力與軍閥勢力更不能合作了。於是國民黨系之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及前南京留守黃興等，對袁氏深致不滿，時有反對之言。袁爲先修制人計，遂免去三督職，并遣駐鄂北軍司令李純移駐九江之沙河鎮，以備萬一。月十二日，李純之軍隊遂與贛軍林虎部衝突，於是李烈鈞舉兵湖口，黃興入駐南京，安徽，福建，廣東，湖南相繼而起，號曰「討袁軍。」并令冷遹扼守徐州，防北兵南下；陳其美等在滬舉兵，圍攻製造局：一時聲勢頗爲浩大。袁世凱對此，乃派段芝貴統第一軍，馮國璋統第二軍，南下討伐，號曰「國軍。」七月二十五日，段芝貴會同湯壽潛之艦隊取有湖口，討袁軍之勢大減。同時陳其美攻製造局亦不得手。八月十八，袁世凱之軍隊入南昌，江西安徽全定。九月一日，張勳所統江防軍入南京。南京亦定。陳炯明在廣東獨立未久，亦被逐走香港，廣東爲龍濟光所據。湖南譚延闓，福建孫道仁，均以形勢不利，取消獨立。熊武在重慶亦不能立足。二次革命，至是遂完全被鎮壓下來了。蔓延六七省。有衆數十萬之民主勢力，竟敵不過軍閥勢力。

一九、軍閥政權之確立

軍閥勢力既把民主勢力鎮壓下去了，袁世凱乃得爲所欲爲；爲時不到一年，軍閥政權，乃得完全確立，軍閥政權之得到確立，凡經過幾個階段：第一建立正式政府的階段，第二解散國會的階段，第三修改臨時約法的階段，（a）在第一階段內，有兩事值得注意。一爲國會之先舉總統，後製憲法。二爲公民團之包圍總統選舉會，強迫選袁世凱爲正式總統，原來祇是臨時總統。袁之爲臨時總統係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臨時政府之組織大綱，後改爲臨時約法，照臨時約法之規定，國會應先製憲法後選總統。但等到憲法製定後，再依法來選舉總統，需時未免太久，於是乃有先舉總統後製憲法之議。二年（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二日，開參衆兩院聯合會議決，由憲法起草委員會，先製定憲法中之總統選舉法，由憲法會議自行宣布。選舉法宣布後，參衆兩院，組織總統選舉會，假衆議院議場，開選舉大總統大會，當時會場外，忽有自號公民團者，包圍議場，強迫即時選出衆所屬望之總統，議員投票，殊不自由，因被迫選出袁世凱爲正式大總統，便是正式政府以代替臨時政府，（b）在第二階段內也有兩事值得注意。第一爲憲法草案之爭執：第二爲國會之解散，袁世凱就正式總統後，即咨憲法會議爭憲法公布權，主張憲法由總統公布，當時憲法會議，在北京天壇祈年殿製憲，十月三十一日，製定憲法，人謂之天壇憲法。袁世凱以所訂憲

法，不合己意，初則遣政府委員八人，要求出席憲法會議，陳述意見，憲法會議拒之，繼則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反對憲法草案，謂國民黨議員干涉行政，欲圖國會專制。當時各省軍民長官，多爲袁系；接電後多置憲法內容於不顧。均主張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及憲法草案。十一月四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民黨議員四百三十八人之證書及徽章皆被追繳，國會遂無形停頓。後各省軍民長官，更電請解散殘餘之議員，袁乃以大總統命令停止國會開會，解除兩院議員職務。爲時不久，各省省議會亦被解散。（c）在第三階段內，最值得注意的爲改內閣制爲總統制。袁世凱既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反對憲法草案之後，隨即電令各省各選派代表二人，會同各部所派代表（每部一人）及大總統指派代表（共八人）組織政治會議，屬以修改約法之事。政治會議對此，不敢負責，於是政府乃另行組織約法會議，修改臨時約法。修改約法的唯一目的，在改內閣制爲總統制。當時熊希齡正任內閣總理之職，頗欲劃清國務院與總統府之職權，以造成法治國。但與袁世凱發生衝突，不能合作。自約法會議出現，熊氏乃知難而退。其次值得注意的爲新約法之公布。約法會議於三年三月十八日成立，至四月三十日便將約法修正完畢，并由大總統公布之。臨時約法是這樣修正了，名曰中華民國約法。其中最重要之點在改內閣制爲總統制，修正的約法出現，舊約法作廢，

內閣制亦隨之告終。三年五月一日，袁世凱遂明令廢除國務院，於總統府設政治堂，內分五局一所。任徐世昌爲國務卿，楊士琦錢能訓爲左右丞。所有京外各官署向來來呈國務總理事件，一律改呈大總統。地方，則改民政長官爲巡按使。至是軍閥政權乃完全確立。舊有的封建統治階級，即滿清統治階級已倒了，早已不能支配牠了；新興的民主勢力的萌芽，即被摧殘，更不能支配牠。於是軍閥乃成了最高的統治者。

二〇、軍閥政治論

軍事領袖之變成軍閥，乃殖民地政治變革時必然之現象。蓋殖民地之政治變革，乃帝國主義壓迫之結果；并非內部經濟發展到了非變不可之境而變革。因有帝國主義之壓迫，舊統治階級必然搖搖；不能不有政治的變革。因內部的經濟發展尚未成熟，所謂民主勢力，沒有英美資產階級那樣大的力量，不足以樹立政權。這時候祇有軍事領袖，爲各方所借重，成了奇貨，最易構成軍閥政治。舊有的統治階級，要鎮壓新興的民主勢力，不得不借重軍事領袖；如滿清起用袁世凱與民主勢力相周旋，即是實例。民主勢力要推倒舊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利用軍事領袖；如辛亥革命時，各省起來獨立，響應民軍的多是滿清統治階級培植出來的軍事長官，即是實例。同時帝國主義者要在中國樹立一個代替他們自己的統治權，更不得利用軍事領袖。當同盟會

成立一年之後，有法國武官市加卑奉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華傳達法國贊助中國革命之好意，問孫中山革命之勢力如何，又問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聯絡成懇，則法國立可相助。（參看孫中山有志竟成一文）這可以說是帝國主義者站在民主勢力的立場利用中國軍事領袖之一證。又辛亥年滿清軍隊剛攻下漢陽，袁世凱主和之時，英國駐漢口的領事即介紹袁與民軍商議停戰，這可以說是帝國主義者站在舊統治階級之立場利用中國軍事領袖之一證。中國軍事領袖在舊統治勢力，民主勢力及帝國主義，三方牽扯之下，自然成為奇貨。帝國主義者想利用他們以發展在華的勢力，舊統治階級想利用他們以鎮壓民主勢力，民主勢力想利用他們以推倒舊統治階級。如此重要的軍事領袖，那能不成軍閥？軍事領袖成了軍閥，一切政治都隸屬他們，於是型成所謂軍閥政治。

在軍閥政治裏，軍閥就是統治階級的最上層。在這一層之下，有貪官污吏所組織的民政財政等機關。這等機關如在省城，便是省政府；如在縣城，便是縣政府。軍閥直接或間接指揮貪官污吏，搜括當地的財富，鎮壓人民的反抗。貪官污吏，則直接或間接為軍閥効勞。所以貪官污吏為軍閥政治裏統治階級的次層。在貪官污吏之下，有鄉村的土豪劣紳所組織的鄉村公事機關。土豪劣紳，上則受貪官污吏的頤指氣使，下則在農民頭上耀武揚威；替統治階級全體直接搜括民衆的財富，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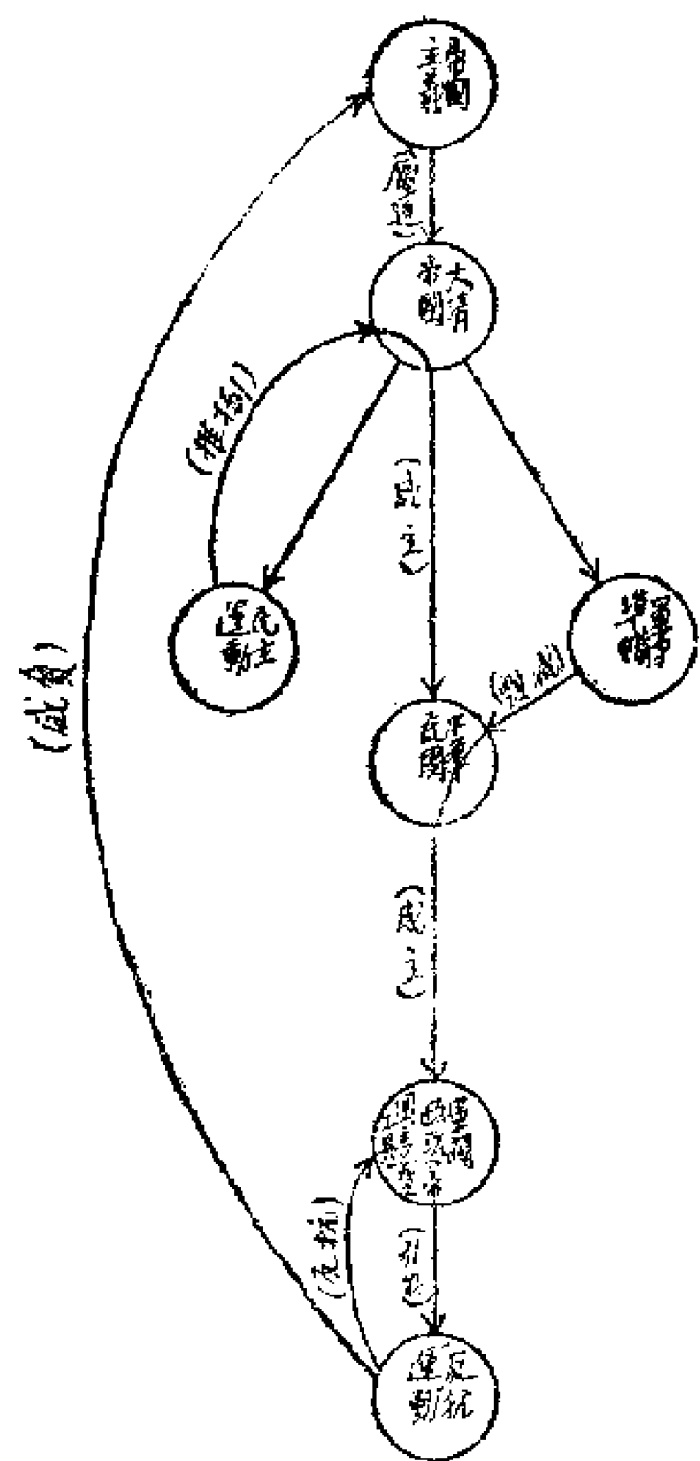
鎮壓民衆的反抗。這是軍閥政治裏統治階級的最下層。軍閥直接指揮貪官污吏；貪官污吏直接指揮土豪劣紳；土豪劣紳直接宰割民衆。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相維相繫所構成的機括，我們統稱之曰軍閥政治；因握最高統治權的爲軍閥，其餘各機關都祇是軍閥的附庸也。

第三節 帝國主義下之軍閥

二、近三十年中國政治變動圖解

立之日，已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之時。新興的軍閥，恰恰成了帝國主義的良好工具。在這一節內，我們要把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稍稍加多一點說明。現在綜上節所述及本節所要述的，先作一個圖解如次，以清眉目。

近三十年中國政治變動圖



1. 帝國主義壓迫清國，其結果逼出：

(1) 在朝的軍事準備，

(2) 在野的民主運動。

b 上兩者本來都是對外的，但民主運動以爲要對外，須先對內，須先肅清腐敗的政治；結果：

(1) 滿清倒，

(2) 民國成。

c 民國成立，曾假手於軍人的幫助，結果：

(1) 民國成了軍閥的民國，

(2) 軍閥復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

d 軍閥帝國主義雙重壓迫的結果爲：

(1) 工農的反抗運動。

(2) 工農的反抗運動復興弱小民族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進行打倒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最後的爭扎，帝國主義原是壓迫他人的；但發展的結果，竟一變而爲被他人所壓迫的。這正如黑格爾所說：

「有限事物的本質，即是取消其自身的原因；牠憑自己的活動，可轉爲與自身相反之物。」參看 *Walden: The*
Logic of Hegel (一四八頁) 目前正是工農反抗運動與帝國主義最後的爭扎相周旋的時候。

二二、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範圍

上面所述，是近三十年中國政治變遷的大勢。現在要進而研究中國軍閥如何變成帝國主義者之工具，則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必須有一個概括的認

識。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最惹我們注意的，厥爲勢力範圍之劃定。各帝國主義者如英，俄，德，法，日等都要對中國施行經濟的侵略，都要榨取中國工農的血汗。以一個可憐的中國，供如此之多的帝國主義者侵略，則各帝國主義者彼此之間的衝突，勢所不免。衝突的結果，便是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經濟的侵略，引起彼此的衝突；彼此的衝突，歸結爲勢力範圍的劃定。整個的中國，被各國劃分爲若干勢力範圍，這與非洲之被各強國分割，一般無二。所不同的，非洲被分割之後，各國自己須多出氣力去治理；中國被劃分爲若干勢力範圍之後，各國可以利用中國軍閥代爲治理。

各國在華劃定勢力範圍，其歷史約略如下：光緒二十四五年間，即一八九八到一八九九年間，中國的外患最爲緊急。換言之即各帝國主義者在華的侵略最爲兇猛。但他們侵略的兇猛，必然要引起彼此的衝突；爲緩和衝突計，祇有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1）首先在中國有勢力範圍的爲德國。德以膠州灣爲中心，伸其勢力於山東全省。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德國藉口於德教士二人在山東被殺，派兵佔駐膠州灣。二十四年，強迫中國與訂膠澳租借協約，限期九十九年。依該約規定，膠濟鐵路的建築權，及鐵路附近左右各三十里內的開礦權均爲德國所有；實際上山東全省也都成了德國的勢力範圍。（2）俄以旅順大連爲中心，擴張其勢力於滿，蒙。俄國藉口於德國租了膠州灣，想

自海參崴南下，根據旅大，以擴充其勢力於東方。光緒二十四年，中俄訂立旅大租借條約，俄國租得旅順口爲軍港，大連爲商港，并得哈爾濱至旅大之鐵路建築權。南滿一帶悉入其勢力範圍之內。二十五年，英俄協約，不經中國許可，竟相互承認：英以長江流域爲勢力範圍；俄以長城以北爲勢力範圍。(3)法以廣州灣爲中心，伸其勢力於兩廣雲南。法以俄德都有軍港商港，乃藉口於保持均勢，向中國要求劃定勢力範圍，并以廣州灣爲根據地。自光緒二十五年廣州灣租借條約成立以後，法乃修廣州灣爲軍港，以對抗香港，并維持英法之間的均勢。自是以後，兩廣雲南，竟入了法國的勢力範圍。(4)英國在華勢力範圍之劃定。光緒二十四年，英以德俄占據膠澳旅大爲口實，對中國要求揚子江沿岸各省的土地，不得租借割讓與他國；威海衛租借二十五年，九龍半島租借九十九年，中國總稅務司，永久僱用英人！凡此等等，中國一一承認了。二十五年，英俄協約，俄且認長江流域爲英國的勢力範圍。(5)日本勢力範圍之劃定。光緒二十四年，日本要求中國：「永遠不許將福建及沿海一帶割讓或租借與他國」。自是以後，日本在華的勢力範圍也劃定了。各國都有勢力範圍，祇有美國沒有。美帝國主義者眼看着大好的中國，竟被劃分完了，乃倡門戶開放主義，以圖抵制，以防止各國的壟斷。光緒二十五年，美總統麥荊來 McKinley 命國務卿赫伊 Hay 向關係中國之英，

德，法，日，意等國宣言：開放中國之門戶。各帝國主義者爲避免武力衝突起見，都予贊成。至是中國乃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市場，未被某些國家獨占。

二三、帝國主義者在華領事裁判權

勢力範圍之劃定，固足以表示帝國主義者統治中國的力量；領事裁判權之規定，更是此種力量之具體表現。領事裁判權，本是破壞領土權的一種例外。一個國家的領土權，固應完全行於本國；但也祇能完全行於本國。所謂領事裁判權就不同了。一方面將一國之領土權侵入於他國領土；另一方面使他國領土權受破壞，而不能保其完整。中國今日的領土權，却正受着各帝國主義者在華的領事裁判權之破壞。各帝國主義者在華的領事裁判權爲期很久。差不多在中國對外訂約之初就有了。一八四四年，中美條約明定領事裁判權。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第二款有云：「領事官員……所享分位職權及優例豁免之事，并裁判管轄本國人之權應與現在或日後中國施諸最優待之國相等官員者無異。」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第三款亦云：「領事官員應得分位職權，裁判管轄權，及優例豁免利益，均照現時或日後相待最優之國相等之官一律享受。」後來各國條約都有同樣的規定。讓與領事裁判權之初，僅有通商口岸（即外國僑民可以貿易並住居之處）五處。今日此類港口，達百餘處。於是在中國境內，而中國幾於無權管理之人，其數驟增。這

種事實，乃使中國領土主權，不復完整。

各帝國主義者在華領事裁判權之實施，我們可以舉英，法，美，日等國為例。英國在華審判機關，共分兩種；一爲高等法院，另一爲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可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開庭；地方法院以領事爲審判官，分布於領事所在之區域。此外上海還設有上訴法院，以法官三人組織之。凡民刑訴訟，都適用英國現行法律。法國在華領事法庭，現在共有十七處，其組織以領事官及會審員爲之；領事官爲庭長。凡法國人相互間之民商事訴訟，及法國人民，或受法國保護之人民爲被告之民商事案件，無論其案件之性質輕重如何，概歸法國領事法庭審判。美國在華的審判機關，有領事法庭，在華美國法院，及美國司法委員法院三種。領事法庭設於駐華美領事署；在華美國法院，及美國司法委員法院，則均設於上海。在華美國法院雖常川駐於上海，但每年須在廣州，天津，漢口開庭一次。美國在華設有領事之處共十八，而領事法庭，則上海除外，共有十七處。日本領事裁判之管轄問題，規定極詳。凡一切民事案件，破產案件，非訟事件，非重罪之刑事案件；日本駐華領事，都有初審之審理判決權。我們祇舉英，美，法，日作例，便可窺見領事裁判權之實際意義了。至若這種特權之應當廢除，中國統治者老早就曉得。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問題時，中國代表

的建議集中便說：「領事裁判權剝削中國主權，使中國人認爲國家之奇恥。……最後尙有使中國人感爲不便者，即因領事裁判權之保障故，在中國之外國僑民，竟主張豁免中國人所必納之地方稅是也。」……此項制度如不廢除或根本改革，中國實不利於開放其全土供外國之貿易及商業。（參看華僑會議小史三〇頁）再者「各國在華設立領事裁判權之結果……破壞吾四萬萬人民國家主權之法統，且徒使其遠東少數僑民，更利用條約，爲約外之舉動，激成東西民族之衝突，而妨害其合法正當之貿易。」（梁啟超著在華領事裁判權論九十五頁）上面的論斷，除尊重主權一點外，都在替帝國主義者說話：一，則恐中國不能開放其全領土供外國之貿易及商業；另一，則恐妨害所謂正當貿易。若站在中國工農的地位講，則領事裁判權，實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工農，榨取中國工農剩餘勞動的一種武器。

二四、帝國主義者在華的軍警

除了領事裁判權這種武器之外，其他強有力的，進攻中國工農的工具，厥爲駐札中國境內的軍警。各帝國主義者之駐軍於中國領土，實濫觴於庚子一役。庚子之役結束，訂立辛丑條約。該條約第七條會明白規定外國使館，得駐衛兵。第九條規定：爲維持北京至各處之交通計，外國得在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

黎，秦皇島，及山海關各地屯駐軍隊。俄國彼時侵入東三省的軍隊，本未經該約的許可。但因為強弱不同的關係，後來便久駐不去了。俄日戰爭，日本軍警繼續占據南滿各要邑，中日善後交涉，經中國再四要求，日本僅允於俄國撤兵北滿時，始實行撤退。後來俄國已撤兵了，日本却不履行原約。而辛亥革命，臨時派駐漢口的軍隊，和青島戰爭侵占膠濟路的軍隊，也是遲疑不撤。二十一條交涉完結以後，日本還藉口管理僑民，二次要求（五年十月十八日，六年一月五日，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南滿添設日本警察。中國政府雖因維持本國警察權嚴詞拒絕；但日本仍積極進行，不肯罷休；竟在奉天省城成立日本警察派出所；沿南滿線的城市裏，也設了許多日本警察官吏派出所。民國七年，日本更利用出兵西比利亞的機會，駐兵於東省鐵路沿線主要地點。據民國十年中國年鑑的調查，駐軍警於中國領土境內的有日，美，英，法，意，比，荷等國。唯日本人數最多，日本駐兵約四千五百名，分駐地點如下：天津，兩大隊，約一千二百名；漢口一大隊，約六百名；山東濟南兩中隊，約三百名；鐵路沿線及青島四大隊，約二千四百名。至於警察，則除奉天城內及間島各地的新警察不計外，日本在華的警察，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一名。至若現在的情形，則較民十時代更甚。各國兵艦分布中國要地，如入無人之境。

各國駐軍移於中國之目的，無非是直接鎮壓中國民衆，以圖經濟侵略之更方便，更有效。但帝國主義者却能舉出一些歪曲的理由。例如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中國代表提議撤退各國駐華的軍警，日帝國主義者即予反對。日代表埴原所發反對聲明書有曰：「一，沿南滿及山東路線確駐有日本鐵路衛兵。關於山東鐵路之衛兵，……日本曾聲明：如中國通告日本，謂中國路警已組織就緒，並準備接替護路事宜，日本即行撤兵。……南滿路線之駐兵，其根本迥異。此事曾經中國於一九〇五年北京條約予以承認。此蓋滿洲——馬賊活動最著名之地方——現狀絕對必要之一種手段也。……二，一九一一年之末，中國第一次革命起義，其根據地之湖北，完全陷於無秩序之狀態。日本及英，俄，德及其他重要國家，因僑民生命財產悉瀕危險之故，特派兵漢口，保護本國僑民。此少數軍隊派駐漢口之原因也。……三，華北所駐軍隊，係中國政府於一九〇〇年拳變之議定書內承認者。倘其他當事國無反對之意思，日本亦準備與各國一致於實際情形所許時，從速撤兵。……四，散駐東省鐵路沿線之日本軍隊，係根據一九一九年協約各國在海參崴所訂之協定。其職務乃維持西比利亞日本分任路段與南滿路之交通。」（參看華盛頓會議小史二六〇頁及二六一頁）各帝國主義者之駐軍警於中國境內，以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及主權之獨立，完全係根據這些歪曲的理由。其用意

則在直接鎮壓中國民衆，藉以剝削中國工農的剩餘勞動。

二五、帝國主義者之利用軍閥

帝國主義者在華，既有勢力範圍，又有領事裁判權，又有軍警；固然可以直接鎮壓中國民衆。但正因為有此種種以作基礎，更大可以利用軍閥以作工具。利用軍閥作工具，以間接鎮壓中國民衆，從而剝削中國工農的剩餘勞動，在帝國主義者看來，是最方便的事情，一則可以節省糜費。帝國主義之侵略殖民地，與其在被侵略的地方設官吏，駐大軍，以作侵略的武器，實不如利用當地軍事勢力之爲妙。蓋在被侵略的地方設官吏，駐大軍，都需要很多的經費。最近法國之對付摩洛哥，耗費極大，尙沒有收到什麼實効，便是一例。此次日本與師動衆，到上海來作戰，國內亦便感着軍費之不易籌措。倘中國不幸，果有一効忠於日本之軍閥，則日帝國主義者當可省去多少糜費。其次可以避免當地人民的惡感。帝國主義者縱力量雄厚，能把被侵略的地方完全征服，但當地人民的惡感，是必然要發生的。這種惡感，往往使帝國主義感着手忙腳亂。例如朝鮮，雖被日本征服了；但朝鮮人民對日的惡感，却日深一日。中國農民，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對各帝國主義者大暴動，也是惡感的表現。帝國主義者從事實上得了教訓，每征服一地，便利用當地的軍閥以作工具，行征服之實，舍征服之名，藉以避免當地人民的惡感。

至若帝國主義利用軍閥之方式，最普通的我們可以舉出三種：第一友誼的方式，第二利誘的方式，第三威脅的方式。(a)何謂友誼的方式？即由外交官直接與軍閥交際往來，聯絡友誼是也。這個方式，在中國最有効力。中國的軍閥之魚肉人民，雖是威風凜凜，但對洋大人，是十分駭怕的。因此各帝國主義者所派來中國的公使領事之類，稍與中國的軍閥週旋，便可以純化他們，收爲自己的工具。我們看見各地的領事常與當地的軍閥互相拜訪，互相酬應，友誼甚厚。實則外國領事與中國軍閥友好，即是帝國主義者利用中國軍閥的一種方式。(b)利誘的方式，借款可以表明之。中國的軍閥，要維持大軍，以圖大逞；然往往爲財力所限，不能暢所欲言。帝國主義者於此，乃乘虛而入，借大款於軍閥。借款一事，真是一舉兩得：一方面可向人民索利息，另一方面，却又收買了軍閥的歡心。日帝國主義者之以鉅款供給袁世凱段祺瑞；美帝國主義者之以鉅款供給×××，都是利用軍閥的一種方式。(c)友誼的方式與利誘的方式，施於中國的軍閥沒有不發生効力的。但効力之容易發生，也正因爲尙有威脅的一種方式。軍閥如不聽帝國主義者之命，帝國主義者，可立刻派大軍來威脅。帝國主義者，可隨時向中國軍閥提出哀的米敦，限期作答。中國軍閥最怕帝國主義者，往往先意承志，唯命是聽。在威脅，利誘，友誼三種方式之下，中國的軍閥，便服服帖帖成了

帝國主義者之良好工具。

二六、利用軍閥之目的

帝國主義利用軍閥之第一目的，在鎮壓民衆，替他們維持次序。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有鐵路，有鑛山，有工廠，有洋行。假如中國境內不安，或者甚至有排斥外貨的舉動，那末便直接影響他們的利益。近年以來，中國人民，因帝國主義壓迫太甚，不免時有反抗的表示。反抗的表示之最具體的，厥爲抵制外貨。這便是帝國主義者所最痛心的，這是他們所必須要鎮壓下去的。他們本可以自開砲艦來鎮壓；但中國軍閥如尙可用，無妨利用之。因利用中國軍閥鎮壓中國民衆，既可以省費用，又可以避免惡感，故仍以利用軍閥爲好。近來每次對外事變發生，人民的反抗情緒爲之高漲；排斥外貨的舉動乃相繼發生。這種排斥外貨的舉動，多半是軍閥鎮壓下去的。例如濟南慘案發生，人民憤慨已極，便一致起來藉排斥日貨作對付的手段。當時日帝國主義者便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限十二小時答覆。通牒中有一條云：『中國軍隊治下，嚴禁一切反日宣傳，及其他之排日運動。』與此一條相適應的，我們在各報上便看見有下面一通誥誡民衆的電報：『……濟南日兵肇事一案，亦已訓令外交部妥爲辦理，以期……及時解決。當此重要時期，凡我國民，應以整齊嚴肅之精神，一致努力，共促成功。近據各機關報告，查獲共產黨印刷品甚多，

希圖煽動；利用罷工罷課，及種種擾亂行爲，破壞秩序。已飭京內外軍警嚴密查捕究辦。政府爲貫徹外交，維持治安起見，用再詳加申徹，以資遵守。所有各地民衆，及各團體學校，均應遵照中央黨部，及本政府所頒各令，恪守紀律，各守職司。對於外交事件，聽候中央處理。至於力防反動份子，保護各國僑民，并應由各當地軍警負責妥辦。經此詰誡，如有違反命令，甘犯法紀者，准即依照戒嚴條例，嚴切執行，不稍寬貸。卽着軍事委員會，各部院各省市政府，切實辦理。並分別曉諭，轉飭一體遵照；此令。國民政府齊（八日）印。」我們讀了這個電令，很可以明白中國當局對帝國主義者所負的是什麼責任。保護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替他們鎮壓民衆的反抗，以便他們在中國肆行無忌，進行經濟侵略：這幾乎成了中國××的專責。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席上日本代表曾謂：「……中國應卽執行有效之手段，以維持治安，並須負將來或已往僑民損害之責。」又美國國務卿許士亦云：「中日兩國代表若屢以陳述書及答辯書來，殊難進行。……吾人所欲知者，乃實際上中國能否保護外人生命財產是也。」（參看華盛頓會議小史二六一及二六五頁）中國××屠殺自己的人民，毫無顧慮；但保護外人生命財產，都是十分認真的。帝國主義者也看清了這一點，故爭相利用，以期在中國能肆行經濟侵略，儘量榨取中國工農的剩餘勞動。

二七、利用軍閥之目的二

帝國主義利用軍閥之第二目的，在緩和帝國主義彼此之間的衝突。甲帝國主義者常利用軍閥以抵制乙帝國主義者。例如日美衝突；日本如能好好利用中國軍閥，固可以抵制美國；反之，美國如能好好利用中國軍閥，也大可抵制日本。日美兩帝國主義者的衝突日益激烈，中國軍閥便成奇貨，爲該兩方所欲爭相利用。中國外交政策之親美疎日，或親日疎美，實際上都是帝國主義者爭相利用軍閥的反映。這一個道理，可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對東方問題之解決來作說明。美國之召集華盛頓會議，其動機未必全然在對付日本。但會議中東方問題之解決，則顯然是對付日本的。美國爲着要對付日本，不得不利用中國軍閥，不得不責成中國軍閥組織強有力的政府，爲之作工具，爲之看守東方的利益，爲之保障門戶開放主義，爲之保障機會均等主義；一言以蔽之，爲之對付另外的帝國主義者。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華會通過路德決議云：「一，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與中國以最充分，最無累害之機會，俾得自行發展，并維持有效力而穩固之政府。三，以其勢力（即中國政府的勢力）認真建設并維持各國在中國境內之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四，不得利用現狀，營求特別利益，致妨害友邦人民在中國之權利。更不得爲有害此等友邦人民安全之行動。」一二兩項，好像是專爲中國的，其實則完全爲着各國在華的

利益。中國政府若愈有**効力而穩固**，各國在華的利益便愈安全。各國若真希望中國有穩固的政府，其目的也祇是要中國作他們的工具，替他們維持利益，作他們彼此之間的緩衝。這層意思許士修正決議案更表示得明白。該決議案有云：「一、爲使各國在華商工業門戶開放，或機會均等主義得更**有効之適用**起見，到會各國除中國外，約定：（甲）不得營求或助其國民營求任何協定之足於私利本位上設定有關中國領土某特定部分商業及經濟發展之一般優越權者。（乙）不得營求或助其國民營求獨占權或優先權之足以侵奪他國人民在華經營合法的貿易實業，或參加中國政府及省政府各種公企業之權利者；或其範圍有**効**期間及地理關係足礙機會均等主義之實施者。……二、中國政府，須注意上述之協定，並聲明有意依據此等原則應付外國政府或人民，對於經濟權利及利益之請求，不問該外國是否本協定之當事國。……」一項所規定的，都是關於各國在華如何分贓，如何宰割中國的辦法；二項却要中國聲明有意去執行；中國政府，完全成了一個替帝國主義者看管利益的機關。中國政府將中國自己的利益，提供於各帝國主義者，不能了事；還須替他們看管！中國軍閥是撐持政府的。政府既有如此的作用，軍閥也就隨着而有新作用，軍閥也成了各帝國主義者彼此之間緩衝的東西，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對付另一帝國主義之工具。

二八、利用軍閥之目的三

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以鎮壓中國的民衆，或爲對付另一帝國主義之工具；其目的雖正大，但都屬於消極的。帝國主義者之利用軍閥，除此等消極之目的外，實另有積極之目的。積極之目的維何！要中國軍閥努力造成一良好之市場是也。時至二十世紀，中國幾乎成了各帝國主義者之最後市場，最適合各帝國主義者之要求。各帝國主義者需要原料，中國恰恰富有原料；需要勞動，中國恰恰富有價格最低的勞動。各帝國主義者要投資於國外，中國恰恰缺乏資本，需要各國的投資，要向國外推銷商品，中國恰恰是產業剛剛發生變化的國家，尙能容納大量的外來商品。從供給原料，供給勞動，吸收資本，吸收商品四點看起來，中國實在是世界最好的市場。但是連年的內亂，却可以把最好的市場變成最壞的。土匪的猖獗，兵燹的迭生，天災的流行，都可以破壞中國市場之優點。就投資說罷，國內既無一天安甯，那末任何胆大的外國資本家，想要拿大宗資本到中國來經營生產事業，多少總要懷幾分戒心，總有一點不放肆。就推銷剩餘商品說罷，國內的不甯，直接可以影響外貨的進口，如交通運輸機關被軍隊占據了，商埠被軍事擾亂了，商賈不能安於市上，這當然會妨害外貨的進口。再就吸收原料說罷，內亂也有很大的惡劣影響。要中國農民供給多量的原料，唯一的條件，便須國內無天災及兵匪之患。天災及兵匪之患，都是減少農民

生產的，或完全是障礙農民生產的。更就吸收勞動說罷，也要國內安甯方可以。國內不安甯，外國資本家不敢進來；中國雖有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外國資本家也無從吸收起。本是一個絕好的市場，本是最適合帝國主義之要求的地方，然因天災及兵匪之患，可以變成全無用處。帝國主義者明知中國可以供給大量的原料，可以供給大量的勞動，可以容納大量的資本，可以容納大量的商品。然天災及兵匪之患，竟可以打斷他們的慾求，竟使他們眼巴巴的望着大好市場不能進來獲利。天下不幸之事，在帝國主義者看來，真是莫此為甚了。然則怎樣辦呢？唯一的辦法，仍祇有利用中國軍閥，以恢復中國境內的安甯，維持中國境內的次序；換言之，要中國軍閥替他們建設起優良的市場。近年以來，中國內部的紛亂，中國人自己固已感着十分的難受；然帝國主義者，各國資本家尤其感着難受。國人自己固時時刻刻希望次序之早日恢復，希望中國太平；帝國主義者，各國資本家，尤其希望中國太平。蓋中國之不太平，直接是他們的不利。故他們之希望太平，與我們自己之希望太平，同樣的迫切。因此之故，各帝國主義者無不衆口一詞，要中國建設一強而有力的政府。這個道理，一九二一年華府會議中表現得最明白。當時我國代表，祇知美國人希望中國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甚為可感；却不知道利用中國軍閥維持次序，建立優良的市場，乃各帝國主義者一致的要求。

二九、世界政治中之中國軍閥

敘述至此，最宜把中國軍閥在世界政治中之地位，總括一說。世界政治，究竟是什麼東西？其根源仍不外是一種統治的力量，仍不外是一種維持階級次序的力量。這種力量，目前在三種不同的對立關係上表現得最明白。一，在各帝國主義者彼此相互的對立上表現。各帝國主義者爲欲爭取統治世界的優越權，各不相下，於是構成所謂世界的政治問題。二，在帝國主義者與殖民地的對立關係上表現。帝國主義者要統治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民，起而反抗，也是構成今日世界政治問題的因子。三，在帝國主義者與其本國無產階級的對立上表現。帝國主義者的勢力能及於全世界的任何部份；無產階級之存在，也不限於某一國或某幾國。兩者之對立或衝突，在在足以影響全世界的安危，所以也具有極大的世界性。帝國主義者之彼此衝突，是欲爭統治世界之力量的表現；帝國主義者之與殖民地衝突，是統治殖民地之力量的表現；與本國無產階級之衝突，是統治無產階級之力量的表現。我們今日在報章上所看見的世界政治情況或世界政治問題，無一不是帝國主義者之統治力量的表現。

中國軍閥的作用，與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力量之表現，恰恰相適應。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力量，在上述三種對立關係上表現，中國軍閥也恰恰在上述三種對立關係上幫助帝國主義者。例如在中國

境內，有甲乙兩帝國主義者對抗，中國軍閥，常立於一邊，爲一邊的工具，以與另一邊相抗；這是中國軍閥在世界政治中之作用一。又如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交相壓迫，因而引起民族運動。帝國主義的壓迫愈殘酷，民族運動便愈有力量。但民族運動是不利於帝國主義的。軍閥於此，最有作用，最能幫助帝國主義鎮壓民族運動；這是中國軍閥在世界政治中之作用二。再如無產階級運動，也是直接攻擊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成功，便是帝國主義的失敗。各帝國主義者與自己國內的無產階級固然對立，而與殖民地，尤其是中國的無產階級亦復是對立的。代帝國主義者鎮壓無產階級運動，是中國軍閥在世界政治中之作用三。這三種作用單就政治方面言，都是鞏固帝國主義之統治作用的。若就經濟言，則又有下之各種新作用：一，延長國際資本主義之垂死的壽命；二，發展中國境內之資本主義的生產；三，掃除中國一切殘餘的舊經濟制度。這三種新作用，實際上祇是一件事，祇是使國際資本主義垂死的局面，暫時延續下去。發展中國境內資本主義的生產，掃除中國一切殘餘的舊經濟制度，都祇是延續國際資本主義的。（參看第二章第三節）

第五章 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二——教育

教育也是維持階級次序之重要工具。牠的內容，牠的形式，牠的興革，牠的變遷，在在與社會階級有關。社會上有什麼階級，便產生出什麼教育。反過來說，什麼樣的教育，恰恰是維持什麼樣之階級次序的。現在我們且着重教育之工具性，來考察中國之教育：看牠原來的大概情形如何，近數十年的轉變又如何，轉變之後，在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之下，其功用又如何。

第一節 舊教育之工具性

一、教育與社會階級

欲明教育之工具性，最宜把教育與社會階級相互的關係，作一個概括的敘述。教育與社會階級相互的關係，不是中國所特有的。茲且先譯兩段外國文章，以明其大

略。一八二四年，俄國教育當局有言曰：「學問之用，有如食鹽：對於受之者的生活地位，及特殊職業上的需要，都須顧到，不可少，亦不可多。學問太多了，於啓發智識，很有妨礙。教整個的民族，或過多數的人民都能讀書寫字，實在是欲益反損的事情。教一個農人的子弟學修辭學，縱不至使他成一個危險分子，但一定會把他造成一個壞而無用的人。」（譯大意。原文見 *Darwinism: Education in Russia* 的六三頁）這還祇講到教育與職業及生活地位之關係，並沒有把教育對社會階級的作用十分表明。把這種作用說得最明白的，有 *Man'erville* 氏。氏在 *An Essay on Charity and Charity Schools* 中說：「要圖社會愉快，要使人民在最壞的境遇中能舒適；則大多數人須無智識，且貧窮。智識之爲物，很能擴大并增加人類的慾望。人類所希求之物倘愈少，則生活必需之品便愈易供給。所以無論何種國家，如果要圖興旺與福利，則勞動貧民的智識，宜限於職業範圍之內，不可超過職業範圍之外。任何種勞動者，倘於世事，以及與自己職業無關的事情，知道太多；則愈不能忍受自己職業上的艱苦。讀書，寫字，算數等等，對於職業上感着需要的人，固不可少；但對於貧民，却是有害的東西。貧民的生活，根本全靠這些：他們每日要吃麵包則須從事於強迫的勞動……貧民在書本上花了多少時間，便是社會遺了多少損失。上學讀書，比起作工來，是一件

懶惰的事情。小孩子過這種生活的時間愈久，則長大了的時候，愈不便於操勞。人們倘終身不能不過勞苦生活者；則開始勞作之時愈早，後來便愈能忍受苦痛。」（譯大意。原文見 *The Making of the Man* 第二卷二一五頁）這一大段文章中，有幾個重要的意思：（一）智識愈多，慾望愈大，生活愈不易滿足。（二）智識愈多，愈不能受苦。（三）勞動貧民，不可多受教育。（四）他們若受多了教育，便是社會的損失。（五）要圖社會國家的福利，祇有使勞動貧民莫受教育。大多數勞動而貧窮的人，既不應受教育，則受教育的，當然祇是少數不勞動不貧窮的人了。這一個事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

二、中國舊社會階級與教育等差

中國往日不勞動不貧窮的是些什麼人？勞動的貧窮的是些什麼人？這我們在第三章第一節裏，曾有極詳細的討論，我們并作了一個表明剝削關係的圖。在那圖中不勞動不貧窮的列在上一系；勞動貧窮的列在下一系。上一系中，列舉了（一）特權者。特權者假手於官僚地主，以及富商大賈，間接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故無須勞動，也不貧窮。（二）官僚與地主。官僚與地主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向來官僚都是由地主子弟出身。官僚退休，仍是地主。他們直接剝削農民與手工業者，無須勞動，更不貧窮。（三）富商大賈。富商大賈也

是直接剝削農民與手工業者的。體力勞動，依然沒有；并且既已成了富商大賈，當然不是貧窮。教育既是少數不勞動不貧窮的人所專有，那末上「三種人」，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教育的主體了。歷史上具體的教育，應該完全是爲他們而設的。然而事實上有一個例外。富商大賈雖不見得不受教育，但他們却不是教育的主體。教育的主體，在幾千年的歷史中，祇是（一）特權者，（二）官僚與地主。富商大賈在教育上之所以不占重要地位，當然是由於特權者，官僚地主等排擠他們。是所謂「賤商」政策的結果。中國歷史上「賤商」的這回事是大家所熟知的；所以商人子弟要做官，不如地主做官的那樣容易；要參加考試，享受高等教育，都不如地主子弟之易得機會。至於「賤商」政策之何由發生，涉到經濟史的範圍裏去了，這裏且不詳究。

特權者，官僚，地主等的子弟，既是教育的主體，歷史上的教育機會，既被他們獨占；因此教育的發展，便完全依他們爲中心。教育的形式內容，都帶有遷就他們的色彩。特權者有特權者的教育，官僚地主有官僚地主的教育。特權者的教育，可以稱之爲貴族教育。這種教育，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極合乎貴族的需要。牠的目的可歸納爲兩個：一，維持高貴的身分；二，講求統治的道理。這兩個目的大體上本是一樣重要的。但實際上後者不及前者重要。因統治的實際工作，多歸官

僚担負；統治的道理，用不着特別講求；即講求，也祇是空疎不着實際的。不過空疎不着實際的東西，最適於維持高貴的身分。因此之故，貴族教育的内容幾乎全然是空疎的，官僚地主的教育，可以稱之爲人材教育。這種教育的内容，與貴族教育或無甚差別；但其主要目的，却截然不同；牠的目的，專重在培植人材，以担負統治的實際工作。至於維持身分，雖也是一種目的，但不如貴族教育之偏重身分。比較說來，貴族教育之主要目的，在維持身分，次要目的，在講求治術。人材教育之主要目的，在講求治術，次要目的，在維持身分。

三、維持身分的教育

這於官僚地主，是不重要的；這是貴族所不可少的教育。教育之用，有如食鹽，要能得當，要能與受教育者之社會地位適合，這在前面曾講過。中國的特權者或貴族的社會地位既高出一般人之上，爲維持身分計，非有特殊的教育不可。尙書大傳稱：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人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朱子大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這都是講貴族教育之主體及內容的。貴族有特殊教育，實在是幾千年以來的常事。皇朝文獻通考學校考開始即云：「臣等謹按虞夏放勳，克明峻德，以親九族；重華命夔典學，以教胄子。三代學校，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唐宋以來，國學以教國子，宗學以教宗人。古帝王之立教也，自親者始，自貴者始。馬端臨考歷代學校，首太學終直省鄉黨，而於宗學之設，附見太學一門，良以自昔無宗學之名，後世有其名而無其制；故統以太學，例亦宜也。臣等稽考宋，金，遼，元，明五朝學校，悉準此例矣。我朝……當國學未興之日，諸貝勒子弟，即奉讀書習學之諭。迨天下一統，禮教修明。順治二年，即建立宗學。設教習等官，司其黷戒，厚其廩餼，嚴其懲勸；使宗室子弟，咸涵泳於禮義道德之途；講明於倫紀綱常之大；服習於書射翻譯之業；練習乎文事武功之備。列祖列宗，厚加培養，時申誥誡。我皇上篤念宗支，恩施疊沛；以教以養，一暨先皇之成憲。猶慮其玩時愒日，或忘本而驚末也；定三年考驗之條，停鄉會應試之例；以期其勿襲浮華，崇尚醇厚。是以玉牒天親，咸勤政行。天下後世有以知帝室皇家所爲立教，以成其忠孝賢良之德者，實有合乎古昔大學之教，非若唐宋以來之宗學，僅與佔畢儒。鰥鰥尋章句以弋取功名已也。臣等謹依類編次，特纂宗學一門，

列卷首，昭聖教所及，自親貴始也。」這一大段，講貴族教育尤爲詳細。綜着上面幾段文章，可得下面幾個要義。（一）受教育者皆爲皇室的親貴；所謂古帝王之立教，自親者始，自貴者始是也。（二）內容極不一定：所謂小節小義，大節大義，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及禮義道德，倫紀綱常，文事武備，無不應有盡有。祇是內容空疏，不知究何所指。（三）獨立的傾向極大。「定三年考驗之條，俾鄉會應試之例；以期其勿襲浮華，崇尚醇厚」云云：好像他人都是浮華而不醇厚；祇有皇室親貴，應該勿襲浮華，崇尚醇厚；因之應該隔離起來，特別受教。（四）受教之所，亦是特立的。大概皇室親貴受教之所，可約分爲二類，一爲太學，相當於現在的中央大學，爲最高學府。太學本是八材教育機關，也是貴族教育機關。皇室的親貴，以及官僚地主的子弟都在太學受教。另一爲宗學，乃皇室所獨有的，不一定設在京師，內容也遠不及太學之精深博大。（五）受教者雖未必不服官，但服官不算他們的終極目的。因有官僚作他們的工具，替他們任實際的統治工作；他們自己祇須藉教育以維持身分便得。

四、講求治術的教育

講求治術的教育與維持身分的教育，形式上并不能截然分開。講求治術的，未必不尊重身分；維持身分的，未必完全不顧治術。不過一則以貴族子弟爲主體，一則以官

僚地主子弟爲主體，貴族的地位，在社會上爲最高，身分不可不抬起；官僚爲貴族的工具，治術不可不講求。因此之故，我們遂有維持身分的教育與講求治術的教育之分。若論到受教之所，則大體相同，多在太學；若論到所習之業，也大體相同，多爲古典（即經書）。所最不同的，祇是畢業後之地位：一則在統治階級裏爲當然的主人，一則在統治階級裏爲被雇的工具。

講求治術的教育，以官僚地主子弟爲主體，這是必然的事。因爲貴族或特權者所要藉重的是他們，所要拉攏的是他們。要藉重他們，要拉攏他們，才能鞏固統治的障綫，才能很順利的統治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同時他們自己因直接間接剝削了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既富足，又舒閑。爲維持自身利益計，必須參與實際的統治工作。情形如此，官僚與地主的子弟，乃有爭受講求治術的教育之必要了。他們既都要爭受這種教育，這種教育也就好像是專爲他們而設的。歷代京師最高教育機關裏，幾乎充滿了官僚子弟，與地主子弟。不過官僚子弟與地主子弟在這些教育機關裏，其地位似也有一點高下之別。官僚子弟地位似要高一點，地主子弟地位似要低一點。例如唐朝的國子監，裏面共有學生六類；最高兩類如國子學生及太學生中，地主子弟尙不能插足。地主子弟頂高也祇能做四門學生。通考學校考二有云：「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

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庶人之俊異者當然是地主子弟。若他們是農民及手工業者，決不會到京裏去讀書。』但他們在國子監裏祇能進四門學，祇能同七品官之子弟同居；而不能進國子學及太學。官僚子弟與地主子弟地位之差別，在各朝都有。宋慶歷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子孫，難以詳別；或興詞訴。請倣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王氏的話發生了效力。慶歷三年便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爲生員（參看通考學校考二）這可見官僚子弟與地主子弟的地位顯然有不同了。但這也不算希奇。官僚雖出自地主；然一經成了官僚便可以直接支配地主。所以官僚子弟，比地主子弟應該高貴些。官僚地主子弟受教之所，并不限於京師。歷代所謂州縣鄉黨之學，乃至各地的書院，也都是他們受教之所。不過在京師受教育的，以官僚子弟爲多；在州縣鄉黨及書院受教育的，以地主子弟爲多。在京師受教育的官僚地主子弟之衆多，以漢唐爲最盛。據宋慶歷四年

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參看上書）這也可見其人數之多了。

五、講求治術的教育與選舉制

上面所講，僅及受教者的地位。至於教育的內容，或治術的本身，究竟何物，尙未論到。治術的本身究竟何物，這從歷代的選舉制中，可以窺見其大概。選舉制一名詞，含義極爲複雜。由地方選出有資望的人，介紹給皇帝，可以叫做選舉。如周朝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地方人民之德行道藝，而舉出賢者與能者來，飲以酒，待若賓客，叫做「賓興」。「賓興」可以算是周之一種選舉制。由皇帝親自把人材召來，當面試以國家大事，從而選拔人材的，也叫做選舉制。如漢文帝訪賈誼，武帝召董仲舒對策，也不失爲一種選舉之制。由政府設專官，區別人材的高下，吏部再憑高下之等級來授官，也可以叫做選舉制。如魏立九品中正之法，擇本州人爲中正，憑中正一人的判斷，定人材爲某某等，這便是魏的選舉制。至若定期召集許多人材，加以考試，考試的科目，分得很多，考試的方法，定得很嚴；如唐宋元明各朝的考試，那當然是模範的選舉制。

選舉人材，其目的在要他們替特權者或貴族担任實際的統治工作。因此選舉的標準，必然就是

治術或與統治工作有關的東西。選舉制既有種種的不同；所謂治術也就有各色各樣。憑德行道藝以舉賢能，則德行道藝便是治術。皇帝以國家大事試人，則明白國家大事，便是明白治術。九品中正定人材的高下，幾乎全憑門閥；那末門閥高的便也可以說是治術高了。唐宋元明考試經義，詩賦，策論等；那末經義，詩賦，策論等也便是治術。合而言之，一個人具有德行道藝，明白國家大事，明白經義，能作詩賦，能作策論文章；便可以說是一個治術極完全的人了。這些東西，是否都構成治術的因子，姑不具論，但歷史上完全具備這些的，却是沒有。

選舉制度，本是選拔有治術之人材的。但後來却成了地主官僚子弟與貴族平分政權的門徑。初爲貴族所必利用，後爲官僚地主子弟所逼迫，不得利用。貴族利用選舉制度以選材，官僚地主子弟逼迫貴族利用選舉制度從而分贓。因此之故，當其初行，或行之未久之時，貴族對官僚地主子弟，常存客氣或借重之心。到後來就不同了，選舉制度，完全成了敷衍或牢籠官僚地主子弟之工具，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自周始有。自周後數千載，凡其間廢置沿革輕重，……大略觀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以鄉三物教民，謂之賓興……祇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武之，如此其重。

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園，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當時之於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考之又略。……成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論其大略，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授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爲之駕，雖以當時號爲諂諛，如公孫弘者，猶是鄉人勸勉而來，未嘗自進。到得後來，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漸輕。『士何以由重而漸輕？這大概有一個原故，地主的勢力擴大是也。貴族原來係請官僚地主子弟入政府，以任統治工作者。後因地主勢力擴大，官僚地主之子弟，乃自動要求加入政府。倘不如願，常可以起而搗亂。這樣一來，貴族不得不敷衍。選舉制度，至是乃一變其作用，由選拔人材的工具，一變而爲敷衍官僚地主子弟之工具。官僚地主的子弟，原是被人禮請的，後來却是被人敷衍，那末自然會漸漸輕起來。』

六、治術教育之目的

治術教育之目的，當然是在培植統治的人材。統治的人材，要發生統治的作用，凡有種種路道可走。其最主要的路道有二：一，進而在朝，插入政府，担任具體的統治工作。二，退而在野，廁身鄉里，担任移風易俗的工作。官僚地主的子弟，受過了治術教育，不是進而在朝，便是退而在野。不是榮任官職，盡忠報國；便是廁身民間，移風易俗。官僚地主子

弟，能担任這兩種工作，便是治術教育之成功，便是治術教育之目的的實現。皇朝文獻通考學校考九有曰：「朝廷之所以優待士子者，以其讀書明理，立品修身，足爲庶民之坊表，且備登進之選，爲國家有用之材也。」爲庶民之坊表，是廁身民間，移風易俗的事。備登進之選，則是準備進而作官，担任具體的統治工作。順治九年，皇帝頒臥碑於直省儒學明倫堂。其碑文有曰：「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徭，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同治學校考七）上報國恩，無非是到朝廷去担任實際的統治工作。下立人品，無非是到鄉里担任移風易俗的工作。官僚地主之子弟，要上報國恩，要備登進之選，則當其受治術教育之時，有必須遵守之「條教」。臥碑上所列條教之重要者有曰：「……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生，常宜思省。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帝知之，必加以福。」從這幾條裏面，我們可以看出，治術教育，原來是教人作官的。培植人材，加之以官，固是治術教育之目的。但受了治術教育的人，不一

定個個作官。不作官又作什麼呢？廁身鄉里，移風易俗，乃成了主要的工作，這是前面一再敘述過的。移風易俗，須立人品，須足以爲民坊表。其詳細，清康熙時所頒十六條聖諭，頗足以明之。其文曰：「一，敦孝弟以重人倫；一，篤宗族以昭雍穆；一，和鄉黨以息爭訟；一，重農桑以足衣食；一，尚節儉以惜財用；一，隆學校以端士習；一，黜異端以崇正學；一，講法律以警愚頑；一，明禮讓以厚風俗；一，務本業以定民志；一，訓子弟以禁非爲；一，息誣告以全良善；一，戒窩逃以免株連；一，完錢糧以省催科；一，聯保甲以免盜賊；一，解仇忿以重身命。每月朔望，令儒學教官，傳集該學員宣讀，務令遵守。違者責令教官并地方官詳革治罪。」這十六條，無一不是關於移易風俗的。官僚地主子弟受了治術教育而未作官的，便照這些條目去移易風俗。

七、治術教育的成果

培植出人材，選入政府，加之以官；或任其在野，移易風俗：這是治術教育之根本目的。基於這種目的所培植出來的人材，在歷史上所演的成績，可以列舉如下：

（一）提倡學術。統治階級需要統治人材，遠看重治術教育。但治術教育，并不單祇培植統治的人材，也還可以培植學術的人材。不過學術的人材，到底祇是一種附產。所謂學術，也祇是治術的另外一面。例如先秦孔老墨三大派，總可以算是學術界之佼佼者。然無一派不是替統治階級說話的。老

子曰：『爲天下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墨子曰：『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這都祇是叫統治階級如何統治百姓而已。(二)保存古典。提倡學術，是積極的；保存古典，却是消極的。但學術之提倡，非可突然憑空而起；於是保存古典也成了重要工作。中國歷史上受過治術教育的人，未作官的，十之八九，都直接間接担任了保存古典的工作，漢立十四博士，各治一經，各守家法教授弟子，是模範的古典保存法。歷代的太學以及地方學校，是治術人材培植之所，同時也是古典保存之所。古典裏面，包含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兩大思想：一曰宗法思想，二曰封建思想。故保存古典，仍是一種維護統治階級的工作。(三)作好官。造就統治人材，養成作好官的材料，這本是治術教育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歷史上的所謂考試制度，選舉制度，學校制度；一言以蔽之，所謂治術教育；其主要任務，即在弄出好官來，統治階級，如得有好官，以作工具，爲之任實際統治工作，以鎮壓人民，便可以減去無限的糾紛。否則對於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便感着難於酬付。就歷史上的往事看，作好官的，確實不少。所謂好官，當然是對統治階級而言，並不是對人民而言。因爲好官始終是統治階級的良好工具，並不是人民的良好工具。(四)粉飾太平。粉飾太平，也是一種統治方

法。治術教育，往往卽以粉飾太平爲其成績。如漢武帝之表章六經，如漢光武之爲諸生投戈講義，如魏孝文之改戎狄風俗，如唐太宗之廣召游學；據呂東萊云，都是粉飾太平的。呂氏之言曰：「學校大意，……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爲諸生投戈講義，初見三廡，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論。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爲美觀。」（文獻通考學校考三）其實這樣的鋪張顯設，除美觀之外，却有統治的作用。（五）程楷人性，宋元明的理學家，都是提倡理學，以程楷人性的。理學之程楷人性，戴東原在孟子字義疏證裏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人之欲，而王道修。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者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下，而在下之罪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

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豈常以理爲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云云，正是理學之妙用，也是理學幫助統治階級之妙用。治術教育能產生這種妙用，可以算是收了最大的成果。

八、農工如何教育子弟

培植統治人材的治術教育，以及維持身分的貴族教育，略如上述。但貴族與統治人材之存在，不是獨立的，他們完全係依賴農民及手工業者等的勞動而存在。倘沒有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勞動，他們的治術與身分，都無用處，并且根本上連生存亦不能維持。他們依賴別人而生存，却有自己的教育。且他們的教育，恰恰是幫助他們依賴別人而生存及幫助他們剝削別人的工具。然則被他們剝削，及維持他們生存的農民及手工業者，自己有無特殊教育，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呢？這當然是有的。我在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教育雜誌二十一卷二號裏有一段話曰：『中國之教育，自古代以至今日，若就其效力所及之範圍而分類，約可分爲兩種：一曰治者階級之教育，（相當於我們上面所述的維持身分的教育及培植統治人材的教育）一曰被治階級之教育。（相當於我們這裏所謂農民及手工業者自己的教育）被治階級之教育，與今日一般教育學者所謂廣義的教

育相當。教師無專人，受教無定所，授業無定式。兒童在家，從父兄學習經理家務，從事謀生，教育也。出而從師，學習手工技藝，以期受人雇請，教育也。入商店當學徒，經過數年，幫他人做買賣，亦教育也。至於稍有蓄積之家，聯合數家，延一稍識文字之人，專教子弟識字，以便成人時，能記賬，能作買賣，當然更有教育的意味。此種被治階級之教育，純為私家之事，社會國家從不過問。若以之與今日文明各國規模闊大之學校教育相比，實不能被稱為一種教育。……被治階級之教育，既無所謂形式，僅潛行乎實際生活之中，實無特別可供吾人敘述之處。若有教育史家，欲為中國民衆教育或被治階級之教育著歷史者，不若為民衆或被治階級著一部生活史較為切實。此種無形式的被治階級之教育，因中國經濟無突異之變化，人民概生息乎農業及手工業的經濟狀態之中，其性質，其內容亦少變化。雖然如此，但其所負歷史上之使命即甚大：維持數千年之民族生命，一也；保存數千年之民族習慣，二也；鞏固數千年來中國文化（即統治階級之文化）之基礎，三也。」上面這段話，是汎論農民及手工業者之教育的。這種教育，除識字一項以外，實在沒有具體內容，可供我們敘述。農民及手工業者之子弟所識之字，大都偏重日常應用的方面，常有人將日常應用之字用韻語編成所謂雜字書之類。我所看見的有林庵雜字，包舉雜字等。林庵雜字開始數句即是：「林

庵雜字，捷徑袖珍。零工簿據，登載分明。該欠下少，面算收清。」這便可見其實際應用性之一般了。包舉雜字亦復如是。不過我所見的這兩種雜字書，未必通行乎全國。至若通行乎全國的，乃有最著名的所謂「三」「百」「千」者。三百千果爲何物？卽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是也。這三本書，在最近的過去，甚至現在的私塾中，是最重要的教科書。農民及手工業者大都憑此以識字。此外幫助他們識字的，有許多下等小說。這些小說中所敘述的故事，無不含有鞏固統治階級之地位的封建思想及宗法思想。農民及手工業者的教育，幾乎祇有識字一端較爲具體。但這一端又恰恰成了麻醉劑。凡多識幾個字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便以勾結統治階級中之地主或劣紳以爲榮，這又可見中國文字麻醉作用之大了。

九、舊教育之根本精神與工具性

農民及手工業者自己教子弟識字之方法，與貴族教育及人材教育綜合起來，統稱之爲舊教育。舊教育之根本精神，可概括爲下列數者：（一）偏重統治階級。王制稱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尚書大傳稱：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朱子大學章句稱：人生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入大學。這都可以表見偏重統治階級的精神。

漢之博士弟子，雖亦有由郡國縣邑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之人補充者；但這種人，當其未補博士弟子時，早已站在統治階級一邊；既補博士弟子以後，乃完全加入了統治階級，與平民脫離關係。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小學。」唐高宗時，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宋元豐時，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國子監）爲國子生聽講。金海陵天德三年，詔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國子監。元亦以貴族子弟入學。明洪武元年，命品官子弟充國子學生；五年，命功臣子弟入國子學。清之太學，更是爲統治階級而設者。蓋統治階級既以依賴農民及手工業者爲生，則維持身分，講求治術，非有教育以作工具不可。（二）偏重古典。秦以前，古典方在成立時代，學校中之教材，尙非後來所謂詩書易樂禮春秋等古典。尙書大傳稱：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節小義，大節大義，都極空泛，尙非古典。直到漢朝，古典教育大興，武帝時，爲易書詩禮春秋五經立博士。光武時，博士之數，且增至十四。博士所講者古典，弟子所習者古典；漢時可謂爲古典確立時代。後來唐宋元明清各朝，無不以古典教

人，更無不以古典取士。雖唐時有所謂算醫等近乎專門之學，然古典與職能未拋棄。清末張之洞主張吸收西藝西政，仍不肯放棄古典，仍要以「中學爲體。」統治階級爲什麼要這樣看重古典呢？蓋古典爲維持階級次序之有力工具也。（二）偏重治術。自秦以後，教育與普通生活日離日遠。學生在學時所習者古典；學成之後，主要職務厥爲服官，或作維繫地方風化之人物。但無論服官也罷，維繫地方風化也罷，總之祇是統治階級裏的一員；所講求的，祇是如何鎮壓農民及手工業者；并非運用生活必需之智識技能，以直接從事於生產。（四）崇拜死人。禮文王世子稱：「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學記稱：「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漢高祖十二年，以太牢祀孔子。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宋真宗時，追謚孔子曰元聖文宣王，後避諱改爲至聖文宣王。元時，初平燕京，宣撫王楙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太牢禮先師孔子於國學。清順治二年，定文廟謚，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死後受過孔子這多優禮的，沒有一個人死後有孔子這多尊號的。自孔子被推尊以後，無論中央或地方，凡有教育意味之機關內，皆必有孔子像或孔子祠。求學生員，必禮孔子。這種情形，幾與宗教無異。歷史上爲什麼有這種情形？蓋孔子生前爲統治階級第一

個優良的工具；其一生的思想學問道德，都可以直接間接鎮壓農民及手工業者，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統治階級看透了這一點，於是極力推尊他；他死了，還極力利用他作維護統治階級的良好工具。總括說來，上述四點，是舊教育之根本精神，同時也就是舊教育之工具性。因為這些根本精神，在消極方面，有鎮壓農民及手工業者的作用；在積極方面，有維護統治階級的作用；無在不表現工具性也。

第二節 教育的維新

一〇、環境之變遷

舊教育維持階級次序，已有幾千年之久。到最近的過去，忽然成了不中用的東西。這并不是舊教育本身有什麼不同，實在是因為環境變遷了。環境之變，原因也很簡單，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已。但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來，中國以經濟落後之故，抵抗不住；於是由幾千年的老大帝國，一變而為貧弱不堪。中國之貧弱，并不自帝國主義壓迫之日始。但在閉關時代，不與他人相抗之時，雖貧弱也不覺得。一到帝國主義的勢力壓境，貧與弱便顯現出來了。舊教育之維新，乃貧與弱的產物。中國因貧與弱不能對付帝國主義。為要對付帝國主義，不得不圖富與強。

但舊教育是不足以圖富與強的。於是改革舊教育之議乃起。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張之洞與劉坤一會奏變法自強第一疏有曰：「竊臣等欽奉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諭：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材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等因。欽此，仰見我上懲忿多難，必欲掃積習以濟時艱；感涕之餘，且愧且奮。臣等常聞之周易：乾道變化者，行健自強之大用也。又聞之孟子。過然後改，困然後作，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者；生於憂患之樞機也。上年京畿之變，大局幾危，其爲我中國之憂者，可謂鉅矣。其動忍我君臣士民之心性者，可謂深矣。窮而不變，何以爲國。然則修中國之內政，採列國之專長；鑒道執中，洵爲至當。唯是中國貧弱廢弛之弊，或相沿百餘年，或相沿二千餘年；一旦欲大加興革，必須規畫周詳，確有下手之處；然後氣血生而宿疴自去；痼癰決而元氣可支。竊謂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不弱於兵，而弱於志氣。人才之貧，由於見聞不廣，學業不實；志氣之弱，由於苟安者無履危救亡之遠謀；自足者無發憤好學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無

由。謹先就育才興學之大端，參考古今，會通文武，籌擬四條：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日停罷武科，四曰獎勵遊學。」他們所籌擬的四條，我們這裏且不管。但他們這段文章裏，表現了幾個主要之點：（一）中國貧弱憂患甚深；（二）欲圖振作，須除舊習；（三）欲除舊習，須興教育，這幾個要點，換句話說，即帝國主義壓迫到了極點，中國欲圖自強，於是不得不維新教育。

一一、廢科舉

維新教育之消極辦法，便是廢科舉制。科舉制度之廢除，有兩個最大的理由：一則科舉的本身發生了流弊，不能達到原來的目的。二則牠可以障礙新教育的發展，妨害圖強自振的新政。第二個理由，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反映。帝國主義壓迫日急，當局正欲辦新教育，造新人材，以圖應付；而科舉制恰恰是這種主張的障礙，且其本身又發生了流弊，則廢除是必然的了。科舉制本身的流弊如何？張之洞說：『中國仕官，出於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傲幸；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三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科舉既有了這種流弊，那末帝國主義即不進來，也到了當廢的時候了，何況牠在在足以阻礙新教育的

發展。其阻礙新教育之處，張氏亦有言曰：「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習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爲國家扶危禦侮者。於是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蒐羅之。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爲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資稟凡下，不能爲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卽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爲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爲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絜長於小楷；名位取舍，雖在於斯；則雖曰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沒聞如故，空疎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勸學篇變科舉第八）由這些話看來，科舉不獨阻礙新教育之發展，實足妨害一切發奮圖強的新政策之實行。因此之故，便有主張部分改良的，有主張全部廢棄的。張之洞主張部分的改良，他說：「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同上）但改良，到底不能切合時代的需要。直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四年）又有請完全廢棄考試制者。當局對此，頗以爲然，乃毅然廢去。

一二、設新學校

廢去考試制，祇是因應環境之一種消極辦法。若真要「求通才救危局」，

則開設新式學校，才算是積極辦法。中國新式學校之開設，遠在考試制度廢去之先。特考試制度廢去之當時，新式學校之開設，較爲普遍而已。例如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京師就有同文館之設立。其目的在養成翻譯人材，以便吸收西洋學術；這可以說是新式學校之開始。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福建設船政局；左宗棠督閩，即於其中附設船政學堂。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江南製造局內，附設上海機器學堂。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北洋水師學堂成立；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天津武備成學堂立；十三年，廣東水師學堂成立，十五年，北洋大學成立；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湖北武備學堂成立；二十二年，南洋公學成立。（中國產業革命，自軍用工業開始；中國教育的維新，自水陸軍學堂開始。可見中國一切改革，都是以帝國主義的壓迫爲直接原因的）。直到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張百熙乃奏擬學堂章程。二十九年，張之洞，孫家鼐，張百熙會同厘定學堂章程。三十一年上諭設立學部；三十三年頒布教育官制，章程，及法令。同年，上諭宣布教育宗旨，以一人心，而定趨向。至是新學校乃開始遍設於各地了。各地開設新學校之過程及學校內容之大要，可於勸學篇中見之。勸學篇頗可以代表當時之時代精神。其設學第三有曰：「……夫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遊學外洋之舉，所費既鉅，則人不能

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爲大學堂，道府爲中學堂，州縣爲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鑲，醫，聲，光，化，電，西藝也。……一曰宜教少年，……一曰不課時文，……一曰不令爭利。」張之洞爲改革中國教育之偉大人物；其所主張，當時多見諸實際。我們讀此一段，頗可以看見當時設學的精神。當時設學的精神有幾點可以注意：第一有系統；大學，中學，小學，層次分明。第二很普遍；京師，省，道，府，州，縣都設學校。第三內容很新；西政西藝如度支賦稅，電化聲光都成了學科。爲着要抵禦外侮，儘量開設新學校。新學校所製造出來的新人，亦多如過江之鯽。然卒因產業發展的速度，不及學校發展的速度之大；新人材竟因無處安插，型成智識分子失業的恐慌（參看第三章第二節）這又是提倡辦新教育者始料所不及的。

一三、派遣留學生

廢科舉爲消極辦法，興學校爲積極辦法，但當科舉既廢，學校成效尙

未卓著之時；爲着要加速度的培植新人材，以應付時艱起見，不能不有一種過度辦法，最有效的過度辦法，祇有派人到國外去留學。派遣留學的理由，可概括於次：一，舊式教育機關，尙未完全革除，新人材一時不易多得。王之春覆議新政疏曾說：「方今中國學堂猶未盡設，書院亦難驟更。學者卽志切觀摩，亦將於何取益？臣再四思維，惟有多派生徒，出洋遊學。」這便是派遣遊學的一個理由。二，自己多設學校，用費太大，一時不易籌出；三，新學普遍的設立起來，教師人選，亦很不易。四，外國學校很好，最便往學。張之洞創坤一會奏變法自強疏第一疏說：「學堂固宜速設矣，然非多設，不足以濟用。欲多設則有二難：經費鉅，一也；教習少，二也。求師之難，尤甚於籌費；天下州縣，皆立學堂，數必逾萬。無論大學小學，斷無許多之師。是則唯有赴外國遊學一法。查外國學堂，法整肅而不苦；教知要而有序。爲教師者，類皆實有專長；其教人亦有專書定法。凡立一學，必先限定教至何等地位，算定幾年畢業；總計此項學業，共幾年若干時刻，方能授畢。按日排定，每日必作幾刻工夫；定爲課程，一刻不曠，如期而畢，故成效最確，學生亦願受教。」自己多設新學校，經費既難籌，師資又難得；同時外國學校辦法很好，復便於遊學，那末正在過渡時代的中國，欲加速度的製造新人材，以作救濟時艱之用；自然以派人到國外留學爲最好。這種派人

出國留學的辦法，正如自己產業不發達，拿現錢買洋貨一樣。自己要用新式機器製造品，然因資本不足，機器不齊，管理乏術，工廠不能開門，終於無機製品可用。不得已祇好拿現錢買現貨以應急，派人留學亦同此理。自己急於要用新式人材；然因經費不易籌，師資不易得。新式學校，一時不能遍設於全國。不得已乃拿現錢到國外，請外人代為培植。我們常說：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斷的把全世界文化起來。這句話的道理，這裏也可看出一些。帝國主義要壓迫中國，中國乃急起維新，以圖抵抗。然所謂維新者，又不過抄襲帝國主義的成法，甚至要假手於帝國主義，才能夠真正維新。所謂帝國主義把全世界文化起來，這便是其中之一義。上面所述，為派人留學的理由。派人留學這件事，在教育維新史上，佔很重要的位置。當維新之始，朝野上下的要人，無不極力主張。張之洞說：『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二說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板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借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為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

造。歸國之後，諸事應變。不特此也。暹羅久爲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卽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上爲俄，中爲日本，下爲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勸學篇遊學第二』這段話不獨把當時對遊學的熱烈主張表現出來了；遊學的目的，亦可於其中看出。遊學的目的，可以用『師夷狄之長技以制夷』的一句舊話代表。當時派人留學的用意，無非是要學得帝國主義之方法，以對付帝國主義。

一四、翻譯西書

翻譯西書，其用意也無非是對付帝國主義。張之洞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聵。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聵而何哉。』人勝我，謀我，吞我，殘我；我以不諳西語，不通西文，不讀西書，無法知道。這一個大缺陷，是翻譯西書的根本動機。就這一點看，翻譯西書一事，也是帝國主義壓迫的結果。在教育開始維新的時代，翻譯實爲絕對的必要之事。（一）學校初開，用外人充教習，不翻譯西書，教學不便。張之洞謂：『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爲教習矣。然有二弊。師生言語不通，恃翻者爲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不能

通其學；傳達失真，毫厘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刪減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期其久。故有一加法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爲鉅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勸學篇廣譯第五）這些話都是就學校教學一方面講的。至於（二）中國舊學之不切實用，也促成了翻譯的必要。王之春覆議新政疏有曰：『今日各國風氣大開，學問之途日廣；……農工商兵之書，中國專書，不盡適用，或且無之。若不借資外國，其學虛立不能成就。……或云：中國卷軸繁富，白首難窮，何爲譯此？不知中國已有之書，其講道精深者，必應謹守。中國未備之書，有學藝切實者，不妨廣求。體用本聖學所兼修，道藝尤今日之急務。考之日本初變法時，凡學凡事，惟德是效。及學校成功，大加增改，遂成爲日本之學，與德迥殊。今我果能博譯羣書，實心采法；他日必有成學懷忠之士，善爲去取；一旦改觀；譯書有用，無可疑者。』舊書不中用，當然祇有翻譯有用之西書。此外（三）中國原有居官任事，以及其他文人想讀西書，而不識西文，也極有待於西書之翻譯。原來能譯西書的人，不一定個個有才識，可以救時艱。而居官任事之人，又不能直讀西籍。這個道理張

之洞很明白，所以他說：『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才衆多而後用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學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仕宦，是仍無與於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於中學之耆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因上述種種必要，翻譯西書，乃成了教育維新運動中的要務。

一五、資本主義教育之成立

考試制廢除了，新學校也開設了，留學歸來的一天一天的

多，翻譯的西書也一天一天的多。合此種種，遂把往日維持身分的教育，講求治術的教育，變一個嶄新，變成了純粹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教育。這可以提出幾個特點來說明。第一學校組織之完備。這是與從前截然不同的。從前設於京師的太學，設於地方的府州縣學，以及各地的大小書院，其組織無不簡陋已極。現在的學校。便全然不同了。大學中學等，固然複雜完整，內部辦事機關，亦門分類別：管訓育的有專人，管教授的有專人，管事務的更有專人。若按學生入學之遲早而分年級，按學問性質的不同而分科系；無不秩序井然，合於科學的組織。即小學以及其他職業學校等，大抵也是秩序井然：管理組織無不完整。第二教授方法之有效。從前舊式學校裏教授方法幾談不到。不成學校之蒙童館裏，則專重灌入；以不合教育原理而編製的教材，強迫灌入學生腦中；學生懂與不

懂，在所不計。至若書院裏，乃至府州縣學裏，更談不到教授方法。於今的新式學校裏，教授方法便全然不同了：既經濟又有效。教材的編製合於教育原理；講授的方法，合於學生的心理。都是由淺入深，由近及遠。即受教的人數，亦有規定：不過多亦不過少。因此種種，教授方法，總能收得實效。第三教材內容之適用。從前的教材，幾乎無一門有用的。詞章詩賦古典應有盡有；但與實際生活無關。這些東西如果也有用處，便是裝飾身分，鎮壓階級。於今新式學校裏，所用的教材，截然與此相反：幾乎件件都是有實用的。聲，光，電，化之學固然有用，政治，法律，簿記，財政，亦無不有用。總而言之，現代學校裏的科目，無一門不有其特殊用途的。第四人材之專門。以前舊式學校裏讀書的人，除了不從事實際生產以外，他如國家大事，幾乎樣樣都會，實則樣樣都不會。於今學校裏的科目，既然各有各的特殊用途；那末學會一科或數科的，便成專門人材。專門人材所治的事，普通人不能過問。現在中等學校裏，已分了科。所以進中學的學生，便在預備作專門人材。若大學校裏，門類之複雜，學科之專精，更非從前的舊式學生所能夢見。凡此種種特點，從消極方面看，把舊日維持身分的教育，講求治術的教育完全否定。從積極方面看，則恰恰構成資本主義的教育。這些特點都是資本主義教育所獨具的。學校組織之完備，教授方法之有效，教材內容

之適用。學校人材之專門：都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產物。中國爲抵禦外侮起見，爲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起見，趕快把教育維新起來。維新的結果，這些特點，一一現顯。比起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的教育來實在沒有遜色。

一六、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一

但正因爲比起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教育來沒有遜色，乃成了不中用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教育，乃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這種產物，又祇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纔能顯大用。中國因爲要抵抗帝國主義的壓迫；於不知不覺之中，把教育趕快資本主義化了。但整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速度，不及教育資本主義化的速度大；兩者不能互相適應。於是學校裏出來的人材，竟無處安插。基於這一個不相適應的道理，遂造成中國資本主義教育的失敗，無論從教育本身講，或從所培植出來的人材講，或從教育界講，都是失敗。

現在且先從教育界講，第一現在從事於教育的人，是徒勞而無功的。因爲教育出來的人材，無處安插。國家既沒有完全得到教育的利益，受教育者自己也沒有得到教育的利益。情形於此，服務教育界的人儘管竭盡心力，終於是勞而少功。第二教育界成了一個衣食爭奪之所。從事於教育，本是暇務。但現在失業的人太多，謀生的路太狹；於是許多受過高等教育，應作其他專門事業的，常

爲生計所迫，擠在教育界混戰。混戰的情形，固然可怕，混戰的目的，亦殊可憐。關於這層，我曾作過一篇教育界之黨派觀論之。其言有曰：「……教育界之黨派，凡稍稍服務教育界者，當能察覺。其複雜，其腐敗，其彼此互競之烈，其影響教育界本身之大，當亦能深知。……中央大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蔡院長（元培）於舉行開幕典禮之日，其致開會詞中亦謂：教育界或因某校同學之關係，而聯爲一系，相與競爭。（據新聞報）似此，則當局亦已注意教育界之黨派問題矣。教育界之黨派，近來殆已複雜至不可名言。就留學生之歸國服務教育界者言，有所謂東洋派西洋派等等。西洋派中又有所謂英國派，美國派，法國派等等。就國內學校畢業之教育界人士言，有所謂北京派，南京派等等。就教育人士出身之母校言，又有所謂某某大學派，某某高師派等等。大之全國，小之一縣，一鄉鎮；凡教育界，無不有黨，無不有派。……而各黨各派之活動的形式，亦甚可觀。一曰奪取教育行政機關。每當教育行政人員，如省教育廳長，縣教育局長，或鄉鎮學務主任之類，一有更動，各黨各派，無不各顯神通，團結勢力，拉攏各游離分子，勾結各種社會，共抬一人作傀儡，以期在教育行政上佔得重要之地位及勢力，進而操縱教育上一切之設施。二曰包辦學校，把持教育學術機關。原來奪取教育行政機關，初意本就在包辦學校，或把持教育學術機關。故每當某一

學校更換校長之時，各黨各派，又必大肆活動，各抬舉其領袖人物，向教育長官包圍，迫其委某也爲校長，而教育長官原是某一派之勢力或某幾派結合之勢力所抬出，少有不被人包圍而即軟化者。近年以來，教育當局委派校長或教育學術機關負責人員，往往預先考察教育界中各黨各派勢力之厚薄，擇其勢力雄厚者委之。稍一不慎，常常發生風潮，釀出長期之紛擾，似此則教育行政機關，已變成教育界黨派勢力雄厚者之代理機關矣。三曰利用學生。某一學校若純爲一黨一派所包辦，固無取乎利用學生。但純由一派包辦，往往引起別黨別派之仇視。爲免除仇視起見，則主持某校者，必用若干自己黨派以外之人，以圖敷衍，於是利用學生之機會至矣。甲派拉攏若干學生，以爲後盾，以保護自己勢力。乙派亦拉攏若干學生，以爲後盾，以保護自己勢力。學校一有某種問題發生，無不各向學生領袖煽動，以期獲得多數之擁護。且平時無不各向學生直接間接，有意無意。論某某之長，道某某之短。教職員中有黨派矣，學生中亦受其影響，無形中顯出黨或派焉。每當校長之更換也，挽留者有一派，迎新者又有一派。……黨派活動，……以獲得謀生之職業爲宗旨。更實質言之，即以爭得飯碗爲宗旨。如一黨一派之領袖，偶因機緣，榮膺省教育廳長或縣教育局長，或某學校校長；則隨即可以提拔一大批人物，隨即可以解決一大批人之飯碗問題。一黨一派，

若奪得一席廳長，則該黨或派之人物，不獨可以安插一大批於廳內；即在教育界作普通事務，亦較容易，蓋有人爲之推薦或援引也。此種職業競爭或飯碗競爭，殆教育界之黨派的最主要之宗旨。：除此而外，更有一大宗旨，培植後起之勢力是也。教育界常有許多人，其辦理教育事業，在教育界活動，專以培植後起之勢力爲宗旨。如任某校校長，則視該校學生爲彼輩之私有物，爲他日作別種活動或競爭之後備勢力。某派在教育界活動之範圍愈廣，則所識學生愈多。學生愈多，則他日在普通社會中競爭之後備勢力愈大。現在常有許多知名之士，創辦私立學校，以云貫徹主張，自己固毫無主張；以云獲利，往往須賠大本，實無利可獲。其主要目的，即在擴充後備勢力，以便在社會上活動。至是奔競之風，遂愈演愈烈。：其流弊：：第一，使社會道德墮落。：：第二妨害教育行政。：：第三，破壞學風。《教育雜誌二十卷第七號》產業未充分發達，而資本主義的教育已先完成。受教育者無出路則辦教育者爲徒勞。不獨止此，因受教育者無出路，轉使教育界成爲一衣食爭奪之所。這是始料所不及的，也便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教育之大失敗。

一七一 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二

就教育界看出來的中國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略如上述。再就教育本身看，中國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更是顯然，資本主義教育，本是資本主義國家之資產階

級所獨佔的。在中國則爲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富商，大賈，以及新式資本家等之子弟所瓜分。我在教育雜誌第二十卷第一號教育新論一文中曾說過：「今日中國之教育，自小學以至大學，幾乎全是富者所獨有。」蓋各級學校耗費均大，貧者或不能受；又學校教育，當然不能直接予受教者以經濟上之利益，貧者或不願受。於是無形之中，一切教育，不得不歸富者獨佔。且就小學校之耗費而言，一年至少，書籍用品學費合計，須費洋十圓左右；高級小學，至少須費洋二十圓左右。若中等學校，每年用費，自一百圓至四百圓不等；平均二百圓一年，則爲最普通之數。至於大學校，每年用費，自三百圓至六百圓不等；平均每年四百圓又爲最普通之數。大學六年畢業，共須費銀至少二千四百圓。中學六年畢業，共費銀須一千二百圓。兩級小學六年畢業，合計至少亦須百圓上下。今日國人中……能費百圓送子弟受學校教育者已是少數。於此百圓外，再加一千二百圓，合計一千三百圓，送子弟入中學者當然更少。至若大學畢業，合小學中學大學之費計之，一人至少須三千七百圓。費用如此之鉅，除極少數富人而外，試問有幾人能送子弟入大學？總而言之，今日中國之教育，自小學以至大學，均有爲富者獨占之傾向……學校利益，貧者不能取得，富者能獨占之。其結果國人之智識思想愈不齊一；上焉者往往得東西洋博士學士而上之，下焉者或竟非洲土人之不

苦。』其次資本主義教育在中國，足以養成特殊階級，「今之教育，目的絕對不在養成特殊階級；但結果特殊階級，無不自然而然由學校養成。此中原因，可得而言者爲：（1）教育既已成爲特殊事業，且爲少數人所獨有，則循物以少爲貴之常理而言，凡受教育者，自然名貴。（2）少數受教育者又皆爲富人；富人經濟勢力，甲於貧人；貧人與富人相處，無不逢迎富人。因此少數受教育者，在未受教育之先，事實上即已成爲特殊階級。（3）既受教育之後，智識甲於常人，常人當然加以相當尊視。於是凡受若干年教育者總較常人爲名貴。（4）在國人經濟地位不平等之時，社會地位平等之觀念，永不能養成，因而一般人皆特別重視讀書人。俗語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其明證也。因此種種，教育之根本目的不能達到，徒促特殊階級之養成。」（同上）基於這一點，又生一新流弊：是智識化成裝飾品是也。資本主義教育所給予的智識，本是很適用的。「但在今日學校之中，所謂智識縱不完全是廢物，亦祇是少數人之裝飾品。蓋今日之學校，爲少數富者所獨有；富者常能坐食現成，無須親自經營實際生活。其運用智識以解決生活困難之機會少，利用智識以炫耀於他人之機會多，此一因也。再富者出校以後，或亦在社會上活動，以謀生活。但其活動之範圍，全非可以運用彼之智識者。學校所授智識，關於實際生活者多，屬於社會活動者少。富者在社會上活

動，需要空汎而可以騙人之常識多，需要有用而切於實際生活之智識少。因此在學校所受者從不應用於實際，徒爲增高身分，取悅於他人之裝飾品而已。此又一原因也。」（同上）由上觀之，資本主義教育在中國，既爲少數富人所獨占，既有養成特殊階級之傾向，既足以把智識化成裝飾品；那末我們實在不好意思說：這種教育沒有失敗。

一八、資本主義教育之失敗三

再就資本主義教育所培植出來的人材看，看他們於社會國家，究竟有何種用處。倘都有用處，或都能找到出路運用所學，以謀正當生活，那末仍不失爲大成功。但事實上恰與此相反。先就留學生說罷。我從前曾有一段話說：「留學國外之學生，歸國之時，大抵皆有專長，祇惜國內經濟狀況過於貧弱，建設事業，多廢而未舉，凡學有專長者，一概無處可用。例如學醫者，無醫院爲其服務之所；學工者無工廠爲其實練之處；學農者無農場爲其實驗之區。其他一切專材，皆無處展其所學。夫專門人材，豈甘閑散？不得已，乃於自己材力所能及之範圍以外謀事。日前中國一切需要專門人材之事業尚未全興，勉強可以插足之處，厥爲政治界與教育界。近來留學歸國之專材，無論其素所習者何科，一概皆在政教兩界謀生活。於是素所學者或不能用；今所用者，又非所學。扞格不入之情，到處顯現。不察實情者，動輒謂留學生無用，不

行。嗚呼冤矣。果用得其所，人盡其材，豈真無用耶？真不行耶？」（同上）次就國內大學生說。『大學畢業以後，出路亦極少，甚至絕無……現在大學畢業生之出路，其最普通者有四：一曰當教員。當教員可以不費成本，而又勉強可以圖生存。不過大學生鄙視教員生活，常不願幹，實則亦不能幹也。二曰辦報。辦報可以罵人，可以使人畏懼，而予以相當之重視。但辦報需鉅資，報之信用亦不易立，罵人又易觸人之怒。因此種種，辦報者亦不多見。三曰從事著作。但著作須有學問，須熱心研究，須忍勞耐苦。今之大學生決不願幹此種生活，或不能幹。四曰作官。此殆今日大學生最普通之出路也。現在國內大學畢業生，無論所習者為何科，無有不奔走於大人先生之門，思圖在政界活動者。此種論斷未免過於滑稽，過於苛刻。但就現在國內之經濟狀況考察，大學生之出路，真祇有上述幾端。蓋在一方面國內一切建設事業尚未全興，專門人材無處可以使用；在另一方面，大學生又係富豪子弟，無須利用專門知識，經營辛苦之生產事業。唯在政界活動，反可以誇耀於鄉黨隣里，揚名聲而顯父母。』大學生之出路如此，中學生又如何？現在『中學生畢業以後，若家資豐裕，可以入大學者則入大學或留學國外。入大學或留學國外者，其出路與上所述者無稍差異。若家計不十分寬裕，不能繼續讀書者，則在社會上閑散；成爲無業者有之；退到鄉里，主持鄉政，爲地

方紳士皆有之；憑親戚故舊之推轂，到行政機關充當書記者有之；燕處家中，以撫兒育子爲樂者亦有之。總之皆爲社會上不能生產之人，皆爲社會國家無益而有損之人物。又中國凡讀書者即以讀書爲業，此乃歷史上傳來之腐敗習慣。中學生畢業於中學之後，不能升入大學爲高等游民者，又不肯退歸田里，從事耕耘。反之情願庸庸碌碌，在社會上鬼混，以保持其以讀書爲業之腐敗習慣。……徒挂一讀書人之名，而爲社會上之寄生物。」（全上）大中學教育，都祇能造出游民都無用。勉強有用者祇有師範教育與小學教育。師範教育，培植小學師資；小學教育，尙祇是啓蒙教育；無論國家如何落後，總還是不可少的。然因國民經濟能力過於薄弱之故，貧民子弟，并水平線以下之教育亦不肯受，小學教育不能普及。至是師範教育與小學教育亦成了多餘的！合上述種種看來，中國資本主義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失敗。

第三節 所謂買辦教育

一九、殖民地的新教育

資本主義教育，對中國固然失敗了；然在國際資本主義者眼中，却是頂有用的。去年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題爲論殖民地的新教育。其中所說，恰與這裏所要說的相

符；且錄出以作本節的導言。其言曰：「經濟落後的國家，一經套入了世界經濟網，或加入了世界的社會關係，（世界的社會關係一名詞，參看第三章第三節）其內部的一切，便都開始變化起來。一方面拋棄牠原有的機能或功用，另一方面顯出新生的應付世界社會關係的新機能或新功用。變化的動因，常爲國際資本主義的內侵；變化的結果，又恰恰幫助國際資本主義之繼續發展。國際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充，全世界經濟落後的地方逐漸轉入其勢力之下，與之發生新關係。新關係一經發生，經濟落後國家內部的一切，都忙着改造其自身，以謀應付。今日的中國與國際資本主義，恰恰發生了這樣的新關係。國內的一切，都在大變特變，以期能夠應付這樣的新關係。教育的變化便是最顯的一端。國際資本主義初踏進中國之門時，中國原也有一套文化，原也有所謂政治，道德，教育等等。這等等東西，不與國際資本主義相接觸時，原是很有用的，也可維持所謂社會的次序，也可以鞏固階級對立的關係，原無所謂不中用。自從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進來之後，才特別顯着不中用。一個舊東西，因其所存在的關係變了，自身的性質也隨着變起來；由有用的變成無用的了。既經無用了，便又要使牠有用。這個由無用到有用，是一個新的變化，是適應新關係的。中國近代的教育，常在變化的過程之中；由有用變到無用，由無用復變到有用。國際資本主義未進來，牠有

用，牠可以鞏固原有的社會次序，或階級關係。國際資本主義進來了，牠無用，牠不足以應付世界的社會關係了，牠不是國際資本主義者所要維持的東西。於是新教育乃應運而興。中國近代的新教育之所以「新」，其意義完全在應付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一點。沒有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決不會有今日這樣嶄新的歐化教育；沒有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存在，今日中國這樣嶄新的歐化教育，真的會毫無用處。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與中國舊教育的維新，幾乎成了有區別而不可分離的東西。中國的教育若不維新，國際資本主義者便不高興。一九〇二年（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清朝統治階級的總頭子，發了一道上諭，要停科舉，興學校；中有扼要之言曰：「……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拉牽舊習，護我首鼠兩端，羣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我們自己的維新大業，人家爲什麼這樣關心？沒有別的原因，祇緣中國的教有一新，最便於國際資本主義之繼續發展也。（a）國際資本主義踏入中國，中國人民因受慣了舊有的風俗，習慣，道德，政治等等的訓練，不善於應付新來的勢力。豈唯不善於應付？即排斥，反對，詆誹，甚至於破壞等舉動，亦時有所聞。這等舉動，反映在當局的心理上，叫做風氣不開通。風氣不開通，足以阻礙中外兩方的接觸，足以便經濟落後的中國，與蒸蒸日上的國際資本主義不能融洽。風氣不開通，中國人

民對於隨着國際資本主義勢力而來的種種作爲，加以排斥，反對，詆誹，甚至破壞，幾乎不遺餘力。明明是洋人們來探礦，却說是來取寶，明明是洋人用醫術，解剖死屍，却說是挖中國人的膽心去製藥。明明是洋人信奉基督，却說是要中國人丟掉祖宗。經濟落後的國家的人民，對國際資本主義者的人民，存如此不良的心理，試問國際資本主義者與經濟落後的中國，如何能夠成立親密的關係？試問國際資本主義者有何理由可以不要中國維新？中國近幾十年來教育上的維新，把風氣開通了，使中外有接近之可能，這是殖民地的新教育在世界經濟網裏的一個重要作用。(b) 中外接近了，國際資本主義者與經濟落後的中國可以發生密切關係了，中國人民的剩餘勞動，有轉入外國資本家的荷包的機會了。但密切關係之發生，必須雙方成立篤厚的友誼，必須彼此互相親善。否則中外兩方的新人相遇，因友誼不厚，仍不能發生密切的關係。要友誼篤厚，有什麼方法：祇有一個方法，「盡棄其學而學」是也。或則外國人盡棄其學而學中國；或則中國人盡棄其學而學外國。近代的中國，既已套進了世界的經濟網，既已加入了世界的社會關係，而不是世界套入中國的經濟網，加入中國的社會關係；那末中國人盡棄其學而學外國人，而學國際資本主義者，乃事所必至，理所當然。數十年來盡棄其學而學的結果，高等華人幾乎盡成了洋人。中外已經一家了，友誼的篤厚，不

言可諒。此種篤厚的友誼，完全是幾十年來的新教育造成的。一經有了此種篤厚的友誼，國際資本主義者乃有充分的把握將中國人民剩餘的勞動盡量榨去！中國的教育愈新，愈進步，中外的友誼愈易進於篤厚，中國人民的剩餘勞動愈易化成剩餘價值而入國際資本主義者的荷包。（c）中外友誼篤厚了，倘中國的剝削階級或有產階級，或統治階級，以及一切依賴他們而生存的寄生分子，不曉得享受現代文明的幸福，那末篤厚的友誼，於國際資本主義者是毫無用處的。國際資本主義者要榨取中國人民的剩餘勞動，同時還要高等華人替他消納商品。華人如何能成為高等的？如何乃能替國際資本主義者消納商品？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受高等教育。一個中國人因受了高等教育，而成了高等華人，一家也隨着高等起來。甚至親戚朋友也隨着高等起來。人既高等了，在歐化東漸（已經不是漸，而是深入了）的過程中，在國際資本主義榨取中國人民剩餘勞動的過程中，凡顯出兩種最大的作用：一方面將民衆的剩餘勞動攬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復將此剩餘勞動灌入外國資本家的荷包之內。前者的作用，要做官，要做地主，要做軍閥，纔能顯出。換言之，要能吃國稅，吃地租纔能顯出。後者的作用，要善於享受現代文明生活，纔能顯出。換言之，要善於佈置客廳？善於玩弄女子，善於講究衛生之道等等，纔能顯出。中國的新教育，未必祇造成了這種有用的高等華人。

但這種有用的高等華人，畢竟出自新教育。至是我們可以下一結論曰：經濟落後的中國，套進了世界的經濟網，加入了世界的社會關係，舊教育乃顯然無用。爲要應付世界的新社會關係，幾千年的舊教育，乃變成一個嶄新。新教育於中國尚沒有出息，於國際資本主義却成了必要的：開通風氣，以便國際資本主義者進來，一也；造成中外的親善，在親善的前提之下，中國人民的剩餘勞動，得充分轉入國際資本主義者之荷包，二也；提高了高等華人享受現代文明生活的程度，三也。把殖民地或經濟落後國家的人民享受現代文明生活的程度提高，本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夙願。但國際資本主義者一方面要人替他銷納商品，另一方面又要人替他創造剩餘價值。創造剩餘價值的，決不能銷納多量的商品；能夠多量銷納商品的，決不會創造剩餘價值。這樣一來，殖民地或經濟落後國家的人民，必然祇有一部份能夠享受現代的文明生活。中國現在所有的這樣的一部份人，在國際資本主義者奪取中國人民的剩餘勞動之過程中，顯出了兩個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坐收國稅地租，替國際資本主義者聚積剩餘價值；另一方面，替銷洋貨商品，替國際資本主義者實現剩餘價值。現在頗有人說起了學問之效用問題。學問究竟有用抑無用，我這裏不談，但新教育下之新人物，却有這此新的用處。這便是殖民地新教育最後的結果。也便是國際資本主義者希望殖民地改造教育的

成功！

二〇、開通風氣

上面是一個汎論，現在且進而分別詳述之。先從開通風氣一點說起。開通風氣一事，在國際資本主義者眼中，甚爲必要。且以義和團爲例。義和團之活動，始則排外，終則引起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這事於中國固無益，於國際資本主義者亦有損；倘這等事常常發生，則國際資本主義者被其威脅，被其打擾，將不能在中國活動。於是防止這等事之繼續發生，成了必要。如何始能防止這等事之繼續發生呢？最根本的方法，唯有開通風氣。義和團之爲物，本是反抗國際資本主義之農民集團。他們的暴動，乃中國農民第一次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豪舉。但他們（一）自始至終爲迷信所支配。他們稱自己所玩之武術爲神拳。以降神號衆，號令都用神語。傳習時，習者伏地焚符誦咒，緊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便曰神已降下。起而操刀狂舞，其狀當令人發笑。待法術練好，自謂可以避槍砲。至於他們所信的神，以及迷信程度之深，可於其咒言中看出。有一咒文曰：『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泰，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李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從高擡

彥著中國近百年史綱要二二七頁轉錄）這種迷信的成分，當然是下等神怪小說，在農民中傳播出來的。但反抗國際資本主義時，竟成了興奮劑，原動力。（2）義和團服見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勢力，一天一天在國內雄厚起來；所謂西洋的物質文明，漸漸傳遍中國，與中國舊文明根本相反。他們以為這是禍中國的；（事實上本也是禍中國的。）於是毀鐵路，燬電線，燒教堂，目教徒為二毛子。凡藏有洋書洋報的，捉了就殺。他們這種舉動，與最近過去四川的神兵，頗相彷彿。四川的神兵，也是農民之帶有反國際資本主義意識者；其活動也以迷信為原動力。其最妙的文告有曰：『燕山中華大國一體之（知）悉！兵情因世道衰惟（微），天下人民，難以得生。明朝乃本國人民，坐定天下，有愛民如子之意。明末清初，蒙古國人民有見民如意。至光緒王，重（衆）臣與陽（洋）國通商，逆賊當擒（權），文臣廷（停）考，武將廷（停）權。文立高等學校，武立緊（警）察；暗將大清推倒，以校（效）外陽（洋）至（制）度，各逞英雄豪傑，中華大國，以（已）成犬馬之地都不如了。至今上帝開恩倒旨，桃山清原廟（妙）道真君，傳下仙法。保定八牛，受其司令之置（職）。各國各省，暗暗相通。各省人民，以（已）校（效）此法。任他各等鎗（槍）砲，概作無用。重（衆）民知悉，切切此示。』（從張振之的革命與宗教上轉錄來的）這與義和團的精神初無二致。（3）以迷信為動力，竟可以引出反抗國際資

本主義的大運動，這是國際資本主義者所最不能容忍的。既不能容忍，祇有逼迫中國發展新教育，以圖開通風氣。風氣開通了，迷信的對象，漸漸由豬八戒孫悟空等轉移到救主耶穌基督；國際資本主義者才稍稍放心。

二、教會勢力與中國人之歐化

中國自辦新教育，固然可以開通風氣，使國際資本主義者放心。但國際資本主義者侵略中國之先鋒隊教會教士等於此亦大有貢獻。(1)教會勢力之侵入中國，爲時頗早。自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至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中國前後與俄，英，法，美，德，丹，荷，日，比，葡，瑞典等國訂過許多通商條約，條約中都有保護教士，便利傳教的明文。光緒時下過好幾道關於保護教會的明令，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命令保護外國教會；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命令保護教會及禁止謠言；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九年)命令官吏消除教會之困難，并保護教士之來往。中國當局這樣努力保護的結果，教會勢力乃在中國無限的滋長發榮。(2)同時教士之地位在中國復提得很高。例如天主教與中國官廳正來的關係，於光緒二十五年得清帝之許可，存案於總理衙門；主教(Bishop)與總督巡撫同級，總辦甫(Head Priests)與布政使，按察使及道員同級。其餘同於府縣官。殖民地既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威勢，對他們教士的地位，都

提得這樣高。教士既經政府明令保護，地位復提得很高，於是耀武揚威，漸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勢力常可以壓倒中國官吏。（3）教士有勢力了，教會跟着有勢力。恰好這時中國社會上衝突也最激烈：農民與地主的衝突，債務者與債權者的衝突，等等都極緊張。個個想在社會上取得優勢（如地主債權者等）或避免受人蹂躪。（如農民債務者等）聽聞教會能替人保鏢，乃很勇敢的向教會跑。一個人進了教會，果然在社會上可以傲慢起來；於是大家羨慕，相與同進教會而為教徒。中國進教會的人，十之八九是想托庇於教會勢力，決不是為着什麼上帝。（4）中國人既變成教士，那於國際資本主義者便有很多好處了；他們拋棄原有一切的習慣，思想，而與洋教士相周旋；把西洋的風俗習慣思想等竭力迎受。這樣一來，他們自身已變成西洋人了。於是西洋的商品的輸入，他們不反對；西洋的資本的輸入，他們不反對；西洋一切生活方法的輸入他們不反對。不獨自己不反對，且極力歌誦，謂中國的一切都不行，祇有西洋的要得。不獨歌誦而已，并極力勸同胞熱心迎受。這於開通風氣，是何等的有作用！這比起義和團之反抗國際資本主義運動來，是何等的文明！雖然，西方來的教士，未必相信他們自己是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先鋒隊；未必相信他們自己在歐化東方人，使迎受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但事實上他們的工作却是如此的。

二、教會的工具與中國人的歐化

中國人之加入教會爲教徒，原來是想托洋勢力的庇護。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之動機：想向教會找飯碗是也。中國人的生活，日益陷於窘迫之中，聽說教會可予人以職業，乃驚喜欲狂，唯恐不得其門而入。教會初入中國，正恐不得推廣。於今既有許多想向教會謀職業的，那便是教會發展之絕好機會了。於是以廉價，甚至不花一文錢，把中國的男女青年收去；稍稍加以訓練，作他們的工具。這些工具，經過多少訓練，已經完全歐化了，於是回轉頭來歐化其餘的中國人。他們之作工具，依其工作性質之不同，可分爲種種：或則爲宣講員，或則爲教書匠，或則爲看護士、名目繁多，不勝枚舉。茲列一華人分區服務教會的表於次，以見一般。

國 中	區 域		人 數 (內分(1)已受聖職者(2)傳福音者(3)男女教員(4) (各級教育區員(5)男女學生(6)看護等(7)雇員)
	滿洲	蒙古	河北
	二二〇三人	一三九	四五八三

中		部南國中				部中國中			部東國中				部北																
甘肅	二四〇	新疆	三一	雲西	六九八	廣東	七六〇二	福建	九七九七	湖南	三二五五	湖北	三六三五	河南	二八五六	江西	二〇二五	安徽	一七一八	浙江	四六二九	江蘇	七八九四	陝西	一〇四七	山西	一四四五	山東	七〇五〇

國 西 部		
四川	三九九七	
貴州	五一九	
雲南	六〇八	
合計	六六〇七三	

上表係就中國年鑑一九八二頁上之表改編而成。我料國民革命之宣傳員的分配，恐亦無若是之勻稱。然國民革命已被不完備的宣傳推動了；則教會人員在社會上對一般人潛移默化的力量之偉大，可想而知。

二三、教會教育之勢力

教士，教會，教徒，以及替教會服務的人員，都能使中國歐化；都能於不知不覺之中，消除中外的隔閡。不獨消除隔閡而已，且可以建立中外的感情，使中外融成一片，任國際資本主義者暢暢快快的來肆行侵略。此外教會教育，亦有與此同樣的作用。(1)教會教育勢力之大，倘不加以制裁，老早便可以把中國人自辦的教育壓下去，使不能抬頭。幸民國十年到民國十三年的幾年之內，國人有強烈的反抗，教會教育在外表上才漸漸不如前此之猖獗。據中國年鑑所載民國十年調查的結果看，教會在華所辦學校、單祇專門以上學校，便有二十四所之多。北

平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廣州的嶺南大學，湖南的雅禮大學，湖北的文華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等，其最著者。當時我國自己所謂國立專門以上學校，總共祇有二十三所！（中國年鑑一八四〇頁）尙不及教會學校之多。即連國立，省立，公立合計，也祇有專門以上學校七十二所。教會學校，且有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以上！單就數量講，教會學校也就足夠引人注意了。何況他們的經費，有一定的來源，不受政治的影響；他們的辦法，有老於辦學校的洋人，指導管理，事事秩然有序。（2）教習專門以上學校，數目既有如此之多，經費又充足，辦法復整齊，同時又不受政治的影響；於是一般官僚，地主，富商大賈以及軍閥買辦等，乃相率送子弟入教會學校，謂國人自辦之學校爲「告乏子」學校，經費不充足，設備不完全，管理不嚴格，不足以訓練他們的子弟。他們的子弟們，則以教會學校樣樣都是洋式，服裝整齊，教員有外國人，教科書有外國原本，說話作文，一以洋文爲準；在這樣的學校讀書，格外令人羨慕。於是唯恐進去太晚。教會學校自己，至是亦趾高氣揚，藐視一切。官僚，地主，軍閥等爲他們捧場；教士教會教徒以及服務教會的人員爲他們捧場；已進來了青年，爲他們狂吹；未進來的青年望着他們欣羨。這樣一來，教會學校自然要在社會上佔大勢力，自然可以壓倒國人自辦的學校。這還祇是指專門以上

的學校而言。至於中小學校等，其勢力也一樣的不可侮。幾年以前，我在長沙，曾見青年會與教會總動員，一禮拜之內，成立了一百餘所小學校！祇此一例便可想見教會教育發展之神速。(3)教會教育，在殖民地有什麼功用？使中國拋棄舊思想舊習慣等一也。教會教育，本是最守舊的。為何能使中國人拋棄舊思想舊習慣等？這有原因。蓋他們之守舊，係對帝國主義守舊，不是對中國守舊。他們若中國青年，向帝國主義者懷裏拖，或向國際資本主義者懷裏拖。中國青年於無形之中，便拋棄了中國的舊思想舊習慣等。使西洋文明，加速度的輸入中國二也。使中外兩方的思想習慣等融成一片三也。使國際資本主義者的侵略，可以更加暢行無礙四也。分別說來，固有這些功用。合而言之，祇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侵略中國。

二四、教會學校學生之發達

上面所述，僅限於專門以上學校及學生。至若中小學校及學生，其在中國發達之速，也要令人興歎。茲且單就耶穌新教學校及學生列表於次，以見一般。

區域	部 北 國 中	部 東 國 中	部 中 國 中
滿洲 蒙古 河北 山東 山西 陝西	江蘇 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學校總數（初高兩級小學及中學）	二七八校 三三 三八四 一一二四 一七二 一〇一	五二五 三五五 二三一 一八九	三一二 三六三 二九三
學生總數（初高兩級小學及中學生）	七、五九九九人 七九九 一三、六九五 二一、三五四 四、二四〇 二、二四六	一九、八八八 一〇、五九二 五、六〇四 五、〇六二	七、一〇七 一一、〇八六 八、六八五

合計	中國西部					中國南部		
	雲南	貴州	四川	甘肅	新疆	廣西	廣東	福建
六、八七一校	六八	九二	四八二	一七	三	五七	八二四	九六八
一八九、六四九人	二、〇一六	一、七九八	八、六六四	四八六	七四	一、五一三	二五、四九六	三一、六九〇

這張表是按中國年鑑一九八四頁上之表編成。計學生總數有一八九、六四九人。這些學生，自己由教會學校出身，固已完全歐化了。他們自己在社會上活動，其影響他人的效力，又是很大。於是無形之中，他們自身又成歐化中國人之工具；時時刻刻在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歐化中國人；使中國人拋棄自己的風俗習慣思想，吸收西洋文明，歡迎國際資本主義者的侵略。教會學校辦得愈多，

中國人歐化愈快，國際資本主義者侵略的手續愈易。近數十年來，國際資本主義者，一定要強迫中國當局保護教士，保護教會，保護教會學校；其真正意義在此。至若用退還的賠款在中國興學，獎勵中國新興的文化事業，優待留學生到各國大學讀書，其真正意義也在此。

二五、買辦教育概論

講到這裏，我們最宜把中國教育對國際資本主義的功用概括的重行指出，而以「買辦教育」四字代表之。（1）從經濟的意義上講，中國的教育可稱為買辦教育。換言之，買辦教育之所以為買辦教育，完全是因為經濟的意義，中國現在經濟上，有一件衆人都曉得的事情：即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之侵入是也。國際資本主義者要到中國來建築鐵路，要到中國來開礦，要到中國來興辦工廠，要到中國來開商店，要到中國來開銀行，要到中國來開醫院。綜而言之，即要向中國移植其剩餘的資本，要向中國推銷其剩餘的商品，并要從中國吸收他們自己所缺少而又必需的原料。這等欲求愈易達到，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前途便愈有利益。中國近幾十年的新教育，恰恰是幫助他們達到這等欲求的。所以中國的新教育，於無形之中，成了買辦教育。（2）中國的新教育何以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達到這等欲求的呢？這在本節的開端，我們便已提及了。例如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初來，挾帶着許多「奇技淫巧」，向中國農村輸入；中國農民，未曾習見，以為是亡人家

國的，（事實上本也是亡人家國的）於是相率拒絕，不予接收；甚至氣憤之極，演出流血慘劇。這於國際資本主義者的欲求之達到，便有極大的妨礙了。中國的新教育於此，把風氣一開，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乃得湧入。這不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達到欲求嗎？開通風氣，還祇是最低限度的一件事。至於培植新人材，以從事於中外兩方的拉攏工作，或友義的聯絡，如外交家學者之所為；或從事於中外兩方的經濟關係之溝通，如各種買辦之所為；皆於國際資本主義者有大利，皆是幫助國際資本主義者達到其欲求的。此外新教育以新的暗示，提高中國人之新慾望，引起中國人之新興趣，使他們戀戀不舍於所謂西洋物質文明的享受，更無一不是便利國際資本主義者的，無一不是使他們向中國迅速達到其新欲求的。（3）中國的新教育，何以有這大的魔力？這祇要一個字可以解釋，所謂「新」是也。要把教育辦成新的，不得不把幾千年傳下的古董，如舊思想，舊學問，舊道德，舊習慣，舊風俗等漸漸拋棄。要把教育辦成新的，不得不把傳遍世界的所謂新文明，如新思想，新學說，新制度，新道德，新習慣等一律吸收進來。舊的拋棄完了，中國人便新了一半，新的吸收完了，中國人便成了全新。幾十年來的新教育，無一天不在聚精會神，造這種全新人物。誰知中國人若成了全新，便已不成其為中國人了。他們幾乎變成了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家人，非其服不服，非其

言不言，非其行不行。這并不是中國人之罪；這祇緣幾十年新教育的薰陶，把他們融化於國際資本主義的文明之內，造成這個樣子。人既成了這個樣子，縱令個個不忘祖國，事實上却個個成了買辦。然則提倡復古，如戴季陶何鍵等先生之所爲，可乎不可？這在戴何等先生當然是以爲可的。但我們則期期以爲不可。中國教育之買辦化，固由於「新」；要使中國教育脫去買辦的性質，却不在復返乎「舊」。重要之點，祇在反對國際資本主義與否，或反對帝國主義與否之一問題。倘教育而能反對帝國主義者，則無論如何新，將不復再是買辦教育，甚且轉成爲革命的教育。倘教育不許反對帝國主義者，則無論如何舊，將依然是買辦教育，甚且轉成賣國教育。（4）今日中國的教育機關或有教育作用之機關愈高等，愈專門，便愈富買辦性，換言之，便都不反帝國主義。遍布於國中的教會或青年會，原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先鋒，當然不反對帝國主義。教會學校，或類似教會學校之文化機關，也是國際資本主義者的先鋒，也不反對帝國主義。剩下國人自辦之大學校，專門學校中等學校，又以反對帝國主義與反革命有連帶關係；從前尙稱「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今則一般人似乎都以爲「讀書要忘救國，救國限於讀書」。所讀之書，果有一部分含有反帝國主義之理論者，果有一部分不是替資本主義文化捧場者，那還可以。祇惜今之教育當局，最不喜反帝國主義之

理論，復舍不得拋棄資本主義之文明。事實如此，培植人才之所，乃於無形之中自然買辦化。

二六、買辦教育與出版界

買辦教育逐漸發達，出版事業，亦隨之漸漸繁榮。這兩者的關係，至為密切。學校青年，需要出版物；以作知識的糧食；同時出版界亦須學校發達，出版物才有市場。因此之故，近幾十年來出版界遂顯出極偉大的成績，極迅速的進步。單以上海商務印書館一家的出版事業為例，其每年所出新書之種類及冊數有如左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二七三頁）

年份	新書種類	新書冊數
光緒二十八年	一五種	二七冊
光緒二十九年	五一	六〇
光緒三十年	三五	一〇三
光緒三十一年	四九	一四二
光緒三十二年	一一一	二〇五
光緒三十三年	一八二	四三五
光緒三十四年	一六九	二六一
宣統元年	一二六	四二〇

宣統二年	一二七	三八九
宣統三年	一四一	五八三
民國元年	一三二	四〇七
民國二年	二一九	五六五
民國三年	二九三	六三四
民國四年	二九三	五五二
民國五年	二三四	一、一六九
民國六年	三二二	六四一
民國七年	四二二	六四〇
民國八年	二四九	六〇二
民國九年	三五二	一、二八四
民國十年	二三〇	七七三
民國十一年	二八九	六八七
民國十二年	六六七	三、四五四

第五章 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教育

民國十三年	五四〇	九二一
民國十四年	五五三	一、〇四九
民國十五年	五九五	一、二一〇
民國十六年	二九七	五三五
民國十七年	四五六	五四四
民國十八年	四五一	七二四
民國十九年	四三九	七〇三

就這個表後面的按語云「……偶有數年出版新書較前一年減退，或較後一年反多者，大半前者因戰事關係，後者因大部預約書或大部書單行本在該年度出版。故大體上每年出版新書的數量，均有增進。」新書這樣的增進，一方面固表示出版事業本身的發達，另一方面却正表示教育界對新書的需要也逐漸增加。新書中最足以傳播思想的，厥為社會科學與文學。而這兩者出版的數量，亦較其他各種為多。單就商務印書館一家的出版物看，社會科學數量最多，居第一位，占全體百分之二九·七三，文學居第二位，占全體百分之二〇·六六，兩者合計，占全體百分之五〇·三九！超過

半數以上！（參看全書二七二頁）然這半數以上之出版物中，所包含的思想，都不是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都不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特如此，且都是擁護資本主義文化之有效工具。這樣看來，出版事業之發達，在經濟落後的中國，恰恰幫助了買辦教育之推行！我們若不討厭新名詞者，則中國的出版界，除最近被壓迫不能抬頭之極小書店外，大可稱之爲「買辦的出版界」。

二七、出版事業之買辦性

出版事業之發達，在經濟落後的中國，恰恰幫助了買辦教育之推行。這一個事實，便已構成了出版事業本身之買辦性。同時出版事業之發達，引起大量外國紙料，外國印刷機，以及其他一切印刷用之材料的輸入；這又是構成出版事業之買辦性的。單以洋紙一項而論，據海關華洋貿易報告冊的統計，有如左表。

年份	輸入數值	數值指數
民國元年	三、四四六、五四七兩	一〇〇
民國二年	六、一二〇、八九二	一七七
民國三年	五、五七〇、〇九三	一六二
民國四年	四、五九五、一七四	一三三

民國五年	八、二〇八、八五〇	二三八
民國六年	五、五五九、九八六	一六一
民國七年	六、三八七、三〇六	一八五
民國八年	九、三五九、八〇九	二七〇
民國九年	一三、一〇二、一一六	三八〇
民國十年	一三、二五七、六六四	三八四
民國十一年	一二、六八二、九九三	三六六
民國十二年	一八、〇七八、七一七	五二三
民國十三年	二二、六二五、八九四	六五五
民國十四年	一九、〇八〇、九七七	五一
民國十五年	二七、六六八、六九二	八〇三
民國十六年	二五、四一六、三八四	七三六
民國十七年	二九、〇四八、八二五	八四〇
民國十八年	二四、二四五、七一五	七二〇

每年單祇洋紙一項的進口數值，便達二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一十五兩銀子！再就鉛印石印等材料輸入的數值看，則如左表：

年份	數值	數值指數
民國九年	九一二、五六〇兩	一〇〇・〇〇
民國十年	八五八、二六一	九三・八六
民國十一年	八一六、〇一	九八・四九
民國十二年	一、一三九、三九〇	一二四・八九
民國十三年	一、三一〇、六五五	一四四・二八
民國十四年	八一八、九八二	八九・六九
民國十五年	一、四四〇、八九二	一五七・八九
民國十六年	九七八、八一〇	一〇七・二四
民國十七年	一、七八一、七九二	一九五・二九
民國十八年	一、五五〇、三六八	一六九・五五

十七年一年的輸入總值達一百七十八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兩！印刷機之輸入，則如左表：

中國社會之現狀

三五〇

年份	數值	數值指數
民國十三年	一、〇三一、四四九兩	一〇〇・〇〇
民國十四年	六五一、四八七	六三・二一
民國十五年	五七九、六八一	五七・三八
民國十六年	四三四、五二八	四二・一三
民國十七年	七九六、〇九三	七四・六六
民國十八年	一、三一九、九九三	一二八・〇六

合洋紙印刷材料及印刷機等項計算，每年輸入總數值，共達二千七百餘萬兩之鉅！現在中國國立大學，每所經費，每年很少有達一百萬兩的。（達一百萬兩的亦極少！）即以一百萬兩計算，上述每年損失之數，大可以抵二十七所大學校之經費。

第六章 思想的變動

思想的變動，依經濟的基礎，社會的階級，以及政治教育等等的變遷，可分爲下之三項討論：一，歷史上最得勢力的舊思想之鳥瞰；二，近數十年來資本主義思想之漸漸成立；三，無產階級哲學思潮之方興未艾。

第一節 最便於統治階級的舊思想

一、周末，思想發達之原因

中國舊有思想的發達，當然以周末爲最惹人注意；這已成了極普通的常識，用不着詳述了。周末的時候，思想爲何特別發達呢？曾有人舉出了許多極含糊的理。有的說：由於振興天下綱紀之必要；由於言論思想之自由；由於人材登庸之道大開。（參看張

宗元林科棠譯中國倫理學史。）有的說：由於蘊蓄之宏富，由於社會之變遷，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由於交通之頻繁，由於人材之見重，由於文學之趨簡。（參看王桐齡中國史第一編第四章。）梁任公則更從三個特殊方面，舉出一十六大理由；其要如次：甲，政治方面，一，兼併盛行，二，特種階級（指貴族）消滅，三，境內諸民族同化已熟，四，各國競務修明法度，五，獨裁政體已成，六，戰爭的影響。乙，社會經濟方面，一，大都會發生，二，經濟重心漸由農業進於工商業，三，農夫失業而為新奴隸階級。丙，學術方面，一，智識下逮普及，二，智識平均發展，三，列國相競延攬人材，四，交換智識之機會多，五，書籍已甚流行，六，社會變遷太劇，七，文化之根蒂深厚。（參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〇〇到一〇四頁）三書合計，共舉二十五大理由。其中除農民失業，淪為新奴隸一項稍為具體以外，其餘多極含胡籠惘。如社會變遷之劇烈，文化根蒂之深厚，何等的含胡籠惘！不含胡籠惘者，又皆屬於促進思想之條件，而非引起思想之基因。如人材之延攬，言論之自由，書籍之流行等，都祇是促進思想之條件。然則引起思想之基因何在？此可以一言蔽之曰，階級對立之局面的嚴重化。我們不能說上舉二十五個理由與思想之發達沒有關係，但我們認為引起思想之基本原因，却在階級對立之局面的嚴重化。當時經濟發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農業生產極

富；農村中可以取出大量的地租。又因農產品及手工業品的交換，商業的擴大，產生出雄厚的商業資本。大量的地租，雄厚的商業資本無處安置時，又常轉變為高利貸資本。（參看第二章第一節）直接或間接運用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及地租以剝削他人之剩餘勞動的，為貴族（或特權者）為官僚，為地主。直接間接被這三種東西剝削的為農民，為手藝人，為小商人及手工業者。剝削的程度加緊，則被剝削者常因支持不住，逃出生產關係之外，成為流氓。（參看第三章第一節）流氓之數愈多，作奸犯科的日衆，社會的次序，或階級的次序，必然的混亂。為欲防止或消滅此種亂混，乃有種種的思想學說。孔子的「仁」，是防止此混亂的；孟子的「義」是防止此混亂的；荀卿的「禮」，是防止此混亂的；韓非的「法」，是防止此混亂的；乃至老子的「無治主義」（此為梁任公所取之新名，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〇七頁）仍是防止此種混亂的。

二、孔老墨三大派

為欲防止階級次序之混亂，諸種思想乃相繼發生。在周末諸種思想中，以孔老墨為最著名的三大派。（一）孔派以孔子為創始人。孔子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曆紀元前五五一年）生於魯之昌平鄉。魯為周公所封之地，雖當亂世，仍有周公所遺下來的禮樂。孔子尊周公為理想人物，大概這也是一個原因。他一生學無常師；凡有一藝一能的人，他似乎都可以師事

之。二十餘歲之時，就有弟子學於其門。後來赴周，調查周之制度文物，且問禮於老子。時老子爲周之守藏吏，職如今之圖書館長，年紀比孔子大些。孔子歸國教導弟子，時魯國大亂，他乃跑到齊國。當時齊景公很想用他參與國政；因晏嬰反對，事遂中止。孔子不得已，再歸國，遂用於魯。曾由中都宰升至司寇。當時魯有聲名赫赫之大夫少正卯，因紊亂政治之故，孔子竟毅然殺之。爲政三月，魯國大治。後爲齊國所拒，志不得逞，乃周遊列國。先到衛，後到陳，再到匡。每到一處，便以自己的懷抱，向當局陳述。哀公十一年，年已六十八歲，歸魯。至是絕意仕途，整理經籍，修春秋，講學問。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歷紀元前四七九年）歿。（二）老派以老子爲首創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出生年月不詳。據一般的推測，他大概是紀元前六百年時代的人。事跡也不大清楚。他曾做過周室的守藏吏。孔子向他問禮的時候，正是他做守藏吏的時候。他因閱世甚深，晚年頗想隱遁。西行至函谷關，被關令尹喜要住，乃著書五千餘言，後人稱之爲道德經。（三）墨派以墨子爲首。墨子名翟，爲宋人，較孔子後出。爲周末之大學問家。曾仕宋爲大夫，其出身年月不詳。莊子說他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孟子稱他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他實是一個持兼愛之說，而注重實行的人。孔老墨三家的學說，後人所熟知的，爲墨子的「兼愛」，孔子的「仁」，及

老子的「道」。墨子論兼愛有曰：「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孔子的仁，意義極不容易捉摩。蔡元培概括之曰：「孔子平日所言之仁，則即以爲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故其爲諸弟子言者，因人而異，又或對同一之人，而因時而異。或言修己，或言治人，或糾其所短，要不外乎引之於全德而已。……仁爲最高之人格，而又人人時時，有可達到之機緣。」（中國倫理學史十九頁）老子的道，據他自己說如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他又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做人的道理，在乎取法於這樣的道。所以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說均見老子）孔老墨三家的基本主張，約略如上：一主「仁」，一主「道」，一主「兼愛」。後來由這三家演出的學派，有最得勢的，有極不得勢，因而失傳的。

三、不十分得勢的道家

例如老學或後人所稱的道家，便是不十分得勢的。老子的學說，（a）以道爲基本主張，上面曾說過。道體是虛靜的，道是取法自然的。他說：「萬物并作，吾以觀

其復。夫物芸芸然，各歸其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道體既虛靜，又取法乎自然；人類生活，亦當復返於虛靜，而純在自然。依此主張，遂有（b）他的理想社會。他的理想社會，即是太古的簡樸社會。他以爲太古的人，不識不知，無爲無欲，如嬰兒一樣，最近於道體，最能法自然。他說：「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還。」這便是他的理想社會。（c）這種理想社會是不能維持長久的。社會經濟的發達，由經濟裏面孕育出來的階級衝突，由階級衝突反映出來的政治紛擾，在在足以破壞理想社會，在在足以使人離開道體之虛靜，而違反自然。社會既離開了道體之虛靜，而違反自然，於是救濟之法隨着多起來。於是乎有仁義，有道德，有望賢，有法度等等的制作營爲。這些制作營爲，不獨不能使社會復反於道體之虛靜，而回到自然狀態。結果反使之愈離愈遠。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紛亂，有忠臣。」又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無願之，則攘臂而爭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理想社會，維持不住；社會次序已經混亂起來了；然則怎樣辦法呢？他有最好的辦法，即（d）一般人所稱道的「無爲主義」，或「無治主義」是也。他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利益多，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然，不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耳目也，聖人皆孩之。」老子學說之基本主張爲道；但最惹人注意的却是「無爲主義」。不過「無爲主義」雖惹人注意，同時又是老學不能得勢的原因。這一點我們要稍稍批評一下。他的「無爲主義」完全建築在「有爲」上。他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故他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這裏他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以「上之有爲」，當作民之難治的原因！而不知「上之有爲」，乃民之難治的結果。他把因果這樣倒置，努力主張無爲，不知民之難治的原因別有所在；這是他的學說不能得勢的第一點。民之難治，理想社會之動搖，以及現實社會之混亂，都祇是社會經濟發達到相當

程度時，階級衝突劇烈之必然結果。他不懂這道理，不去分析階級的衝突，不尋出階級衝突的原因來，不懂得剝削的經濟關係；祇從枝葉上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結果適得其反；不獨聖智仁義不能棄絕，反而一天一天發生聖智仁義的需要，大有聖智仁義不可一朝去之勢。這是他學說不能得勢的又一點。剝削的經濟關係，日益發展；階級的對立之局，日益嚴重；社會是必然要混亂的。如果不圖根本的救治，不打算推倒剝削的經濟關係；祇有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祇有尊重聖智，提倡仁義。老子於治本的辦法既沒有找出，於治標的辦法又不贊成。究竟叫統治階級何所依據？這是他趕不上孔家學說之處，這也是老學不能得勢的又一個根本的弱點。

四、爲何墨家也不得勢

墨家學說之不得勢，應當（a）分爲兩方面論述。若就統治階級一方面說，墨家學說，實在未曾有過何等影響，未曾占過何等勢力。若就被壓迫的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乃至現在的農民及手工業者，幾乎無一個不是墨學的實行家。這一個分別，不弄清楚，不便敘述墨學（b）墨學在統治階級方面何以不得勢呢？這是由於墨子的主張，根本上有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相刺謬處。統治階級因剝削農民及手工業者的剩餘勞動，生活優裕，可以享樂，可以窮奢極慾。墨子不善逢迎，竟主張節用，主張非樂。統治階級

要用「慎終追遠」的方法，以期「民德歸厚」，便於統治；故最重厚葬久喪。墨子却主張節葬短喪。他主張節用有曰：「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輶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率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不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紬繅之衣，輕且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不爲。」（節用中）當墨子之世，統治階級早已向農民及手工業者施行剝削，早可以過優裕的生活。「諸加費不加於民利」的作爲，在他們自己看，看是尋常極了，并且很必要。墨子之說，實與他們不利。墨子主張非樂的理由曰：「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當卽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民衣食之財將安得乎？……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等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非樂上）統治階級之斂民財以興樂，本是爲的自己。墨子謂鳴鼓琴瑟笙等之聲，不足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無與乎民之飢寒勞苦。這根本說得不投機，應該沒有人睬。至若厚葬久喪，是使「民德歸厚」的工具。墨子不解統治階級這個秘決，偏要說：「計厚葬，爲多埋賦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已成者，挾而埋之；從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

得焉。」（節葬下）厚葬久喪，在統治階級一方面，是易行且必須行的。墨子以爲無補於民之求富，想加以否定，那便非統治階級所能贊成的了。（c）墨學在民間，却是不折不扣的實行了。這因爲被壓迫被剝削的農工，窮到水盡山窮，謀生存且不易，最合於做墨家。薄葬短喪，節用非樂，等等辦法，即無庸置其人出來主張，農民及手工業者，依然會一律採用。何以故呢？他們窮極了，事實上不能厚葬久喪，侈用興樂。即不懂得墨子的主義，却早已做了墨子的真實信徒。莊子天下篇曰：「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被壓迫的農工，究竟有幾個不是這樣！墨子學說，是階級社會裏的產物。墨子看見了被壓迫階級的窮，故極力主張節儉。但統治階級是不窮的，是要奢侈的，斷不接納墨子的學說。墨子的兼愛，非攻，節用，非樂等主張，無不是人民貧苦的反映。知道人民貧苦了，要他們過簡約的生活，那如順水推舟，毫不費力。但要窮的統治階級也過簡約的生活，那何可能？墨子的學說，不得勢於統治階級，主要原因在此。

五、孔家學說成功之理由

老學未十分得勢，墨學幾乎全不得勢。獨有孔家，能壓倒衆流，爲統治階級的良好工具。這究竟由於一些什麼原因？現爲明瞭起見，分述於下：（a）孔家學說中的等級思想，最合於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對立。孔子常分君子與小人的兩等。君子總是高出

小人之上的。他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論語陽貨）「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同上）「君子不仁者有之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這種說話，完全是階級對立的反映。社會上已經有階級了；孔子想從已成之局裏面找出意義來，遂認人性根本上有君子小人之別。這正如Aristotle之擁護奴隸制一樣。Aristotle眼看見希臘奴隸制的盛行，想找出其存在并盛行之理由，遂認「等級原理」(Principle of Gradation)爲遍存於一切事物之原理。孔子這個看法，經孟子的推演，便更適於階級對立之局。孟子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這也叫做天下之通義，當然是有理由的。孟子舉出理由說：「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從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

也。此爲大人而已矣。」（荀子上）這一段話，雖然分立「耳目之官」與「心之官」，雖然分立所謂「大者」與「小者」，似爲大人與小人之分界。但何以有些人能先立乎其「大者」，有些人不能；他依然解答不來。他的大人小人之分，勞心者與勞力者之分，依然出於武斷。但孔家的學人，卻根據這種武斷，努力發展階級之說，自己站在統治階級一邊，替統治階級作工具，直接間接從事於鎮壓農工的任務。階級學說在荀子口中，也講得最乾脆。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是之謂大本。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篇）統治階級最怕階級次序動搖。孔家的學人們，竟把階級次序看作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這是何等的有益於統治階級！單祇這一點，孔家學說便已大可以得勢了。何況孔家學人尙有根據此一點而發展的許多切合實際需要的學說。（b）例如經濟學說，便是最投合統治階級之要求的。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滕文公上）又曰：「明君制

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不反對剝削制度，主張民有恆產，這是統治階級所贊成的。因為民有恆產，他們便可以繼續剝削哩。（c）不獨止此，更有最合實際需要之「禮」論。荀子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能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篇）孔家學人之主張恆產，主張禮義，都是擁護階級次序的，故最得統治階級之歡迎。為欲使恆產與禮義能收實效，能「驅民之義」，他們又有（d）極完備的教育學說。沿孔子這個系統下來的學人，截至今日為止，沒有不會講教育的。這大家都略知一二，我為節省篇幅計，且不詳述。總括說來，孔家學說之成功最大，歷時最久，蓋因其與統治階級的利益最相融合。孔家學人眼看見社會上已有了階級，便極力尋找理由，以擁護階級的次序，拿這一點堅固統治階級之信心，從而發出經濟論，禮義論，教育論。處處為統治階級畫策；而所畫之策，又極平易可行。此其所以成功最大，歷時最久也。

六、董仲舒及其天人合一說

孔家學說，因特別便利統治階級，為統治階級保鏢；故在秦

說紛糾之中，能獨得勝利。直到漢朝，因集權制的逐漸鞏固，諸種學說，更無存在之餘地了，於是有應運而生的董仲舒，在思想界成就其空前的統一運動。董仲舒之統一思想界，其作用之偉大，與秦始皇之統一中國，恰相伯仲。秦始皇之統一中國，造成偉大之中央集權國家，減少了統治階級內部許多糾紛，鞏固了統治階級自己的陣線。（參看第四章第一節）董仲舒之統一思想界，把思想界弄成一色青；自是中國的思想界更合了統治階級的要求；孔家學說，成了統治階級更有用的武器。董仲舒在中國歷史上地位之高，就這一點看，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他向統治階級提出統一思想的主張，其言有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士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本傳）這一個主張，造成了他歷史上的地位。至於他的學說，是從孔子，孟子，荀子一路演進而來的。孔家學說之演進，處處以便利統治階級為標準。換言之，處處是促進統治術，增厚統治力的。孔子眼裏，社會上階級對立，乃開始從人性中尋找根據，以期尋得維持階級次序之理論基礎；於是一部論語中，隨處可以發見君子小人之對立論。孟子循孔子一個方向尋找，尋出他自己所謂貴，賤，小，

天，大體，小體等，謂「體有貴賤，有大小；……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於是極力發揮其階級論，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荀子則開始從宇宙論中去尋找維持階級次序之理論基礎。謂「君子者天地之參，萬物之總；……謂君臣之分，『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直到董仲舒，乃乾乾脆脆，從天上去尋找維持階級次序之理論基礎。他說：「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春秋繁露）統治階級之統治術，本是事實逼迫出來的；他却代爲向天上去找出根據，這是何等有利的事。他又說：「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之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同上）教統治階級承天之意，來舉所謂大本，那沒有不受歡迎的。董仲舒「天上找到維持階級次序之理論基礎，造成天人合一之說：可算是孔家學說發展之極致。從人說到天，所謂科學家之流，一定認爲是退步，開倒車。但在統治階級方面，却常認爲是再進步沒有的了。」

七、韓愈與孔家學說

韓愈在唐代的地位之重要，正如董仲舒在漢代的地位之重要一樣。

董仲舒在漢代，能叫統治階級將『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使孔家學說有更大的勢力。韓愈在唐代，則排斥老莊，排斥佛教，叫統治階級緊緊握着孔家學說，以爲統治之一種工具。韓愈自己，並沒有新的發明，他祇有蔡元培所謂儒教論。『儒教者，因人類普通之性質，而自然發展，於倫理之法則，已無間然，決不容舍是而他求者也。』（中國倫理學史三十六頁）這樣的儒教，乃韓愈在原道篇裏所擁護的，其言曰：『夫先王之教何耶？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道也易明，其教也易行。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受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則處之而無不膏。是故生得其情，死得其常；郊而天神假，廟而人鬼饗。』這段議論，除贊美現成的階級次序，以及維持階級次序之種種手段外，毫無其他意義。韓愈自命爲孔家學說的繼承人，其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也。』（原道篇）這顯然要以孔家學說的繼承人自居。既然要繼承孔家學說，便不能不排斥老莊與佛教。他於是排老莊曰：『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民』

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使古無聖人，則人類滅久矣。何則？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又曰：「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責冬之裘者曰：曷不易之以葛；責飢之食者曰：曷不易之以飲也。」又曰：「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又曰：「凡吾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而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去仁與義而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原道篇）又排斥佛教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全上）消極方面排斥佛老，積極方面擁護儒教，這便是韓愈對統治階級的功勞。蔡元培說：「其功之不可沒者，在尊孟子，以繼孔子，而標準性情道德仁義之名，揭排斥佛老之幟。」（中國倫理學史三十九頁）那是站在孔家學說的立場應有的好評。歷史上的韓愈，祇是階級次序的維持者，統治階級的擁護者。其崇儒教，其排佛老，著書立說，概爲此而已。

八、宋明理學與朱子

宋之理學，創始於邵康節，周濂溪，張橫渠諸人。到程明道與程伊川兄弟手裏，乃完全確立，二程以後漸漸傳演，至朱晦菴與陸九淵手裏，遂截然分化爲兩大派別。朱重「道問學」，最注意於古訓古義。陸重「尊德性」，頗尚思想的自由。然都爲統治階級的護持者，

並沒有發過半句反統治階級的言論。自明朝以後，理學的勢力，差不多彌漫全國。理學中最重要之點爲動機論。朱陸兩派，雖有「尊德性」與「道問學」之分，然所研究之對象，却同是動機論。動機論自漢朝就漸漸明確了。董仲舒曾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來發展到理學家手裏，乃完全確立。張南軒之言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深淺之不同，而其爲徇己自私，則一而已矣。」這可以說是極端的動機論。動機論在統治階級自己的隊伍裏，並沒有什麼用處，也不一定牠有用。但在人民中間，直接間接的傳播，却有麻醉劑的效用；可以麻醉被壓迫的人民，使不作亂犯上。其効用之大，與基督徒所宣傳之博愛苦行相當。理學中除動機論一項最爲重要以外，其次便是儒教。儒教是由孔家學說凝成的。孔家學說，自漢武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以後，便已漸漸成了國教。但其作用，遠不及在宋明之大。宋明的所謂理學家，先後輩出。講學授徒，遍於國中。其人都篤信動機論；常將動機論應用於日用行事之間。在社會上，很能樹立信仰。後來政府又專以所謂「經義」取士，尤其注重朱子所注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

書。於是稍聰敏的人，自幼便研習四書。達而做官，則益增其說於法令之中；窮而在野，則長書院，設私塾，掌學校教育之權。或爲文士，編述小說劇本，行社會教育之事。於是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凡有子弟，要稍稍認識幾個字的，無不以四書爲讀本。其一知半解，互相傳說之語；雖不識字的人，也常聽慣了，而曉得一些。至於苛細拘苦之處，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亦因風氣已經成了，不能公然違反。縱暗中稍稍違反，表面却仍須裝作奉行。孔家學說，至是乃成了結結實實的教義。成了深入民間的唯一麻醉劑，而爲統治階級所不可少的東西。其所以達到這步，不能不歸功於所謂理學家，尤其不能不歸功於朱子。蔡元培論朱子曰：『宋之有晦菴，猶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孔子以前，道德之理想，表著於言行而已。至孔子而始演述爲學說。孔子以後，道德之學說，雖亦號折衷孔子，而尙在乍離乍合之間。至晦菴而始以其所見之孔教，整齊而釐訂之，使有一定之範圍。蓋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時代，不過具有宗教之形式。而至朱晦菴時代，始確立宗教之權威也。晦菴學術，近以橫渠伊川爲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遠以荀卿爲本，而用語則多取於孟子。於是用以訓釋孔子之言，而成立有宋以後之孔教。彼於孔子以前之說，務以詰訓溝通之。使毋與孔教有所齟齬，於孔子以後之學說若人物，則一以孔教進退之。彼其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徒

黨之衆，既爲自昔儒者所不及。而其爲說也，矯惡過於樂善，方外過於直內，獨斷過於懷疑，拘名義過於得實理，尊秩序過於求均衡，尙保守過於求革新，現在之和平過於未來之希望。此爲古昔北方思想之嫡嗣，與吾族大多數之習慣性相投合，而尤便於有權勢者之所利用；此其所以得憑藉科舉之勢力。而盛行於明以後也。」蔡是站在孔家學說之立場而擁護朱子的；然亦不能不承認朱子之說爲便於有權勢者之所利用。其實朱子之所以爲朱子，壓根兒就因爲他站在統治階級一邊，做他們有用之工具；并不僅其學說便於有權勢者之利用而已。

九、暗地成功的法家

維護統治階級的，本不單止孔家學說。法家也是很重要的。不過法家的成功，沒有孔家的成功那樣顯著。因此之故，人們或真以爲中國祇有孔家學說，別無雜貨。其實歷代的統治階級，固然都利用孔家學說以作護符，同時却也都是法家學說的實行者。我們平心而論，法家可以說是暗地成功的。進一步說，孔家法家，實是統治階級兩個不可分離的工具。孔家學說可以麻醉人心，可以馴服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使不發生反抗運動。法家學說，則可以直接鎮壓人民的反抗，可以補孔家麻醉劑之所不及。兩者實是互相爲用的。然則法家學說的基本要義究竟是什麼呢？這從韓非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韓非子六反篇曰：「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子也十

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子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以決矣。……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答。子多善，用嚴也。」五蠹篇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譏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姦諛弑臣篇曰：「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是以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由這些說話看來，「嚴刑重罰」，殆是法家的一個根本要義。但要施行嚴刑重罰，必須先有一定的標準，否則亦無從施行起。標準是什麼呢？所謂「法」是也。用人篇曰：「釋法術而心刑，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若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顯學篇曰：「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有度篇曰：「巧匠目意中繩，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

擡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懸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上面所述，都是法的意義。以「法」爲治國的標準，以「刑罰」爲達到此標準的手段，這是法家學說中兩個根本要義。照我們現有的常識講，應該先有法，後有刑罰；因法爲標準，刑罰爲手段也。但在歷史上，這兩者却循反常的狀態而發展：刑罰已進步到了不能再進步的程度；而法却依然是令人莫明其妙的東西。我所謂法家暗地成功，實在也祇是指刑罰一方面的成功而言。

法家之成功，并非我一個人的臆說。梁任公曾曰：「法家起戰國中葉，逮其末葉而大成。以道家之人生觀爲後盾，而參用儒墨兩家正名覈實之旨，成爲一種有系統的政治學說。秦人用之，以成統一之業；漢承秦規，得有四百年秩序的發展。蓋漢代政治家蕭何曹參，政論家賈誼晁錯等，皆用其道以規畫天下。及其末流，諸葛亮以偏安艱難之局，猶能使「吏不容奸，人懷自厲」。」三國志諸葛亮傳陳壽評語「其得力亦多出法家」信哉卓然成一家之言，直至今日，其精神之一部分尙可以適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二五三頁）法家一部分精神，豈止「尙可以適用」而已？老實說，歷代統治階級，無不切切實實適用法家一部分的精神。但此一部分精神者，決非前面所述的標準法。而是作手段的

刑罰。中國歷史上刑罰之殘酷，無論那一朝，都是一樣的。這在歷代正史上，都有記載。我們祇要看正史上的刑法志便可明白。遼的且不追述；單就明史刑法志看，即可看到統治階級的刑罰之殘酷。「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職職。以極輕之罪，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滿塗，可爲傷心。」最輕的刑，亦要人家的命，其重的當可想而知了。「嘉靖六年，給事中周璫言：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概加幽繫；案無新故，動以歲時。意喻色授之間，論奏未成，囚骨已糜！又況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姦吏悍卒，倚獄爲市；或扼其飲食以困之，或徒之穢溷以苦之；備諸痛楚，十不一生。」（上均見明史刑法志）這祇是任意舉出的記載。然就此也可推見一個大概。統治階級或未與法家學說接過頭；但事實上歷代統治階級都是法家學說的實行者，都能「嚴刑重罰」，以實現法家學說之一部分精神。

第二節 資本主義社會之思想的傳播

十、思想之轉變

便於統治階級的舊思想，發達到了極點後又轉成與其自身相反之物。代

表這個轉變的，有三大家的學說：一爲戴東原對宋儒埋欲之辨的反駁；二爲黃黎洲對君臣職責的非議；三爲俞理初對男女平權的主張。（a）先述戴東原之說，戴東原名震，休甯人，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著作之有關於學術思想者爲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等。他是反對理學最力的第一個人，其言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恃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慙，口不能道辭者埋屈。」又曰：「自宋儒立理欲之變，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於是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人欲之感，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又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

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又曰：「理欲之辨立，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身見欲之難制。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思無愧怍。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又曰：「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哉！」（上均見孟子字義疏證）孔家學說發達的結果，成了理學；理學發達到極端，可以把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一筆勾銷；可以使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至是與原來的孔家學說完全相反對，使原來孔家學說所欲達的目的，不能達到。這種轉變，乃自然之理；凡一切發榮滋長之物，都不能逃脫自然之理的支配；凡一切發榮滋長之物，都有由其本身轉化爲與其本身相反之物之一日。孔家學說這樣的轉變，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開端。也可以說是農業手工業社會裏的統治思想轉變爲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統治思想之開端。

一一、思想之轉變（續前）

（b）次述黃黎洲的學說。黃黎洲卒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

五年）其學說，也是孔家學說發達到極端的反響。也是農業手工業社會裏的統治思想轉變到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統治思想之開端。其原君及原臣各篇的議論，代表中國政論的一個極大變革；把歷來以統治階級利益爲中心的政論，轉變爲以整個社會利益爲中心的政論。原君篇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漸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爲君也。」原臣篇曰：「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爲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救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且以爲纖介之疾

也。」又曰：「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存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常不背也。」（上均見明夷待訪錄）這種道理，在現代是極普通的常識；然以之與歷來的孔家學說相較，則便是一大轉變的表現了。（c）再次述俞理初的學說。俞理初卒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其學說也恰恰代表孔家學說的轉變。俞頗擁護女權，於歷來男女不平的事跡，極力批評。其節婦說曰：「禮郊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義。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男子理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又曰：「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其妒非女人惡德論曰：「妒在士君子爲義德，謂女人妒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買妾而妻不妒，則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之道也。」又貞女說曰：「烏乎，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上均見癸巳存稿）此等道理。卽現在亦有未通行

者。但在新智識分子心目中，却已成了極普通的常識。不過俞氏亦能道出。便不是尋常事了。

上述思想的轉變，與整個中國的歷史之轉變恰相適應。近代整個中國歷史的轉變，以一八四〇——四二的鴉片之戰爲關鍵。在這關鍵之前，促成中國歷史之轉變的大事，爲各國與中國的通商。例如葡國，一五一六年（明正德十五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西班牙，一五七五年（明萬曆三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英國，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俄國 一六五四年（清順治十一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荷蘭 一六五六年（清順治十三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法國 一六六〇年（清順治十七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美國 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即開始與中國通商；在這關鍵之後，促成中國歷史之轉變的大事，爲各國與中國的戰爭。一八四〇——四二年，的鴉片戰爭，即是一個開端。一八五六——六〇年（咸豐六年到十年）有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有中日之戰；一九〇〇——〇一年（光緒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有八國聯軍之役。這祇是人人都曉得的較大的戰爭；此外尚有無數的小衝突。凡此大小戰爭衝突，統是鴉片戰爭以來，各國以武力壓迫中國的表現。各國以通商及戰爭兩種方式與中國發生關係，中國歷史，竟因這些關係而發生空前未有之大變遷。思想的轉變，亦即發端於這大變遷向前遞演的時代。上述三家思想，從

歷來孔家學說上轉一個方向，幾乎與原來的方向相反。其受時代與環境影響的事跡，我雖未曾指明，然其爲劃時代的轉變，則已章章明顯。至若後此的新思想，則完全爲時代與環境之直接產物；茲述一二於次，以示資產階級的思想，如何依社會經濟的轉變而漸漸型成。

一二、新時代的張之洞

張之洞并不是學者，也不是思想家，向來敘述近代中國思想的，很少提到這個人。但他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社會之思想的成立過程中，却是一個極重要的人。他以兩湖總督的資格，著書立說，倡導維新，其影響之大，不容否認。上面所述：戴東原，黃黎洲，俞理初諸人的思想，雖從幾千年遞演下來的孔家學說上轉了一個彎，可以代表思想界的開始轉變。但於西洋資本主義社會裏所流行的新思想，却未明白表示歡迎。張之洞就不同了。他自己固不是思想家，却極力主張迎受新思想。其主張具見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所發表之勸學篇。該書很可以表示新舊思想交替時代之一般的情形。其主要之點，可概括如下：（一）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中國思想界的變動，完全爲國際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壓迫的結果。他在勸學篇的序言裏說：『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警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禍而急』

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又謂昔「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瞶瞶，起魯國諸儒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宴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唯知亡，則知強矣。」務求有學有力有恥，以復求強；乃張之洞著書的目的，也就是近代中國各種新思想所以輸入之動因。張究竟用什麼方法使人有學有力有恥以求強呢？這便要研究他那（一）新舊并重的主張，才能明白。他對當時新舊不能調和的情形曾發痛切之言曰：「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多岐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瘡，而恢復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

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勸學篇序』這是講新舊不調和之害的。他既知新舊不調和不能禦外侮，自然要主張新舊兼學。於是在勸學篇下，設學第三論學堂之五要時，首先便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張之洞的舊學爲體，新學爲用的主張，在近代中國思想變動的歷史上是有名的。他根據這個主張，更提出所謂『務本』『務通』『五知』等等講法。

一三、新時代的張之洞（續前）

勸學篇序言曰：「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補助之者。乃窺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內篇（共九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共十五篇）務通，以開風氣。：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現在先看他（三）所謂「務本」的究竟講的一些什麼。關於務本的，一共有九篇文章：『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閱神明之胃脩，無論胥

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為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枿也。』（同上）這九篇之中，祇去毒一篇，用意稍有不同。其他如教忠，明綱，宗經，正權，循序，守約等，無一不是要繼續孔家學說之遺緒者。不過單靠孔家學說，決不足以救危亡。帝國主義深入中國之時，孔家學說，於繼續麻醉人心，或仍有用；但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却毫無用處。至是張之洞便不得不講其所謂（四）務通了。外篇十五，是講務通的。『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因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樂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習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鐵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

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竊逞小忿而敗大計也。」（同上）上所列舉，實在毛細已極，實夠不上稱思想。但在農業手工業社會轉變到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這些毛細事情却是絕對必要的，絕對不能不提倡。一經提倡，則姑無論在實際上見諸施行與否，都有大效。實際上見諸施行者，則提倡之功可以教人擁護，實際上未見施行者，則提倡之功，可以教人趕快振興。一個老大帝國開始變成「摩登」國家之時，這等提倡之功，實不容磨滅。此外（五）張氏所謂五知又是什麼呢？他說：「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爾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奇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同上）這等說話，感情的成分居多，不十分重要。敘述至此，我們可以結束幾句曰：張之洞這門人之重要，不在他自己的思想，而在他推進新思想的功勞。他所提倡的，所鼓吹的，無一不是摩登中國所必須見諸實行者。戴東原，黃黎洲，俞理初諸人，對孔家學說表反感，可以說開始棄舊；但未表示迎新。張之洞對西政西藝肯提倡，可說開始迎新；但舍不得棄舊，仍要以「舊學爲體」。直到新民叢報諸人手裏，「棄舊」「迎新」

的工作，才同時并進。

一四、新民叢報裏的梁啓超

新民叢報裏的重要人物爲梁啓超。梁啓超對中國的影響，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他有兩個特點，使他在社會上能發生極大的影響：第一，他在當時，先別人一着草草率率的販了一肚子的西洋思想；第二，他是一個極好的新聞家，能作淋漓痛快的報章雜誌之文章。關於這兩點，他自己有幾句公道話說：「啓超……以宣傳爲業，爲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庭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自中華民國十年起算，因此段文係從該年之著作錄出）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文學概論一四一到一四二頁）拿着常帶情感之筆，并根據販來的新思想，作武器，梁氏在中國思想界乃大做其「棄舊」與「迎新」的工作。（梁氏的破壞功夫。在光緒二十餘年的時代，國內新舊思想衝突最甚。張之洞著勸學篇，折衷於新舊之間，主張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梁氏則極端破壞舊的：「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

學者，摺擊無完膚。」（清儒學術概論一四〇頁）對於當時所謂孔教，反對最力。其言有曰：『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書，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爲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寢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羣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詈以相奪；情狀抑何可憐；……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壬寅年的新民叢報）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知也；然則非此新學新理蓋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附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而非真理也。萬一遍索諸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別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簡造我國民也。故吾所惡乎舞父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

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上面兩段文章，頗能表示梁氏破壞舊思想，反對孔教的勇氣。同時尊重思想自由的精神，亦於其中可以看出。這與張之洞的「明綱……以保教」「宗經……以折衷於聖」等主張，便截然不同了。

一五、新民叢報中之梁啟超（續前）

現在我且來看一看（b）梁氏的建設功夫。梁氏建設的工夫，多偏於政治道德方面。於道德，則重進取冒險；於政治，則重平等與自由。進取，冒險，平等，自由，這本是西洋資本主義社會裏極尋常之事。所謂梁氏的建設工夫，也祇是說他努力把這些尋常之事介紹過來；並不是說他自己有什麼獨創的主張。這一點他自己亦很明白，常自作批評曰：「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清代學術概論一四八頁）這可說是很公道的評論。不過他那介紹新思想的功勞，究竟是不可磨滅的。他自己曾說：「啓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為無限制的盡量輸入。……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民國十年時起算）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啓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同上）這種批評，也不是自誇。他在當時，介紹新思想的功勞，比任何人為大。當時所謂平等自由之說，是很遭人反

對的。例如以「新學爲用」的張之洞，便是反對者之一。他常主張「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見前）而梁則頤力主張民權；提倡權利思想。其言有曰：「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爲其人格之所關。彼夫爲藏獲者，雖以窮卑極恥之事廷辱之，其受也泰然。若在高尙之武士，則雖擲頭顱以抗雪其名譽，所不辭矣。爲穿窬者，雖以至醜極垢之名過毀之，其居也恬然。若在純潔之商人，則雖傾萬金以表白其信用，所不辭矣。何也？當其受侵受壓受誣也，其精神上無形之苦痛，直感覺而不能自己。彼誤解權利之真相者，以爲是不過於形骸上物質上之利益，斷斷計較焉。嘻，鄙哉，其爲淺丈夫之言也。……吾中國先哲之教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此自前人有爲而發之者，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而末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誤盡天下。……大抵中國善言仁，而泰西善言義。仁者人也，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義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許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爲至乎？在千萬年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則義也者，誠救時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雖非侵人自由；而待仁於人者，則是放棄自由也。仁焉者多，則待仁於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使人格日趨於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體之至焉者也。吾中國人唯日望仁政於

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則爲之嬰兒；遇不仁焉者，則爲之魚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爲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王寅新民叢報編輯部第八節）梁氏痛恨中國人民過於懦弱，任人魚肉，故主張對權利而競爭。但競爭之不已，一定發生危害權利之事。故同時又必提倡法律以確保權利。所以他說：「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爲第一要義。凡一羣之有法律，無論爲良爲惡，而皆爲操立法權之人制定之以自護其權利者也。強於權利思想之國民，其法律必屢屢變更而進於善。蓋其始由少數之人出其強權以自利；其後復由多數之人復出其強權相抵制，而亦以自利。權利思想愈發達，則人人務爲強者。強與強相遇，權與權相衡，於是和平善美之新法乃成。」（同上）上述種種，乃資本主義社會裏極尋常的道理，且梁氏介紹，亦不完不備。但在當時却很重要；與張之洞的「正權，辨上下，定民志，以防民權之亂政」的話比較起來，便有天壤之別了。要主張民權，主張權利思想，便須連帶主張「自由」。梁氏於「自由」的介紹，雖也不完不備，但在新民叢報中，却總竭力主張。他曾說：「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

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數百年來，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爲之原動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時不同，其國不同，其所需之種類不同；故其所求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諸實事而非虛談；施諸公敵而非私利一也。」（王寅新民報彙編新民說第九節）我們現在拿張之洞與梁啟超比較起來，得兩個主要不同之點。一，張主吸收新的，維持舊的，造成其所謂「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之說。梁則於吸收新的之外，同時并極力破壞舊的。二，兩人雖都主張吸收新的，但張祇主張吸收應用於物質之改造的實用科學；而不及政治道德倫理等。梁則於實用科學之外，更竭力宣傳政治道德倫理各方面之新說。

一六、「德」賽「兩先生暢游中國」

張之洞所謂舊學爲體之體，在梁啟超手裏，差不多完全換了一套新的，如權利思想，民權思想，自由思想乃至冒險進取，自尊自治等等新道德是也。這一套新東西，直到「五四」時代的前後，意義漸漸明顯，學人們常用一個名詞來概括，曰德莫克萊西（*Democracy*）的精神。張所謂西學爲用之用，本是指一切實用科學而言。在「五四」時代的前後，學人們常以之與德莫克萊西的精神對舉。稱之曰賽恩斯（*Science*）的精神。新青年雜誌曾有一次爲更簡括之稱，曰「德」「賽」兩先生。這兩位先生，與資本主義社會幾乎結了不解之緣。就其發展而言，可以

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就其作用而言，又可以說是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因。自張之洞梁啟超以後，這兩位先生，因報章雜誌的發達，外國書籍的翻譯，以及白話文的盛行，乃得暢游中國。賽先生也者，科學是也。何謂科學？那是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但賽先生既是以西方嘉賓的資格暢游中國，我們無妨即以國人對此嘉賓的觀感解答之。這裏很可以借重唯心論者梁漱溟的幾句現成話。梁謂：「我們雖然也會打鐵，煉鋼，做火藥，做木貨，做石貨，建築房屋，橋梁，以及種種的製作工程。但是我們的製作工程，都專靠那工匠心心傳受的手藝。西方却一切要根據科學，用一種方法把許多零碎的經驗，不全的知識，經營成學問，往前探討，與手藝全然分開。而應付一切，解決一切的，都憑科學，不在手藝。……科學求公例原則，要大家共認證實的；所以前人所未有的，今人都得有得，其所貴便在新發明。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逐步前進，當然今勝於古。藝術在乎天才祕巧，是個人獨得的；前人的造詣，後人每覺趕不上，其所貴便在祖傳祕訣，而自然要歎今不如古。……西方人走上了科學的道，便事事都成了科學的。起首祇是自然界的東西，其後種種的人事，上自國家大政，下至社會上瑣碎問題，都有許多許多專門的學問，為先事的研究。因為他總要去求客觀公斷的知識，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規矩，而絕不聽憑個人的聰明小慧，到臨時去瞎碰。所以

拿着一幅科學方法，一樣一樣的都去組織成了學問。那一門一門學問的名目，中國人從來都不曾聽見說過。……西方的學術思想處處看去，都表現一種特別的彩色，與我們截然兩樣，就是所謂科學的精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三十七頁到四十九頁）至於德莫克萊西的精神，梁也有一段話曰：『西方學術思想上的特別，固已特別的很了。還有在吾人生活上一種更古怪的樣法。……西方人護持權利，護持自由，……第一層便是公眾的事，大家都有參與作主的權。第二層，便是，個人的事，大家都無過問的權，……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來作主辦，個人的事，便自己來主辦，別人不得妨害。所謂「共和，『平等，『自由，』不過如此而已，別無深解。……這種傾向，我們叫他「人的個性伸展」人的個性伸展，前邊所說，不過是在社會生活最重要的一面——國家——表現出來的，其實從這一個根本點，種種方面，都要表現出來。……成年的兒子，有他自己的志願，作他自己的生活，不以孝養老子爲事業，在法律上權利都是平等的，並不以老子兒子而異。父母不能加兒女以刑罰，至於婆婆打媳婦，更是他聞所未聞的了。兒女的婚姻，由他們自己作主，因爲是他們自己的事。夫婦之間，各有各的財產，丈夫用了妻子的錢要還的。妻子出門作什麼事，丈夫并不能過問。一言不合，就要離婚，那裏可以打得？諸如此類，不須多數。——但是我們還要留意：西方的社會，不可單看人的

個性伸展一面，還有人的社會性發達一面。……個性伸展的時候，如果非同社會性發達，新路就走不上去。新路走不上去，即刻就循舊路走，所謂個性伸展的，又不見了。個性社會性要同時發展纔成。……總而言之，據我看西方社會與我們不同所在，這「個性伸展，社會性發達」九字足以盡之，不能復外。這樣新異的色彩，給他個簡單的名稱，便是「德莫克萊西」。……所有西方化，通是這「德莫克萊西」，與前頭所說「科學」兩精神的結晶。分着說，自然是一則表現於社會生活上，一則表現於學術思想上。但其實學術思想社會生活何能各別存立呢？所以這兩種精神也就不相離的了。」（同上四十九頁到六十一頁）梁在當時是要提出孔子之「剛」的（同上三百一十一頁）但「德」「養」兩先生也居然到了他的眼下，也爲他所瞥見，可見「德」「養」兩位，在五卅時代，便已暢游中國了。幾千年來的孔家學說，在戴東原，顧炎武，俞理初諸人手裏，受一大挫。張之洞主張「舊學爲體」，稍稍爲孔家爭了一口小氣。但張同時又主張以「新學爲用」，這便不是好玩的了。到梁啟超手裏，孔家學說，幾乎全然絕跡。梁在當時，一方面極力主張破壞舊的，另一方面，極力主張歡迎新的；在中國傳播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的思想，以梁啟超的力量爲最大。到五四時代，因報章雜誌新書的發達，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的所謂「德莫克萊西」思想或精神及「賽恩斯」（科學）思想或精神，

乃得一時傳徧中國。

一七、工具主義

五四以後，有所謂工具主義者，經胡適之的介紹，在中國教育界學術界頗流行，同時且做了推進上述兩種思想或精神的利器。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最近英美各國，流行一種資產階級的最淺薄的哲學，叫做Pragmatism，張東蓀稱之曰唯用論。杜威的工具主義或實驗主義，即唯用論中的一個支派。唯用論中有三個較為出色的人物：一為F. C. S. Schiller著作很多，主要的有：Riddles of the Sphinx, Studies in Humanism, Formal Logic等，Formal Logic一書，可以說是從消極方面，替杜威之工具主義張目的。這個人自稱其主義為人文主義（Humanism），但因少人提倡介紹；在中國沒有影響。另一為William James，著作也很多。在哲學方面較為重要之作有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及Pragmatism等。唯用論Pragmatism幾乎是他獨一的主義。此外便要數到杜威了。他的著作，比上兩人更多；他在中國的名聲，較任何外國學者之名為大；他在中國的影響，亦較任何外國學者之影響為大。他的工具主義之精華，即一般人所傳的思想之五步是也。杜威所謂思想的五步，如下：一，疑難的境地；二，確定疑難之所在；三，提出解決疑難的假設；

四，將假設措諸實際，五，看效果如何。這五步，我們縮短爲三步亦無不可。一，二兩步，屬於思想之來路，是研究每一思想之所由起的；三，四兩步，屬於思想之中路，是研究思想在實際上之作用的；第五步則屬於思想之後路，是研究思想在實際上所生之效果的。這三步，在五四時代，凡在報章雜誌上作文章的人們，無不弄得爛熟。喜歡新花樣者更創所謂三W主義以代之：曰 Why 曰 How 曰 What。杜威所謂思想方法，本來就是作事方法。每作一事，當問爲什麼作，這便是 Why；當問怎樣作法，這便是 How；當問作了有什麼效果，這便是 What。這種方法，本極尋常，任何人作事，都有幾分與此相類，這也實在夠不起被稱爲什麼哲學。但杜威一切著作中所討論的，是這個；胡適之在中國替他宣傳的，也是這個；自「五四」以來，教育界學術界實際受用了的也是這個。這個東西的道理本極淺，但在中國所生的根却很深。因此之故，最近的無產階級哲學如辯證唯物論之類正被他擋住，不容易進來；縱在年輕的學生中稍稍流行；但在五四時代已經成年的學人中，却萬萬不能進去。杜威這種方法，胡適之又稱之爲「祖孫方法」。他說：「杜威先生不會給我們一些關於特別問題的特別主張，——如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戀愛之類，——他祇給了我一個哲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從來不把一個制度或學

說看作一個孤立的東西，總把牠看作一個中段，一頭是他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頭是他自己發生的效果；上頭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孫。捉住了這兩頭，他再也逃不出去了。這個方法的應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寬恕的，因為他處處指出一個制度或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指出他的歷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歷史上佔的地位與價值，故不致有過分的苛責。一方面，這個方法又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的，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這種方法，是一切帶有評判精神的運動的一個重要武器。」（胡適文存五三四頁）胡氏對這方法的恭維，固已至矣盡矣；這個方法在資產階級眼中，本也有牠自身的好處。有什麼好處呢？第一，牠是很「寬恕的」，凡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私有財產，剝削關係等，牠都一一維持擁護。第二，牠是很「嚴厲的」，凡不合於資本主義之要求的東西，牠都一一批評；學校製造出來的人材，不適於資本家之需要，牠可以創實驗學校，以求其適合。真良法也哉！

一八、所謂綜合的道德論

上面所述，幾乎全是傳播資本主義社會之思想的，並沒有講什麼獨立的思想。實在說，中國近幾十年來，所謂文人學士，除一部份傳播資本主義社會之思想外，幾乎沒有一個有獨立思想的。蔡元培常倡以美育代宗教；似當建立自己的思想。但圖於此點，至今

尚未看見他有一萬字以上的文章作說明！頂頂大名的哲學博士胡適之，除著了中國哲學史上卷之外，不見他有絲毫獨創的哲學思想。吳稚暉雖然有過他自己所謂新宇宙觀及新人生觀；但在社會上從未發生過影響，并且今已完全成爲過去了。祇有張東蓀自命不凡，常謂自己綜合各派，試建了新說。近著一書，曰道德哲學，其第七章第三節，便是他的新說之所在。張是極端反對唯心論，并主張唯心論的；其闡明資產階級諸學者之道德論，很少錯誤。但他自己試建之說，除綜合各派之成說以外，實在沒有建立什麼新東西。在資產階級的學術界，還不能算是有所建樹的人。不過他的著作，也頗引起人們的批評；他自己又自命爲有所建樹，我們無妨卽以他的說話爲資產階級思想之代表。他那綜合的道德論之着眼點，爲生活的放大。（1）何謂生活？他說：「生活之性質非他，夫亦曰：新鮮活潑而已。……吾人之一見一聞，一喜一悲，一言一動，卽爲生活。故新鮮活潑之義，必含有此時此地之義。此時此處，可簡稱之曰：『今此』（以今代此時，以此代此地）。而親歷此『今此』，或體驗此『今此』者，則謂之曰生活。……生活係事實，其本身無意義可言，無價值可言。……是以吾人第一步當視生活爲純粹事實。事實者意義與價值未曾加於其上之謂也。」（2）生活之放大——生活爲限於時空上交切點之體驗，而生活之目的，則爲求有以放大此切點。……所放大之

範圍愈廣，則其解決困難也愈多；所放大之範圍愈小，則其解決困難必亦愈少。……在時空交切點之生活，以其爲獨一無二，以其不能重複，我名之曰生活之本身。換言之亦即生命之自身也。至於其放大之範圍，以其爲所必需，我名之曰生活價值。言其爲價值於生活也。故生活之本身無意義無價值。而因附有生活價值，遂致生活本身亦得有意義有價值。吾人平素謂生活之意義與價值者，非指生活之本身言，乃卽以此放大之範圍而言耳。質言之，卽生活倘止有時空之交切點，則無價值；而若超出此交切點則始有價值。……且其超出之範圍愈廣，則其價值亦愈大。故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純視此放大之範圍。(3)所謂理想。「普通所謂理想，係對「現實」而言。吾以爲惟在時空交切點上之生活，可稱爲現實。而放大此交切點，卽所以超出此交切點，此則可歸之於理想，以生活之目的在超出此現實故也。故生活爲現實，而生活之目的爲理想。生活所努力者，卽由現實以達於理想。質言之，現實者有限也，變也，渾亂也；而理想者無限也，恆也，確定也。以有限變亂之生活，而自求有以達於無限永恆，斯謂之向理想而趨。(4)文化與道德。「人類現實生活，受制於時空之交切點，顧人無不欲超越此交切點；凡向此超越之努力，堆集其共同者，名之曰文化。文化有種種；對於物質需要則有經濟；對於合羣之維繫則有政治；對於條理之審知，則有學術；而對於

行爲方面有所律則者，厥曰道德。」（5）創造的道德。「個人精神有所創造足於原有文化之總體有所增加者，此種創造，即代表文化之前進。個人精神之此種創造亦有各方面：有於美術方面者，有於學理方面者，有於經濟方面者。而於行爲方面，則爲道德。此即所謂創造的道德是已。」（6）拘束的道德。「人常有在文化層中向下墮落之勢，故不得不有拘束的道德。拘束的道德無他：即禁人之下墮是已。……無論如何開化之社會，其中不能絕對無害羣之分子。」害羣之分子，即不道德的分子，「不道德即爲惡」(evil)。惡之來源有三：曰自然之惡，曰人性之惡，曰制度之惡。……要之，自然之惡，與人性之惡以及制度之惡常混合爲一，不易分析。往往有一惡事焉，由於人性使然，亦由自然所迫，亦因制度所演。謂其純出於何種，不可也。……所謂道德，即爲對於此種不道德之征服。亦即理想征服現實之謂也。苟有人能於此種不道德之征服加以計算而確證已征服者視未征服者由少而漸多，則必可使吾人於厭世主義與樂天主義（即進化的淑世主義）之間，定其抉擇矣」。

一九、略評綜合的道德論

上述這種綜合的道德論，有值得略予評論的地方。（1）解釋生活，太忽視物質基礎。謂生活爲新鮮活潑，爲一見一聞，一喜一悲，一言一動，爲「今此」，爲時空之交切點。以時空之交切點爲生活，以「今此」爲生活，這祇是一種空談。生活一事，實建於我

之身軀及其所處之環境兩個物質基礎上。避免這兩個物質基礎不談，祇以「今此」爲生活，祇以一見一聞，一喜一悲，一言一動爲生活，而不涉及一見一聞，一喜一悲，一言一動之所從出的基礎；於作文章時，固可省去許多麻煩。但（2）所謂生活之放大，便爲不可能了。時空之交切點自己可以超出時空之交切點嗎？「今此」自己可以超出「今此」嗎？若謂超出時空之交切點的，超出「今此」的，不是時空交切點之本身，不是「今此」的本身，而爲我之身軀及其所處之環境互相磨擦之結果；那末與所謂生活之放大的原意便不符了。原意生活之放大，即時空交切點之放大。今於時空交切點外另找放大之根據，那末當然與原意不符了，（3）基於此點。所謂理想，又成廢話。「普通所謂理想，係對現實而言。吾以爲唯在時空交切點上之生活可稱爲現實。而放大此交切點，即所以超出此交切點，此則可歸之於理想。」放大或超出交切點即爲理想。但交切點放大自己，超出自己，除根據我之身軀及其所處之環境兩者互相磨擦之外，是不可能的。張既故意丟開此兩者不涉及，以免作文時麻煩；但正因此，所謂理想，乃成廢話。上述三點，係指明忽視物質基礎，生活即無放大之可能。現姑讓一步，承認時空交切點上之生活，可以不憑物質基礎而放大，如俗所謂鬼與靈魂然。但張所分之生活與理想之別，仍有問題。張謂「生活爲現實，生活之目的爲理想，生活所

努力者即由現實以達於理想，實言之，現實者有限也，變也，渾亂也；而理想者無限也，恆也，確定也。「生活既祇在時空之交切一點」上，其分量殆等於零（一有放大，便出交切點，便是理想。）有什麼「有限」可言？有什麼「變」可言？有什麼「渾亂」可言？理想既是由生活放大，明明由「今此」展開，何謂「無限」？明明是放大，是移動，是展開，何謂「恆」？何謂「確定」？張謂「以有限變亂之生活而自求有以達於無限永恆，斯謂之向理想而趨」。不知他所謂「無限永恆」，究何所指？指「神」乎？則與基督教徒之說無異，指人類前後相續努力奮鬥爲「無限永恆」乎？則此又明明是向前而趨的活動，不是所趨向的理想。（4）解釋道德，太過含混。張氏所謂道德，至少有三個根本不同的意義，第（一）道德爲文化全體之原因，凡經濟，政治，學術，宗教等，皆有待於道德，皆待道德而始成立。第（二）「道德即文化自身之一方面」，爲與經濟，政治，學術，宗教等並立，而專門「律則行爲」的東西。第（三）道德即文化之整全體。蓋「道德爲對於……不道德之征服」。不道德謂之惡evil。惡之來源有三，曰自然之惡，曰人性之惡，曰制度之惡。道德既是對不道德的征服，那末凡征服自然之惡的物理學，化學，機械學，醫學，等等都成了道德。凡征服人性之惡的教育學，優生學等，以及征服制度之惡的一切學說都成了道德。張氏立言，到處露此三種

不同的意義。而自己下道德之定義，却又祇把牠當作與經濟，政治，學術等並立，而專門「律則行爲」的東西。這樣閃爍其詞，實在令人莫明其妙。但在張氏自己，却是很好的。因爲這樣可以免去自己說話作文的拘束。(5)述道德的本身，太過空洞。如云「個人精神有所創造……於行爲方面，則爲道德」。此即所謂創造的道德是已。」這種說話，空洞到這樣，實在等於不說。假如有人要想從張氏說話中了解所謂「創造的道德」，那便糟了。(6)絕對避免實際不談。例如講自然之惡時，謂「天然缺陷中最大者即爲食料不足之問題……此點實爲人類文化前途之危機。」本可繼述資產階級傾銷政策 Dumping Policy 下無產階級飢寒的矛盾現象。但隨即謂「此非本書所應論」以轉勢。又如講人性之惡時，謂「慾非惡亦非善。而要視其與文化層之理想的格局是否鑿柄不相入。」學者抬出的「文化層之理想的格局」，既偉大，又堂皇。在此格局之下，有權勢的軍閥，殺人如屠羊豕，不見有什麼鑿柄不相入。無權勢的車夫，每日積一元六角錢，送一元與車主，亦找不出什麼鑿柄不相入。好一個「文化層之理想的格局」，可以把吃人的社會，彌縫得點水不漏，使吃人者肆行無忌，被吃者俯首貼耳。再如講制度之惡時，標舉「向上」「自由」「平等」三大原則以爲制度之標準。對於現社會任何壞制度，則一詞不贊。凡此等等，都是避免實際之所在。概括的說，綜合的

道德論之特點，有下列三項：一，爲免去作文的麻煩起見，竭力舍棄物質基礎不談，竭力舍棄社會歷史的事實不談。二，這樣一來，把一個百孔千瘡的社會，彌縫得妥妥貼貼，使人看不見社會上的不平等。三，引誘讀者向玄虛方面跑，向空想的路上跑，使他們於不知不覺之中好談玄虛，厭棄實際。整個的綜合道德論之本身，固未能成一個體系；但有這三個特點，也大可以挂資產階級思想的招牌了。

第三節 無產階級哲學之勃興

二〇、現代中國與輿導周報

幾千年以來的舊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之內，竟逐漸變成了摩登中國。中國既已摩登了，現代化了，中國的思想也跟着摩登化，現代化。於是有梁啟超胡適之輩前後介紹資本主義社會裏流行的思想於中國，有張東蓀爲摩登中國試建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不過中國開始摩登之日，便逐漸成了整個世界經濟系統中之一部門。中國在世界的經濟系統中，祇有部分與全體之別，祇有名義上的區別。實際上却成了一個不可分的東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有賴於中國；中國不供給原料，他們的生產感受恐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有賴於中國；中國不消費

商品，他們的貿易感受恐慌。換言之，整個帝國主義，或國際資本主義的壽命，差不多繫於中國之一身。中國是帝國主義一個良好的投資地，商品出售地，原料出產地。這個道理，現在講的人也很多；我們在本書中也講得不少，這裏且不多述。基於這個道理，中國與世界竟融成了一體；中國在整個世界經濟系統中，祇是一個部門，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這樣一來，帝國主義或國際資本主義統治下所流行的新思想，中國亦得流行。無產階級的哲學思想近來在中國暢行，其重要原因，即因中國與世界融成了一體。中國與世界融成了一體，於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與世界的資產階級立於一邊，無形中成立一個陣容。中國的無產階級與世界的無產階級也立於一邊，無形中也成立了一個陣容。從整個世界看去，祇看見兩大陣容的對立，看不見許多國家的孤立。世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逐漸顯現其對立的過程，同時也就是許多孤立的國家逐漸喪失其孤立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之中，無產階級的哲學思想乃勃然興起，并蔓延於全世界。

蔓延到中國時，便首先在導報裏爲具體之表現。導報周報在武漢政府時代銷路最廣，據說有一個短時期內，每一期出版，不到一天，可以銷到五萬份。這事并不虛假，也不稀奇。因爲導報在武漢政府時代以前，早就有了；受了牠的影響的青年，爲數很多。武漢政府樹立的時代，一齊跑

到武漢，從事革命。那末幾萬份的響導，在一天之內銷完，是極尋常的事情。響導周報，始終沒有專門談過什麼無產階級哲學之理論問題，牠在武漢政府時代以前，專門分析中國軍事政治之實際狀況。不過執筆的人，對於無產階級哲學的理論，都有部分的相當的了解。以唯物史觀解釋社會政治軍事等現象，幾乎是響導報裏諸執筆者一致的意見。所以當時該報的文章，比較的能獨樹一幟；文筆頗好，吸引力亦較大，故能風行一時。但響導之風行一時，正是今日無產階級哲學之理論的介紹的先夜。今日執筆爲文，討論無產階級哲學問題或介紹無產階級哲學思想的青年，十有八九，是當年受過響導之影響的。響導分裂以後，響導消滅了。思想較爲左傾的青年，多集中在上海；能讀外國書，能寫中國文的，爲數亦不少。一個短時期的蘊釀，乃有最近過去以及現在無產階級思想之暢行。不過我們現在敘述無產階級哲學思想，應該以響導爲開路的先驅。

二一、伊利亞派之「靜」

無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即現在大家所宣傳的「辯證唯物論」(Dialectic Materialism)是也。「辯證唯物論」的內容，我們從 Dietzen 的著作中，可以找出兩個非常適當的名詞來描寫其大意：即偏重物一方面言，可以說是「講變的物」(Changeable Matter)的；偏重變一方面言，可以說是講「物的變」(Material Change)的 (Dietzen: The Positive Outcome)。

Philosophy 八三頁) 依於前者，乃有「辯證的唯物論」，依於後者，乃有「唯物的辯證法。」兩者着重之點，都在「變」與「物」的結合。但這種結合，直到 Marx, Engels, Lenin, Dietzgen 一般人手裏，才完成。且「變」的觀念是從「不變」或「靜止」的觀念發展出來的；「物」的觀念，則是從「心」或「精神」的觀念發展出來的。都不是成於一旦。

人類的思想，本來完全是變的事物之反映；但變的事物，總易被人看作僵死的，靜止的。明明是事物之變擺在眼前；却偏要說變是事物之假相，不變或靜止才是真相。希臘伊利亞派 Eleatic School 中的 Xenophanes, Parmenides, Melissus, Zen, Gorgias 等，都是否認變的。尤以 Parmenides 的靜止的「有」Being 爲令人發笑。氏謂：(1)「有」不能由其他之狀態變成現狀。假如能是這樣變，那末原來的狀態，究竟是「有」Being 還是「無」Nonbeing 呢？如果是有，則從有變到有，實等於不變。如果是無，則從無變到有，等於無中生有，於理爲不可通。(2)有不能由現狀變成其他的狀態。假如能這樣變，那末其他之狀態，將是何等？如果是有，則仍是從有變到有，等於不變。如果是無，則從有到無，等於消滅，於理爲不可通。(3)有不能移動，因爲移動要在「空間」在行。「空間」果是有？還是無呢？如果是有，則有在有中移動，等於不移動。如果是無，則根本

沒有可以移動的地方。(4)有爲聯續不可分的整全體，其中并無裂縫。如有裂縫者，則此裂縫果是有？還是無呢？如果是有，則有與有之間的裂縫仍是有，等於無裂縫。如果是無，則裂縫且沒有。當然祇是整全體。(5)有爲絕對，獨立，自足的。如果不是絕對，獨立，自足；則必依靠他物始能存在。然則被依靠之他物，果是有？還是無？如果是有，則是自己依靠自己，等於不依靠。如果是無，則有依靠無，祇是不依靠什麼，祇是絕對獨立自足。(6)有祇是一個，不能有第二個，第三個等等。如果有者，則祇是其自身之聯續。總而言之，「有」爲永久的，不變的，不動的，聯續的，不可分的，無限的，獨一整全體。在 Parmenides 看來，在這個獨一整全體中；一切差異，都融解而爲一團了。(參看 Webber: History of Philosophy 111頁到117頁)這樣靜止的世界，固然祇有伊利亞派的人，說得出來。但平心說來，「靜止」觀，在思想界是很普遍的。其勢力縱不比「變動」觀大，但亦決不比牠小。大概社會次序由「紛亂」漸趨於「安定」的時候，「變動」觀一定會從容不迫的被擠在「靜止」觀的後背去。抬頭得勢的，祇是靜止觀。中國孔子的思想，希臘 Aristotle 的思想，都是極好的代表。

二二、黑格爾的邏輯與「變」

其實宇宙間決無靜止不變的東西。「宇宙及其進化，人類及

其發展，與夫進化或發展在人類思維中的反映；複雜錯綜，不可數紀。祇有憑辯證的方法，不斷的注意其生死動蕩，往復變遷；才可以正確的暴露其真象。德國的哲學，曾從這方面用過工夫；例如康德，便把牛頓那個不變的太陽系統，及其無限的綿延，看作歷史發展的結果；把太陽及一切星體，看作一大星雲質由旋轉變化而成。根據這個道理，同時他且推論：此太陽體系，將來之死亡爲必然。半世紀之後，他的道理，被Laplace弄得很完整；又半世紀之後，有分光鏡，把星雲質在空間逐漸凝成的事情證明。德國這種哲學，到黑格爾手裏，乃發展到登峯造極。在黑格爾的哲學系統中，有一最大之功勞，即他首先把整個世界，無論其爲自然的，爲歷史的，爲思維的，通看作一種過程；看作不斷的運動，變遷，轉變，發展。他很想把一切運動及發展的整全體之內部聯繫，清理出來。（Engels: 'Ueber den Utopian and Scientific' 三五頁到三六頁。摘錄大意，非直譯原文。）的確不錯，黑格爾對於變動的道理，真講得不少。他的重要著作邏輯學 *Science of Logic* 完全是講變的。他把「有」Being 「無」Nothing 相結以成「變」Becoming 的道理說得渾透。他說：「單純的「有」，在伊利亞派的眼中，便是絕對，便是唯一的真理。尤其是Parmenides，他以為祇有「有」是存在的，「無」是絕不存在的。至若在東方思想中，尤其在佛教中，「無」或「空」又成了絕對的原理。祇有

Herakleitos，很反對這種一偏之見，而以較高的「變」之一概念，統一「有」與「無」。他說：「有」之存在，與「無」之存在相若；萬物是流轉的。其意即曰：萬物皆在變化之中。」（*Science of Logic*，第一卷九五頁到九六頁。摘錄大意，非直譯原文。）何謂變？他說：「變」即是「有」與「無」之不可分離。「有」與「無」之必然的統一，即謂之變。在「變」之中，「有」與「無」，皆存在。但「有」與「無」既統一於「變」了，也可以說皆不存在。所存在的，祇是超越的動或越過。……「變」或以「無」為始，「無」與「有」相結，乃成顯現；或以「有」為始，「有」與「無」相結，乃成沒落。一顯現，一沒落，或一起一伏，便謂之變。……起與伏的相持，即「變」之本身。……在起與伏相持之中，「有」與「無」的存在，正因其彼此之不分顯；但「變」之所以為「變」，又全靠「有」與「無」彼此之不混同。」（全上第一卷一一八頁到一九頁）上所述者，是「有」與「無」相結以成「變」的道理。現再錄幾句關於「有限」finite與「無限」infinite相結以成「進步」progress的話於此，以期互相發明。黑氏曰：「進步：初有「有限」；其次越過「有限」，即得「有限」之否定，便是「無限」；再其次，又越過「無限」，即將「有限」之否定再否定之，便是新的「有限」，至是乃得一完全自決之運動：其終極之點，即起始之點；是之謂「有限」的改造。」（全上第

一卷一六〇頁錄大意）自「有限」達「無限」，或自「無限」達「有限」；正與自「有」達「無」或自「無」達「有」。不過前者講「進」，後者講「變」；然同是否認「靜止」或「不變」。

二三、由唯心到唯物

黑格爾對於「變」的解釋雖有大功；「但他自己，究竟還有幾層的限制：一則，他個人的知識，有限；二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一般的知識，其深與闊，也都是有限的。此外還有第三個限制；即黑格爾自己是一個觀念論者。在他看起來，腦中的種種思維，祇是實際事物及其許多過程之抽象的描寫，但反過來說，事物及其過程又祇是觀念的反映；觀念乃永久存在的東西，未有世界以前，便已存在。這種想法，把世界完全翻了一個邊；把世間事物之實際的關係，完全翻轉了。」（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二七頁) 費爾巴哈 Ludwig Feuerbach 於此，便做了劃時代的人物。『他那曠世不朽的，劃時代的重要性，即在他能堅決的離開黑格爾的觀念論，而正式宣布唯物論。唯物論在十八世紀時，尤其在法國，早已成了攻擊當時政治，宗教，乃至形而上學的武器。』（Lenin: The Imperialist War(一〇頁) 費爾巴哈能正式宣布唯物論，脫離觀念論，那當然要做劃時代的人物了。他說：『現代哲學上自命的觀念論 Hegel 的唯心論 Spiritualism，常以誹謗的口調責難唯物論：謂唯物論是獨斷論，謂其出發點完全根據感覺，以感覺為不宜置辯的

客觀真理，認識爲存於自我以外的實際世界；祇是精神的產物云云。『實際說起來，卽人類的幻想的產物，祇也是自然的產物；因爲人類的幻想力，也同其他能力一樣，分析到最後，其根本或發源，仍祇在一種自然力當中。』（以上兩段，係從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九一頁到九二頁上譯錄大意，非直譯原文。）這樣的說話，便是很明顯的唯物論的主張。唯物論最重要的意義，在承認實際事物之客觀的存在。實際事物，並不是因爲先有了我們的感覺而始存在的，反之，沒有我們的感覺，實際事物依然存在。這樣客觀存在的事物，康德稱之爲「物如」或「物之自身」Ding an sich。物之自身，卽是本體，本體是不可知的。可知的祇是現象。費爾巴哈很反對這個意思；他以爲現象與本體，並不是截然分立的兩事，所謂本體，祇是實際事物的抽象之稱呼。康德所謂本體，雖然也是一種抽象的稱呼，但是沒有實際作基礎，祇是一種空的抽象。費氏也承認「物之自身」，也承認本體。但他的所謂本體，乃根據實際事物作基礎的抽象，不是康德的空的抽象。關於此點，Lenin曾替他作有一個扼要的解釋曰：『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卽在承認思維以外的事物本身之存在。費氏的「物之自身」，與康德的「物之自身」絕對相反。……康德的「物之自身」，是「沒有實際的抽象」Abstraction Without reality，費氏的「物之自身」，則是「根

據實際的抽象」Abstraction of reality，即客觀的可知界之抽象；而此客觀的可知界，却與現象界無稍差池。』（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九一頁）

二四、歷史的唯物主義

費爾巴哈離開觀念論，正式宣布唯物論，固有大功。但「他的唯物論，究竟不十分完全，不十分周到。」馬克斯輩，雖曾一時做過他的信徒，但後來却都看出了他的唯物論之弱點。（Lenin: The Imperialist War 110頁）馬克斯與恩格斯既看出了費氏唯物論之弱點，乃又「漸漸離開費氏，自己鼓起勇氣，與俗學者洗門爭，注意於澈底發展唯物論的哲學。他們不但以唯物的認識論作出發點，同時并以歷史的唯物論作出發點。馬克斯與恩格斯的著作於講辯證的唯物主義時，對於「唯物主義」固然看重，但尤其看重「辯證的方法」。於講歷史的唯物主義時，對於「歷史」固然看重，但尤其看重「物質」（Lenin: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118四頁）辯證的唯物主義與歷史的唯物主義并非相反而不相容的東西。辯證的唯物主義，固不一定就是歷史的唯物主義，因這主義不一定祇研究歷史或社會也。但拿這主義研究歷史或社會，却是真正歷史的唯物主義之所以得名。

馬克斯與恩格斯都拿辯證的唯物主義研究歷史和社會；我們於此，最宜引他們的話，以見歷史

的唯物主義之真相。馬克斯說：「在社會的生產中，不管各人願意與否，各人都須加入一定必然之關係——生產關係；此等關係，與人類生產力發展之階段，是相適應的。此等關係之總和，即構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在此結構之上，乃有法律政治等上層結構之生產；與此結構相適應的，又有一定社會意識之形態。生活資料之生產的形式，總是決定人生之社會，政治，思想等活動的。決定人類之存在的，不是他們的意識；反之，他們的意識，乃受其社會存在之決定的。人類發展到一定之階段，物質的社會生產力常與當時之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以法律上的術語明之，即與前此所憑藉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前此的財產關係，本是生產力發展的外形，今則變成生產力之桎梏了。至是社會革命的時期乃開始。首先有經濟基礎的變動，隨着便有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多多少少變起來。考慮此等變化時，有一重要區別，我們須常常留意：即在一方面為生產的經濟基礎之物質的變化，此等變化，由自然科學可以決定；在另一方面，為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及其他一切觀念的定型；人們漸覺此等定型與物質的變動相衝突，思有以解決之。這樣的變革時期，斷非訴諸當時的意識所能說明；反之，我們祇能認當時的意識為物質生活之矛盾的結果，或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之衝突的結果。」（馬克思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序言之大意）細讀上文。

凡「辯證的」「唯物的」「歷史的」種種特點，無不具備。如不管各人願意與否，各人都須加入一定生產關係；以及存在決定意識等，皆「唯物的」特點也。生產關係初為生產力發展之外形，後則變成生產力之桎梏；以及一切意識定型與物質變動之衝突等皆「辯證的」特點也。所研究說明者，又皆為社會生產力之史的發展，此則「歷史的」特點也。此三個特點，合之乃成歷史的唯物主義。恩格斯所說，亦可與此相發明。恩氏曰：「一切社會結構之基礎，最要者為生活資料之生產，其次為生產品之交換。歷史上一切社會中，財產分配之方法，以及階級次序之分化，概依生產方法及交換方法而定。凡一切社會變化，政治革命之最後原因，皆當本此見解去探求。此等原因，祇可於生產方法及交換方法之變革中求得；決不能從人類之腦中或所謂永久真理及公道之追逐中求得。」（*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五頁大意）這種見解，也是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的唯物主義的。

二五、辯證唯物主義之宇宙觀

拿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歷史或社會，得歷史的唯物主義；拿

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整個宇宙，則得辯證唯物主義之宇宙觀。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宜拿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學說作例。狄慈根對辯證唯物主義之貢獻，任何人不能否認，且為馬克斯，恩格斯及列寧輩所特別推崇。一八七二年，海牙國際大會席上，馬克斯介紹他於與會諸代表曰：「這裏是

我們的哲學家 Here is our philosopher』其推崇可以想見了。恩格斯在 Feuerbach, The Roots of the Socialist Philosophy 一書裏述辯證法之本質時說：『唯物的辯證法，許多年以來，已成了我們最良的工具及最銳的武器；這東西之發明，德國工人狄慈根與有大力；且他之發明，完全係獨立的成功；并未依傍我們，甚至於未依傍黑格爾。』這也可見得他之偉大了。狄慈根在學理上的貢獻，他的兒子曾有一段不亢不卑的話曰：『對人類的悟性及自然界作分析的及綜合的研究；研究的結果，應用於社會的及宇宙的整個現象而能收到最圓滿的效果，這是狄慈根特別的成功。他這種成功，正值無產階級抬頭的時代；於了解社會運動上對馬克斯及恩格斯幫助極大。同時馬克斯及恩格斯的研究，却又幫助了狄慈根，使他能更進一步，根據自己的認識論，建設一元的宇宙。』

(Diezgen: Philosophical Essays 四八頁)

狄慈根的認識論，在無產階級的哲學中，確有獨到之處。他的理論約略如下：客觀世界千差萬別的事物不斷的衝撞吾人之感覺；由各種事物與感覺的相互衝撞，遂得各種感覺。這是認識作用的第一步。吾人的腦，將各種感覺，聯合而統一之，因以構成思維。這是認識作用的第二步。感覺以客觀的事物為材料；思維則以感覺為材料。由成立之經過看，思維是出於物質的；由客觀事物到

感覺，由感覺到思維。但思維一經成立，却與客觀事物有別，而不復是原來的客觀事物。客觀事物，經過感覺，而入思維；思維，憑藉感覺，而建於客觀事物之上。因此之故，我們可以說：『心是物的，物是心的。心與物在互相關係之中皆爲實在。』（*Disson: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六頁）換言之，即心與物在認識過程之中統一了。狄氏根據他的認識論，進而建立他的宇宙論。狄氏宇宙論之要點爲：事物之本身與事物之現象之辯證的統一。事物之本身與事物之現象，本是可區別 *Can be distinguished* 而不可分離 *Can not be separated* 的東西。就事物之入於感覺界而言，可以稱之爲『我們的物』*thing-for-us*，可以稱之爲現象。但入於感覺界之事物，原在我們以外，原有其『自己的存在』*thing-in-itself*，事物自己的存在，即事物之本身。事物之本身與事物之現象，其根本區別不過如是而已。但休謨 *Hume*。反康德輩一定要說是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休謨以爲我們對於本體，不必知道；康德以爲我們對於本體，不能知道；所知道的，可以知道的，祇是現象。這種道理，狄慈根是不承認的。狄氏以爲本體是可以知道的。怎樣可以知道呢？憑現象可以知道。因爲現象與本體原是一事；就其在感覺界之內而言曰現象，就其在感覺界之外而言曰本體。但在感覺界之外者，隨時隨地與感官相磨擦，相衝撞，因而得入於感覺界之內。一入感覺界之內，便成了思

維的材料。一經思維的綜合統一，便成所謂物之本體，物之真象，物之自身。（全上八〇到一〇四頁）費爾巴哈以「本體爲根據實際的抽象」，其意與此略同（見前）辯證唯物主義之宇宙觀，當然不是上面所述的這樣簡略。但此處限於篇幅，祇能述到這裏爲止。讀者如有雅興，最宜取狄氏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一書中四一頁到一七三頁 *The Nature of Human Brain Work* 之部分與 *Lenin's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第二章對照研究。

二六、辯證法

辯證唯物主義之要點即在辯證法。倘將辯證法丟開，唯物主義或仍存在；但那便不是辯證的唯物主義，而是機械的唯物主義。然則辯證法究竟是什麼呢？這裏有特別提出來討論的必要。簡單說來，辯證法即萬物變動的法則。（我們依據這法則去理解事物，則此法則便成爲我們探求真理的工具。）萬物的變動，即物的發展，乃由於互相反對之物的互相鬥爭。互相反對之物的統一（黑格爾以爲一經統一，便一度入於靜態，所謂靜止的統一 *Static Unity* 是也。參看 *Science of Logic* 一卷一一八頁末了一行。）爲暫時的，爲相對的；互相反對之物的鬥爭却爲悠久的，爲絕對的。互相反對之物，在何處可以看出呢？這尋常得很，隨處可以看出：

在數學中，有正與負的相反對或微與積的相反對。

在機械學中，有主動與反動的反對；

在物理學中，有陰電與陽電的反對。

在化學中，有原子的結合與原子的分解相反對。

在社會中，有階級的相反對。（上係從 Lenin's 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 三二三頁錄出）互相反對之物，在互相鬥爭之中，各自的分量若有所增加，則鬥爭的強度，當然有所變動。增加的分量，倘到了一定的程度，則鬥爭的結果，竟可將原來包含相反之物的總體，忽然轉變其性質，使之與原來的性質截然不同，或全然相反。這叫做由量的增加到質的變異。例如炭（C）輕（且）硬（O）三元素所構成之總體，因原素分量有種種之不同，所成總體，亦就有種種性質之差別。

CH_3O_2	醋酸 Acetic Acid	溶解度 〇〇度
$\text{C}_2\text{H}_4\text{O}_2$	醋酸 Acetic Acid	溶解度 一六度
$\text{C}_3\text{H}_6\text{O}_2$	Propionic Acid	溶解度 一四〇度
$\text{C}_4\text{H}_8\text{O}_2$	丁酸 Butyric Acid	溶解度 一六二度
$\text{C}_5\text{H}_{10}\text{O}_2$	Valeric Acid	溶解度 一七五度

(上係從 Engels: *Landmark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一五七頁錄出) 量的增加到質的變異；或一事物因內含相反之物的量的增加，鬥爭的結果，使該事物轉變性質，致與原來的性質截然相反：這可以說就是辯證法的精髓。這樣的轉變，遍存於人事，社會，自然的任何方面。黑格爾說：「凡運動之所在，生命之所在，以及世間任何事物顯現之所在；都是辯證法的工作場所。」(Wallace: *The Logic of Hegel* 一四八頁。此書是 Wallace 從 Hegel's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中譯出)「有限事物之限制，非僅自外而來：其自身的本質，即是取消其自身的原因；其自身的活動，可以使其轉化到與自身相對之物。」(同上頁)這樣的轉化，上錄恩格斯之例，乃自然界中之最顯明者。在精神界中，黑格爾舉了好幾個最顯明的例，茲錄如下：例如：

在法律中，抽象的「對」，若推到極端，便成「不對」。

在政治中，極端的無政府與極端的專制，必然相接而興。

在倫理中，驕傲常在失敗之先；多智常成不智。

在心理中，極端痛苦與極端快樂常相接而生。歡樂極者常繼之以淚；痛苦極者常繼之以笑。

(上係從 Wallace's *The Logic of Hegel* 一五〇至一五一頁錄出) 此等實例，我們不能說個個正確。但很可以暗

示我們在精神界也同樣有「由量的增加到質的變異」的事態。「由量的增加到質的變異」之過程，通常都以「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等字描寫之。就一事物之原狀而言曰「正」；就原狀之取消而言，曰「反」；但原狀之取消，并非歸於烏有，實乃成一新物，新物者「合」也。由「正」經「反」以達「合」之整個過程，謂之「三合體」(Triad)。

二七、

社會階級之互相衝突

相反之物的互相鬥爭無論在自然中，社會中，意識界，隨處都可以看出；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在社會中最顯之例，厥為階級之衝突。任何社會之中，總不免一部份人與另一部份人互相衝突之事。社會生活，實充滿了矛盾；歷史所昭示我們的事實，隨處可見。人羣與人羣之間的鬥爭，社會與社會間的鬥爭；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之內革命與反動之相遞演，太平與混亂之相接連，進步與停滯之相交替等等，都是極顯明的實例。馬克斯於此，給了人家一種最透闢的學說，曰階級衝突論。吾人要研究社會的成果，而得到正確的意義，祇有研究社會內部的衝突，祇有研究社會與社會間的衝突，才能辦到。社會的衝突，起於各階級的生活及境遇之不同。馬克斯在 *Communist Manifesto* 裏開始便曰：「所有人類的历史，無論現在過去，都是階級衝突的历史。」(Engels 在其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四十一頁有如下之一句：所有過去的

歷史，除許多原始的階段以外，都是階級衝突史。）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會主與手藝人——一言以蔽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彼此實站在極相反對之地位。彼此鬥爭無已時，有時暗鬥，有時明爭；鬥爭之必然的結果：或為整個社會構造中發生革命的變動；或鬥爭的雙方同歸於盡。……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係從封建社會之廢墟上興起的，對於階級對立之事，并未結束；僅樹立了新階級以代替舊階級，造成了新的壓迫情境，孕育了新的鬥爭。我們這個時代，即資產階級時代，所不同於前此的地方，祇是把階級的對立簡單化了。社會逐漸分裂為兩個大的敵對營壘，兩個大的直接相反的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是從歷史上看出來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馬氏又分析階級之變動及各階級對革命之態度曰：『在今日與資產階級相衝突的一切階級之中，祇有無產階級是真革命的。其他各階級，都隨着大產業之興起而衰微沒落；但無產階級，却是大產業之最顯明的產物。凡中下階級——如小製造業者，小商人，小手工業者，以及自耕農民——都一致反對資產階級，但其希望却在保全自己在中等階級中之存在。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獨止此，他們而且是反動的；因為他們想把歷史的輪子開向後轉哩！他們假若也革命，那祇是因為他們自己怕墮入無產階級的地位；暫時放棄目前的利益，以圖保全將來的利

益；暫時犧牲自己的立場，以採取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兩段係從 D. Ryazanof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f Marx and Engels 五頁二六頁及三九頁節譯大意）

二八、社會主義

階級衝突的前途，爲社會主義。祇有社會主義的實行，才可以消滅階級的衝突，才可以消滅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工具——國家。『使國家真正變爲整個社會的代表的首先要工作，即在將生產工具自資產階級手中取出，爲整個社會利益之用；這種工作，同時即是國家之所以爲國家的最後獨立之工作。國家權力干與社會關係的事情，將成爲莫須有的，將從各方面逐漸絕滅。治人的政府，將轉變爲治事的及管理生產的政府。國家用不着廢棄，牠自己定會滅亡。』社會開始根據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重行組織生產時，要將國家這架大機器，在織機與鐵斧之旁，轉入古董博物院去。」（上兩段係恩格斯的話，從 Lenin: The Imperialist War 四一頁到四二頁譯出來的。）國家這架大機器，歷來都是一階級鎮壓另一階級的工具。（參看第四章第一節）古代的国家是奴隸主 Slave-owners 鎮壓奴隸的，封建的国家是貴族鎮壓農奴的，近世代議國家，則是資產階級鎮壓工錢勞動者 Wage labour 的。社會主義實行的起碼一步，當然要首先奪取這架機器，憑牠的力量，把私有財產制取消，然後任牠向古董博物院裏死下去。私有財產制取消了，國家死亡了，社會進入了社會主

義之最高階段。此時情形如何，馬克斯有一段扼要的文章曰：「在共產社會之最高階段內，人類因屈從分工原則而受奴役的事情沒有了；因此腦力工作與體力工作的反對將就消滅；勞動將不復僅是維持生活的手段，其自身將成爲生活首要之內容的一種；因個性充分發展之故，生產力亦將達於成熟；社會一切的富力概將轉入於一個前進無間的活流——祇有這時候，才能完全越過資產階級社會法則之狹隘範圍；也祇有這時候，社會才能掛上自己那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符號。」（上係從 *Lenin: Imperialism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一九九頁轉譯大意。）無產階級哲學最大的實際的成果，也祇有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才算到手。我述無產階級哲學思想，暫止於此。本節標題爲無產階級哲學思想之勃興；敘述時，當特別注意的應爲下列各點：無產階級哲學思想在中國怎樣勃興的，刊行了好多出版物，流布到了一些什麼地方；信從的人有多少，對此思想有新貢獻的有幾人。但我除在本節第一段講現代中國與響導周報時稍稍涉及無產階級哲學思想在中國發端外，其他各段所敘，幾乎完全是無產階級哲學之本身。但我之如此，也有理由：一則無產階級哲學思想的本身，也有再行略爲介紹的必要。因讀我此書的人，不一定都是熟悉此種思想的。二則上舉各點，研究起來，一定乾燥無味，且一定不得要領。應該讓喜作社會統計的人去研究。三則無產階級哲學思

想近來在中國勃興之狀，似已成了極尋常的事實；我不研究，人們也不至否認。

結論——世界之統一與再分裂

一、

中國之辯證的變動

由上各章所論，現代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可以明白了。現代中國，係幾千年的歷史產物與今日的整個世界互相交接而造成，由歷史上的遺產，轉變而為新國家；所謂新國家，又恰恰嵌在整個世界關係之內。由過去到現在，為中國之現代化的過程；由中國到世界，為中國之世界化的過程。此兩個過程，有區別而不可分離 *Can be distinguished but not separated*。現代化即在世界化之過程中，世界化即在現代化之過程中：縱看為現代化，橫看則為世界化。中國維新的深度，同時即是與世界相關的密度；中國與世界相關的密度，同時即是牠自身維新的深度。拿事實說，凡經濟的變動，社會階級的重組，政治教育之維新，以及思想的變動等，件件足以證明，這個道理。在歷史上的經濟中，因私有土地制的畸形發展，以及農品及手工品之交

換的盛行，農村中乃有鉅量的地租及商業資本；由地租及商業資本中又分化出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以及地租，乃舊時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此結果，在維新的過程中，却成了新式經濟滋長的根基。舊時代的果，恰恰成了新時代的因。帝國主義之壓迫一來，挽回利權的運動乃起。舊有的地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在挽回利權的運動之下，一一轉入新式生產事業之中；至是得經濟的維新，至是乃有所謂民族資本主義。但民族資本主義與國際資本主義相較，有如嬰兒之於壯年，因此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乃乘虛而暢入。中國的經濟雖已維新，而資本主義的勢力，却為帝國主義的勢力所左右。中國的新式經濟，因帝國主義之刺激而勃興；勃興的結果，却又成了便利國際資本主義的條件！中國經濟的變動，如是而已：由過去的翻為現代的；由中國的翻為世界的！

經濟的變動，拖着社會階級與之俱變。貴族，官僚，地主，富商大賈，立於一邊；憑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由地租翻成的土地資本為剝削工具，藉政治勢力以剝削農工；農民，手藝工人及手工業者，以血與肉供其剝削。兩兩對立，衝突未有已時；或暗鬥以構成歷史上的太平，或明爭以構成歷史上的變亂；此舊時階級對立之情形也。及民族資本主義興，舊時代的階級對立，乃翻成新時代的階級對立。舊日剝削他人者，隨其資本的性質之變動（由土地資本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

變成民族資本，而成了新式資本家或民族資本家。舊時被他人剝削者，亦隨其被剝削的方式之不同，而成爲盈千累萬之無產階級。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對立，此新時代之情形也。但此種對立，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階級對立是相一致的。於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於無意有意之間，立於世界的資產階級（即國際資本主義者）一邊，擁護資本主義的生產制。中國的無產階級亦隨着而與各國的無產階級，直接間接表示同情。至是中國的社會關係乃全然套在世界的社會關係之內。社會階級之變動固如此，維持階級次序之工具，如政治如教育，其變動的方向亦恰與之相適應。在舊日的中國，有政權者爲貴族，有治權者爲官僚，絕無受政治保護者爲地主。此三者皆直接（地主）或間接（官僚與貴族）剝削農工的剩餘勞動以爲生；因此舊日的政治可名之曰地主政治。自帝國主義侵入，圖強運動興起，於是有政治的維新。政治維新之日，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之時。照理而論，新政治之權，應操於民族資本家之手。但民族資本家方幼稚，不足以左右政治；所謂新政，乃暫時停滯於軍閥之手。恰當此時，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布滿國中；中國的軍閥，乃成國際資本主義者之良好工具，爲之鎮壓反抗，爲之安定市場。至是中國的政治，乃成爲國際資本主義之代理政治。

政治與社會階級相適應，教育亦與社會階級相適應，且教育與政治又彼此相適應。就教育之適

烈社會階級言，中國歷史上之教育，概爲貴族，官僚，地主所獨佔。就教育之適應政治言，中國歷史上的教育，幾乎完全是發展治術的教育。當帝國主義肆行侵略之時，爲圖強起見，一面固維新政治，另一面却也改革教育。教育一經改革，於是拋棄向來治術教育之舊觀，而努力於新式人材之培植，以期新人材能協助資本主義的生產，能使中國轉弱爲強。但民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在幼稚時期，新式人材的數量之多，超出生產事業的容量之外，於是形成供過於求之現象。新教育之目的雖不錯，而新教育的功用竟全無。不過新教育之無功用，乃就中國本身言。若就國際資本主義者言，則有非常之大用！開通風氣，使其易於進來一也；培植中外友誼，使其在中國易於發展二也；傳播資本主義之文明，使其文化殖民地，能收最後之成果三也。因此種種，中國的新教育，乃成了國際資本主義的新教育，完全是替牠文化殖民地之工具。

與教育及政治相適應，同時又具維持階級次序之功用的，還有思想一端最爲重要。中國舊日幫助貴族官僚地主的思想，彰明較著成功的有儒家，暗地偷着成功的有法家。自民族資產階級代貴族地主而興，舊日的儒家法家等思想，亦漸爲德莫克萊西（民主主義）與賽恩斯（科學）等思想所代替。德莫克萊西與賽恩斯等思想在中國暢發之日，正世界經濟完全統於一個體系之時。世界經濟統

一方告成，而世界階級的對立已開始。於是無產階級的哲學思想，乃在中國勃興。

二、世界之橫的統一與縱的分裂

歷史上幾千年傳下的舊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逐漸否定了。但否定并不是消滅！反之，乃套入整個世界經濟系統中成了一個新東西。中國套入世界經濟系統之日，便是整個世界經濟系統完全成立之時。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與列強間發生過許多軍事政治外交的衝突。這許多衝突的結果，便是世界經濟系統之完成。世界經濟系統之完成，即我所謂世界之橫的統一。世界之橫的統一逐步實現，世界之縱的分裂，亦隨着逐步形成。我所謂縱的分裂者，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之謂也。中國與列強在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衝突，我稱之爲新的種族鬥爭，以別於周秦以前之種族鬥爭。周秦以前之種族鬥爭，僅限於亞洲東南部一隅的漢滿蒙回藏苗等族；新的種族鬥爭，實即國與國之鬥爭，其範圍則擴大到全世界之各國。在此新的種族鬥爭過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我稱之爲新的階級對立，以別於歷史上的階級對立，歷史上的階級對立，其存在限於各國內部；新的階級對立，則是由各國經濟地位相同之階級於有意無意之間互相接近而成。各國的資產階級；立於一邊，互相聯合，成爲一個「世界的」資產階級，以國際聯盟爲其代表機關。各國的無產階級，立於另一邊，互相聯合，成爲一個「世界的」無

產階級，以第三國際爲其代表機關。這兩大階級各自的內部儘有紛糾衝突，但彼此相對的陣容。決不混亂。世界的資產階級內部彼此之間，雖有衝突，但對於鎮壓無產階級，却是一致的。世界的無產階級內部彼此之間，或者也有糾紛，但對於反抗資產階級，却是一致的。這樣的階級對立，是明目共覩的事實，并非我誇大其詞，定要把一個統一的世界，看成兩個階級的對立。即三民主義中也有下面一段話曰：『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是順天行道。』（民族主義第三講）這也可見世界階級的對立，不是可以任意誇大的，而是實在不容否認的事實。被壓迫的確數是否爲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姑不具論。但現在求一被壓迫之機會以圖苟活而不可得的失業人口，却一天一天增加。這些人爲什麼日益增加呢？唯一重要原因，就在資產階級把他們向生產事業之外驅逐。資產階級爲要榨取無產階級的剩餘勞動，不得不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的結果，便是生產過剩與消費不及的矛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爲私有財產制固定了，消費能力無法抬高；生產品在市場上找不到多數的主顧，於是物價低落，於是對外貿易縮減，於是國內商品不得出賣，於是收縮生產。於是工廠關門，於是工人被驅逐於工廠之外。這樣的複雜現象，總稱爲經

濟恐慌。經濟恐慌的次數亦得愈多，每次到來的時間延得愈久，波及的範圍愈加廣。影響的程度愈加深：如一九二九年到現在的恐慌之例，驅使着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互相傾軋，互相衝突。在全世界資產階級互相傾軋，互相衝突，到了銳化之時，全世界無產階級起而根本推翻私有財產制，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徹底改造世界的經濟系統，乃成了人類文化史上之必然的任務。這一個任務完全實現之日，乃世界階級對立之局開始消滅之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途，繫於這一個任務之完全實現；中國被壓迫民衆的前途，也繫於這一個任務之完全實現。

